胡凤集团

冤案始末

李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 版 人：董 伟
策划编辑：陈志明
责任编辑：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刘文东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上架建议：历史/畅销

ISBN 978-7-5115-0030-4
9 787511 500304 >
定价：58.00元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李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 李辉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5-0030-4

Ⅰ. ①胡… Ⅱ. ①李… Ⅲ.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134 号

书　　名：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作　　者：李　辉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刘文东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65369530
编辑热线：（010）6536953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20　1/16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28
印　　数：0，0001-1，0000 册
印　　次：2010 年 2 月 第 1 版　　2010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030-4
定　　价：58.00 元

作者新版说明

拙著初次以《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为题，发表于1988年的《百花洲》杂志，198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同年，相继在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繁体字版本。1996年，东京岩波书店分上下两册出版日文版。1998年，复以《文坛悲歌》为题列入《李辉文集》出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以《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再版，并根据当事人和读者的指正和建议，我对部分史实作了修订和补充，另外根据初版后新披露的史料，对引文、特别是上层往来批示与通信作了适当调整，以期更为准确地勾画历史原貌。

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描述和研究，其准确性和深度远非拙著所能企及。我为这一历史发展、为自己能够成为众多历史叙说者中的一员感到高兴。

自首次发表《文坛悲歌》，倏忽已过二十年，一切都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些年里，我所采访过的、描写过的几位“胡风分子”——这些在苦难中磨砺的前辈，相继辞世，我不会忘记他们在我写作此书过程中的帮助，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路翎、鲁藜、曾卓、罗洛、梅志、王戎、耿庸、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他们走了，永远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他们所敬重的胡风，和先于他们辞世的友人相聚。希望他

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息。借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新版之际，谨将这些年所写怀念他们的文章附录书后，作为补充，以求历史叙述的完整性。

二十一年前完成本书写作时，我刚刚三十出头，如今却已过知天命之年。说是“知天命”，仅仅是一种奢望，其实，尽管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解说已经相当丰富，但仍很难说今人对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尽然了解。那段历史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对未来的影响，恐怕远没到描述清晰和完整的程度。至于对历史的解读和思考，更是有着许多新的角度和层面，需要发掘和深入。在这一意义上说，拙著的修订再版，如同当年发表一样，仍是抛砖引玉，期待着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加入到历史叙说的行列。

历史终有不再让人困惑的那一天。

希望如此。

但愿如此。

李 辉

定稿于2009年11月1日，北京飘雪中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它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80 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1980 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1986 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1988 年 6 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但是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80 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会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

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回头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做的正是这种工作。李辉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正直的年轻学者，他虽然在报刊编辑部工作，但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1985 年和陈思和同志合作的《巴金论稿》问世，我就钦佩他的精神。从对巴金的理解中，就可以见到他的思想与心灵。后来，他又写出了《浪迹天涯——萧乾传》，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没有想到，他在繁忙的报刊编辑工作之余，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材料丰富翔实、思想庄重的纪实作品，从从容容地把牵动社会心灵的一大历史事件描述得这么明晰。这与其说是驾驭历史的能力，不如说是履行历史责任的正义感。可见，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并不缺少优秀的儿女，有这些儿女在，大地是不会沉沦的。说历史是公正的，她的公正，还得由她的正直的儿女来体现；说历史大厦是雄伟的，他的雄伟，毕竟需要人的脊梁来支撑；否则，历史就会是朦胧的，大厦就会是倾斜的。

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 30 年代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

太执着、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文学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与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相比,实在是高明很多。从"情"来看,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讲,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韧性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需要从胡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中得到某种启发的。但恰恰是这种心态和性格,反而难以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能通过胡风命运的思考,使我们减少一点蒙昧和幼稚,能使我们更自觉地创造一种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心灵的环境,我们也许会取回一定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正是提供我们思考的一部很好的历史见证录。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是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我感谢一切敢于面对历史错误的人们,包括著写这份历史报告的作者。

1988年岁末

引 子

李辉：

一支微弱的笔，难以记录下历史的风云变幻。

但永远有人在拿着笔，在记录着。

人创造着历史，历史也创造着人。

给历史造碑的，是人。

给人造碑的，是历史。

（1987年岁末）

黄宗羲：

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使为海若者，沃然自喜，曰："咨尔诸水，寻源而来，不有缓急平险，清浊远近之殊乎？不可谓尽吾之族类也，盍各返尔故处？"如是则不待尾闾之浅，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今之好同恶异者，何以异是？

（《明儒学案》序，1669年—1676年）

三

马克思：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 年）

四

毛泽东：

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55 年 5 月）

五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到 1956 年底，绝大部分

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

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

六

中共中央：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1980年9月29日）

七

赫尔岑：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转引自《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

目 录

作者新版说明 …… 1

刘再复序：历史悲歌歌一曲 …… 3

引 子 …… 1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 …… 1

第二章

阿垅受挫 …… 23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 …… 38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 …… 50

第五章

舒芜反戈一击 …… 70

第六章

三十万言上书中央 …… 94

第七章

“我们必须战斗” …… 112

第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132

第九章

在被捕的日子里 …… 157

第十章

风暴袭来之后 …… 182

第十一章

1957 年——一个怪圈 …… 207

第十二章

狱中 …… 229

第十三章

受难的妻子们 …… 248

第十四章

受株连的人们 …… 261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又一个怪圈 …… 276

第十六章

劫后重逢 …… 297

第十七章

一段历史的终结 …… 316

尾　声

三年之后 …… 337

初版后记

…… 340

附　录

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 …… 345

1955 年的禁书 …… 355

风雨中的雕像 …… 361

在冬天:怀念梅志 …… 380

曾卓:“悬崖边的树”,寂寞而倔强 …… 384

灵魂在飞翔 …… 386

解冻时节 …… 391

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 …… 400

绝响谁听? …… 405

何满子:自龙门走来 …… 414

第一章 怀仁堂里的胡风

一

静。寒冷中的静,更衬出威严。

静得出奇。寒冷似乎凝固了古都北平的一切。没有了喧闹的市声,没有了风的呼号,连本来可能发出轰鸣的炮声,也全凝固在一月的寒冷中。

一夜之间,曾经剑拔弩张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顿时偃旗息鼓,开出了古城。北平显得空荡,静,似乎是永恒的了。

第二天,1949 年 2 月 1 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头版通栏标题赫然醒目: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头条消息报道——

肩题: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

主题:北平宣告完全解放

副题:国民党军已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在石家庄出版的这张《人民日报》,仍然袭用中华民国的年号:中华民国 38 年 2 月 2 日。不久,在大陆这就将成为历史。

2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3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启示:自 3 月 15 日起,《人民日报》迁移北平市出版;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朱德、毛泽东进驻中南海……

随后,各条战线、不同类型的全国性代表大会在北平相继召开,学联、青联、妇

联、工会……应运而生。

共和国在筹建中。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新闻。消息告诉人们:全会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

从以农村包围城市,到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要转折。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一段有力的结尾。谁也不能怀疑胜利者的乐观,谁也无法否定已经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会充满着信心、充满着豪情,等待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潮!

就在3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最下方,一长横条窄窄的消息,与上面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与全国妇代大会隆重开幕的消息相比,是那么不起眼,好像热闹的都市里一条僻静的小巷。可以想象,当年,人们捧着这张报纸时,完全可能将它只是扫上一眼,甚或忽略掉。可是,对于中国文艺界,这条小巷却胜似往日盛大聚会的广场。

“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消息报道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近日在北平成立。

【本报讯】为适应全国革命形势与革命任务的需要,团结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建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京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特于2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场推选筹委会,并于24日举行第一次筹委会议。当选筹委为: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郑振铎、叶圣陶、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曹靖华、曹禺、徐悲鸿、柳亚子、俞平伯、胡风、贺绿汀、程砚秋、李广田、叶浅予、赵树理、柯仲平、吕骥、古元、袁牧之、艾青、欧阳山、荒煤、李伯钊、马彦

祥、宋之的、刘白羽、盛家伦等三十七人，并选举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关于代表大会代表产生问题，会上决定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原五大解放区文协理事及中华全国文协总会及各分会理监事为代表大会当然代表，此外由筹委会酌情邀请若干文艺界人士参加代表大会。

三个多月后，7月2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他们走来了。几百位代表来自东北、华北、西北、中原……他们风尘仆仆，一起参加新的时代文坛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议。

然而，在各自的内心世界里，步入怀仁堂大厅时，其实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些代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一部分，来自过去以上海、重庆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进行着同样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所在的区域不同，感情表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就是这样的不同，决定了此刻他们心理上或显著、或微妙的差别。

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们，领略过战争的壮观。他们的笔触，饱蘸着延河的水，他们描绘的人生画卷上，都衬着延安的骄傲。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者，是和士兵们一道打下江山的文化人，未来的文艺，必然是他们走过的道路的延续。说他们是未来中国文艺的主人，是未来文坛的主宰，此刻是谁也不能怀疑也不可怀疑的事，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他们骄傲，他们自豪。他们完全有更多的理由高昂着头，带着解放者的微笑，步入文代会的会场。

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家们，尽管怀着同样的喜悦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面对着人民解放军对旧制度的武器的批判，他们真诚地感受到文艺的微弱，感受到手中的笔那么苍白无力；面对着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家，他们真诚地感到惭愧，真诚地羡慕喝过延河水的光荣。重庆的雾，上海的阁楼，南京的城垣和延安的窑洞相比，显得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解放者”，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这是他们心中隐隐作痛的惭愧。

当年参加过这次文代会的话剧界代表凤子，40年后回忆说：当年，我们这些

来自国统区的代表，虽然一直在斗争着，可那时总觉得我们矮人三分。我们觉得自己是过时的人物，需要重新学习。

巴金来自国统区，尽管他的小说在国统区、在解放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可是他真诚地写出大会发言：《我是来学习的》。

……

骄傲也好，惭愧也好；真诚也好，勉强也好，曾经心存芥蒂的人们，今天都迈着同样的步履，走进怀仁堂。

二

主席台后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前端上方中央，挂着第一次文代会会徽。会徽由毛泽东、鲁迅的侧影像和六面红旗构成。

40余幅锦旗，并排挂在台上，这些锦旗是各系统、各部队向文代会赠送的，上面赫然绣着一句句祝辞：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为人民服务”；

……

主席台两侧的墙壁上，嵌有两块洁白的浮雕。一块上面塑着四个解放军战士前进的姿势；一块上面塑着工农兵结为一体的图形。

会场后面中央，置放着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

主席台上，端坐着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陆定一、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蔡廷锴等，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等方面向文艺家的盛会表示祝贺。

郭沫若站到了麦克风前面，他是本届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总主席。郭沫若精瘦的身躯，充溢着比五四时代时还要豪放的激情，他的眼神里，飘着彩虹般美丽的未来，胸中似乎有着永远也倾泻不尽的兴奋和高歌。

唱起来了，与会的每一个人引吭高歌。

他们唱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首普通农民的歌，今天，从文艺家的口中飞出。在他们此刻的心境里，这首简单又简单的歌，单调又单调的旋律，一定比所有音乐精品还要伟大，还

要美妙动听。和这首农民的歌相比，他们的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画，顿时黯然失色。

他们无限敬佩无限崇拜伟大的救星——毛泽东。《东方红》的旋律，早已替代《国际歌》的旋律，在他们的心中久久萦绕。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当时的报纸上，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他们深深知道，没有他，就没有历史今天的转折，更不会有这次空前的文艺界盛会。

无可指摘的崇拜，理所当然的崇拜。

《东方红》的歌声，激荡在怀仁堂，激荡在中南海。

胡风以他的高亢的声音歌唱着。

和其他人一样，胡风对毛泽东充满敬意，他由衷地崇拜这位中国革命的伟人。在现在，在以后的一些年里，他几乎总是以他那带点偏执的真诚，崇拜着毛泽东。

被人常常贬为有“领袖欲”的他，倒是如一名普通的士兵，一名普通的农民，天真、纯朴，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领袖，用倾吐不尽的诗情高唱赞歌。即使后来身陷囹圄时，他依然以特殊的语言方式，表达着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敬仰。

此刻，高唱着《东方红》，胡风更是对毛泽东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然而，胡风此时的心情，绝不会如此单一，在几百名代表中，他的心态，也许要算最为特殊的一位。

自三月份当选为一次文代会的筹委之后，胡风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之一，另外两位是茅盾、厂民(严辰)。他还被列入一次文代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他在大会期间，任诗歌组委员兼负责人，另一位是艾青，委员有十二人：李广田、柳亚子、柯仲平、俞平伯、田间、冯乃超、何其芳、臧克家、冯至等。

在《人民日报》上，他的名字屡屡出现：4月9日，他和文化界名人共同发表宣言，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4月24日，他和茅盾、周建人、叶圣陶、臧克家等分别发表文章，拥护毛泽东、朱德发出的进军命令；5月4日，他和茅盾、杨振声、叶圣陶等分别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年；6月5日，他和艾青、郭沫若、田汉、冯至等定于翌日参加普希金诞辰纪念会；同一天，他的叙述自己奔赴解放区的文章《第一片土》开始连载；6月27日，他和筹委会成员一同前往车站，欢迎前来参加文代会的南方第二代表团……

在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中，胡风和许多过去的朋友重逢。他们中间，或是多年好

友，或是经他介绍而走上文坛的诗人。面对着历史，面对着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他也完全可以骄傲，在中国左翼文艺的宝库里，有他的播种和收获，有他人无法取代的作用。他的才华，他的能力，在人们的记忆里，在一部部作品、一本本刊物里，应该闪耀不灭的光辉。

在同一会场里，胡风还有最为密切的友人，他们后来在1955年都曾蒙受冤屈。他们是：平津代表第一团的鲁藜；华中代表团的绿原；华东代表团的雪苇；南方代表第一团的彭燕郊、吕荧；南方代表第二团的路翎、梅林。

他们和胡风重逢在北平。他们在怀仁堂同一屋顶下，一起高唱《东方红》，一起分享着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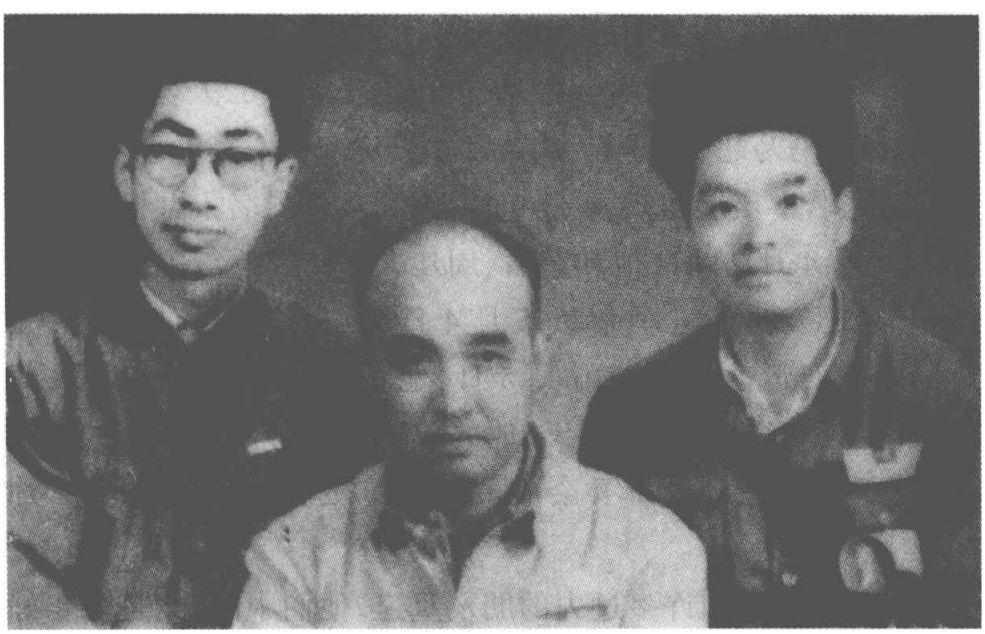
胡风是快乐的。

然而，胡风也是忧郁的。

不。忧郁是带有女性色彩的感伤，是面向大海时，一叶扁舟的叹息。胡风不是。他唱惯了豪情一如瀑布般倾泻的战歌，像他这样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理论家，像他这样带有楚人耿直禀性的人，忧郁是会被唾弃的。

他也不是带有忏悔意识的自卑。自卑感，不属于他。虽然，他也来自国统区，虽然，和许多文艺家一样，他没有喝过延河水，住过延安窑洞，但他，不会为此而感到自卑。他充满着自信、自豪，他不贬低自己业已走过的道路，他为自己的奋斗、为自己在文艺上的成就自豪。

但是，他有他人所没有的苦恼，他有他人所没有的历史和现实的矛盾。这苦



胡风（中）和绿原（左）、冯白鲁（右）在一起。

恼,这矛盾,会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情感上、心理上的网,将他紧紧裹住,使他冲动,使他敏感,使他随时可能做出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

三

胡风和周扬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结下矛盾,是人们熟知的事实。

1933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宣传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十个人一同被驱逐回国。这时的胡风,早已开始了文学生涯,并在1931年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

胡风一回到上海,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便陪同鲁迅前来看望。这是一次特殊的会面。在以后几年里,胡风和鲁迅关系更为密切,成为与周扬相矛盾的一方。

第一次见面之后,胡风接到周扬的通知,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左联书记后,又接任左联书记。胡风和鲁迅的来往频繁了。除了将每期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送给鲁迅外,还定期从鲁迅手中取得资助左联工作的每月20元。

1934年秋,胡风与周扬开始发生矛盾,并辞去了左联工作。关于这段时间的事情,胡风的女儿晓风在1986年发表的《胡风年表简编》中这样写到:

> 秋末,因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愤而辞去左联工作。同时,韩侍桁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说他"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从而暴露了身份,只得离职。从此,就开始了专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生活。先用谷非笔名,后用胡风。更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并和左联盟员周文、宋乐天(王尧山)、彭冰山(彭柏山)、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和周颖等保持友谊和工作关系。

胡风离开左联之后,和周扬在1936年春天,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次理论争鸣。胡风在1935年5月,应《文学》社的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的典型。半年之后,周扬在《文学》1936年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便在《文学》二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展开反驳,周扬也在四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

与胡风论争，胡风随之再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这场理论上的论争，以胡风的文章为结束。此后，两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没再发生直接冲突。

鲁迅对这段时间胡风和周扬等人的矛盾，1936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过记述：

>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了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O.V.是胡风，笔录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
>
> 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

胡风与周扬的又一次冲突，发生在“两个口号”之争的风波中。

1936年春，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在刊物倡导国防文学创作，并于6月成立文艺家协会，签名参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在4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针对“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就在6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6月15日，鲁迅、巴金、曹禺、张天翼、萧军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胡风率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按照冯雪峰的指示，“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历来善于争论的胡风，未再写文章参加“两个口号”的论争。倒是鲁迅抱着病躯，在逝世前两个月，以4天时间写出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胡风再次辩护。

在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之后，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徐懋庸于8月1日给鲁迅一信。信中认为鲁迅受了胡风等人的蒙蔽，信中写道：

>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



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的合影。

> “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先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学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公开表示胡风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并说口号的提出，是和几个人——包括茅盾——一起商量的。针对徐信中对胡风、黄源、巴金的攻击，鲁迅一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在说到胡风时，鲁迅将胡风与周扬加以比较，说：“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自鲁迅发表此文后，公开的对胡风的攻击，日趋减少。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左翼文艺界各派暂时停止论争。随后，周扬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开始领导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胡风仍在上海，从事创作，并于 1937 年编辑《工作与学习》丛刊。“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风创办《七月》杂志，辗转武汉、重庆等地，开始了他的一生中另一重要阶段。

四

十二年后，胡风和周扬重逢在北平。此时，当年平等的论敌双方，却发生了重要的力量、地位的变化。昔日的均势已经打破，昔日的恩恩怨怨，今天在各自的心理上，必然产生种种意想不到的冲击。

这时的周扬，是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在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早已不是 30 年代上海文坛的青年人，而是卓有建树的新时代文艺的开创者之一。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胜利，他将成为整个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者。

他端坐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主席台上。他是这次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



1949年后，代表着当时文艺上和思想上的政治权威及主流意识的周扬。

相比之下，胡风不免黯然失色。虽然，十多年来，他精心编辑的《七月》、《希望》杂志，培养了一批诗人、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影响颇大的“七月派”，但在政治远重于文学的中国，这种文学上的成就，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他的文艺思想，“七月派”的创作，早在重庆、香港，就开始受到共产党作家的严厉批判。

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今天，同样和他坐在一个大厅里，这不能不使胡风心中有着难以排遣的郁闷和烦恼。

1949年初，胡风从香港辗转入北方解放区时，一方面为自己渴望已久的共产党事业的胜利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文坛上的前景、特别是自己的处境如何十分担忧。去年在香港，共产党员作家们刚刚集中批判过他的文艺理论以及友人路翎的小说，现在，他们一跃成为领导者，再加上与周扬的旧日积怨，他们会如何对待自己呢？

一走进北平，接踵而至的几件事，对胡风的情绪打击很大，开始感到阴云正在头顶翻卷，自己的处境正日益艰难。

他听说：在华北大学，读过他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他听来自延安的作家讲：在延安时期，周扬在讲演中讲到鲁迅时，总要骂到他。

对胡风打击最大的，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进北平之前，在石家庄，胡风见到过去重庆时期领导并支持过他的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然而，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胡风对此毫不知晓。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

胡风不由醒悟到，他已经失去信任，冷落将伴随着他。

紧接着关于《文艺报》编委的工作安排，胡风产生了抵触情绪，对周扬等人的做法极为不解和不满。

关于这件事，胡风后来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的“三十万言意见书”（后面简称“三十万言书”）中有过记述：

> 没有接受《文艺报》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发生的。这思想情况又被下面说的具体情况所固定了。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第二夜（4月16日）在北京饭店关于和谈的报告会上，周总理和我握手的时候说，看到报上消息，知道我要忙起来了。我当时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接着我就详细考虑了这个工作在当时整个斗争中所能产生的意义，更明确地感到了这工作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负责同志不先和我谈一谈呢？因而想到了，要我担负这工作也许是周总理提示的。但如果是周总理提示的，那负责同志们更应该有人事先直接和我谈一谈，在政策上给我帮助，在关系上给我支持，研究一下任务和做法的。得不到解释。第四天（4月18日）访沙可夫同志，说周扬同志忙，不好直接找他，托沙可夫同志转达，这个工作由我做恐怕不合适。当时有李伯钊同志在座。我以为不好直接说出来也用不着说出来的那意思是，希望周扬同志约我直接谈一谈，看他的态度怎样，希望他把现实情况和政策要求告诉我，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我也预备可能时说一说对文艺情况的看法，至少也要彼此间对这个工作本身取得某一限度的共同了解。周扬同志和沙可夫同志都没有给我回答，只是由茅盾同志和厂民同志用他们自己的意思催过我两三次。我又再三考虑，不管要我担负这工作是不是周总理提示的，但根据这些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从抗战期间和解放后看，周总理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艺上的领导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至少是不支持我做这个工作的。在具体领导关系上没有保证，在这样的文艺思想情况之下，以我的性格和看法，主持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是无法做到的。在这繁忙时期，我又不

能在具体问题上都去找周总理。况且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如果贸然接受这工作，做下去不但一定会惹出问题，甚至会是严重的问题来，而且好容易我这一点能够通过文字去表现出来的对于当前现实的欢喜和热情，我的文字工作上的计划，也要被拖垮了的。考虑的结果是，我的社会能力和政治条件是负担不起这个工作的。以后周扬同志见面时，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本书着重摘引当年未能公开的“三十万言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出版发表的部分，一般略去——引者注）

胡风拒绝担任《文艺报》的编委，成为和周扬的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随后，在起草大会报告上，胡风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消极情绪，作出另一个显然并非深思熟虑的决定。

在3月召开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被选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为：阳翰笙、叶圣陶、冯乃超、周扬、茅盾、胡绳、黄药眠、钟敬文、杨晦等。

这些人中，有的和胡风交过锋，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胡风的主要人物。胡风无法迫使自己静下心与他们坐在一起，再加上已经感觉到的不信任感和受人冷落，他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

几十年后，胡风的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决定，这导致对手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总结历史、打击他和朋友。

然而，胡风拒绝了。他的性格，他的处境和情绪，都使他不能不这么决定。

胡风从来将自己视为左翼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视为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非常自然而然地视为自己的胜利。政治，在他那里，是无条件地和一切共产党人的信仰、奋斗连在一起的。可是，文艺，却又将他和一些共产党员作家绝然分开，有着难以弥合的历史裂痕。

对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他翘首相望，赞歌不绝；可对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他却矛盾重重，甚或失去兴趣。

一方面，他敏锐地感觉到新的生活将给创作提供新的天地，会有更多的作品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他却固执地对文代会予以漠视。

就在5月7日，胡风给远在南方的朋友方然、冀汸、朱谷怀、罗洛等人写信，表达出这种心情：

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多到实际里去接触。

将近半年了，不知道情形如何，念久。前些时有信给嗣兴，不知道他和守梅如何。我意，解放后你们应尽快参加实际工作，不应浮在文化圈子里面。刊物之类，即令能办，也只应附带地去做，暂时没有束缚自己的必要。这时代有着火热的内容，只有到实际工作去才能体验得到。

……

（此信由冀汸提供——引者注）

今天，当唱起《东方红》，当凝望毛泽东、鲁迅的浮雕像构成的会徽，胡风也许淡忘了历史的阴云，他也许完全沉浸在刹那间的喜悦里。紧接着的朱总司令的讲话，几天后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的莅临并即席讲话，都会使他心里充满光亮，清澈而透明，没有一丝忧郁，没有一丝烦恼。

然而，他拒绝参加起草委员会得到的第一个打击，也在这个怀仁堂里，会重新荡起他心中的阴云。当时任何简单又简单、普通又普通的词语，后来看来，其实都包含着它们本身所无法含蕴的内容。

怀仁堂，对胡风来说，不仅仅是欢乐、喜悦。

五

第一次文代会开幕后第三天，7月4日，仍在怀仁堂里举行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茅盾作题为《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概况。

这就是胡风坚决拒绝参加起草的那个报告。在发表这个报告时，茅盾在附言部分谈到报告的起草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

茅盾在报告中，不点名地介绍了国统区时对胡风文艺思想观点的批评，还不点名地将受过批评的以路翎的小说为代表的作品，列入不正确的倾向之中。

他们为了使作品"有力"就着重去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然而不幸，他们所写的人物和斗争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

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加以表现，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观任意解释和说明客观的现实。他们以为愈是显露作者的强烈的主观，就愈能表现出主题的积极性，但事实上，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茅盾单列一节概述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标题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

1944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内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认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种所谓的原始的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像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调子是平和的，一如缓缓流动的溪水，然而，一旦跌落山涧，会溅起浓浓水雾。

难以知晓胡风当年坐在怀仁堂里，听到这些话时的心情。显然，他的抵触情绪会愈加强烈，他会更加感到无形的压抑。

也许压抑和恼火，使他不可能深深领悟下面这番话的含义：

但我们必须警惕到：

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

> 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如果我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因而习惯于一套适合于旧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不能说这番话有明确具体所指，更不能说是针对胡风而言的。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首要的是要适应新的环境，这是最为简单的道理。对胡风来说尤其如此。

胡风面临惟一选择，就是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改变自己过去死不低头的态度。

然而，他没有。

胡风的性格，热情，以及业已形成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抵触情绪，都使他难以在外界的压力下，改变自己。

胡风诞生于 1902 年，是在五四时期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主、科学的熏陶，早已习惯于文坛平等争鸣的环境。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在文艺创作上，年老的、年少的、著名的、初出茅庐的……全是独立的分子。血气方刚的创造社青年，敢于独树一帜，向卓有成就的文学研究会挑战；尚未走进文坛、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二十来岁，却敢发表文章向被视为诗界巨星的郭沫若挑战；“太阳社” 蒋光赤和他的同人们，居然毫无惧色，直接向鲁迅开炮……

一个热闹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一幅幅平等争鸣的历史画面。作家们，也许各自有很大成见，也许矛盾永远不能消融，然而，争论的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借助文艺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取得自己在文艺争论上的胜利。

胡风成长于那个时代，他属于那个时代。

面对即将诞生的时代，他会感到陌生，但他绝对相信，会是更为民主自由的时代，会是“五四”时代的延续。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充满民主精神的社会。

胡风的思路没有纳入报告中点明的轨道，他没有去预想，当年争论的双方，会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打破力量的平衡。

胡风没有“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这样,他就注定“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六

7月4日茅盾的报告点染着胡风郁闷的心境,使之更为压抑。但这种心情,在两天后,7月6日,便在见到毛泽东之后暂时为激动所替代,奔涌胸间的,是滔滔如大江的诗情。他有的不只是忧愁,在他所敬仰的人面前,更多的是幸福,是一首首颂歌。

和毛泽东,胡风从没有过太多的直接接触。在国统区,他经常联系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周恩来,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但是对毛泽东,胡风却一直充满钦佩敬仰之情。1938年,在《七月》第十期上,胡风就曾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演记录稿,题为《毛泽东论鲁迅》。

7月6日下午7时20分,正当周恩来作长篇报告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会场。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代表们欢呼,鼓掌。

毛泽东只作了极为简短的讲话:

>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一版。“文革”时转引此段时,大多将“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组织者”一句省略)

毛泽东简捷的即兴祝词,赢得长时间的掌声。“我们欢迎你们”——这话出自《东方红》的主人公之口,出自代表们歌颂的救星之口,无疑增加着他们的自豪和荣幸。

周恩来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结束时,同样兴奋地说:

“代表们,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文艺方向……”

郭沫若，大会主席团总主席又一次站到麦克风前，兴奋地说："诸位代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承周副主席给我们作了六个钟头的报告，又承毛主席亲自来参加，来指导我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郭沫若表示完全接受周副主席给大会代表的整个指示，表示要以最大的热忱做毛泽东的学生。

"全体代表们，"郭沫若声调顿时更为高亢，"让我们最后高呼几个口号。"

他以高唱过《女神》的热情，振臂领呼：

一切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

学习毛泽东的思想！

创造人民的文艺！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

胡风和代表们一起放开喉咙高呼着，他的声音和所有人的声音汇合一起，在怀仁堂大厅激荡着。

他在真诚地高呼，他在真诚地歌唱。

几个月后，参加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胡风，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胡风，写出《欢乐颂》。

他在以饱满的激情歌唱：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胡风在仰望着一个高峰：



参加10月1日开国大典后，胡风写出的《欢乐颂》书影。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


胡风、卢甸国庆节在北京北海公园留影。

胡风歌唱着。这是他步入新的、陌生的、而又向往的时代时唱出的第一支歌。胡风的朋友们也在歌唱着。

诗人卢甸在天津歌唱着新的中央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你是人民自己创造的政权
你是人民意志的象征
我们拥护你

像万物迎接太阳
像众星围绕月亮
像江河涌向海洋
……

诗人徐放，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歌唱着《新中国颂歌》：

今天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祖国的红旗下
在毛泽东的面前
像百鸟朝凤
像大海沸腾
我们呵
看到了胜利
我们呵
真正有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胡风的夫人梅志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开始连载。小红帽和小铁匠消灭了老山妖，拥抱着歌唱：



诗人徐放与牛汉（右）在一起。

“哈哈哈
鲜红的太阳出来了!
哈哈哈
鲜红的太阳出来了!……”

诗人牛汉在歌唱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见：

毛主席
告诉你
我们底手臂
全都向北极星伸出来了!
祖国的大地
正向莫斯科倾听
倾听着你
怎样走进克里姆林宫
又怎样和斯大林亲切的谈论着
……
你们向着远方凝望着
全世界
在你们面前
光荣地展开了!

他们都在分享着与胡风同样的喜悦。
他们也在思考着新的创作。
在南京的路翎，1949 年 11 月 20 日给天津的友人鲁藜和卢甸写信：

鲁藜、卢甸兄：

来信收到。胡风兄已来信了，那退回来的信是误会。

我这个月在厂里做点工作。但是又要搞文联，所以写写东西的时间仍然不多。工作岗位则仍然是文艺处。南京人手少，脱不开。

不过慢慢地我想多写一点。我仍感觉到我们的缺点，但也感觉到，

在文学思想和实践上我们是对的。不仅现在的文艺思想上有这样的要求，个别的工作者有这样的要求，群众也有这样的要求。大家都得找寻一条实践思想内容的道路，这虽然艰苦，有些保守者不愿意，但慢慢地就非得前进不可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伟大的，这就保证了前进和胜利的可能。

很怀念你们。曾给方纪兄寄了两稿，但未给你们写信。鲁藜兄是什么病，全好了罢。最近都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守梅兄近来没有通讯。曾听说他回杭，不知又来上海了没有。小刊物，他们准备出的，但不知能不能实现。

握手

路翎 1949.11.20

他们歌唱、思考；准备着投身于新的开始。

陌生的、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在他们面前。

熟悉的、一个飘着阴影的过去在他们面前。

在未来与过去的交接点上，他们毫不否认自己的过去，反而充满自豪、充满自信；在这个交接点上，他们毫不畏惧自己的未来，反而充满热情、充满真诚。

他们在拥抱着自己的过去，也在拥抱自己的未来。

在他们的歌声中，在他们的拥抱中，在他们交织着喜悦和烦恼、兴奋和沉思的时候——

历史正有声有色地进展着。

——时间开始了。

第二章 阿垅受挫

一

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战争的硝烟,在大部分国土上渐渐淡去。摆脱历史压在民族头上的贫穷、落后的阴影,已是当务之急,为许许多多仁人志士所明了。

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共产党人,从一支弱小军队的指挥者,成为共和国领袖的共产党人,按照一年前七届二中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开始了在战争废墟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战略转变。

尽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陌生的课题,尽管,未来的发展,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样顺利、轻松,但在第一个春天欣然来临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步入新时代的激情,眼前飘动着彩虹一般美丽的前景。

从国统区走来的知识分子,步履则显得沉重。他们有太多的自责,有太多的反省。特别是那些在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上,曾经和共产党人有过矛盾、不那么和谐的高级知识分子,第一个春天来临时,他们正在做着新的抉择。

朱光潜表态了。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这位成就卓著的美学家,一两年前,和沈从文、萧乾等,在国共分裂、内战又起的情况下,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走英美体制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政体。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思想界,对他们进行过严厉的批判,郭沫若特地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斥反动文艺》。

在1949年3月发表的这篇文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为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了像,他以诗人的厌恶的情绪,捕捉到几个概括性的字眼:红、黄、蓝、白、黑。

郭沫若所谓的“红、黄”,指的是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所谓的“蓝”,指的是朱光潜,因为“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所谓的“黑”,则指的是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是受他麻醉着了。”

三位受批判的“反动文艺”的代表,如今自然面临着新的抉择。

朱光潜睁开了布满困惑、畏惧的眼睛,仰望着闪烁的阳光。他痛恨过去,反省过去,表示要跟上时代,汇入新的历史长河。

沈从文则沉默了。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从事20年创作并且成就显著的他,却因为属于“反动文艺”而没被邀请,为此,他曾饮过轻生的苦酒。自那以后,文思如泉涌的沈从文在文坛上消失了,在故宫幽深冷清的高墙大院里,在千百年黯淡的历史遗物面前,他将度过后半生,并成为一位成就显赫的服装史专家。

萧乾也在沉默着。不过,他早在1948年,离开上海到了香港,还参加了《大公报》的起义,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尽管他心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有着自卑和对未来的惶惑,但他仍想努力跟上新的时代,用自己的笔歌唱新时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因有着不同的历史缘由而需要调正自己的坐标。

继朱光潜之后,1950年1月3日和2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费孝通发表了《我这一年》、《解放以来》。1月22日,冯友兰也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这两位著名学者,反省自己一年来改造思想的过程,明确表示重塑一个“新我”的态度。

费孝通的这番话,可以概括许多知识分子此时此境的心态:“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过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

路程摆在每个人面前,无论它是铺满鲜花或泥泞,无论它是平坦或曲折,无论它会索取精神上或肉体上的代价,既然选择了这段路程,它就将伴随你的丰富的人生。

这不是简单肤浅的逻辑所能解释的面临历史转折时所出现的人生哲学，这不是脆弱的一己的情感所能取代的心灵磨炼，这不是固执地闭上眼睛就能回避的现实。

而今，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再一次遇到多少代文人为之烦恼的重塑自己心灵的磨砺。他们是那么明智，那么敏锐，那么及时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大步流星走进了正在高歌奋进的大军。

他们不会后悔这种选择，后人们也不会讥笑他们的转变。是呵，一个为千千万万民众所欢迎、所热爱的政权应运而生，生活于这些民众之中的他们，完全可能由衷地发出同样的欢呼。在强烈的历史反差中，他们会发现自己过去的幼稚和渺小，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同民众一样满怀激情迎接民族的安定、繁荣、富强。

他们以及和他们类似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迎来了共和国的第一个春天。

二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却没有朱光潜等人那样的沉重包袱，他们早就踏上了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革命之路。他们中间，有的活跃在延安的大军中，有的在雾都重庆高喊着推翻旧制度的战歌。一旦走到新旧制度交替的转折点，他们抖一肩仆仆风尘，再吟一曲高歌，就像溪水必然汇入大河一样，毫无迟疑，毫无困惑，高昂着头走到了共和国的起跑线上。

在天津——

鲁藜，这位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诗人，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写出歌颂延安的《延河散影》，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它是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重要人物。他早在1949年1月就随解放军大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卢甸，也是在《七月》、《希望》上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1947年他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根据地，结识了鲁藜，加入了晋察冀文联和中国共产党。如今担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

阿垅，1939年曾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因受伤到西安治疗，又就读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传送军事情报。这位著名诗论家，热情赞颂的是来自延安的诗，延安的文艺。1949

年,他也到了天津,任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

在北京——

在20岁写出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牛汉,早在194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封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到达华北解放区,此时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

随解放军大军一起进入北京的徐放,曾先后在延安、华北根据地等地区工作,任教于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等,并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



1951年,胡风(右)与谢韬(左)一起。

谢韬本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却与"七月派"诗人方然、卢甸等人关系密切。

他1946年便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后来撤退去延安。此时在北京华北大学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

在武汉——

诗人绿原是《七月》、《希望》上最为活跃的作者之一,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诗人曾卓在193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年龄只有18岁。此时,在武汉,他已是年轻的文艺界领导。

在上海——

在上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就与胡风熟悉的彭柏山,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新四军中担任领导职务,此时任二十四军副政委。后来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罗洛,从事写诗和翻译,此时任报社记者。

贾植芳,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任系主任。

耿庸，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养学馆工作，后调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王戎、梅林、何满子……都在不同文化岗位上开始新的工作。

在杭州——

方然，1938年曾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回国统区，1947年在重庆曾组织、参加学生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筹建浙江省文联，任编审部部长。

和曾卓、邹荻帆等一起编辑过《诗垦地》的冀汸，此时在杭州任文学编辑。

在南京——

胡风最为赏识的路翎，以其非凡的才华在国统区为评论界推崇，1949年后创作力更为旺盛。此时，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长，随即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化铁，诗虽不多，却被阿垅备加赞赏。此时，他在南京部队中任气象参谋。

欧阳庄不是诗人，却和化铁等创办《蚂蚁小集》，后来又成为胡风起草三十万言书的得力助手。此时，他任一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

在四川——

在广东——

在湖南——

……

天南地北，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熟悉的，甚至不熟悉的——此时，都在为共和国努力地工作着。对于他们，释放胸中的热情，创造，再创造，是天经地义的历史责任。文艺这座殿堂，是他们痴心向往而为之倾心的，他们毫不怀疑，共和国的诞生，会使他们将这座殿堂装扮得更为壮观。选择，痛苦的反省，不属于他们；在理智和情感上，他们无不充满自信和骄傲；他们本来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共和国！

春天，1950年的春天，对于他们来说，本应是从未如此明媚、温暖的季节。

然而，对他们这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三

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是，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卷起的阴云，仍然时时笼罩着他。

一些文化圈子之外的朋友，在胡风面前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建议他去要求和周恩来见面谈一次，以求问题的解决。

胡风同意了，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

周恩来未与他见面，倒是由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来找他谈过一次话。

>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外的迷惑。
>
> 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三十万言书")

胡风是感到了困惑不解。他从来认为自己大半生都在追随共产党的事业，根本不存在将个人同党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这样一个问题。不过，胡风仍然将自己自一次文代会以来对文艺现状的担忧和思考，真实地托盘而出，并告诉胡乔木，这些便是想和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

胡风在文代会前后，和一些作家的交谈中，开始感觉到文艺上出现了一种他认为的偏向，那些负责人对文艺问题的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解，气势日益旺盛，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被否定、被贬低了。五四文学被说成小资产阶级的，不采用民间形式也说成小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胡风感觉到虽然不一定总是用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一谈到具体问题，便成为支配性的理论。那些负责人，带着文坛征服者的神气，好像革命的胜利已经完全保证了文艺上的胜利，胡风却不然，他反而认为这种理论和现状，预示着文艺潜伏着危机。

这一忧虑，胡风告诉了胡乔木，说他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胡乔木当场否认了胡风这一说法。

谈话归来，胡风被胡乔木那句话"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所打动，他

明白这是带有原则性的话，自己应该明确表明态度。于是，几天后，胡风给胡乔木写信，表示希望能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从日本回国后，胡风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明确。

和胡乔木又见过一面，回答胡风，组织问题可以考虑。胡风后来又这样记叙："但他并不'奉劝'我。由于进解放区以后一连串的情况，由于他所说的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由于丁玲同志所说的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拒绝的意思。况且本来在我自己的感情上，对于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品质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要求，我是相差得很远的。但同时也模糊地觉得大概是要我先经过一段考验的过程。"

与周恩来的见面要求未能实现，解决组织问题的愿望又被推向无边的未来，胡风显然有些失望。不过，共和国成立所带来的激情，还在他胸中唤起诗歌创作的灵感，这一时期，仍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

1950年2月，胡风离开北京（此时北平已改称北京）回上海与久别的妻儿团聚。

火车向南方开去。他的身后，是悄悄远去的灰蒙蒙的古城，灰蒙蒙的天空，而一次对阿垅——也是对他的打击——此时正在这片天空下面酝酿着。

四

1950年3月18日，天津。阿垅搂着四岁多的儿子，忧郁地端坐在妻子的遗像前。

妻子逝世已有整整四年。四年前的3月18日，她摆脱不了感情的重负和折磨，自杀身亡，给阿垅留下仅仅7个月的儿子。每年到了这一天，阿垅就会和儿子一道，默默地坐在她的像前。

阿垅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妻子当年送给他的戒指，上面刻着英语"毋忘我"。1943年在成都认识她——张瑞——时，阿垅已是一位创作成就显著的作家。他在1937年的上海淞沪抗战中负伤，然后根据经历，写出一篇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胡风创办的《七月》上，并结集《第一击》出版，名震一时。自那以后，阿垅便成了胡风的一位好友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他到达延安，进抗大学习，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便到西安治疗。这时，响应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创作了记录南京沦陷前后历史的纪实性小说《南京》，获得第一名。

阿垅与张瑞相爱时已经36岁，张瑞只有20岁，但阿垅真挚地爱着她，写下了一首首情诗。妻子永远消失了，阿垅仿佛失去了一切，原本因时代而产生的激愤更加强烈，那颗不安定的心，因痛苦而更为烦躁、焦虑。带有诗人气质的阿垅，渴望火，渴望力，渴望打破令人窒息的沉闷。

阿垅写诗，却没有了温柔，而是力的赞礼，流贯着刚劲；他写诗论，赞赏向黑暗进击的诗、来自延安的诗，以及《希望》上朋友们的力作。

艺术在他那里，远没有政治重要。生活中，他利用担任国民党军队战术教官之便，曾通过胡风、廖梦醒等人，为共产党提供过军事情报；诗论中，他干脆主张“诗是赤蓝冲天直起的红信号弹!攻击!攻击前进!诗是攻击前进的红信号弹!”

今天，阿垅又坐到了妻子遗像面前，该说些什么呢?他的身旁，正放着3月12日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第五版上，以半版的篇幅，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陈涌在文中批判阿垅发表在天津《文艺学习》第一期上的论文，认为阿垅“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错误的解释”。

陈涌指责阿垅在文中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却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

在逐层分析批判阿垅“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歪曲”马列主义的错误之后，陈涌结束语这样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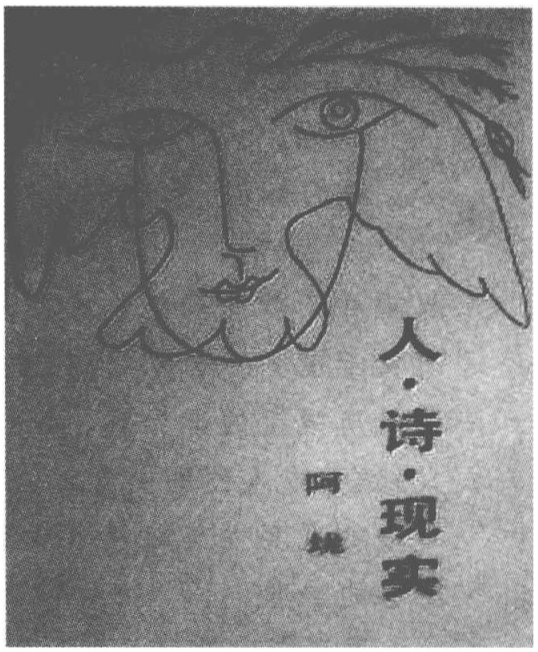
> 总的一句话说来，阿垅这篇名为《论倾向性》的论文，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和公式主义，但事实上，却是也同时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事实上，在阶级斗争一向都异常尖锐的中国，并不是培植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最好的环境，完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体系(假如有的话)，是抱守不住的了，而且一个多少有点革命要求的作家，他也要求某种程度即使是颇为朦胧灰色的战斗，但又不愿意(至少今天还未认识到)把自己的艺术更多的靠近群众的政治，他还希望保留自己的一撮残土。于是他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不管阿垅曾经怎样大量地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又不管阿垅自己明确地意识到与否，我以为他的理

论的实质便是如此。

“便起来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读着这句话,无形中巨大的重量压在头上,压在心上。阿垅无法承受这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更无法理解自己的理论为何被戴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

翻开自己的诗论,何尝主张过“艺术即政治”。无论评论鲁藜、绿原、化铁、艾青、田间的诗,还是评论《白毛女》,即使在1949年以前的环境下,也是屡屡强调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和政治上的意义。

三十多年后,1984年,阿垅的好友罗洛在编选的阿垅《人·诗·现实》一书的序中,就毫不虚饰地指出阿垅的这一局限:“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阿垅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有时会忽略另一个方面。例如他强调诗的政治内容,这是对的,但他对于艺术技巧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就失之偏颇了。”



阿垅《人·诗·现实》一书的书影。

此时,阿垅多想为自己辩解,多想表明自己只不过主张文艺不是服务政策,文艺应有自己的规律。

在亡妻的忌日,阿垅为新的烦恼而痛苦,这位被朋友历来称之为充满激情、容易激动的人,现在,需要的是冷静,是克制,他完全清楚,任何轻率的反应,都是不明智的。沉默,也许是避免麻烦的最好方式。

阿垅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又发表批评他的文章。署名史笃(即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主要指阿垅以“张怀瑞”笔名发表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歪曲马

克思的原话,借以推销自己错误的论点。

史笃在文章开始时即明确强调批判阿垅此类错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在这样的时候,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随时随地向一切歪曲、玷污马列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的'理论'作坚决的斗争,是思想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一方面要进行最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学说的通俗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就必须坚决揭露一切马列主义伪装,使他们在群众面前露出原形来。"

史笃首先指出,在引用马克思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一篇书评中的一段话时,阿垅引了错误的译文,同时也没有完整引出来,只是为己所需,并从马克思的话里作出和原意完全相反的推论。

史笃这样批判阿垅:

>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创作方法服从于世界观。自然,政治并不就等于文艺,世界观并不就等于创作方法。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真正忠实于现实的有良心、有才能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可能突破为他的阶级所限制的世界观,而达到对于现实的真实的描写。但在社会主义社会,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人民的文艺必须服从人民的政治,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服从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
> 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了现实主义能够违反反动世界观而获得胜利,却不是说现实主义甚至能够违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获得胜利。今天我们的问题首要的正是逐步掌握和巩固这永远不可战胜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却不是把现实主义和世界观对立,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往独来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否定了阶级立场与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
>
>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迄今以前在文艺上从未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应得的地位。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角,但是今天的问题并不是工农兵在文艺上的地位已经"超

越”或至少相应于他们在历史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地位，却是跟不上和落后于历史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的这种地位。

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他们作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的时候，都要求了并且获得了在文艺上主角地位，现在劳动人民更加千万倍理直气壮的要求这个地位了，可是这位第一句是马克思，最后一句也是马克思的作者却摇摇头说“不妥当”！同样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畸轻畸重，不从个别作品而从整个文艺来说，也是没有疑问的事。这就是必须号召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们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分彼此，同等重要，那就恰恰等于放弃了对正面人物的深入，也就恰恰违背了历史所交给文艺的主要任务：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

为什么中共中央机关报在短短一周里，接连两次批判他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真是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痛苦。他爱冲动，爱发火，但他也常为这种性格的弱点而头痛。他知道自己并非圣人，头顶上决没有耀眼的光环，更不会没有缺陷让人抓住。他心里无底，难以预料这两篇文章之后，迎着自己而来的还会有什么。是风？是雨？是灾？是祸？

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写去一封检讨信。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的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中说：“……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

阿垅的信如下——

编者同志：

《论倾向性》和《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我写的。两篇批评也看到的。

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

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首先，经过是这样的：我贫乏，不能够完全得到所要的书籍。因此，我有几个笔记本，借书看的时候，就把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句摘录在上面，我这样做了几年。《科学的艺术论》，我原来认为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对于学习文学的人更是如此。我重视这本书，但是我自己手边却没有，尤其解放前我被通缉，生活不定，不可能带书，只有利用抄本的办法。解放以后，在杭州我找遍了各书店，买不到；在经过上海时候，也找过，还是买不到；还请托过一些友人为我留意，给我买。这事情，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文章是去年九月间在上海住的时候写的。写的时候，根据的是手边的摘录得不完全的那个抄本，就犯了这个大的错误。无论如何，责任是我的。

其次，对于新的情况了解不深，问题提得不全面，分析不够，这当然也是我自己应负的责任。

再次，我是这样理解那一段引文的：说到“私生活”，我误以为那是说的人物底生活内容底的一面，要写他们的生活内容的；说到“和一切形形色色跟在周围的人一起”，我误解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内容，即反映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接触，冲突和矛盾的。而且，又误解了“指示给我们看”这一句话——才得出了这一错误的结果。

最后，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

此致

革命敬礼

阿垅 3 月 21 日

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

《文艺报》在 7 月 1 日出版的第 2 卷第 8 期上，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作者陈淼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

五

胡风在上海关注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知道，阿垅的受挫，实际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个不吉祥的预兆。显然，拿阿垅开刀只是表面现象，那背后的真正目标是他本人。

阿垅历来被视为胡风“七月派”中一位骨干人物，他的大量诗论在国统区有过强烈反响。小说创作上有路翎为代表，诗歌创作上有田间、绿原、鲁藜，甚至早已成名的艾青为代表，那么，文艺理论方面，阿垅可称得上胡风的一位代表。如今，率先从理论上在阿垅身上打开缺口，的确让胡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阿垅，胡风的第一个反应，便认定这是担任报社文艺组负责人的袁水拍在起作用。他不会忘记，当年在国统区，阿垅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袁水拍以笔名“马凡陀”写的一些诗，而史笃（蒋天佐），过去也在语言问题上与阿垅发生过争论。现在，由他们配合攻击阿垅，倒也不是令人奇怪的事。但那背后一定另有他人，那就是周扬。

胡风很快听到了从北京而来的传闻：

> 1950年3月14日，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陈亦门同志（即阿垅——引者注）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态度激愤得很，把这当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还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并没有什么可惜。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名所谓胡风“小集团”打的。我间接听到了的时候，问题发展到这样严重实在是超乎了想象，但回忆一下进解放区以后的情况，又觉得这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万言书”）

听到这传闻，胡风更加确信，是周扬安排了对阿垅的严厉批评。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刚刚半年，局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所忧虑的批判，由此将逐步展开了。

胡风的思路总是囿于个人间的恩恩怨怨，他所看重的，正是他与周扬、与所有

论敌们业已形成的矛盾。他会一直将对他的批判,视为纯粹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他从没有跳出这种局限,没有看到,这个刚刚开始的新时代文艺,特别是毛泽东,正需要确立统一的权威。要达到这一点,摈弃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已是一种必然。胡风永远盯着对手的举动,他也就会为此而被现象紧紧裹住,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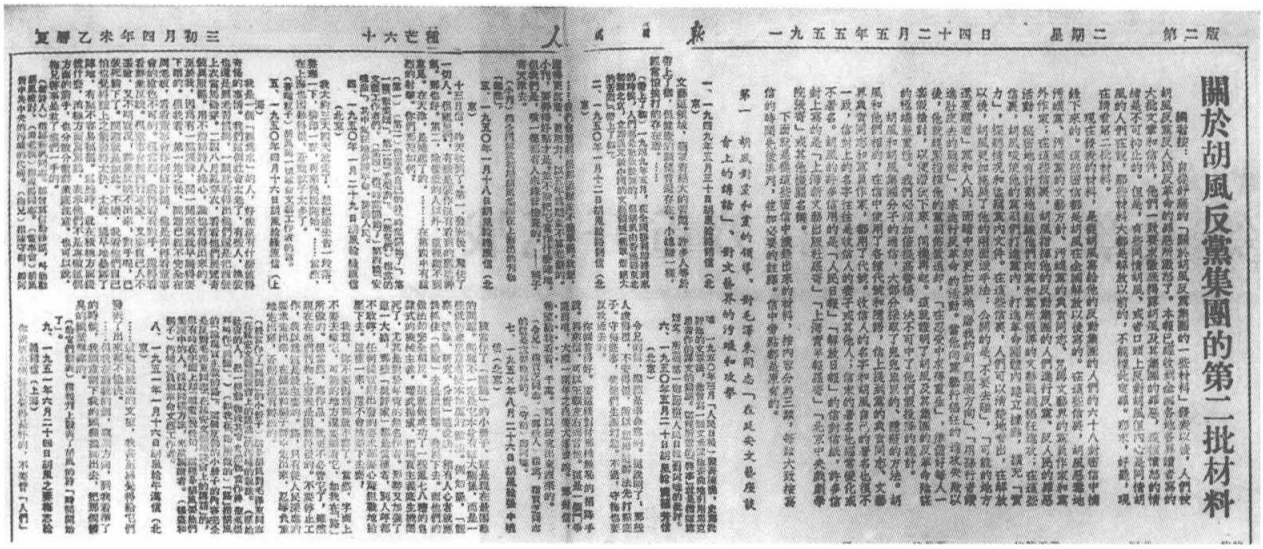
4月16日,在阿垅受挫之后,在听到有关周扬报告的传闻之后,胡风给武汉的绿原一信:

> 我是一个"难为水"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太老了,有些人,换装也还是照老习惯换,一眼就看得出他们还是把西装上衣当马褂穿。二四八月乱穿衣,看看他们展览奇装异服罢。用不着邹诗人操心,谁也看得出来的。至于我,因为有一点经验,闻一闻空气就早晓得要下雨的。但我看,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
>
> 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

1955年《人民日报》将此信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发表时,加注说明,信中前面有"邹诗人"一句,指邹荻帆曾写信给绿原,叫他劝胡风检讨;"第一炮",即指阿垅遇到的两次挨批,"周老板",指周扬;"董事会",指中共中央;"梅兄启事",指阿垅(陈守梅)发表的自我检讨。

胡风对阿垅挨批评有反感,更反感批评文字所表现出的让他难以接受的武断。他深知自己是了解阿垅的,他相信阿垅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追求进步的人。

> 他(阿垅)从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实践要求对创作问题做了追求。应该说,他的实践要求是真诚的,他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寻求对于这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1955 年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 问题的启示，也是为了想得到正确的理解的。但是，不但他的斗争要求被完全抹煞了，还被戴上了“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在政治热情那样高涨的当时，这是一个承受不起的打击。你认为他有错，甚至完全是错的，也应该肯定一点他为文艺事业的追求精神，用分析去说服他和读者的。但却给他戴上了这样可怕的帽子，这就使得小人物不敢独立地主动地去追求马克思主义，只好背诵领导人已经说过的话。美其名说是保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但却用“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去打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实际上是把小人物拒绝在马克思主义的门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专利品。(“三十万言书”)

四年后，1954 年，胡风说出了上面这番话，这也正是现在他的心情的又一种反应。

就在胡风为阿垅的事忿忿不平时，另一个直接对他的打击出现了。1950 年 3 月，胡风看了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的何其芳的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何其芳在写于 1949 年 7 月的序中，与胡风再度挑起论战。

历史的积怨不会随历史消逝而消逝。何其芳重提国统区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把胡风推到了不得不与之抗争的境地。

一场笔战，在所难免。

第三章 胡风、何其芳重开笔战

一

一段富有象征意味的美妙文字：

> 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动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
>
>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
>
> 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写这段文字的作者，正是在1949年重新挑起论争的何其芳。他写这段文字时，是1933年。那时，胡风和周扬在上海开始接触，继而产生矛盾，而何其芳正在北方京津文坛上，吟唱着委婉动人的青春之歌。

何其芳此时被认为是“京派”作家中的新秀。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何其芳厌倦于哲学的枯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和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青年作家，构成以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为中心的京派文人的新的一代。

何其芳吟唱着《汉园集》、《画梦录》，以优美的笔调，独特的象征意味，赢得了许多青年男女的青睐，成为他们摹仿的对象。他敏感，又带着女性的细腻和温柔。他有出色的语言艺术感觉，在作品中一咏三叹，讴歌青春虚幻之梦。

渐渐，美文家的何其芳，吹奏青春牧歌委婉曲调的何其芳，从校园走向乡村，情感被社会磨砺得趋向“粗糙”（何其芳语）。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何其芳于1938年到达延安，转而从事文艺理论和批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文艺界的一位领导者。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两度到重庆，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长，负责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面简称《讲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左翼文艺的领导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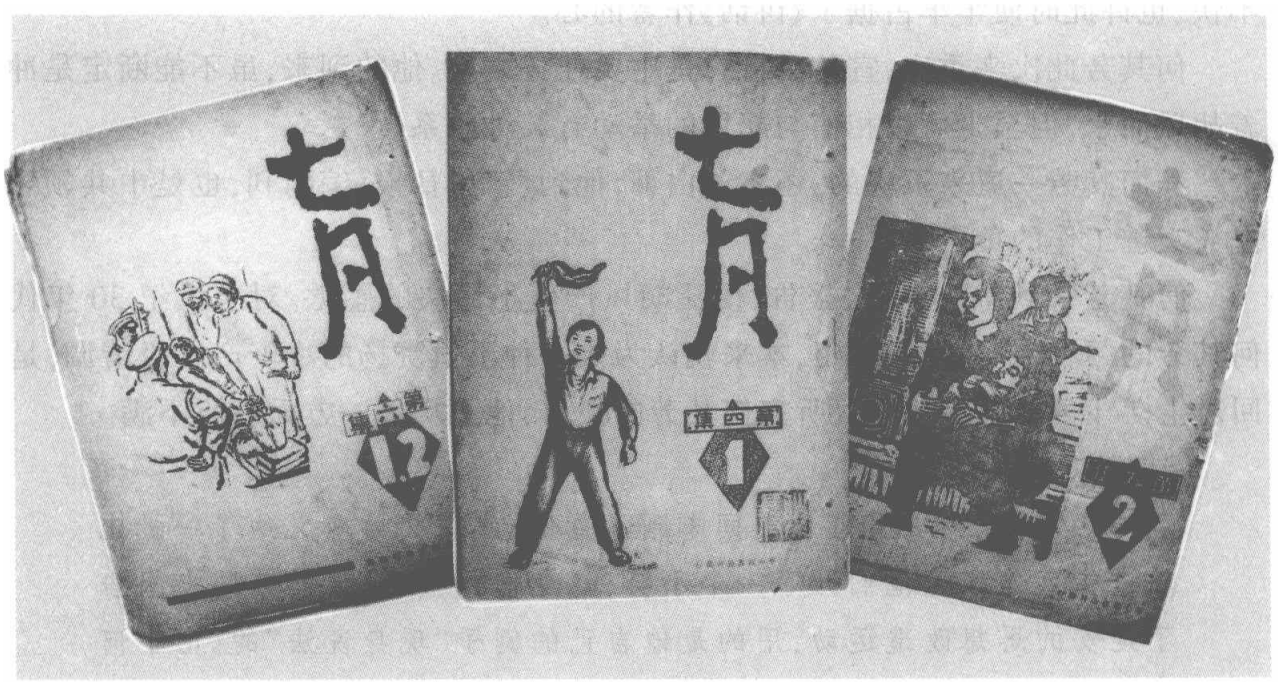
那个充满艺术敏感、充满创作力的何其芳，永远不能归来了。

二

何其芳1944年底来到重庆时，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

自1937年9月创办《七月》周刊后，胡风在这几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出版着《七月》，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

1944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吊销了《七月》的登记证。胡风在愤慨之中，筹办起新杂志。按照当时规定，重新登记必须在银行有一笔存款作为保证金。当时住在重庆的周恩来，支持胡风的工作，拿出一笔钱，使胡风的新刊物《希望》得以问世。



1937年9月，由胡风创办的《七月》周刊，向文坛推出了路翎、阿垅、丘东平、田间、绿原、曹白等人，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七月派”的文艺流派。

胡风见到何其芳之前，这一年已经在重庆参加过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他赞同毛泽东的《讲话》，却又反对机械地去理解它，反对不考虑国统区实际、教条地套用解放区的办法。为此，胡风与共产党员作家、一些左翼作家，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

1944 年 3 月 18 日、19 日，一部分文化人集中到重庆郊区，由冯乃超主持，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 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勤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三十万言书”)

胡风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坚持独立见解的个性，实际上会令许多人不快，也使关于《讲话》的讨论未能如期进行下去。这消息完全可能传到延安，难以觉察的不快，也许此时便牢牢占据了《讲话》作者的心。

何其芳此次来重庆，宣传《讲话》是主要任务之一。他的到来，虽不能断定是冲着胡风而来，但至少可以相信与胡风的举动有某种联系。

和何其芳一道来重庆的，还有刘白羽，他到《新华日报》编副刊，也是中共领导左翼文艺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何其芳一到重庆，一次报告，便让胡风产生不愉快的感觉。对上世纪 30 年代何其芳的《画梦录》，胡风当年，本来就认为是一种不值赞扬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回避生活斗争的哀怨。现在，听完何其芳的报告，他又从另一方面有所不满。

> 1944 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

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三十万言书")

胡风在对思想改造问题的认识上,由此发生了分歧。他又一次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意识。难道他不知道,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不就是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文艺家的改造吗?

我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同志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后来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那就是指的何其芳同志的那一种态度说的。意思是,虽然那种态度不好,不能真正说明思想改造,反而把思想改造庸俗化了,但不能因为那就把思想改造当作笑话;对于一个作家,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三十万言书")

胡风又是认为自己仅仅对何其芳个人表示出独特性,他的文章,他的举动,无非是对何其芳的观点的一种矫正。他只有淡淡的嘲笑或挖苦,他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出自己的思想。然而,生活绝非如此简单,天上并不只有云彩,太阳,月亮;地上也不只有山,树木,野草。1+1=2 是简单的等式,可在思想、政治风云中,这种加法的含义之复杂,是谁也无法领悟的。

他的笔打向何其芳,事实上,也打向了延安……

这时,1945 年初,《希望》创刊了。

一册厚厚的《希望》创刊号,对胡风,会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在创刊号的封面上,胡风选用了一幅外国木刻《麦哲伦通过海峡》。画面上,黝暗的岩石和天空之间,行驶着麦哲伦的探险船队。云,翻卷着,浪,拍打着,呼啸着。人的不屈不挠的探险精神,体现在这幅构图生动的木刻中。

胡风为什么在创刊号上选用这幅画,难以猜测。但对于他,刚刚过去的几年,无疑是在夜色沉重的天地摸索、抗击的几年。

抗战一爆发，胡风便创办了《七月》，尽管断断续续、条件恶劣，但他一直不放弃这块阵地。他是个作家，他是个批评家，他是个想在文坛大有作为、成为具有号召力的人，没有刊物，便意味着声音的沉默。

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常务理事、研究股主任，在编辑《七月》的同时，和老舍等人一起主持抗敌协会的日常工作。

漫长的几年，在他，正如麦哲伦在漫长的海航中，探索着新大陆。

一方面，胡风同恶劣的政治环境抗争，以刊物的存在，显示自己的生命力。另外，他仍像30年代在上海文坛一样，毫无顾忌地、理直气壮地同一切与自己意见观点不一致的人争鸣。在他的论文中，永远洋溢着刚劲之气，他对不赞同的观点，总是毫不掩饰地针锋相对，予以批驳。1940年，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他反驳郑伯奇、罗荪、徐迟的观点。1940年，在波及整个文坛的关于民族形式大讨论中，他写出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文章主攻向林冰的观点，同时，围绕这个问题他与所有他认为观点不正确的人论争。他提及的人名，会是一串可观的排列：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田仲济、巴人、艾思奇、陈伯达、光未然、葛一虹、陈鹏啸……

胡风虎虎有生气地在《七月》上推出文艺新人，胡风咄咄逼人地在争辩中反驳许多人的观点，他也许未曾预料，《希望》一问世，便会招来别人更为咄咄逼人的、永无休止的批判。

三

在《希望》创刊号上，胡风发表了两篇引来批判的文章，一是他本人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是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

胡风受到批判的，是他在文中提出的“自我扩张”。胡风在探讨现实主义理论时，强调艺术创作是特殊精神活动，作家在反映生活时，必须重视感性对象，重视自己情感也即主观的介入。胡风写道：

> 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生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想活动就不能超过感性的机能。从这里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

> 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是艺术创造的源泉。

舒芜则在《论主观》中，直接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主观在生活中、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主观的重要性。他说：

> 由以上简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来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

写出长达数万字的《论主观》的舒芜，是路翎的好友，经路翎介绍，胡风认识了他。《论主观》初稿完成后，舒芜和路翎曾加以讨论，争辩激烈。文章发表时，附上了路翎的五点不同意见。同时，也附上胡风的意见：

> 似乎《主观论》还有不少的弱处。例如，今天知识人的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这是由于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之故，例如，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够强的缘故。总之，胸襟还不够阔大。

胡风在“编后记”中还这样写道：“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果然不出胡风所料，《希望》创刊号于 1945 年 1 月一经问世，当即引起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强烈反响，紧接着便是批判。

1 月 25 日，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会议由冯乃超

主持，茅盾、蔡仪、冯雪峰等参加。4月，黄药眠在成都写出长篇论文《论约瑟夫的外套》，系统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认为文章宣扬的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

批判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潮，在两年后的1947年重又掀起。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因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已由重庆移至香港。他们到香港后，重新组织系列文章批判胡风等，参加论战的有乔冠华、邵荃麟、胡绳、黄药眠、林默涵等。

1949年11月，何其芳提及的往事，正是这样一段历史纠葛。

四

何其芳1949年在《关于现实主义》一书的序中，没有在正文里点出胡风的名字，而是采用注文点出的方法。在序里，共有十条或长或短的注文涉及到胡风。在正文里，和茅盾一样，何其芳将胡风的强烈“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只是这样一段话，远比茅盾的报告明确得多：

> 等到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之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



“文革”刊物上歌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宣传画。

此话如果是在一年之前讲出，也许和其他任何论争语言，不会有更多的含义。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个月后的时候讲出，其分量不可低估。

胡风应战了。他采取与何其芳同样的办法，1950 年 4 月 13 日，在论文集《为了明天》后面写了长篇“校后附记”，并且也是在注文中点出何其芳的名字，注文长达数千字。

刺痛胡风的，首先是何其芳文中出现的“先生们”这个词。何其芳在文章开头部分说：“有这种理论倾向的先生们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和那种主观战斗精神所接触的所谓客观现实的结合……”

胡风是熟知“先生们”的典故的，对之极为敏感。

1933 年 2 月，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不通两种》，讥讽当时正在宣扬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民族主义文学的王平陵，马上在《武汉日报》上发表《“最通的”文艺》反驳鲁迅，文中便多次出现“先生们”的字眼儿。鲁迅又写出《官话而已》反驳，还专就“先生们”发了几句议论：“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即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做‘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

胡风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抓住这一点，仍保留他那犀利、尖刻、讥讽的论争风格与何其芳应战。在正文中他采用“有一位先生”的说法，注文中却写道：

> 这一位先生是何其芳先生。我说“有一位先生”，而且在“注”里才写出他的名字，是学习何其芳先生自己的做法的（见何其芳先生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但也没有完全照学，我是说“有一位先生”，单数，他却是“先生们”，“有这些先生们”，复数。因为，第一，他有他的用意，我是不能有也不应有的；第二，这却是我自己的“片面的艺术观点”了，我对“先生们”这说法有一点厌恶的记忆。还在五次围剿的时期，当五位左翼作家被杀之后，王平陵污蔑左翼作家，“先生们”“先生们”地造了一通谣言，说了一通昏话。当时鲁迅先生就“拆通”了他，指出他“大有一网打尽之概”。这一点记忆，沾在脑子里总不大容易消退。
>
> 不用说，何其芳先生的情形完全相反，无论他对于我的一点理解和工作怎样失望，失望到忍不住加以责骂，但他当然是从“真正无产阶级的主观战斗精神”出发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要我以及别人（即“有这

> 些先生们”)“使自己今后的工作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新中国的人民”。他之所以用“先生们”或“有这些先生们”,不过是,第一,为了把我和他心目中的若干人放在一起,批评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为了把我和他在后面特别指明的“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区别开来,免得读者发生误会,这是非常必要的。

在谈到当年发表《论主观》的动机时,胡风申辩自己并不是一定赞同舒芜的观点,而是如同当年的“编后记”中所写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讨论,以配合国统区文化界对延安整风运动文件的学习。他说:

> 延安整风运动的文件,传到国民党区域,当然经过了一些时间。而且,由于国民党底言论统治,在文字的反应上,除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有过号召、宣传、讨论外,群众性的反应是很少的。后来,从外表上看,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是《希望》能够出版之前,舒芜写来了这一篇文章。这是他读了能够看到的一两篇《整风文件》引起的,兴奋得很,在“主观想法”上还是想从“当时环境”的情况学习整风,为了反对主观教条主义;文章里面就曾说过,为了反对它所以才要研究“主观”这一范畴的。实际上他也谨慎得很,征求意见,改写了几次。实际上我也踌躇得很,但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了。所以说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以为学习整风当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而且应该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展开群众性的批评。

胡风,一如几年前、十几年前的胡风,思维的惯性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他着眼的是具体的问题的争辩、解释,他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作家间的敌视情绪。对何其芳,以及在此之前香港时期邵荃麟、乔冠华等人的批判,他一直有着抵触情绪。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片言只语作教条式批判的作法,本能地产生反感和轻蔑。争论的对手,也许在他看来,并不是站在同等的水准线上,他需要的是令他心服口服的理论家的宏论,而不是借助群体的声势在那里责怪的声音。

然而,胡风的惯性掩盖了他的眼睛,他忽略了本该及时警觉的要害问题,没有在最应争辩、解释的地方发挥他的能力。何其芳文中那句“对于这种理论倾向

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居然对胡风毫无刺激。这句话表层的、深层的含义，在这位极度敏感的诗人、理论家那里，居然没有荡起一丝涟漪。

多么迟钝的感觉！

多么天真的胡风！

他争辩着，仍是满怀对文艺的热忱，仍是郁积着年以继年形成的恩恩怨怨。

五

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

阿垅5月之后，便写长文予以答辩。袁水拍后来在批驳胡风就此事对他的指责时，详细谈到阿垅答辩文章引起的小小风波：

> 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来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烦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在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
>
> 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

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做到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的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

袁水拍不再理睬阿垅了，阿垅的文章便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一年，两年……一直到1954年底。

胡风为阿垅的事一直萦绕于心，后来他也谈到了这件事情，着重谈阿垅受批评后的困境：

后来，周扬和袁水拍同志要阿垅就论点写文章，阿垅写了两篇，送给……袁水拍同志。大概经过了一些讨论罢，但过了四年一直没有处理，没有消息，这使他陷在极端困难的处境里面，而且还不断地受到打击。那打击之一是对于他十年间所写的六十多万字的《诗与现实》的毁灭性的批评。一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发表了《完全是浪费》的几百字的批评，书就不能卖了，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刊》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答复的……（“三十万言书”）

阿垅此时为了这种来来回回的稿件旅程，心中充溢着作战一样的情绪，这情绪无法平息，他也就无法冷静。

1950年10月6日，阿垅给胡风、路翎一信：

谷、宁两兄：

我有一种心境，也是一个体验：这都是对日本作战时的经验。一，

最困难和紧张的，是开始战斗以前，不知道对方是怎样的；但到枪声一响，心就宁静了，因为对方底行动、力量等等，都已经了然。二，在纯防御中，在挨打主义中，是沉闷而苦痛的，但到和对方接触，自己可以回击，能够看到自己底力量，是再残酷的战况也不怕的。这个比方不太好。但我底情绪是这样。宁兄好像战久而疲乏。兄弟我了解，我身受着。但他们是无力的，不讲理可恼，但不讲理正是无力。没有什么的。你是比我更有力和宁静的。善于休息，也善于摆脱情绪而从高度看他们吧。

还有一点，现在是连讲礼貌的话，都会被人当做空隙而乘虚直入的。也和战争一样，不是自己错，连一寸的土地也放松不得。

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

从容战斗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另外，我想给文艺报写信，指出两条虫底伪造历史。上次的信，是大致的内容。不谈理论，只指出历史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撕破那假东西之全部。这做法，可以否？有一点，费尔巴哈，好像没有中译本；我没有看到和听到过。除了马恩底费尔巴哈论，他本人底作品似未翻译过来。有没有他底译本，你们有所知，也请告诉我。

附信稿，请提意见后寄回。我预备寄邓。似乎火气大，我压制不住。

祝好！祝好！

（那小册子的名字是什么？请即告我）

梅

10月6日夜

也在天津的卢甸，在信后附上一句：

“我非常同意这种理直气壮的说话。甸”

信中所表明的作战一般的情绪，不仅仅是阿垅的，不仅仅是胡风的，而是他们和朋友们共同的心境。他们会一直拥有这种情绪，走向灾难。

第四章 风起风落几度凉秋

一

胡风和朋友们卷进新的、旧的论争之中，他们无法平静下去。作品的评价，工作的安排等，烦恼缠绕着他们。

不平静的不仅仅是他们。

批评的季节——正可概括1950年的文坛。在众多的批评中，对胡风等人的批评，并不特别显眼。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阿垅的两篇文章过后不久，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于是，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潮。《决定》所提倡的全党、全国范围的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他各界，远没有文艺界所形成的声势和规模。《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率先响应，各自发表编辑部的自我检讨，批评自己办刊上的方针、工作错误。随后，《长江文艺》、《湖北文艺》、《说说唱唱》、《文艺学习》、《人民美术》、《人民戏剧》、《河北文艺》等全国各地期刊，纷纷刊文自我检讨。

对作家、作品的批评，顿时成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仅以《文艺报》一年间的批评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就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之后，《文艺报》很快设立了专栏：批评与检讨。一年间比较重要的批评和自我检讨有：

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

陆希诒批评林庚、臧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

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作者朱定检讨；

立云、启详、魏巍批评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平发表自我批评;

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

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枪的敌人》,作者胡丹佛检讨;

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作者卞之琳检讨;

……

人们真诚地批评,人们真诚地检讨。一切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艺术主张,在这个时代,都无一例外地经受检验。一道道水,都在一处宏大的堤坝前回旋,过滤。

批评,在人们是天经地义的;检讨,也是天经地义的。一切人的真诚,都在创造一个文学的未来。他们的心中,也许不会有胡风和朋友们那么深沉的刺激和不安。

二

胡风和一些朋友的名字,自然列在一串串被批评的名字中。

在此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高潮到来之前,除了阿垅的受批评,胡风的新作也于1950年初受到了批评。随后,《文艺报》刊文批评路翎的《女工赵梅英》,批评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批评冀汸的《春天来了》。

对自己的新作《时间开始了》,胡风寄予了热望和激情,他深知,这诗贯穿着对时代的颂歌,第一乐章"欢乐颂",第二乐章"光荣颂"……都是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他也清楚地明了,诗的发表所产生的影响,正是意味着自己的存在,是反对论战的又一次战斗。自然,他也预料到诗歌发表后,必然会招致新的批评。

1950年1月18日,在北京的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写信:

> 十三日信,昨天收到了。"第一"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即臧克家、碧野——引者注)都叫了好的。]但宠儿们,有些是装作没有看到的尴尬神气。那也好。"第二",除接近的人以外,这里听不到意见。在天津,是烧起了的。[但你不要过于乐观,昨天就有一个小巨公就于肯定之余,说我在这里面下了"人面的动物"的决断,是精神上的贵族的革命者云。对于这一类,我早料到了的。]在"第四"中有猛烈的射击。你们那里如何?
>
> [我约一天后去上海,就写信,还能够收到的。]

(——本书中所引信件,凡有括号者,括号内均为1955年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公布时删除部分。后面不再另行注明。)

胡风的预料果然为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诗歌》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沙鸥、黄药眠等人批评胡风的诗作的文章。

3月,批评阿垅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于5月25日出版的2卷5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在此同时,周扬约见路翎。

在北京的路翎将消息告诉已回上海家中的胡风。胡风5月31日回信说:

[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即张明东的文章——引者注),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嘻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以这否定来表示对冬、财的保证。]

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包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它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少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即阿垅受批评事——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要提到那小评,给以强的暗示……但如情形已大致定了,那就暂时无必要罢。总之,可以考虑一下。]

他们承受过多年的批评,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批评这么敏感;他们感觉过一次次文艺论争对手的压力,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压力的沉重。

批评,在胡风他们并不显得可怕,令他们忧心忡忡的是批评后面隐藏的无形的阴影。作品招致批评,那毕竟是已经与读者见面的作品;在路翎,在胡风,更令人恼怒的是路翎剧作的难产。

在二十几岁就写出长篇巨制《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就像所有作家一样,欣喜地将目光转向新的生活。他不留恋过去的成就,他愿意写出新的人物,新的生活。

1949年他充满激情地向文坛、向读者倾吐自己由衷的心声:

我所奉献出来的是我们土地上的阴暗的血迹,而在这解放了的大

地上,这是已经快要成为陈旧的回忆了……

从这样的道路走来,我底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地失去了它们底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创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底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在铁链中·后记》)

一时间,路翎集中描写工人阶级新生活的小说陆续问世。路翎很快又将兴趣转到写剧本上,1947 年话剧《云雀》的成功,至今仍唤起他的创作冲动。

他写《英雄母亲》、《人民万岁》、《军布》、《祖国在前进》,追赶着新生活的浪头,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存在,路翎以前所未有的敏感和勤奋,在 1950 年奋斗着。

为了得到一个舞台演出的机会,为路翎,也是为自己,胡风考虑着各种办法,觅求各种途径。

1950 年 3 月 23 日,胡风在上海曾给已被调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路翎一信,此信 1955 年曾发稿至人民日报印刷厂,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之中,后被删去。信的摘要如下:

刘天达,笔名雷加,做了约两三年安东造纸厂长,人很好,对创作经过辛苦,曾寄过《在铁链中》给他罢。他调到了北京,来信问你的通信处。我已告诉了你的地址和电话。得空找找他。西交民巷,东半壁街 14 号,轻工业部造纸处。大概是处长。剧本可给他看看,得点意见。他熟悉工人。剧本不可能演了罢。即使演,也大半是为了演出后作研究材料的。无论演否,经过一次讨论,思想总可以得到不少益处的。金山兄是有心人,或者不演,或者把自己力量放进去,演出后得到一致认可的成功。告一段落后,写第二个,或者一面下厂一面写罢。但大概的主要的思想内容,和廖兄谈谈,如何?我不知道帮会内容现在是否应该写。

梅兄匆匆来京谈话,不知如何?见到谈起时,可告我。李兄如对我有赠言,也望告我。我近来安些,不大咳了。

劳动部有两个友人:董冰如(丈夫),高启杰(妇),人极诚恳负责,也许你在上海碰见过。如决定不演了,带一份剧本去看看他们;说明经过,大家看法不同,请他们看看,尤其要请他们转给李立三看一看。李

做过一次报告，很有见地，对文艺也很关心，如能请他看过，一定可以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帮助的。

这两个友人和我们很熟，明了我的意见和情形的。

然而，路翎、胡风，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剧本，一个个从路翎笔下流出，却在舞台前夭折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耸立在剧本与观众之间。也许，不可排除剧本本身价值的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罩在路翎、胡风头上的浓重阴影。

三

为路翎的剧本受挫，胡风胸中郁积怨气。为自己的工作的确定，他焦急，他同样郁积起怨气。

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开国大典前后，曾经有过短暂的红火时光的胡风，渐渐被冷落一旁。在《文艺报》试刊时，他和茅盾等三人曾同是主编，而在 1949 年 9 月正式创刊时，他便与《文艺报》无关了。此后，一位位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而他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

何处是他应有的立足之地？

他彷徨，他等待。在彷徨中腾起胸中焦急，在等待中忧郁地衡量自己的价值。

1950 年 4 月在与何其芳论战的同时，身在上海的胡风仍然惦挂着北京对自己工作的安排。19 日他写信给在北京工作谢韬，希望通过他打听到一点关于自己工作的消息。

此信也是在“第二批材料”见报时删掉的：

亚兄走了没有？如未走，而且他还关心，你不妨用你自己的意思，请他向该公提及我的事情，看反应如何，我总觉得，该公会长期搁下去的。如果证实了，我好作长期打算。我以为，如该公如此，非长期作名山事业不可的。

信发出了，可工作安排的消息依然杳无踪影，只是得知有高层领导人透出风：胡风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

检查？这在目前，无异于缴械投降，而这，是胡风无论如何做不出的。更何况，

他认定自己的文艺思想,原本没有错。

胡风仍然不作检查。在《文艺报》上受到批评的路翎和冀汸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那阵热风中,也同样没有检讨。而是将批评引发的怨气埋在心中,等待着发泄的时候。

要胡风作检查的风声,也传到文坛其他人的耳中。

胡风的朋友贾植芳的哥哥贾芝,是在延安窑洞滚爬过的文艺界领导,也是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女婿。上世纪30年代初,他与弟弟贾植芳一道从山西山区,到北京求学。后来,弟弟去了日本,尔后成了胡风的好友之一,而他辗转到了延安,在翻译、写诗之余,又潜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成为民间文艺界的专家。虽然与弟弟分手多年,但手足之情愈来愈浓,像当年一样,他关心着弟弟的一切。

贾芝深知弟弟与胡风的情谊,而正是这情谊,使他担心弟弟今后的处境。1950年,贾芝已经从胡风诗中的情绪,以及接踵而至的批评,感觉到胡风与这个时代的要求有着一段距离。随后不久,一次传达上面关于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指示的会议,因为他和贾植芳的关系,没有让贾芝参加。这样,贾芝的忧虑更重了。

贾芝给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弟弟写信,暗示他与胡风的关系应当注意。

只有35岁的贾植芳,此时已经出版了小说集《人生赋》、《你的证据》、散文集《热力》,以及译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上海高等学府中已颇有名气。虽然与胡风年龄相差十多岁,可论关系之密切,要甚过许多朋友。

这位来自山西襄汾山村的北方汉,操着浓浓的山西乡音。北方的豪爽、乐观,早已深深溶化在他的精神中。他念念不忘的是朋友间的友情,那种朴素的义气,在他来说,远重过名或利的魅力。他忘不了是胡风1937年发表了他的小说《人的悲哀》,从此走上文学之路。更忘不了自己1948年被捕入狱时,妻子受到胡风夫妇的照顾,胡风还为搭救他四处奔波。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淡漠胡风与贾植芳的情谊,相反,两人无话不谈。只是,胡风身材高大却过于敏感,远不如瘦小的贾植芳那样豁达开朗。

接到哥哥的信,贾植芳非常自然地将信中的意思告诉了胡风。胡风当即回信,索要贾芝的信参考,并分析贾芝是受了上面的指示而写的——这自然是胡风出于精神绷紧了弦而得出的一种错误判断。

令兄的信,显然是奉命写的。这说明了:那些人虚得很,不安得很,

所以想用这办法先打点底子。守梅底事，使他们生涨幻想。不过，守梅也要反攻过去的。

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那封信，希望给我看看，千万。可以研究东西来的。

贾植芳听从胡风的意见，很快将贾芝的信寄到了北京。

“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的”——这是胡风的预测，还是他的准备？他是不是被接二连三的批评压抑得过于紧张，已经感觉到自己是一颗已经点着的炸弹，不熄灭就是爆炸？他是不是被久久地闲置折磨得心理再也无法自制？

然而，前景依然模糊不清。他，还有所有其他的朋友，谁也猜不出对方究竟会怎么办，更想不出，如果不检查，还有没有别的可选择的路。

胡风的希望没有破灭，他的心远远地牵挂着中南海的举动。

四

1950 年 9 月，应《人民日报》邀请，胡风再度进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的采访，陆续写出一批报告文学。

几个月后，1951 年 1 月，胡乔木约见胡风，谈到了胡风的工作安排。胡风后来记叙到：

一，他说我不该把别人都看做异端，二，党对于一些同志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因为他们都战斗了过来，现在也都在战斗着，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别的同志全要反对他的……这完全出乎我意外，我从来不是这种性质的看法；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从香港批评，特别是从文代会以后，只有我和所谓的“小集团”是被看做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异端”的。但想到了他当然是根据一方面的材料，不能也没有必要马上解释，我只就话剧运动和电影工作的关系说了一些看法。

其次，他向我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

"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工作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但从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了解一些《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后,我发现了:一,我抓不着工作实际情况的基本内容;二,不研究一下文艺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不能在现实基础上安排好的,在工作人员条件上也得不到共同理解和保证;三,丁玲同志和田间同志的感情也似乎没有从整个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基础上去看具体问题,在具体问题上求得一些改革的意思。("三十万言书")

对胡乔木提出的工作安排,胡风感到十分难得,近一两年的处境,更迫切需要他占据一个工作岗位,不必在京沪之间荡来晃去,更可避免议论纷纷的"不合作"之嫌。

不过,胡风似乎永远改不了他那分认真、计较的秉性,他显得缺少通融的圆滑,固执地认定先得对文艺整体有了确切的把握和认可,他才能接受具体的工作。好像渡河时没把水流观察仔细,他是不能放下船只的。

他犹豫不决,心想,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他在工作上是无法遵循胡乔木提出的原则的。同时,他还想到自己是一个非党人员,担任那三种工作中的随便一项,都是极不容易的。

胡风书面回答了胡乔木。信中大致内容是:

从接受工作的角度上对这三个工作说了一点看法,实际上是希望能面谈一下,把我的具体意见提供他参考,如果同志们能就全面情况研究一下,当然最好,否则,无论做哪一个工作,也想领导上说明看法和企图,我也把意见先说清楚。最后申明了愿意听从分配。这里面也还含有从我所估计的困难情况复活了的消极情绪。("三十万言书")

胡乔木没有回答胡风,工作安排遂成泡影。

不久,胡风便听到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

委屈袭上心头。胡风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工作，而是想陈述他的处境的困难，和工作的不便利条件。胡风的性情，按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条件怎样，工作做上了手，就不愿意故意敷衍了事的。

胡风的任何解释，已经无法弥补他的认真、固执而造成的缺憾。滚到他脚边的球，他又一次让它溜掉了。

还是没有工作，胡风于5月被安排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二团，前往四川参加土改。与方然熟悉的谢韬，凑巧在第二团任宣传部长，胡风有了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同伴。

四川、重庆，那里是胡风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胡风和谢韬一同重又踏上这块熟悉的土地。一切都在变化，昔日的“周公馆”，胡风却感觉依然亲切。他无法忘却当年在这里和周恩来面谈的情景，无法忘却在重庆他为办《希望》所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这一切都无法重现了，胡风不免心头荡上几丝悲凉。

然而，从来不肯轻易在现实重压下低头的胡风，他伫立嘉陵江边，不绝的希望却飘向北京。

领袖在干什么，会给胡风的命运带来转机吗？

五

毛泽东在忙碌着。

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来概括共和国草创时期的毛泽东的辛苦，的确十分恰当。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创建者、领导者，他自然比任何人都感受到更大的紧迫感和艰巨性。

已经过去了的二十几年的战争，曾使他呕心沥血，充分施展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在同时代众多杰出人物之中，他显然当之无愧地耸立在最为人注目的高峰。由湖南山沟中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的儿子，成为亿万人誉之为的“大救星”，在他，绝非“天才”二字能代表自己的命运的。

可是，一旦成为一个政权的领袖，他丝毫不会觉得轻松。整个军队、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此刻都摆到了他的面前。

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海南岛海战、西南剿匪、西藏解放……都不宜迟缓地需要他从北京发出一份份指令。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问题，更是严峻地考验着共和国的巩固。

他依然是一位军事统帅，密切注视各地战局的任何或大或小的变化，及时作出或大或小的决定。大者，颁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小者，询问战士棉衣棉鞋的供应，一个团兵力的调动……

经济建设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同时摆在他的面前。春耕、夏征公粮、土地改革、城市工业，直到整个国家经济规划，他依然是最高决策者，直接指挥者。

翻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1949.9—1950.12)》，根据这本并非完整的历史纪录，就可看出一位统筹全局的领袖的繁忙。

仅以1950年10月13日—15日三天的所收文稿，就可管窥此时毛泽东的工作状况：

10月13日——给周恩来一封电报，谈及派军队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必要性；

10月14日——给陈毅一封电报，同意第九兵团的集结整训地点安排，认为一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并询问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同日，就朝鲜情况和军队入朝参战意见再给周恩来拍电报两封；同日，作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保护问题的批语；

10月15日——就立即运志愿军粮食给高岗(当时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拍电报；就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问题电告高岗、彭德怀等；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近日市场情况报告上作批语，认为投机风潮会来到，请速筹对付办法；在外交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军事出版社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报告上作批示。

……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似乎永远不会让毛泽东感到疲劳，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和同志们开创的事业充满信心。尽管，他明了眼下国内外军事、经济的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有关共和国的命运，他依然如同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样，对胜利的到来毫不怀疑。

毛泽东同样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对他的颂扬和崇拜，与后来的毛泽东相比，此时他显得并不那么陶醉，也许形势的紧迫，还不能让他静心品赏被万众高呼万岁的滋味。对于各地修他的铜像等等，他一律拒绝。

沈阳市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1950年5月20日他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时在来函中"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

五个月后，得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提案，建议中央

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毛泽东当即批语："不要这样做。"

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为在他的家乡修房修路之事，写信制止："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的影响。是为至要。"

这是一个与后来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军事和经济，以及日常琐事，丝毫没有冲淡毛泽东对思想界、对文化界的关注，或许，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化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感到思想和文化对他的诱惑。他批评为他铸造铜像，并不证明他对确立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感到更大的诱惑。作为一个领袖，他完全可能比任何人更清楚，思想的权威，才是真正久远的权威。

一个领袖一旦有了自信，那么他就会将一切不可能努力变为可能。

在军事上，在打天下上，毛泽东证明了自己的伟大，而现在，他同样要证明，在思想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知识分子的改造上，他也是伟大的，无所不能的。

文化界，对于他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在延安，在战争年代，他的文艺思想，他的政治思想，曾经广泛影响了一代人，但那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如今，整个中国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必须将所有旧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文化、艺术全然改造。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今后的一项工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随后，在1950年，1951年，全国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

漫长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铺向未来……

六

毛泽东1949年10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表明了他对文艺的浓厚兴趣。他呼唤的好作品，自然是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品，而对他所认为的"坏"作品，在此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

1950年3月，毛泽东观看电影《清宫秘史》时，指出这部影片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应该进行批判。但这之后，全国并没有展开批判活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报刊有材料说是刘少奇、胡乔木阻挠了毛泽东的指示的落实。

一家刊物上这么写到：

>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放映时，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但刘少奇却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胡乔木，指出："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表面上承认错误，但暗地仍按刘少奇的黑指示办事，极力阻挠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这家刊物的记述也许不很可靠，但毛泽东所设想的对《清宫秘史》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未能实现，却是事实。虽然如此，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电影的注意，一年之后，另一部影片《武训传》终于引发出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

由上海拍摄的《武训传》，主要反映清朝以"行乞兴学"而著称的武训的一生，1950 年底公映。公映后，评论界纷纷称赞影片中的主人公，以及影片所力图反映的武训精神。

对报刊上的叫好声，对电影所体现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毛泽东不能保持沉默。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时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毛泽东在社论中写到：

>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会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竟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没有丝毫艺术分析，没有丝毫闪烁其辞的犹豫，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诗词的毛泽东，并不将自己仅仅作为一个文艺家来介入文艺，他着眼的是政治，是千万人的思想改造。一句句不容置疑的质问，携带着沛然而至的气势，向人们提出来。一部电影，在他的笔下，再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场弥漫着阶级斗争气氛的战斗。

《武训传》批判开始了。

由文艺为导火线而转入政治思想批判，乃至政治斗争的范例，于是产生了。它，决定着未来；它，通向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更猛烈的批判。

七

上海。

读着《人民日报》的社论，作为上海文化局局长的夏衍，绝不会轻松。在上世纪30年代初因与周扬接近，夏衍曾被鲁迅划入“四条汉子”之列。1949年后，他重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文化界领导职务，《武训传》的拍摄，正是由他所管辖的电影厂进行的。“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社论中的这种批评，很难说与他无关。

夏衍遇到麻烦，对于在上海的胡风的一些朋友，恰恰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耿庸、罗洛、张禹……他们参加了批判。没有看到胡风本人的文字，但他不会反对朋友们所写的文章，这是完全可能的。

自《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上海各报展开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但耿庸他

们看到，夏衍等依然控制着上海的局势，在竭力把批判对象转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而他们却正是要借这场批判，给夏衍施加压力。

《解放日报》5月27日发表虞孙的文章《“我错了”和“你错了”》，认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人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反对对犯了错误的戟指而攻之。之后，《文汇报》、《大众电影》等都发表一些强调不必追究个人责任的文章。

耿庸不满于这种和稀泥、为夏衍等有关领导人员开脱的态度，他于6月4日在《文汇报·文学界》上发表《论诚实和负责》一文。

“文学界”是《文汇报》此时每日出版的附刊《社会大学》里的一个副刊，每周一期，由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编辑则是后来也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梅林。同一天的“文学界”，除了耿庸的文章，还发表了罗洛的文章《从“黄马褂”谈起》，也是批判《武训传》的。6月11日的“文学界”上，又发表了张禹的《一点杂想——和武训有关的》。

耿庸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上海并不是没有人感觉到《武训传》的错误，但是却被评论界、领导者们阻止了。“负责同志的郑重推荐等等，还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从而，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



1984年，黎丁（前左）、耿庸（前右）、徐放（后左）、路翎（后右）在一起。

耿庸反对“人人有责”的观点，而认为那些强调每个人都需联系自己思想的人，是想转移批判的中心。他说：“无疑，指出那种没有捧《武训传》不等于思想水平比别人高，是正当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强调看了《武训传》，‘难道就不歌颂与赞扬武训么’和没有看《武训传》只是侥幸错误，却不是对检讨和《武训传》的错误这一工作的集中，而是对检讨工作的离间；不是在于追寻

颂扬武训和《武训传》思想混乱的症结的所在，而是在于涣散这个追寻的工作精神，在于造成人人（无论看了《武训传》与否的全体）都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或至少是思想有问题的嫌疑的印象。显然，这加强了思想混乱，这只是帮助了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中存在着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获得了分摊的安慰，亦即是，耽误了对待《武训传》所必需的严肃认真的思想论争的全力进行罢了。”

胡风的朋友们全身投入了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每条河，都往前流着；谁也不会知道，所有河水在远方会汇成一片什么样的大海。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夏衍的公开检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在这之前的3个月中，《武训传》批判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已在全国掀起前所未有的文化批判浪潮，《人民日报》自7月20日发表社论之后，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甚至一个版或半个版的篇幅。田汉、郭沫若等均作了自我批评。7月23日，又开始连载由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负责的调查组的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不仅仅是文化界的批判，《文汇报》一则消息报道，北京凡是观看过《武训传》的共产党员，都纷纷出来承认错误，检讨，反省。

在批判《武训传》的同时，文艺界对其他文艺作品的批评重又兴起一阵热潮，1950年已出现的批评惯性，自然而然冲到1951年，冲向时间的前面。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文章，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表现出的倾向；6月17日同一报纸发表冯征的文章，批评电影《关连长》；

6月25日，再发表刘浩的文章，批评丁克辛的小说《老工人郭福山》。7月30日、31日，重庆《大公报》也报道了重庆文艺界对刘盛亚的“反动小说”《再生记》的批判……

对夏衍的公开检讨，张禹等人并不满意，认为夏衍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张禹于9月9日写出长文《读夏衍同志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寄给《文艺报》。在文章中，张禹披露一件事实：耿庸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化局极为不满，并且以行政机关名义出面，由文化局艺术处于6月25日发出通知，召集全市文艺报刊编者座谈会，同时邀请有关文章的作者参加，要耿庸“报告写作动机与今天的看法”。通知发出后，又发“暂不举行”的通知，座谈会遂未举行。张禹认为，这是“要把批评者‘揍’一顿”，是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反的。

《文艺报》发表了张禹的文章，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按语肯定了张禹对上海文艺界领导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现象的批评，但又不赞同张禹、耿庸等人的观点。“按语”说：

但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则应着重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不能单靠文章所要求的用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这样，上海文艺界才需要更好地展开思想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错误的文艺思想，建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上海文艺工作才能正确地前进。

还应该指出，思想改造，是对于多数文艺工作者都迫切需要的。因此，如果有人用“人人有责”的论调，来互相安慰，取消批评，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以为错的只是少数别人，那就把思想改造看成只是少数别人的事情，因而缩小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范围，那也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耿庸的文章，就犯了这种错误。

《武训传》批判渐渐接近了尾声。胡风在上海的朋友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两年多来，终于有了第一次集体参加批评的机会。尽管，这将是他们惟一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岁月，他们再也不可能像这样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自己或对或错的意见，但他们终归发出了声音。在整个胡风事件的悠长历史中，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可它却让人荡起无尽的思索……

八

旗开得胜。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文化思想上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役，仍然印证了他的必胜信心。

在《武训传》批判刚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兴地提到自己所发起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有了可喜的进展。他继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再铸造进一步开始了。

很快，《人民日报》出现了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在这个标题下，一个个文化界知名人士，像一年多以前的冯友兰、朱光潜、费孝通一样，纷纷向人们敞开自己的思想。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到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转向了新的时代。毛泽东以他那无限的力量，改造着人，改造

着大知识分子的思想。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

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奋斗》;

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

金岳霖、黎锦熙、蓝公武、陆侃如……

一个个,虔诚地解剖自己,埋葬旧我。他们的语言是真诚的,心更是真诚的。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士兵面前,在毛泽东面前,他们显得多么渺小、苍白。

他们空有理想和抱负,却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一丝一毫,而民众、而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治力量,改变了一切。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在这样伟大的人面前,他们的思想毫无存在的价值,接受,而不是思考和创造,这将是他们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不容忽视的选择。

文艺整风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全国文联常委会于1951年11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决定首先在北京进行文艺整风,尔后在全国铺开。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800余人与会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以及周扬和丁玲的报告。

《人民日报》1月5日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文艺整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其内容即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

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了文艺整风。

九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面临着又一次选择。

对毛泽东,胡风非常崇拜,他曾以饱满的激情歌唱过。但在文艺思想上,虽然就文学与生活、文学与阶级等方面,胡风与毛泽东并无大的区别,但胡风更强调作

家的主观意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文艺家。一位文艺家的文艺思想，与一位政治家的文艺思想，似乎天生存在着难以融合的分歧。

胡风多么自信自己的文艺思想。多少年来，他的奋斗，他的倔强，不就是要以刊物、以作品、以一个个脱颖而出的作家，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自己的权威性？

眼看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子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到那么多人虔诚地在《讲话》面前抛弃自己的旧我，胡风不能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他依然坚守自己哪怕越来越小的阵地。对《讲话》他不能完全附和，更不能轻易将自己二十多年的探索付诸东流。

1950 年 4 月开始，与胡风素不相识的青年张中晓开始从浙江绍兴和胡风通信。

在所有朋友中，张中晓要算胡风认识较晚的一位年轻人。年龄的悬殊，毫不影响他们思想的沟通，更何况张中晓的许多见解与胡风不谋而合。从张中晓的文章中，胡风欣喜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理论人才，后来他曾在朋友中赞誉张中晓是“年轻的杜勃罗留勃夫”。

张中晓 1951 年 8 月 22 日的一封来信，后来被作为胡风等人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罪证，收入“第三批材料”中，并在信后加了一大段按语。

张中晓写到：

> 为了想写一写，看了一遍毛著“论文艺问题”，但，看了之后，就不想写了，现在告诉你一些我对这本书的意见：
>
> 作家与对象在创作过程进行搏斗，在我觉得这是真假现实主义的分歧点，但，他只说：“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多冷静！
>
> “功利主义”云云。这个标准压杀了真正的批评，压杀了新的东西。对于“暴露”，“歌颂”的三小段，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我讨厌“暴露”、“歌颂”（这含义应该与“暴露”相对）这类说法，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换写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我觉得，现实主义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
>
> 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对的。杂文，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假如仅仅把他看作“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故以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才正确，那就根本没有懂得鲁迅。

其他当然还有好几点，以上的一些，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觉得它不对的。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

……

这书，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怪不得帮闲们奉之若图腾！

譬如"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乔木就引用过。

当然，里面有些是对的，譬如"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及你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第10页所引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都该是马列主义的常识。

我真不敢想那些以为这本书是"最完整"的文艺方针而且谆谆教训别人的指导家们心中作何想头！

在1955年"第二批材料"中，收有胡风一封8月26日给张中晓的信，没有标明哪一年，但可以从内容推断是收到张中晓前面一信后的回信：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例如罢，"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说法，稍有人心者就应该抓住"体验"去提出问题，发展下去。而他们的做法却完全相反，这就做成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耀武扬威，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无名作者。形势又加强了这一大结：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地给压下去。这样一来，还不会枯萎下去么？

我想，你不要因为那就不写了。当然，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但当然，写作品，就更不必管它了，虽然现在在它们刊物上发表是困难得很的。不要停止工作，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路，只有从人民深处的要求走出来，在强盗和骗子群中走出来，忍辱负重地走出来，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胡风早拿定了主意，"忍辱负重地走出来"；他也认定目前局面的形成，罪过是在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他对毛泽东，毫无抵触情绪，相反，他在内心里相信，不

是《讲话》本身，而是“低能兼恶意者”在兴风作浪。

真挚的忠诚，与胡风密不可分。但，文艺整风会将严峻选择进一步推到他的面前。

胡风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在许多人抛弃旧我的潮流中，他保持了沉默。他并非不愿认真审视自己的过去，也按照新的要求矫正自己，但他害怕自己的任何一小步退缩，会让过去现在的对手们抓住时机，将自己全然击溃。

于是，他，以及朋友们，沉默着，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始终不肯退缩半步。

胡风1952年2月8日写给绿原的信，曲折地反映出他内心复杂的状态。这封信1955年被公开时，作了大段删削（下面引文括号内为删削部分）。

> [你说得对，是深入浅出的甘苦之言，并不片面。因为是为了真理，这个“主动”就特别艰难，但并非主动就不足以济事。]
>
> 现在能做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步去推动实际的局势。
>
> 但这实在是近冤枉的“麻烦”之事，首先，非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但这要忍受生理上的厌恶才行的。现在只能有这样的实践。
>
> [但这是暗房子里的实践，好像要考取一个医生名义，但瘟疫正在蔓延开去，看着药品没有资格动用。]
>
> [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责任感，要不然不是可以心气平和地例行公事做太平犬么？当然，“澄清自己，发展自己”也是必要的。但这一步也不容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他？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现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

一种莫名的烦恼和忧郁，甚或激愤，贯串于字里行间，也贯串于胡风和朋友们的沉默之中。这沉默不是静止，而是地岩之下地火依然在运行，等待着迸发的时机。

舒芜发言了，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的声音，刹那间惊雷般炸响于文坛，炸响于胡风、路翎他们的耳边。又如一阵旋风，将他们卷起，带到一个更为艰难的境地。

错综复杂的生活万象，网一般密布的人际关系，谁能理得清，理得顺？又有谁，能洞察未来的千变万化？

第五章 舒芜反戈一击

一

很少有人比得上他的聪明和才华，即使在胡风众多的有才华的朋友中，他也显得智力过人，知识丰厚，更有着可以引为自豪的文化熏陶背景。

舒芜出生于安徽桐城，但当年并不明显表露出对家乡“桐城派”祖先的偏爱。不过，生于斯而长于斯，舒芜即便高中没毕业，但家乡深厚的古文化的土壤，早使他在学识上闪出耀眼的光泽。1944 年之后，高中肄业的他却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讲授的课目“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齐集于一身，足可见只有二十几岁的舒芜出色的才能。

真正将舒芜推到一个赫赫然位置的是胡风。在短短时间里，舒芜的兴趣集中在哲学问题上，经胡风之手，连续发表《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说不上西方哲学家冷静、严密的思辨，但贯串其中的气势、挥洒自如的旁征博引，倒是让人惊奇它们居然都出自二十四五岁的舒芜之手。

对舒芜，那是应该留恋的日子。人们议论他，甚或批判他，贬斥他，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作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还有引为荣耀的友人，与路翎——这位当时崭露头角的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有着密切的交往，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一封封来往信件，汇集一起，体现着两个字：知心。

由路翎介绍，舒芜认识了胡风，成了胡风的重要撰稿人。因路翎结交胡风，由胡风发表哲学论文，当年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没有犹豫，没有顾虑，全是一片真诚友情。这友情，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尔后招致来的对《论主观》的批判，也没有损害相互之间的信任，反倒把他们历史地绑在同一战车上。

历史变换了新面貌，舒芜的心上弥漫起难以排遣的苦闷，甚至痛苦。

1949年之后，舒芜远远地留在南宁一所中学里。朋友们有的在上海，有的在中原，有的在北京，大多占据了令舒芜羡慕的位置。他寄希望于曾经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赫赫有名的胡风，使自己能到首都北京工作。他写信，他来北方，一次又一次，可是，看到和听到的胡风现状，却冰冷冷，令人黯然。不仅自己的工作安排前景黯淡，就是胡风本人，工作安排也迟迟不能解决，而那些当年批判过他和胡风的人，哪一个不是身居要职，盛气凌人？好友路翎，即使有了工作，可是剧作却总也不能上演，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被安排去了抗美援朝的前线。

舒芜的心沉重如巨石，他关心胡风的遭际，对接连不断的批评，他也不会不认真掂量。他知道自己的过去、胡风的过去，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胡风的受冷落，对他，正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但是，要作出新的抉择，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1950年10月30日，刚从北京经汉口回到南宁的舒芜，给路翎写了一信。信中对胡风现状的忧虑，也许正曲折反映出他心中的苦闷。

翎兄：

别后，在汉口和到家后各写一信给胡先生，想都看见。此行自觉尚有收获，“思想上提高了一步”，因此决定了回来之后还要加紧工作，改正解放以来的无为。

自解放以来，这种无为状态，一方面固然也帮助我突破过去的文化圈子，可以从较宽阔的角度来看清自己，看清问题；但另一方面，在思想斗争的意义上，又未尝不含某种逃避的心情和作用。这前一方面，是一向自觉得到的；而后一方面，只是在这趟和大家说了几回之后，才发现出来。在汉口时，绿原力劝我要动笔，说了许多道理，我觉得也是。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但当然，也要紧防“文化”之卷土重来。

绿原和曾卓谈了许多前些时在汉口所流传的关于胡先生的谣言笑话：有人说，他在家庭里是个暴君，写文章反封建，而对妻儿却是十足封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自己养尊处优，置妻儿冻馁于不顾，云云。又有人说：重庆有一次座谈会，会上说起你的作品，大家都说不好，只他一人说好，于是他拂袖而去，一直跑到你家，坐下来就拍桌子，一面拍，一面向你说，“你写！你写！！你写啦！！！……”气得别的话

都说不出来，云云。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封侯挂帅的名单时，拿了报纸给绿原看，说："你看，胡风竟然一个名字也没有，多难为情呀！其实，以他的斗争历史，只要他稍稍谦和一点，决不会搞到这个样子的。"云云。又有人说：什么是胡风思想？很简单，就是专讲技巧。又有人说：胡风派文学，乃是非党的文学，所以党不能放心。又据说，《论主观》一发表时，有人请教艾思奇，艾说："这很简单，只要看题目，就知道是主观唯心论的。"还有许多，花色繁多，不及备载。不过又据说，近些时候来，比较少听到了。

此信便中请给胡先生一看。

敬礼

管 10 月 30 日

不能说一封信就能展示人的内心深处，但这封内容丰富的信，透露出舒芜沉默一年的苦闷。他自己已经感觉到突破过去文化圈子的必要，他决定改变"无为"的状态。

一大段关于胡风传说的转述，既是对胡风的关切，同样，也可以让读信人感觉到飘忽着舒芜几丝心中的凄凉。

是的，他不会再"无为"下去。他还不到 30 岁，他有满怀才华要展现。

沉默，不属于他。无为，也不属于他。

二

胡风和朋友们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不出他们的预感，1951 年底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对他们的确是新的冲击，是 1950 年批评阿垅的继续。

《人民日报》1951 年 12 月 25 日第三版报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东北产生反响。

天津是上海、北京之外，另一个胡风的朋友较为集中的城市，这里有阿垅、卢甸、鲁藜等。12 月 7 日，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党员干部，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分别由方纪、鲁藜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报上消息说：方纪批评了卢甸、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处，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在上海的胡风，从绿原来自汉口的信中得知北京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机构发行的内部通讯上，批评了路翎在整风运动中仍然公开宣传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收信后，于1952年2月8日给在北京的路翎一信。

> 你那里，想有一个时期的纠缠。得汉口信，说在“通讯”上看到了关于我的话。[这样看来，以某为首，是在布置一个谣言阵地了。我想，应该慎重处置。]顶好能弄到一份“通讯”。原兄说，你这“赤膀上阵”(?)的办法，他认为是不好的。[他以为，不从根本问题进行坚持，单在一些具体实践的枝节问题上答辩，那该是多伤脑筋呵！]
>
> 那么，[这个学习，应该你真从事才好。]应该与谢、徐、阎等讨论研究，得些启示。问题当然是这样一个问题，但为了少些浪费，就得走得稳，要抓就得抓准，万一没有把握就不如用拖的方法。

同年3月4日，胡风再给路翎一信，一是反对路翎送文章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一是介绍上海情况。

> [文章寄陈，我恐现在不大好，这样，就有另找一线的感情不快产生的，因为，这些都是乔公在管的。这样办如何——等讨论思想时，提出去，如果不行，就分寄学委会和乔、陈甚至主席。现在寄，以寄乔为宜罢。至于书，可寄陈的。]
>
> 华东一塌糊涂，上海当然也如此。现已调柏山接黄源副部长的工作，可见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没有可能开辟岗位，那只能是一个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他再很难写成一个开始了的中篇，也是可惜的。]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可惜的是当他正在处在攀登创作高峰时，却被毁灭了。

胡风信中所提的黄源，在文艺整风中被上海

报纸公开批评,其错误被说为官僚作风、财经混乱等等,很快被撤销了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黄源是当年鲁迅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曾经为之辩诬的三人之一,而现在,他第一个栽了跟斗。

彭柏山就任副部长后,十分关切胡风的问题。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与胡风关系不错,胡风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还撰文高度评价他的创作。他来上海担任文艺界领导,对胡风,无疑带来了一些希望。

和彭柏山一样与胡风接近的,还有此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刘雪苇。1951年他负责筹备"华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曾提议由胡风担任主席,后被否决。1952年上海成立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由刘雪苇出任社长兼总编辑。于是,耿庸、罗洛、张禹、张中晓等,都成了出版社的人员。

彭柏山想出面解决胡风工作问题的愿望,很快化为乌有。

3月17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谈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困难。此信在1955年"第二批材料"中分别列为34、37发表,并作了删减:

> 甸兄听部长说,讨论我的问题时机成熟了,柏山来后探问了一下,[说中央不同意我的一些论点,希望我自己检讨,否则他们提出来云。]那么,也许要玩一玩么?
>
> 我甚至怀疑乔爷生病也是专门在"研究"问题的。要求见面提意见,是否适宜,现在也在踌躇了。此事写在给谢兄信中。
>
> 柏山来后,想我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但探问一下,觉得中央不会批准(他的意见可以在此通过),所以主张只弄自己的问题,不要提意见云。[他甚至以为,问题在哪里不弄清楚,得到解决,不应搬到北京。这当然有他自己的心情起作用,但他们搁着不理,要搬去也无法搬的。现在想,等弄出眉目来了,那以后随时可以搬的。]

胡风不知何处栖身的烦恼,无法消除。正在兴起的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运动,虽然触及着他,使他也感到形势的紧迫,感到自己也应认真学习一番的必要,但许许多多非理论、非思想的生活刺激,却让他永远难以冷静下来。

4月初,胡风看到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15号和16号),上面发表有读者来信,在文艺整风中第一次提出应该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判。同

时，胡风还看到了一本没有出版处和出版年月的小册子《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

这时，彭柏山告诉胡风，周扬将来上海，建议他俩谈一谈。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记叙了他和周扬的会面：

> 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约我到北京谈一谈，同时，《文艺报》也准备对夏衍同志过去的作品作一总的批判，周扬同志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感到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贸然地写了信。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冰山）劝说胡风，应该也写一篇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文章，表示一下态度，借此把问题解决，胡风听从了劝说，马上着手写，题为《学习，为了实践》，这是他 1949 年后写的第一篇理论性文章。

胡风写着，他不知道，远在南宁的舒芜也在写着。都在写体会，都在纪念《讲话》，而心事各异前景各异。

三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舒芜终于写出了这个标题。在他，写这几个字，不亚于灵魂的搏斗。苦恼，寂寞，彷徨……他终于将自己汇入了业已形成的潮流。

写出这几个字，他决不会轻松自如。不会像在蜀山之间，与路翎漫步黄昏中那么悠闲，那么谈笑风生。他显然早已在心中掂量过即将写出的文字的分量，显然将这篇文章作为自己抛弃旧我的宣言。这是他在不可避免的选择面前作出的选择，这是和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的选择。历史摆出了这选择。

舒芜写到：

从我自己的经验，深知这篇伟大文件，和毛主席的其他一切著作一样，是人民群众实际斗争的指南针，而不是书斋里面徒供玩好的教条。因此，它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革命者，每一行，每一字，都显示出无限深刻的指导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对于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则是完全不可能被理解的。他们从文件当中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字面，其中当然没有任何奇辞奥句，于是他们觉得："这还不容易懂吗？一望而知，有什么可学习的？"即使要他们深入反复钻研，也只是再从字面上多看几遍而已，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

例如，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大家最熟悉的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多次引用过它；向别人宣传、解释，好像也头头是道。可是，在它发表之后已经十年的今天，回想自己十年以来，究竟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什么，细细一算，真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于是第一次想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恰好替我预先做好了十年发展过程的结论，把我这十年来一切以为大有意义，而其实是渺小可怜的活动，统统概括在里面，照出了原形。进而再读全篇，更发现每一字，每一句，都好像针对着我而发。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

充满热情、赤诚的赞美，毫不留情的解剖、否定，长达数千字的读书体会，依然写得酣畅流利，妙笔生花。即使写这种检讨类的文章，那份聪明和才华，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

舒芜完全清楚，像他这种曾经招致从上层到下层人们普遍非议的人，仅仅挠痒似地自我批评，是不可能获得谅解的，需要的是彻底否定旧我。

需要的是和胡风、路翎划清界限——舒芜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他开始做到了。在这篇文章中，舒芜点出了路翎的名字，赞同《人民日

报》上批评路翎的小说中工人形象的“品质特征”：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

在文章的结尾，舒芜向路翎，以及“其他几个人”发出了呼唤：

> 但是，我想，从今天起，从头开始，再来学习，还是来得及的。并且，我希望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入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舒芜写完了。对于他，对于胡风、路翎等，这迈出的一步，都是多么重要的、具有历史性的一步。

舒芜将文章寄往武汉的《长江日报》。此时武汉为中南地区的中心。

四

5月到了，这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胡风5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寄出一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学思想的读者来信。当年在重庆时期，胡风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对他，胡风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希望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理解与支持。

5月18日，胡风收到北京谢韬的来信，告知周恩来办公室的于刚曾去谢韬处，谈及胡风的问题。胡风对此极为关切，当即写信给谢韬，询问与于刚谈话详情。

> 昨得信，说于刚看过你，谈到我的问题。谈话内容如何，请告诉我。要全部内容，他的话，你的话，你的印象，最后结语，等。他的谈话，可以作为某一种的反映的。望即告我，详尽地。
>
> 我5月4日发出信，7日可以寄到。信可能经他的手送上去，因而可能听到副座的话。如果他和你见面是7日以后，那么，很可能，他是有所为而和你见面的。因而，你的意见，也会对他有影响。
>
> 如能再见到于，可吐露：一、几年来胡想工作，二、想搬来北京，得

不到帮助。

当然,你不能去找他谈这些的。

胡风的希望从没有破灭。他一直相信最上层领导总有一天会向自己伸出热情的手。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日子,已经来临。报刊上早已开始的热闹气氛,此刻更为热闹了。

《人民日报》在5月21日第三版标出通栏标题: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而斗争。

同日,首先发表老舍的文章《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随后几天中,陆续发表了赵树理、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等人的文章。

23日——十年前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长篇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社论强调了贯彻执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重要性。在对当前文艺现状的分析时,主要指出了两种应该纠正的错误现象。

目前文艺界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

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

其次,和上述倾向看来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

社论将文艺界学习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明确指出文艺一旦离开毛泽东的思想,放弃毛泽东的方针,那就是实际上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生活,离开了阶级斗争,文艺工作就失去生命,失去战斗的目标和战斗的力量了。

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是精神、思想的化身,是群众、生活的化身。从《武训传》批判开始树立起的文化思想权威,此时在文艺领域显得更为突出、提法更为明确了。

胡风和朋友们,对这篇社论提到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感到些许安慰,认为除了一直强调很厉害的思想批判,总算又提到了另一种他们竭力批判过的倾向:公式化、概念化。

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5月24日胡风给路翎一信,信中说到:"看纪念的社

论,似乎也看到了问题,杀机似乎还有,但已经不愿意说得太显了!"

同一天,阿垅也高兴地给路翎一信:

宁兄:

人民日报社论,多好。问题可以开始解决了。高兴的。但感到,人们即使一百八十度地转弯(如丁玲),但由于教条的血肉和沉淀作用,转变也不简单,甚至仍然会阳奉阴违,或力不从心的。

刚发一信给谷兄,建议他再去信给上面,要求见面,并提出问题。

等他来信,我打算即行动,麻烦是会多。

勇敢的兄弟,握手!

亦门

一时间,五月这阵风在他们似是多少带着春意的清风,心头的阴影被轻轻拂动,浑身顿时又充溢起希望之光唤起的力量,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

很快,舒芜的反戈一击,将他们的片刻欣喜击得粉碎。代之而起的是对昔日友人的鄙视、诅咒、怨恨。

五

就在胡风、阿垅分别给路翎写信的第二天,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舒芜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辑熊复,决定发表。

为此事,绿原曾写信向胡风解释,表示歉意。

胡风于5月30日给绿原一信:

[此文看到了。应该想象得到的。原来我们把他当作书生,现在看来,倒是我们是书生了。我想,这是示范,恐怕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

但我想,不能要别人"研究",一来要搬开这个问题,免得学习不好,二来呢,"研究"了也说不清的。这就愈弄愈麻烦。]

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除了同组的，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自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而创作的人，又不专业理论，没有牵在一起的道理。宁兄处就专谈他自己，从未牵到别人的。外省比较远些，但也应求得如此。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

曾兄也可以如此。

万一要谈，也只能谈个人印象，那倒可以谈谈，因为那是和所提出的相反的。只除了不通俗一项，但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又要理论文字，当时没有觉得。[至于介绍，那时据自己所知，是尽力介绍了的，有得到手就尽力介绍了的。当时是那样的环境，只要能给以发表，出版，就是尽杪一称了，为文介绍不可能，但经常暗示了的。]万一要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是好的，那就有：愿意长期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不是屡次提出了要求么？至于别人受了不好影响，但那是别人的事，有机会研究好了。但并非一定要我研究罢。云云。

信中流露胡风的焦虑。他担心由舒芜的信，而将所有朋友全都卷进漩涡。

谁料想，几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特地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据林默涵回忆，这一“编者按”是由胡乔木所加。

“编者按”说：

本文原载5月25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45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文艺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观点已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

舒芜受到了欢迎，胡风和朋友们却被意料不到的打击拖入恼怒之中。

在《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的第二天,6月9日,在天津的阿垅立即给路翎一信,发泄心中对舒芜的咒骂,安慰被公开点名的路翎。

宁兄:

看到8日人民日报方管一文否?

说到他,这真是死人复活。

人,自己擦脸或擦屁股都是可以的。但狗肉臭了卖不出去,却卑贱得必须挂羊头了,这就不行。

本来,这不过是沙砾似的存在,跟我们不相干。但一只时间表,有时却得受这类沙子底障碍。他变来变去,一是他自己的事,二是渺小的事,三则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被他拖入阿鼻地狱,则是过去所想不到的事。

真有些辛辣的感情,苍茫的感触,真理在哪里?刚才还想去信发泄一下。他要毛虫变蝴蝶,他过去不是由蝴蝶变了毛虫么——指给他看。但除了想骂人,我恐怕不会说别的。

但无论如何,兄弟,坚忍而宁静呵!

梅

6月9日

在阿垅写信的同一天,天津的卢甸,也给上海的胡风写出一信:

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暗杀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得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胡风6月13日给路翎写信,从这封信起,无耻、吾止,便成了舒芜的代称。胡风在信中建议路翎也揭开舒芜的底子,予以反击。胡风依然不相信报上的一切,是上面的决定,他认准的还是个人间的矛盾在起作用。

[你所说的两个原因都有,但第一个所谓自信,由这材料得到一百倍而已。按语并未号召读者,可见还自信得不到一百分。但这样有奶便是娘,对领导是只有损失的。有些人看了气愤。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对人的问题。凤姐(即丁玲——引者注)、昆乙(即周扬——引者注)等如此,恐怕上面也还是这因素。不过,既然公开了,就得就这情势表示态度。伯兄以为还是上面的决定,但我很惊疑。(不必告人)现在不能不记住,是对人的问题……]

部来领导,得好好准备。我看,小组结论不会拿出来,由部来重弄过。但关于无耻,一定要你发言罢。当然揭露他。而且,那文章,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而且,当时没有人完全同意他。揭露他想当教授;刘邓大军时不参加,事后大家对他不满;解放后劝他在南宁,他却老想出来,向上爬;来北京时满口冷嘲,大家厌恶他……——关于小集团,不知道,向来个人投稿,不用者甚多,从未开过会。

那么,在你那面,可能是硬来了。也许以无耻所提者来试攻。

第一,是在一起过。但对他的书生气和虚无气(把他叫做五四遗老)一向不满,争论很多,没有谁说过A、B、C的话,恐怕只有他才这样想的。

第二,厌恶马列主义云云,完全相反。他当时总是谈马列主义得意的,自己也正在读一些马列主义,正在以为用马列主义认识社会的入门中,颇为沉醉的。[当然,对他的学究式的读法有反感,也有争论。他的文章,总是卡尔如何,云云,可以为证。不是当时欺骗,就是他今天虚伪。]

……

6月30日,胡风再给路翎一信,告诉他得知舒芜又写一篇文章寄《人民日报》。

一,无耻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青年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当会在那个报上发表的吧,以广见闻,不知道能打听其中的大意否?某小说家当准备作答吧。

二，有些事，要严肃的做。势成背水，大意不得，也迷惑不得的。

……

舒芜的举动，使胡风和朋友陷入混乱之中，愤慨、焦躁、苦恼油然而生。此时，彭柏山又带上胡风的《学习，为了实践》进京送阅。胡风便附上一信给周扬，告诉周扬看到《人民日报》按语之后的惶惑。

7月初，周扬回信，说胡风的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决定北上，7月19日登上火车。就在上车这一天，胡风又看到《文艺报》第66期上公开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仍是要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文章还特别指责了胡风1950年反驳何其芳时的“恶劣态度”。

火车启动了，向前方奔驰而去。胡风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是终结。

六

胡风到了北京，住在位于朝内大街的文化部招待所内。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与周扬谈过两次，每次约十几分钟。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记叙：

他的态度很严厉。关于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几点：一，我反对了党员的意见，但党是代表群众的，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又说社会民主党最危险，这是50年3月他向干部作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过的。二，舒芜是进步了（他说不是投机取巧），舒芜说的几个人，实际上是指我。三，我说的话九十九句对，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全部皆推翻了。四，他觉得过去的事不必谈，但还有几个人受我的影响，所以，要舒芜和受我影响的青年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五，要我主动地检讨，少说或不说优点，只说缺点。六，要打掉我的架子……我已是罪人的身份，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以后，他说工作忙，由林默涵同志和我谈。

周扬的谈话，后来便成为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基调。

据林默涵在文章《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胡风5月4日写给毛、周的信，周扬看到过。7月23日，周扬给周恩来写信，谈了胡风的问题：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三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跟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了，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

(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林默涵注)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中写了一篇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没有发表。对胡风理论的批评,上海方面表示困难,没有进行。同时,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自我检讨的文章按语已正式提出胡风理论错误的问题,最近《文艺报》发表了有关胡风思想的两封读者来信,胡风更急切地要来北京,而这个批评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来做了。他(注:指胡风)于十九日到京,现住文化部。我们已和他谈了一次话,我表示希望他能对自己过去的理论采取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指定林默涵为中心发言人(他正在准备),雪峰,丁玲等同志都准备发表意见,党内讨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如果他的发言有较好的自我批评,也可以发表,我们当努力争取他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示知。

此致

布礼

周扬七.廿三

周恩来于7月27日在周扬的这封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同意你所提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检讨步骤,参加的人还可加上胡绳、何其芳,他们两人都曾经对胡风进行过批评。不要希望一次就得到大的结果,但他既然能够并且要求结束过去二十年来不安的思想生

活，就必须认真地帮助他进行开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既然开始了，就要走向彻底。少数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读者，和他进行批评斗争。空谈无补，就要把他放在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试了，总会有结果的。

周恩来

七月二十七日

同日，周恩来复信胡风：

胡风同志：

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均收阅。现知你已来京，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洽，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的“不安”情况。

舒芜的检讨文章，我特地读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读它几遍。

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转去。

致以

敬礼

周恩来

七.二十七

周恩来还给胡风写来一信，由周扬转交。信中提到除文艺理论以外，还应该检查“生活态度”。对周恩来，胡风历来崇敬，读完信，他非常感动，认为这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胡风想到，作为一个追随党的事业的人，首先澄清对于组织的错误态度，之后才能够顺利地检查理论问题。他觉得周恩来指示这一点，是把他当作党的事业的追随者看待的。

周恩来在信中指示胡风多与周扬丁玲商洽。可是，事实是，周扬说忙，委托林默涵和胡风见面，丁玲说不搞理论，说不出具体意见，随后又离开了北京。

胡风写出了《对我的错误态度的检查》。

8月12日，周扬在谈话中通知胡风，舒芜也将来京参加讨论会，胡风当天给武汉的绿原写出一信：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昆乙说，要无耻来参加，一周多以后可来云。这是三反五反的做法，当然要有一通胡缠的。他是风云儿，过武汉一定红得很。对他尽量和气些，多请教，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千万和和气气的请教他，愈多愈好，那是有益的，为了学习。当然，我也希望从你间接得到教益。

胡风不知道，舒芜此次来京，还有另一重要任务，那就是修改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曾提到那篇长文：《给路翎的公开信》，这将是讨论会期间的一发重型炮弹。

舒芜到了北京，途经武汉时，曾卓曾诚恳地对他说过："如果你自己真地那么认为，那你就那么说，那么写。但你不要把别人也牵扯进去。"

第一次讨论会就要召开了。在开会的前一天，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打印本发给胡风。胡风看到舒芜不仅更彻底地否定自己，还鼓励路翎像他一样检讨自己，除旧布新。舒芜还更为明确地又一次提到"小集团"问题。

尚未开会，胡风再度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舒芜的文章分五点，每一部分均有提纲挈领的醒目说明：

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去涂改群众的面目；

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

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的完整一套；

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彻底的决裂，毫不遮掩的反戈一击。在舒芜笔下，胡风和朋友们，完全是处在与人民、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立的位置，在接受一个醒悟者的批判。

路翎看到了打印本，他当即给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写报告，提供材料，希望澄清事实。

七

9月6日，酝酿两个多月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会规模并不大，可对胡风来说，却是一次大的考验。

胡风记叙道：

> 9月6日开第一次会。开会前一天，林默涵同志一定要我先说话，但我因为抓不到问题到底在哪里，觉得困难得很。得到林默涵同志的同意，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的理论问题说明了一下，并且声明这是初步的检查，似乎得不出那里面所下的结论，希望同志们帮助。接着同志们发言，有的责备我不该"强辩"，主要发言人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周扬等同志在理论上提出许多问题和要求。有的同志口气非常严厉，有的同志口气充满了嘲笑，冯雪峰同志开始是带有讨论问题的口气，并说《文艺报》按语不对，读者断章取义，但一听到周扬同志的严厉口气就又马上改成了完全不容讨论的口气。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的。但因为已经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没有在情绪上受到一点影响。但最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好像并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只是随便抓一两句来任意解释，有的还好像是临时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那小册子抓来的。周扬同志是主持会的，他连后一句都没有看就用前一句来斥骂了一阵。我已经是罪人的身份，当然什么都不能说。林默涵同志归纳，要我就"现实主义"、"生活"、"主观精神"、"民族形式"、"五四"五个内容进行检查。("三十万言书")

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胡风的情绪跃然于上述文字中。

9月26日，不管胡风、路翎的反对和申辩，舒芜的公开信仍发表在《文艺报》上，只是删了几处被胡风、路翎指定"太明显了是捏造的事实"。为这篇长达万字的公开信，《文艺报》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胡风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当天下午，林默涵约见胡风，一同到中山公园谈了几个小时。胡风称"这是一

次最长最亲切的谈话”。林默涵告诉胡风,胡乔木因病休假,由习仲勋来主持中宣部的工作。除此之外,林默涵还谈到路翎、舒芜、胡风的问题:

> 一,路翎提供关于舒芜的材料,他相信是真实的。二,这以前对舒芜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到他从刘邓大军占领过的家乡跑出来的事情,也对他有些揣测;广西也没有送来材料。大概舒芜没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给他当中学校长。三,路翎是有贡献的,舒芜一开始就犯错误。四,路翎过去作品解放后都不能出版发行,那是下面不理解,过了这件事就会解决的;这件事过去了,路翎是可以作很多工作的。
>
> 关于我的主要有两点,一,有些文章提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容易生副作用;二,其实现在大家忙,没有时间谈过去的问题。(“三十万言书”)

林默涵的谈话,倒使胡风觉得林的态度与以前显然不同,不再是过去强调的“就是要算旧账”的意思。是一种安慰,抑或什么,胡风迷惑不解。

看到舒芜的文章和会上大家一再提出的“小集团”问题,胡风为了加以澄清,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他写明,当时51个投稿者中,有13个在解放区,他已经知道的有19个是中共党员。到目前为止,有将近一半的投稿者他没有见过面。

《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组在此期间,也于10月1日在《人民日报通讯》第28期上,向全国通讯员发出号召,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感到有必要写文章了。他征得林默涵、冯雪峰的同意,写成《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对一些问题再作解释。11月18日他将文章交了上去。

11月26日,召开第二次讨论会。从这次起,路翎和舒芜也应邀参加。会上胡风根据林默涵的要求,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作了简要口述。舒芜也就他的文章作了发言,说他过去的思想完全受胡风的影响。

12月11日,开第三次会。

12月16日开第四次会。据林默涵回忆,这四次会议都是在东总布胡同的丁玲住处举行。

在12月11日召开的讨论会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

现实主义的路?》的发言。一开始,何其芳就毫不留情地指出胡风的态度是避重就轻:

> 对胡风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我是很不满意的。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检讨,不,他也检讨了个别的重要问题。但是,胡风同志的文艺理论上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错误。胡风同志没有提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把自己的文艺理论描写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看法有错误,只是在做文艺理论工作的时候有某些技术性质的缺点,具体作品的批评写得太少,文章里的语言又常常缺乏明确的科学性,等等,因而可能引起一些误解。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的。

何其芳的发言此时倒不显得激烈,除了系统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外,对胡风仍然寄予热情的期待,希望胡风像舒芜那样,作出深刻的检讨,并认为胡风现在来检讨自己,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自然,他是带着居高临下的胜利者的口吻。

关于最后两次会的情况,胡风也有详细记叙:

> 完全是同志们对我提意见。主要发言人的口气更严厉。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
>
> 同志们没有提过《一段时间,几点回忆》有什么原则错误,另外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使我奇怪的是,主要发言人如周扬、胡绳、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同志,好像还是没有认真检查过我的文字,只是抓住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解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周扬同志的发言更随便从我的文字抽出几句来斥骂一阵。其余几位发言较少的同志只是个不得不表示态度的意思。因为确定了"依靠组织"的原则,我在情绪上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最后,周扬同志严厉斥责了我,说我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决定于文艺理论;说我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斥责了以后,归结到:结论要由我自己做。时

间太晚了,我要求简单说明我的态度,但还只说了几句,有的同志就大声说明天还有工作,会应该散了。

我当时向同志们说明的主要点是:经过这一次,同志们坦白地说出了对我的意见,我感到愉快,但当然还要继续检查,作出结论,在工作上去认识并改正错误,请同志们相信。说我感到了党的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二十多年的工作,党没有不注意的道理;谈出来了,党明白了,我自己也安了心。如果有些问题我不能理解,不能一时解决,那也不要紧,一步一步做去就是。同志们不要耽心意见提得太尖锐,那不要紧,那是为了帮助我猛省的。我自己更加强了求真的精神,要努力再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懂得了团结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面工作的问题,要从过去朴素的想法和心情更进一步,争取做得好一点多一点,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我争取了十多分钟把这点意思说完了,这是为了希望同志们相信我是要尽可能在党的庄严的斗争要求下面,在党性的要求下面对待问题,对待自己,也对待同志们的。

从7月到12月,断断续续几次讨论会,仍然没有让胡风低下头来,虽然他也尽可能地作了让步,作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悔悟。此时,如果胡风放弃自己的固有的立场和观点,原本会避免随后而至的一切风浪。

可是,他没有,又一次失去了别人给予他的机会。他不屑于像舒芜那样,内心里,他更不愿意向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他们低下自己高昂的头。

带着满腹恼怒、惶惑来到北京,几个月,他依然情绪低落,怀着更为矛盾的心情滞留北京。

胡风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又呈送中央、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然而,如石沉大海。

1953年1月27日林默涵给胡风一信,说他的文章已写好,并希望胡风也尽快写出来。28日,胡风便去中南海拜访邵荃麟,表示担心林默涵的文章现在就发表,恐怕要产生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邵荃麟答应去商量一下,如发表,也先给胡风看一看。胡风同时又一次提出解决入党的组织问题,邵荃麟表示理论不解决,目前解决组织问题比较困难,但同意将胡风的申请转达上去。胡风还提出全家搬到北京。

29日,由全国文协召开在京作家会议,严文井主持,由林默涵作关于讨论胡

风文艺思想的报告。也在北京的胡风,没有被邀请参加。

1月30日,《文艺报》便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距胡风与邵荃麟的谈话时间只相隔两天。

与何其芳在发言中的口气相比,林默涵的文章显得极为严厉,题目就很刺激胡风:《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并不否认胡风在政治上"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斗争"。但他文章的重点,是批判胡风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所发表的文艺理论,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林默涵又一次提到"胡风为首的小集团",只是此时只认为他们是文艺上的小集团:

> 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他们的小集团作风的表现,是在于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性,凡是跟他们不同的意见,不论来自何方,都加以排斥和打击。自我批评对他们是根本不适用的。把自己一小伙人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很快加编者按转发了林默涵的文章。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长文《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同一天中宣部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其中写道:

> 我们和胡风一共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周扬、冯雪峰、丁玲、胡绳、张天翼、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田间、陈企霞、艾青等共十余人。第一次会,主要是大家提出问题,作为胡风进行检讨的参考;第二次会,由胡风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作检讨性发言,舒芜也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第三次和第四次会主要是大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发表意见,最后由胡风表示对大家所提意见的态度。除了这几次座谈会以外,好几位同志还和胡风作过一次或多次个别谈话。不论在座谈会上或个别谈话时,我们都采取了诚恳的坦白的态度,严肃地具体地指出了他的文艺

思想的错误所在和错误性质。但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作了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地，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大家的批评。

受胡风思想影响极深的路翎，在座谈会上没有发言。会后，林默涵同志和他谈过一次话，路翎表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已有初步认识，他表示愿在实际中好好地改造自己。(转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历时将近半年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便以这样的局面宣告结束。胡风没有写文章与对手们再度公开争论，这一次和过去完全相反，他沉默了，他已明显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何止如此，胡风更感到自己被一连串的打击推到了绝路。

舒芜终于离开南宁调往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胡风也有了一个满足，他的关于全家搬到北京的要求被同意了。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种种非议，是为了参加随时可能展开的讨论。

胡风开始在北京找房子。他穿行于北京的胡同之间。密密麻麻的胡同，大大小小，弯弯曲曲，像一张迷网撒在北京，任胡风在里面寻找一处安静幽雅的新居。他转悠着，寻觅着，为自己，为妻儿，安排一个满意的所在。



路翎与好友杜高一起合影。他那曾经大而明亮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曾经热情洋溢的表情变得漠然憔悴。

第六章 三十万言上书中央

一

胡风、贾植芳走进了小酒店，围桌而坐。两杯酒，一盘猪头肉，一盘花生米，对他们，这就足够了。

1953年夏日的上海，闷热，潮湿。既不是烈日暴晒那样的热烈，也没有乡村间偶尔掠来的一阵凉风。

坐在小酒店里的这两个人，那份心情就是这样的天气，湿漉漉的，却又捏不出水。酒店小，来客不多，闹中取静，倒不失谈心的一种选择。

清瘦的贾植芳，在魁梧的胡风身旁，更显其瘦弱。只是滔滔不绝的话语，句句都让胡风感到有分量。

自从开过“胡风文艺理论讨论会”后，胡风虽然给中央写了信，但仍无结果。1953年春天，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在《文艺报》第2、第3期上相继发表，过后，又无新的动静。

胡风不想再公开纠缠于对己不利的争论，早就停止了发表理论文章，而是集中创作一些报告文学。

在1953年5月，他前往东北慰问被遣返的志愿军伤病员，写了报告文学《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

心似乎安静一些。寻找新居的奔忙，同样分散了精神上的焦虑。

新居终于安顿好了。胡风回到上海，接全家北上。离沪前，他结束了希望社的工作，将存款分摊给各位作者作为版税，余款3万元用“钟洪”的名义移交给由海燕书店改组成的新文艺出版社，作为归还当年重庆时周恩来资助《希望》创刊时给的保证金。

就要离开上海了，小酒店变得更吸引胡风了。每当在上海时，朋友们常爱聚在一起，酒助话兴，无所不谈，或笑，或怒，或骂，或悲，酒引出一切，酒又消融一切。

贾植芳现在已经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是在1952年高校调整时，由震旦大学转到复旦大学的。此时，他任中文系教授兼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贾植芳嗜好没别的，只有烟和酒，胡风此时的愿望也没有别的，就是和朋友们把心里的话说个够。和胡风比起来，贾植芳虽然年轻许多，却在政治漩涡里滚打过多次，因而，倒没有胡风那种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

贾植芳回忆，他不止一次对胡风说：

“我说老胡，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却不懂。”

贾植芳的话中隐含着极为复杂的内容，胡风虽说没有完全领语，但多少触动了他的心。贾植芳建议胡风不如静下心来写一本鲁迅回忆录，另外搞点翻译，譬如可以译《天方夜谭》。

“你不再去和别人争什么，你争得赢吗？”

话的确打动了胡风，他稍稍感觉到自己太累太紧张了，该躲进一个更小的、与纠纷无关的世界里，干一些踏踏实实又平稳的工作。他接受贾植芳的建议，答应到北京后开始翻译《天方夜谭》。

小酒店的交谈，只能算一段小小的插曲。

胡风全家离开了上海，真带上了一套《天方夜谭》的日文本。这是贾植芳从一位朋友手中借来的。

上海的朋友们目送列车徐徐驶出车站，列车前方，是谁也无法得知的未来。

二

在胡风举家搬京之前，天津的卢甸将消息告诉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的路翎。

翎兄：

曾见过你写给荒兄的信，知道你生活得好，像一个军人似的。我在“五一”以前就回北京了，写完了一个中篇，机关已通过，荒见他们也认为可以，现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否用，还不知道。你寄来的短篇，下期可在《人民文学》发表，我是据可靠方面说的，门兄已下厂，调京暂无可能，也就只好在天津了。鲁兄通过铁道部的关系，已开始在关内各线

游历，为期三个月。原兄已调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荒兄在本月十六日奉命去东北慰问病伤战俘，任务是写作，以备将来做国际宣传之用。时间大约两个月。在京时，听说慰问团里面也包括有你，但荒兄在东北来信，到了那里没有人提了，他忘了你有通讯处，无法和你通讯。

他也有可能去朝鲜的，如果谈判成功有战俘回来的话。他在京已买好了房子，在地安门附近，现在全部修理好了，暑假中，屠先生他们就搬来了。你的近况怎样？感受一定很多，能先多写些短的寄回来是非常好的，可以发表的。下星期日我要去看你的孩子们。

祝好！

卢甸

5月23日

在朝鲜战场上的路翎，生活在朴实、可爱的战士中间，没有了文人间让人烦恼的纠葛，他感觉到轻松，时时有创作的冲动充溢胸间。

几年来作品的磨难不止，路翎几乎失去了创作的信心，他知道，胡风的日子一天不好起来，他的创作就难以像当年那样，放射出耀眼的光华。舒芜的反戈一击，那封给自己的公开信，曾让他彻夜难眠。虽然近几年两人的关系没有过去那么密切，可目前这一举动，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对路翎，舒芜的公开信发表之后的那几个月，是多么难挨的日子。组织上、同事们，都施加着各种压力：善良的、热心的、冷漠的……可是他认准自己没有错，认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的。他没有检讨，也没有沉默，而是在一切可能发言的场合，振振有词地为自己、为胡风辩解。

来到朝鲜战场，对于他，在思维上、精神上，也许是一种调整。在这里，枪声，炮声，在他，倒比那些报刊上的文字更少刺激。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切倾轧、争斗都没有了踪影，有的是战士对作家的崇敬、体贴。

好久没有体验过这种闲适的心情了。路翎搜集着素材，熟悉着中国士兵、朝鲜乡亲，他在构思着小说，他在养精蓄锐，准备以创作再次证明自己的存在。

没有淡去的是对国内友人的思念、担忧。收到卢甸的信时，路翎也快到归国的日子。

几乎与胡风全家同时，路翎到了北京。

胡风的北京新居，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地安门内太平街甲20号，与北海公园相邻。

安静，小巧，一个典型的独门独户的小院。为安置这样一个家，胡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细心、热情。他张罗看房、买房、修房。在全家搬来之前，胡风将房子修葺一新，虽然只有四间房，但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扩展厨房、安装抽水马桶。在院子里，他又买上四棵树种上。一棵梨树，一棵紫丁香，一棵蟠桃，一棵白杏。

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稳定的家，是胡风多年的夙愿。在家里，他的脾气是常有湖北佬的暴躁，对妻子、对孩子，时常会有突兀而至的火气，有时甚至当着朋友的面，他也会不留情面地训上妻子几句。可是，他深深爱着妻子和孩子，不发脾气时，会像小孩一样地逗着孩子玩耍，忘掉自己的工作、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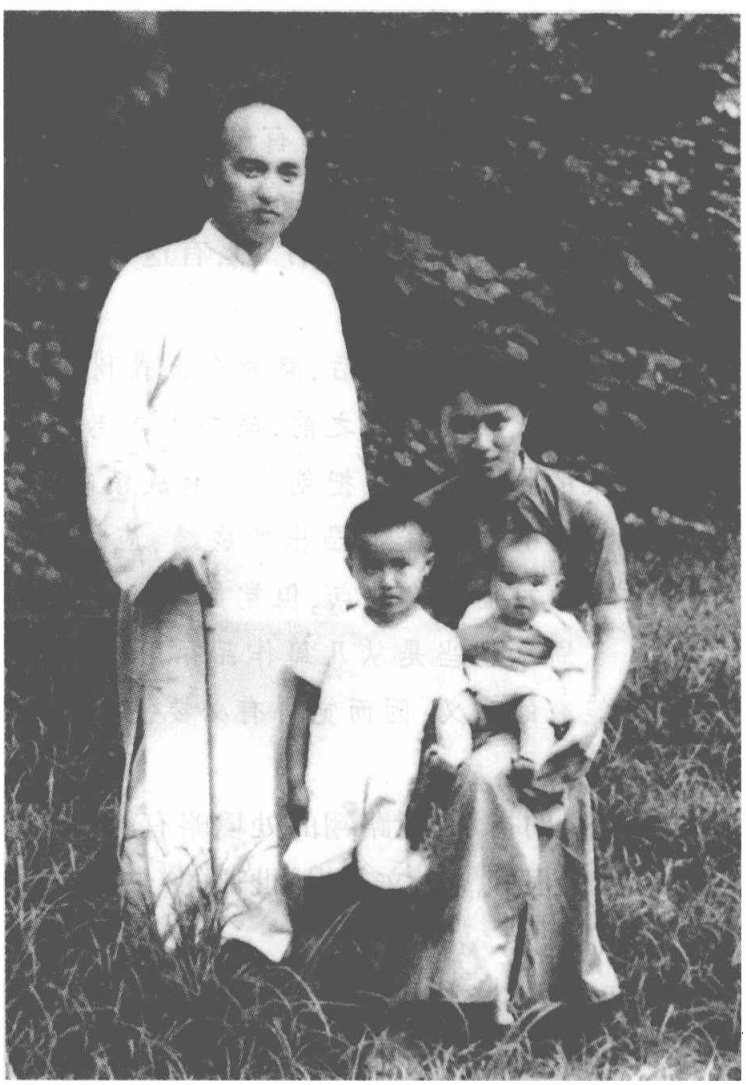
和妻子梅志结婚20多年了，国难不止，他们的生活颠沛不定，在重庆，在上海，从没有一幢像样的住宅。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一个男子汉，胡风感到惭愧。如今，总算如愿以偿了。

四棵树，点缀着小院。翠绿的树叶，在夏日，令胡风全家感到些许快意。胡风兴致盎然地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四树斋。

胡风写出一篇文章，郑重地署上：写于四树斋。

胡风将文章拿给正担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看，邵荃麟一看到“四树斋”三个字，不由一声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

邵荃麟与胡风曾是朋友，即使在香港时期邵荃麟也批评过胡风，但胡风从未将他当作对手，依然保持一定情谊。邵荃麟的话显然不带恶意，但这种本能的联想，不由似一盆冷水浇在胡风的兴致上。他听从梅志的劝说，放弃了这个斋



1939年，胡风、梅志与孩子们在重庆。

名。从此,“四树斋”永远消失了。胡风的心仿佛注定没有平静的时刻。

路翎走进了“四树斋”。和胡风分手半年多的路翎,发现胡风搬到北京后,性情与过去多少有所变化。有时平静,有时焦躁,书柜上多了一套日文本《天方夜谭》,却不见拿下来翻译,只是在谈到自己的朝鲜之行时,胡风才显得兴致浓厚,鼓励路翎早日写出来,还特别强调一句:“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

与别人不一样,胡风正是希望路翎的创作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以成果来证实自己强调作家主观精神的艺术创作思想的正确。

路翎记住了这句话:和别人写得不一样。

三

1953 年 9 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胡风、路翎应邀参加,而别的朋友,虽然参加过一届文代会,这次也被冷落一旁,如阿垅等。

开会之前,胡风、路翎曾有过短暂的欢欣。从一些党员作家里,他们得知周恩来最近的指示中,特别以肯定的方式提到了路翎。

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这么一段:

> 从朝鲜回来前后,路翎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散文报告。
>
> 文代大会开会之前,胡乔木同志向党员作家们的讲话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把创作上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提到领导机构里来;譬如路翎在创作上有凸出的成绩,应该被提到领导机构里面,当然路翎在其他方面也有缺点,但党员作家也不能说都没有缺点的。
>
> 周总理当是从几篇作品了解了这个作家的气质和他的劳动成果所能有的意义,因而觉得有必要挽回路翎的工作条件的。

周恩来的指示,使路翎的处境略有转机。一些批评过他的人,这时转而承认他的小说写得很好。被《文艺报》批评的《朱桂花故事》,这时汇集成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出版。

对于胡风,这只是稍许安慰,但基本状况依然如故。

几年来忽重忽轻、连绵不息的打击,已经使胡风感到疲惫,心上笼上一层灰色。

工作没有落实,作品难以发表,或者一经发表,就会招致批评。最近一年,连过

去约过稿的报刊，也对他望而生畏，惟恐避之不及了。

在文代会的文学分组会上，胡风被预定发言。他有许多话可以说，但他不敢谈诸如作家组织的基础和性质、工作方式、对作家的态度等思考已久的问题，怕因此引起误解。于是他一改过去短兵相接、直抒己见的习惯，讲叙起一个个外国作家和中国古代作家的故事。

他讲起故事，讲那些作家对同道的成绩抱着无私的衷心的关切，对于同道的有价值的劳动能有纯真的感激，甚至虽然客观上看来那并不及他的作品，但仍看得比自己的作品更高、更宝贵，对那样的作家产生深挚的友谊，甚至甘冒危险和牺牲去保卫他不受攻击，不被埋没。胡风还讲到那些作家，对于同道者走入迷途也不姑息，用赤诚或者愤怒来提出警告或抗议。

胡风讲这些故事之后，强调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的作家，应该接受宝贵的教训。胡风并且认为党和毛主席希望作家们的，也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工作、对人、对己。

胡风说得很激动，也希望自己的话能感动所有人。

可是，小的打击不断。华东代表团的一位领队，听了胡风的发言，当即向华东代表团递一纸条，说胡风又在骂人，含沙射影……

文代会上胡风、路翎已是形单影只，不过仍被选为中国作协理事，胡风还当选为文联委员。

就在大会闭幕不久，胡风便听到一件事情：一位电影界的负责人，在电影局的大会上说，胡风、路翎是反对派，但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位子。

会后，路翎的创作高潮来到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出5篇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节日》。这是他的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新的阶段，语言仍是那种句式长而涩却透出力度的风格，选材、角度，在同时期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创作中，的确独树一帜，引人注目。

引人注目对他人或许是一种幸福，一种欣喜，带给路翎的——同时也就是胡风——却并非如此。

1954年初，《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相继发表路翎的几篇小说，如此集中发表路翎的作品，是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初雪》备受赞赏，1月号《人民文学》一发表，巴人立即撰文在《文艺报》第2号上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生活的实践已经带领了我们的作家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时间,路翎的小说形成一阵“路翎热”,这或许是周恩来的指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只是路翎创作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严厉的批评随即而来。

《文艺报》第7期发表读者张家骥的来信,批评巴人的文章,批评路翎“只是在追求自己所空想出来的结构与人物的描写,却可以完全忽视了生活最低限度的真实”。

3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路翎反映朝鲜战场生活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于是,批判风波陡起。小说中借志愿军战士与一位朝鲜姑娘的爱情,写出士兵牺牲精神的伟大,被斥责为诬蔑志愿军等等。

评论家、后来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侯金镜,3月便写出批评文章,先打印出来供作协党组成员传阅、讨论,文章得到通过,发表于第12期《文艺报》,题为《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侯金镜批评路翎的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这几篇作品说明了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

由于路翎的小说是反映军队生活的,对路翎的批判,便自然成为5月召开的“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的一个主要话题。5月28日,周扬到会作报告,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这样记叙周扬的报告:

> 在一般性的“鼓励创作”的话的掩盖之下,所举的具体的例子有两个: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说巴金虽然不懂部队,但他看到志愿军伟大,就歌颂伟大,那就是老实,值得欢迎,对我们有好处,这就够了;但路翎偏偏要写他不懂的战士,这就是不老实。非批评不可。说路翎是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歪曲了志愿军,非批评不可。……周扬同志又说,编辑部发表了这样的小说没有错误,发表了以后批评就是,如果不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5月底结束,中国作家协会又于6月7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扬、丁玲、林默涵、侯金镜、严文井、沙汀等,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

6月9日,周扬召集北京各文艺刊物编辑开会,再次提出要对路翎展开批评。批判路翎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正在这期间,胡风和路翎没有坐以待

毙，他们终于下决心反击。那边一个会接一个会，而他们，已经开始写“三十万言书”了。

四

文坛上风云翻卷，气氛紧张，此时，政坛风云也正翻卷着。

1954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问题。此次全会毛泽东因休假未参加，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政治局根据毛泽东 1953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而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际上，高岗、饶漱石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2 月 18 日发表了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公报没有公开高岗、饶漱石的事情，只是强调反对高级干部的骄傲自大等，并特别提倡开展党内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风并不知晓全会内幕，但公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所讲的内容，对他无疑是一帖兴奋剂。他所重视的正是这样的话：

> 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
> ——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公报

> 必须反对这样一种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因为这就是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人民日报》社论，2 月 18 日

这些话，对几年来一直受到批评的胡风来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看来文艺界状况正是公报和社论所批评的那种不良倾向，而周扬，不正是“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吗？

公报和社论，是一个信号，胡风直觉给党中央、给毛泽东上书的时机到了。一方面，他再也无法忍受此起彼伏、循环反复的批评，孤立、冷落，希望爆发的日子到来；另一方面，公报精神透露出的消息，使他感觉到有告倒对手的可能。这一天，是他等待已久的。

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上书，并不是胡风一时的心血来潮，自共和国成立之后，胡风不止一次给中央写信、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1953 年底，在参加“胡风文艺理论讨论会”之后，胡风上交中央的《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其实就是现在即将写的“三十万言书”的雏形。

1951 年底，周恩来曾约胡风长谈一次，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八点半。对周恩来，胡风一直非常崇敬。在重庆时期，《希望》创刊，便得到过周恩来经济上的支持。这几年，周恩来一直劝胡风要善于与反对自己的人相处。

那是一次胡风难忘的交谈。回来后，他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谈话内容。他说：周恩来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所谈问题主要有：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 30 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开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

自那次谈话之后，胡风一直考虑着上书中央，系统反映文艺问题，解释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又认为时机未成熟，除了时而写信上去之外，并没有下决心写一份全面的材料。

1952 年 5 月 29 日，胡风在自上海给路翎的一封信中，曾写到关于上书中央的考虑：

> [考虑一下，过了学习，可否把《明天》和《前进》都提出去，作为对公式的一个反攻？至于提到上面去，那要叙出两年多的经过。但提到最高，现在不见得理，还是交下来，提到次高，结果还是等于提给了对方本人。所以，要做，就得是破釜沉舟的做法了。但如果先只抓住《报》做

去,也许不那么绝对?此事望你们考虑。]

[这里的情形是:没有回信,当不会回信的。昆乙来消息说工作也可以在华东。云。]这里提出,华东剧院(话、歌、交响乐三团,共200余人),或者还有一个刊物。好处是:独立单位,接触群众。到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工作机会的。

但困难很多:(一)不要北京,总是若即若离的状况,(二)接触面不能大,被限住了,(三)夏管文艺(副部长),(四)柏、雪二人肩膀只那大,柏在华东可以顶住,但在上面他是不能回嘴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文章写起了,争取到京一次,不得已,只好在华东弄一两年再看。此事望与谢、徐二兄谈谈,但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看如何?

小说抄寄了,改了题目,但奇怪的是,是那个报退了回来,附信说主题人物都较好,但人物(尤其是军代表)写得歇斯底里,受了某某写法的恶劣影响,劝作者深入斗争中去,云。显然地,贵人并不忘事,看出来了。不好的是,看出这一做法,以后更加小心,由此可见仇恨之深。

[梅兄等看到社论,要我再要求,而且把整个意见端上去。由于上面所说的,能不能这样做也值得考虑。柏君说: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云云。如果这样,那我们过去的赤心,都是从错的估计而来的。他经验多,那么,我们是做了三年的书生了。这看法,你们也可以谈谈。]

胡风这里所说的"书生",便是指自己总是在关心着文艺现状,认为这几年的文艺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主管文艺的那些对手们。

胡风迟迟没有上书中央,并不是打消了此种念头,而是想找更利于自己的机会。

看到文艺状况一年不似一年,他更坚信自己的正确。1953年9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文艺创作不景气,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愈加严重的问题,成为大会中心讨论议题,对此,胡风反倒更觉自己的正确了。在和由武汉来参加大会的曾卓的交谈中,他的乐观情绪显得较以前明显了。他深信,导致目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对自己的文艺理论的无休止批判,在于强调思想改造扼杀艺术家的创造性。

看到胡风侃侃而谈的样子,曾卓30年后对本书作者说,他当时有一种直觉:

胡风会越发不冷静了。

现在,胡风更按捺不住了。他不再甘当全国文艺界被冷落的对象,不再容忍自己的理论被弃之一旁。他要用确凿的事实,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对手们的错误,他要向最高层陈述一整套文艺方案,要让他们相信,只有采纳自己的方案,才能扭转文艺创作的局面。

胡风胸中肯定充溢着"收拾一片河山"的豪情壮志,尽管这股豪情隐隐约约,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没有这份豪情,他是不会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书"的!

五

目标一旦确定,胡风和朋友们,就像一台停歇多时却又憋足了劲儿的机器,刹那间启动,飞快地旋转起来。

在北京的路翎、徐放、谢韬、绿原,都成了写作"三十万言书"的积极参与者。谢韬本是文艺圈之外的人,与胡风真正熟悉是在1949年之后。上世纪40年代,他也是《七月》的一个热心读者,虽然专攻哲学,却与方然、卢甸成为大学期间的朋友。1946年,谢韬到《新华日报》担任记者,采访过文艺界新闻,见过胡风几次,但没有私人交往。1949年,在北京城里,谢韬才开始与胡风有交往,并通过胡风认识路翎。1951年,他和胡风凑巧一起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同车南下,多次长谈。胡风全家搬到北京后,两人的来往更多了。谢韬尊重胡风,对激烈的批判胡风的行为产生不满,进而同情胡风。当他从胡风处听到周恩来建议写一材料,不由兴奋起来,一再鼓励胡风动笔,认为这说明中央是重视胡风的。当胡风决定动笔时,正在人民大学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谢韬,便成了胡风一个得力的参谋。

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的徐放,也是积极主张上书的。在他的心目中,胡风是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斗争的引路人。1949年《人民日报》进京后,徐放与胡风也曾有过分歧,来往不多。但在1954年,他又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

绿原已在1953年由武汉调到了北京中央宣传部工作,现在同样是赞同上书的参与者。

卢甸的妻子李嘉陵,由天津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她和梅志一样,成了抄写稿件的人。

路翎协助胡风写作。工作在悄悄地、却又紧张地进行。

1954年3月26日,胡风给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洛、张中晓写信,信中说:

我在着手弄材料。未着手之前,总感到有些恶心,但着手一弄,反而忍不住要笑起来了。世界上有这样低能而又混蛋的畜生!但当然,是一件麻烦事,但也只好做了它。

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为什么出了,出了哪些好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

4月5日胡风再给罗洛、张中晓、耿庸一信,请他们分析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

你们工作忙,但如有多少可能,希望开始便中帮我做一件工作。

分析二文的论旨和论点:

一、查出他们所引用的论点。

二、对他们每一个论断分条写出看法(从当时条件和原文主题)。

三、提出可参考的材料(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论点,出处及页数。

四、引用何、香港等文……[冯]"理论",相同者及其错误的可以对照者——出处页数。

现在得做这准备,实事求是地帮我准备,免得考虑得不周。我一安定下来也许就得做这一工作的。

4月11日给浙江的方然一信:

在激烈动荡中,徐兄作品,烧痛了许多人,凤姐一流派,发动反攻,说是,要有批评出来,云。对凡兄三首小诗,也要反攻,马诗人在准备中,云。那么,对某些名字,是视如猛兽的。目前,是争一个会和两个刊物的占领罢,但骨子里是恐慌,是想闷死某些人。双木,凤姐为主,刀口、三花之类骑墙。看样子,是企图把团结问题,做成反面文章。

你那里不会听到什么罢。但也许要被问到的。转移时,曾提明了你

的身份。

林、何二文有暇再看一看，把你以为要害之点告诉我。我在进行解剖中。无时间就算了。

4月19日胡风给谢韬一信：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的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一封封信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天津的卢甸、阿垅，上海的耿庸、罗洛、张中晓、贾植芳，浙江的方然、冀汸，南京的欧阳庄……全围绕着这一中心绷紧着神经。

欧阳庄到了北京开会，利用时间，参加了在京朋友们的商谈。他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还将要点寄往各地，征求意见，以求内容更充实、材料更确切。

他们觉得在干一件庄严的大事，在干一件关系到胡风前途的大事。他们真诚地聚在一起，真诚地异地相勉，谁也没有在此刻去猜测上书之后的命运如何。

胡风的情绪影响着他们，正像当年他的文艺思想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一样。胡风也受着他们的影响。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把最高层领袖视为神圣的、纯洁的晶体，透明，光华灿灿。他们把信任、忠诚，甚至整个身心也交给了共和国，奉献领袖。

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六

从3月到7月，每个人的心中弥漫着作战的气氛。搜集的每一份材料，剖析每一个观点的文字，在他们，都是洪钟大吕，将在关键人物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促进问题的顺利解决。

“三十万言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

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胡风详细陈诉自己自 1949 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等将他视为文艺界"惟一的罪人或敌人"。这一部分约 5 万字。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 1953 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他逐个论点反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一部分约 13 万字。

在《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就这几年一些涉及自己的重要问题加以辩解和说明。共有 9 个问题,其中主要为:小宗派——小集团问题、关于舒芜问题、关于陈亦门(阿垅)问题、关于路翎问题、关于党性。这一部分约 7 万字。

在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中,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分细目提出诸如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这一部分约 3 万字。

四大部分合计约 28 万多字。这便是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概貌。

1955 年初,胡风的这份"三十万言书"由中国作家协会排印成册,但只有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随《文艺报》发行,另外两部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因此,当年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了解过它的全貌。

胡风写这四大部分,并不是按顺序写下来。1954 年 4 月 30 日,先完成了第二部分;5 月 19 日,完成了第一部分;6 月 8 日,完成了第三部分。

洋洋三十万言,胡风惟一的目的便是要证明自己的冤屈和正确,他要论证的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对手。在第二部分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时,他振振有词,以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话为理论依据,无非是要说明违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是他,而是林、何二人。

举例几则:

反驳林默涵的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

主义。”这是说,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在艺术认识(也就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方式,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但如果“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去代替,那就要堵死了艺术实践,取消了艺术本身。

……

林默涵同志颠倒了、反对了、取消了毛主席的原则,要用马克思主义代替现实主义。

反驳林默涵指出的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

对立场的提法,毛主席是把“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并列的。我以为,这提法表现了实践的战斗性,在生活要求上是人民大众的立场,同时是在思想要求上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定是在实践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是通过人民大众的立场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也就是党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但林默涵同志的“工人阶级立场”,却完全是抽像的东西,它简简单单地割弃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因而他和何其芳同志,像清教徒一样,完全不碰到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斗争任务。……这已经不带一点烟火气,和毛主席的提法没有相通之点了。

在反驳林、何关于生活实践的论点时——

把毛主席在积极意义上号召作家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口号,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成鄙视以至拒绝日常生活和日常斗争,鄙视以至抛弃普通群众或“落后”群众。从主席全面的提法里面阉割掉了“到群众中去”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做成了一个适合于军法裁判用的“片面的”固定的公式,这是十年左右以来的文艺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到了工农群众里面心慌意乱,和正面人物相处的时候麻木不仁;“下去”了才是“生活”,“上来”了就变成了没有人民的“太虚幻境”。这个大名鼎鼎的“理论”,使许多本来可以成长的作家渐渐衰萎,使应该少愧于时代要求的党的

人民的文学事业渐渐荒废了。违背了“生活、实践底观点”的这种“理论”,终于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受到了这样沉重的处罚。

胡风是在一片容易陷入泥沼的森林摸索，是在小心翼翼地攀登一座也许永远登不上去的峻岭。他必须高举起毛泽东旗帜,在一个有限的天地里施展无限的才能。

他必须谨慎而又应该贴切地将自己观点与毛泽东的思想联为一体。他必须用严密的逻辑、不容反驳的充足理由,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

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论证。胡风不能容忍对手拉大旗作虎皮来压住自己,他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赢得信任。

“圣上圣明,小人作乱”,汉代晁错“清君侧”的悲壮之举,也许可以印证胡风的潜在意识。

胡风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

我很愿意改造自己,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争取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但我却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论改造自己。因为,那样做,虽然也许可以暂时使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等“我们满意”,但我一定会变成和林默涵、何其芳同志一样,随便发表危害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的“理论”和“批评”,非弄到每一个感觉健全的有常识的读者都“很不满意”不止的,更不用说对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伟大的人民的负疚负债的痛苦了。

被对手们斥为“小集团”、“宗派主义”的胡风,同样反唇相讥,指责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胡风认为,负责领导共和国文艺事业的那些人,“在解放以后用党的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造成了文艺现状的恶果:

三十多年以来,新文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一点有生力量,被闷得枯萎了;

在现实里面成长着的无数新生力量,他们的感受机能和美感要求

从创作成长规律被割开了。他们的绝大多数被引到了各种形态的公式化概念化，即不从生活出发的虚伪的方向去了；

思想斗争完全用命令主义来代替，完全脱离了实践，吓住了群众，因而转变了对立场，即完全把通过实践也为了实践的思想斗争压死了……

胡风的笔下，几年来的文坛弥漫着阴影、混乱、苦闷，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这局面的责任在对手身上，是他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他们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英明的决策。文艺要摆脱阴影，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他们的影响。于是，后来被严厉批判的“五把刀子”的概括，便出现在“报告”中。这样一种形象比喻，包含着胡风压抑多年的激愤和不满，他没有迟疑，没有遮掩，坦率写出：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算是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

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三十万言,这是一片大海。大海不停地涌动,浪花飞卷,拍打峭崖,向天空发出涛声,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载着一叶扁舟向前涌去。

第七章“我们必须战斗”

一

1954年7月22日,对胡风和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胡风带上花费三个多月写出的“三十万言书”。前去和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见面,请习仲勋将报告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指望这一举动,能改变文艺现状,能改变他的处境。

报告前面,胡风附上了7月7日写的一封长信。

中央政治局:

毛主席,刘副主席,

周总理:

我现在送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过程当中,我作了反复的考虑和体会。我反复地考虑了对于文艺领域上的实践情况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贯注我对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的一些体会。当我逐渐明确地感到了我的体会同时也是对应着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这才真正打痛了我自己,也终于解放了我自己。

在我走过来了的路上,由于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于革命斗争发展的感受,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的。通过对于四中决议精神的体会,这才比以前数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取得了的胜利,我所分享到

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就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内愧。

如果不是把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看做同一的内容，如果不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信赖，那我就无法得到这二十多年的路上走了过来，坚持了过来的基础。如果当我一度排出了革命阵营以后不是抗战一开始就找到了党的领导，得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周总理的带领和关注，带着我通过一个一个的包围圈斗争了过来，逐渐提高了我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和信赖，我就很难在那样复杂诡诈的环境当中争取到一些工作条件，在党所领导的总的要求下面做了一些微小的斗争的。

正是因为这，当正视到由于我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所造成的失败和失责，无论是对于党或是对于年青的一代，我所感到的负债的痛苦是无法表达的。

革命胜利了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和实践情况上反而现出了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借口原谅自己了。

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掉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虽然对于文艺实践情况的耽忧和对于劳动的渴求总在咬嚼着我这个老工人的心，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基本上是信任的，没有放弃过要依靠党来解决问题的信心。一直相信斗争一

定会展开，我的发言权和劳动条件一定会被恢复。然而，只有从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受到了批判以后，我才无限痛切地感到了非马上正视我所处的这个环境，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因为这，非马上首先正视我自己，向党交待问题，争取参加斗争条件不可。但由于我的问题是从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现象之一，完全不是个人问题的性质，我就只能直接向党中央提出我的报告。

抱着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我开始了检查问题。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一步一步深入地实感到了毛主席的“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这个原则的威力。我实感到了只有对具体事件的内容作完全如实的分析才能找出可以说明客观情况的问题实质，只有对问题的实质作出完全如实的判断，才能够对客观情况得出合理的解释。不这样做，就不能暴露出事实的逻辑，因而无法替实践要求扫清道路和开辟道路找出根据，使党能够取得真正的主动，把斗争推进一步的。

我把检查的初步结果写成了报告，分为三件，另附件一件。

……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审查。

我热诚地希望得到中央的批评和指示。

我要遵照指示随时做补充的检查。

我要担负我应该担负的任何严重的责任。

衷心的敬礼

胡风

1954年7月7日，北京

胡风交上了“三十万言书”，交上了热望，也交上了急切的等待。他的真诚，他的焦虑，还有那种犟劲儿，都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相信毛泽东和中央，会明察他的苦心：他绝不是不热爱党，不热爱毛泽东，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他只是将目标集中在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冯雪峰等文艺界领导身上。

在他看来，是他们错误地领导了新中国的文艺，因而造成文艺现状的不景气；同时，也是他们不按照中央、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排挤、打击自己，在周扬，这

则是报30年代的一箭之仇。

胡风急于改变文坛和个人的现状。他盼望着转折,不错,“三十万言书”真带来了胡风命运的巨大转折,但绝非他和朋友所期望的那种转折,而是谁也无法在此刻能预料到的转折。

3天后,7月26日,胡风给上海的罗洛、张中晓写信,建议他们继续做好下一步的工作:

> 欧阳还在此。大概一周左右回南京,如果他无公到上海。那你们中一个人到南京一次。他知道全部内容,你们了解了以后,好赶作准备。斗争展开时希望能做得彻底些。他自己,在等公事中,这几天也在准备一篇。检查对宁兄批评的发展过程,抓出那阴谋性。
>
> 现在想到的,你们有三个工作可作。
>
> (一)解放以来,批评宁兄的同时,肯定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检查以后,觉得有用就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作为宗派主义为了继续庸俗社会学统治的说明。
>
> (二)在二马编的作品中,检查那工作态度和用意。也作一简明的原则性的分析,准备对二马的。
>
> (三)检查新文艺以来,出了些什么不应该出的东西,排斥了些什么应该出的东西。准备一下,必要时向上面提出,说明宗派统治的危害性。
>
> 你们考虑一下,如觉得能行,现在就着手准备,等欧阳谈过后作决定。
>
> 见过欧阳以后,看是否你们有一个再去看看声兄,将情况告诉他,希望他也有准备。
>
> 此事不能给任何人一点点暗示。

报告呈上之后,胡风和朋友们仍没停下脚步,心理的惯性,推着他们马不停蹄地往前走去。走向何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回音壁,他们用心灵在倾听可能传来的回声。

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顿时将他们推到欣喜若狂的巅峰,继而,却又跌入其深莫测的幽暗峡谷。

二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二百年前曹雪芹留下一部并不齐全的《红楼梦》,却引发出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或圆或缺的人生。人们在释梦,说梦,又在续梦。人生无限,梦境无限,生活重叠,梦也重叠。说不尽的《红楼梦》,也就有走不尽的文人曲折的路。20 年增删,曹雪芹仍未捧出一个完整的“梦”,200 年论说,那梦更远,更玄。而一个个说梦人,自己也身不由己作了历史梦中人。

到了 1954 年,《红楼梦》研究范畴之内一次正常的学术争论,因毛泽东的重视,一跃成为政治领域的激战。前所未有的规模,后人时时评说的风波。

《文史哲》本年第 9 期,发表了两位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著作的文章。这便成了毛泽东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导火索。

关于这场运动的前后过程,10 年后,“文革”期间,不同小报,有着大同小异的记载。披露的内容不能确信,却多少呈现出当年的概貌一二。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于 1967 年 5 月出版《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49—1966》,其中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介绍有这样的文字:

> 9 月　《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这本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
> 9 月　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9 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
> 9 月　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

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　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毛主席又一次提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

10月16日　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

毛泽东写信了。继电影《武训传》批判之后，他再次亲自发动了这场文化战线上的批判运动。

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等人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

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挡“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的信在很小范围内传阅，但其精神立即传达到文艺界。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讨论会，开始了《红楼梦》研究批判，第四天，10月24日以袁水拍名义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在《人民日报》上顿时将矛盾公开化。

这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是经毛泽东修改之后发表的，题目也为毛泽东决定。文章主要质问《文艺报》为何压制“小人物”，编辑们是资产阶级贵族气。所提事例有二，一是在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时，不同寻常地加上了贬抑口吻的按语；二是发表文章批评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

袁水拍振振有词地质问：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任务，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句正可形容此刻不同人的心情。面对又一次猝然而至的浪头，有人被击懵，有人被振奋，有人远远地站在岸边，任海水溅湿衣衫，自己却默默地闭上眼，静听海的呼啸。

胡风振奋了。

三

胡风等待已久的时候终于到了。他可以痛痛快快地舒展身体，第一次开怀大笑了。

对中央为何一下子展开对《文艺报》的批评、对文艺界“资产阶级老爷”的批评，胡风并不知晓内幕。但他认定，这是他的三十万言“报告”已经发挥了影响作用。这局面，正是他所期望的。

“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文艺报》对朱光潜的态度，不就是如此吗？

压制“小人物”——《文艺报》对路翎、阿垅的批判不正是如此吗？

……

胡风和朋友们阴郁的心情，被这阵风吹散了。油然而生的是乐观，是自信。

10月27日，胡风给张中晓一信：

>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
>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诗人的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
> 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
> ……

11月2日，胡风再给张中晓一信：

> 缺口已打开，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胡风信中多次提到的“二马”，正是他多年的朋友、《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

胡风与冯雪峰30年代在上海，交往甚密，与鲁迅关系也极为密切。在“两个

口号”论争中，他们与鲁迅一起提出“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文学”口号，同周扬等人的“国防文学”口号相抗衡。为此，人们一直将冯雪峰、胡风视为一派。

但是，1949 年后，胡风被冷落的同时，冯雪峰一直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也是几年来《文艺报》的主编，那些批评胡风和朋友们的文章，便是发表在《文艺报》上。

怨恨《文艺报》，自然怨恨当年的友人冯雪峰。在和友人的通信中便写到：“冯是小人，得了势就玩手段，内里空虚得很。去看他，一方面使他觉得是你示弱，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觉得有拉拢之可能，得些安慰。”

现在，一吐怨气的机会抓到手了。不仅仅限于《文艺报》，胡风的目标，是《文艺报》背后的那些有更大权力的对手。他既然看到了可能，就必须将可能尽快地化为现实。现在，他的心里是踏实的，他的精神是昂扬的。自己的报告得到了上层领袖的支持，他应该有可能取胜。

他必须拼命一搏。

四

10 月 31 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青年宫（即东单青艺剧场，现已拆，成为东方广场一部分）开始召开连续的联席会议，听取冯雪峰、陈企霞（副主编）的检讨，并展开对《文艺报》作风的批判。

听了冯雪峰、陈企霞的检讨之后，11 月 7 日的联席会上，胡风开始发言。

胡风首先批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具体的讲“是向反动的胡适派思想投降”。胡风点出朱光潜的例子，认为朱光潜过去是“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对这样的人，《文艺报》却妥协，投降。

胡风继而指出，恰恰相反，《文艺报》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的态度却是压制。他以阿垅为例，他说阿垅过去在批判朱光潜的美学，却招致严厉无情的、无休止的压制。

胡风还认为《文艺报》五年来的文艺批评，占支配地位的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由于这些批评，文艺的新生力量受到了打击。

慷慨陈词，没有迟疑，没有含蓄。胡风坐在扩音器前，发言稿都没有，就口若

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是的，他毋须发言稿，这些话早已烂熟于心，他的几年的观察、思考，刹那间，冲破情感的大门，喷泉般迸发出来。他一点也不瞻前顾后，在发言中，点出了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名字，特别指出俞平伯、徐志摩、朱湘“都是属于胡适那个系统”。

胡风走出了批评《文艺报》的范围，又指责《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在阿垅问题上，同样犯了压制“小人物”的错误。

发言当天晚上，胡风给浙江的方然、冀汸一信，告诉了自己在大会上的举动：

>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
> 我的发言未完。下次会徐兄要发言提出控诉。
>
>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的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

与此同时，天津的阿垅，和胡风一样，不约而同地就袁水拍的文章发出了指责。

11月9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 邓拓同志：
>
> 读了袁水拍同志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我完全拥护这篇文字的内容。
>
> 因为，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艺的侵蚀，甚至夺取，关于以“权威”压迫青年，窒息新生力量，解放以来的这几年，我是深深地有着现实感受的。
>
> 但我对于作者本人，却同时有一些意见。
>
> 第一，《人民日报》是全国最高的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袁水拍同志负责文艺组，在他的领导之下，几年以来，关于文艺

作品发表的既极少，而所发表的又总是不多几个作者的文字，袁水拍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否由于党报的严格的要求的结果呢？是否只有这几个作家尤其袁水拍才符合这个要求呢？是否别的作家在政治和艺术上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或不愿在党报上发表作品呢？当然不是。因此，我以为，党报在文艺方面所出现的不应有的荒凉的景象，和袁水拍的领导作风、工作态度，是分不开，而今天似乎应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

第二，袁水拍批评压制批评的“老爷”态度，完全说得对。但他本人，对于我的《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从五零年一直到今天，时间经过了整整四年，不但不作具体处理，而且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在我的感受里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爷”，比被他批评的“老爷”还要“老爷”得多。如果他今天已经认识到“老爷”不对，他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表现才对；光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光骂别人而不检查自己更是一个矛盾，而且还掩蔽了他自己的矛盾。

第三，从他的过去的诗看，例如《马凡陀山歌》中给马歇尔的那些诗里面，就存在着异常浓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向美国一边倒的亲美、崇美的思想，也是和武训那么恶劣和卑贱的思想。

由于以上三点，我觉得，《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并非袁水拍本人的灵魂的声音。我是把《质问〈文艺报〉编者》作为党的发言的。可是，这样重大的文件由袁水拍执笔，以他的名字发表，我以为，这似乎是党报的一个失察。

敬礼！

亦门 11 月 9 日

五

胡风 11 月 7 日的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只讲了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的一半。他准备着在下一次会上再度“放炮”。

胡风第一次“放炮”的第二天，11 月 8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以中国

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同记者的谈话，强调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郭沫若号召文化学术界各部门、每个人“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

路翎在书写着。作为作协理事，他也被邀参加联席会议。胡风的发言使他振奋，批评《文艺报》的热潮使他欣喜地感到一吐数年冤气的时机到了。

他挥笔疾书。4万多字的文章短短几天里一挥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要质问，他要发言。

到11月10日他写完了长文，他反驳所有那些指责自己的作品的人，他以自己受批评的事实，来映衬胡风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批判。

他写到：“由于这种横暴的气势，我的批评家们就充满了‘左’的激情，他们在作品的任何词句，任何形容词里都可以找出‘资产阶级’以至‘反抗祖国’的罪名来。这种批评有危害性是很显然的，它严重地摧残着文学创作的生机。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大家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我的批评家们是以‘立法者’的姿态来说话的。”

10月10日，在文章结束部分，路翎写下了这番话。第二天，他带着4万多字的长文，和胡风一道参加联席会。

路翎发言了。

胡风发言了，接着7日的话题又滔滔不尽地说下去。



路翎在胡风遗体前默默走过。

这次，胡风点到了何其芳，他指责“脱离实践要求去看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的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他重提袁水拍对阿垅的压制；他再次强调庸俗社会学对文艺的破坏……

依然是犀利、快畅的文风，依然是昔日争论时咄咄逼人、逻辑严密的气势。

他的声音高亢，湖北人独特的嗓门，即使不用麦克风，偌大的会场，每个角落的人，都听得见他的声音。

他严厉指责：

> 被这种庸俗社会学所武装，批评家就“自我膨胀”了起来，不把作家当做战友或劳动者同志看待，有时候以政治教师的面目出现，有时候以技巧教师的面目出现，当然，最厉害的是以下判决词的法官面目出现。总之是要你按照他的公式、按照他的法则去写，对于创作实践采取了极冷酷的态度，既不考虑到具体作家的实际基础和创作要求，也不深入到具体作品真实内容和客观意义，那发展到极致，就采取了把作家简单地划阶级成分的方式，这一划就把作家划得不能动了，对作品细节采取了适合于自己结论的歪曲的解释，你要反驳他就非得把每一个细节加上很长的详细说明不可。当然，实际上那样解释也决不准你解释的。

又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仍然只讲完了四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和路翎一起，他俩几乎成了会议的主角。他俩慷然陈词时，自然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公开发言的“绝唱”。

两天后，11 月 14 日，胡风给方然一信：

>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即胡风本人——引者注）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就一、二两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于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

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要打击的人,造成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两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等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展开了。徐文,约四万字,日内抛出去。

字里行间,欣欣然得意之情。胡风显然认为自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初战告捷。

六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杰出的韬略。和过去一样,战争中,或者思想斗争中,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控制权。他可以轻松自如地驾驭局面,让一切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人们也许很难知道他的每一个意图背后深藏的东西,他却可以洞察每一件事物的发展趋向和未来前景。他决定着一切,自然更擅长同时部署相辅相成的战役,他部署批判《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思想,恰恰是在看到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之后。可是,他没有公开表示自己对胡风意见的态度,却首先将斗争矛头引向胡风正深恶痛绝的《文艺报》身上。是巧借胡风之力,还是引诱胡风公开出台,这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有文章批判陈企霞,其中提到陈企霞在 1954 年时曾说过,中央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杀鸡给猴子看”,是“吴三桂借兵”,即借胡风之手整《文艺报》。

另一个迹象也表明同样的可能性。胡风在 10 月 27 日给张中晓的信中说:“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可见,号召批判《红楼梦》研究与准备出版胡风的上书,在毛泽东是作通盘考虑的。只是胡风和朋友们,此时处在兴奋状态,不会认为上书出版会是作为反面材料公布。

胡风是这样痴情，这样真诚地相信毛泽东会容纳自己稍稍不同的思想，会重视自己的意见，让他力挽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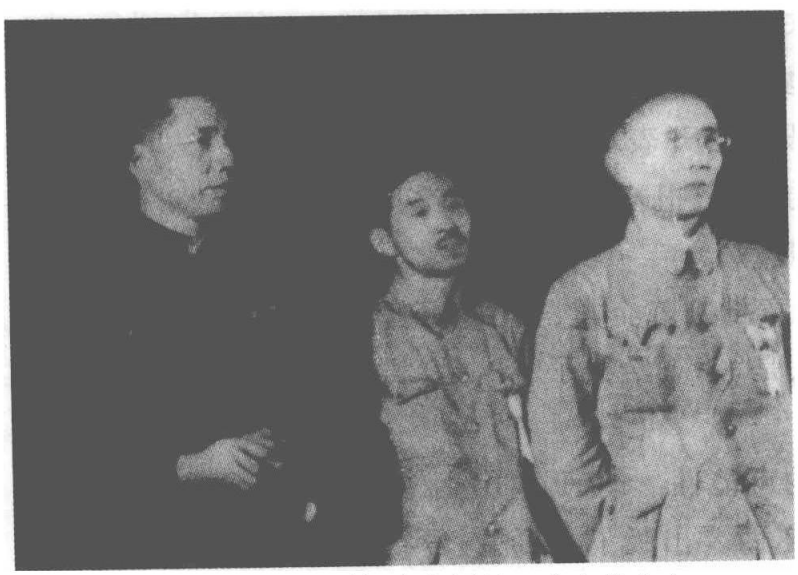
他崇拜，他忠诚，然而，他根本不了解毛泽东，尤其不谙于政治。不了解现在的毛泽东。

电影《武训传》批判、文艺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次次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几年来，都按照毛泽东的意愿进行。与经济、抗美援朝战争方面的进展相比，这些只能算微不足道的政绩——虽然是有更深远的意义。五年来，毛泽东不仅仅在文化思想领域已经树立了占居支配地位的权威，在其他领域，过去业已形成的权威，更加崇高，更加悬殊地耸立于他的战友们之上。

他看到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看到了经济恢复的顺利发展，看到了亿万人民蓬勃旺盛的建设热情，也看到了人们与日俱增的对他的崇拜。

共和国创建时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路线，在他那里，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他充满自信，充满希望，要让共和国按自己的意图向前发展。

1952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批评中央统战部领导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作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而两年前的同一天，1950 年 6 月 6 日，在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说："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



从左到右周扬、茅盾、郭沫若，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批评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理论，认为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同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评薄一波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认为："新税制发展下去，势

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并严厉批评薄一波“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四次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会议的任务之一,周恩来指出是“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可是,就在这之前的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作出两次书面批评,强调:“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成了一人拍板。

1953年发生的梁漱溟事件,突出反映了毛泽东的变化。梁漱溟和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一直有矛盾,但私交很深,尽管毛泽东坚决反对梁漱溟的思想,但过去每次交谈,都能虚怀若谷,相待如宾。到了1953年9月8日至1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为列席代表的梁漱溟,在会上当面顶撞毛泽东。这是多少年来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的顶撞。毛泽东没有像梁漱溟要求的那样,拿出“自我批评的雅量”,而是中断了梁漱溟的长篇申辩,继而开始全国性的批判。

梁漱溟的毫不客气的当众顶撞,在毛泽东,肯定是始料未及的。在党内,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恐怕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他激怒了,他发出了一串串言辞激烈的指责:“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胡风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不知道以复杂的政治眼光观察历史的微妙,只是将满怀希望寄托在他所崇拜的、被奉为圣明的领袖身上。他没有冷静地回顾历史,没有分析自己十几年来,已经多次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差异、甚至冲突。

最初分歧在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强调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其中提到了民族形式,反对洋八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于是,延安文化界随之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在重庆的胡风,写出《民族形式问题》一小册子,副标题即是“对于若干反现实主义的倾向的批判提要”。胡风认为那些主张民族形式的作家、艺术家,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违背。

到了“三十万言书”中，胡风依然坚持他在1940年时的观点，并认为是林默涵、何其芳等人使“这种民族复古主义的理论，在思想上使旧文艺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迫不及待地用行政手段去推广‘民族形式’，那不但使新文艺工作者失去信心或心冷，而且还闹出了不少损失威信的笑话”。

除此之外，在现实主义理论、主观战斗精神的强调等方面，胡风显然与毛泽东有着分歧。在胡风，他也许把这当作正常的现象，五四运动呼唤的正是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思想天空的一片云彩。在毛泽东，这却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不敬，更何况，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抨击的对手的理论、实践，恰恰正是他的精神的体现；更何况，胡风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尊重，骨子里却同时也坚持独立见解。

毛泽东与胡风的矛盾显而易见，他总有一天要解决这矛盾。他的观点，他的精神，在一切领域，甚至每一个人的思想上，都应该是君临一切的。

时候到了。对毛泽东来说，批判胡风的思想，此时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胜券在握的一次思想之战。

七

反击开始了。

首先站出来批驳胡风的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袁水拍。

自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之后，在胡风看来，袁水拍是在投机取巧，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推卸掉自己过去几年的错误责任。在给朋友的信中，在前两次会上的发言，胡风都毫不掩饰他对袁水拍的不满情绪，点名责问。他并不知道内情。实际上是毛泽东指定要发表这篇社论的。

袁水拍在胡风发言后第六天，11月17日，在联席会上发言了。他逐条反驳胡风对他的指责，并坦然承认那篇质问《文艺报》的文章，是奉上级指示而写，不仅仅代表自己的观点。他说：

> 由于前两次会上胡风先生批评《文艺报》的时候，以莫须有的严重指摘，攻击了我，而且连带到《人民日报》，因此《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我来作这个发言。
>
> 我应当首先声明：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文艺报》的编辑

思想、作风的那篇文章，是我受到党的指示而写的。党看到了当前阻碍文艺工作的发展严重障碍是思想斗争的懈怠，作家、批评家的战斗精神不足，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蔓延，认为《人民日报》有责任向文艺界敲起警钟。由于我是《人民日报》文艺组的工作人员，报纸编辑部负责同志指定我写那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我的文章决不是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袁水拍在作了发言之后，11月30日曾给阿垅一信，退回了积压4年的阿垅的两篇文章。

亦门同志：

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现在我也向你承认这个错误。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道歉！

敬礼！

袁水拍

1954年11月30日

紧接着，周扬发言了。

12月8日，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周扬发出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形势急转直下，胡风和朋友们，从此踏上荆棘遍布的灾难之路。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郭沫若在总结性的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路翎的发言：“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我感觉着已经有了这种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的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我看这是不正确的……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

年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

茅盾在发言中强调了郭沫若的上述一番话,重复一遍后,要求人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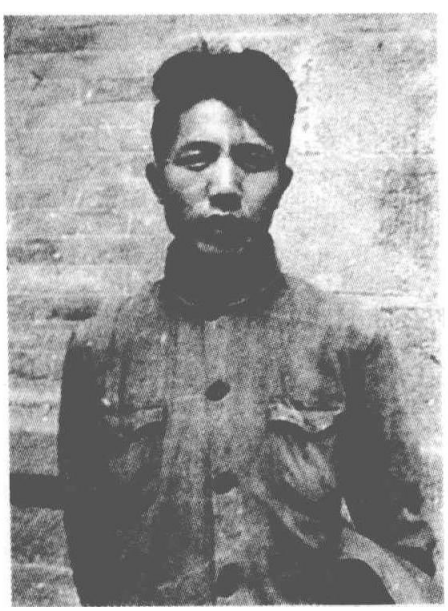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12月9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同时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消息中也特地提到:“会议也对一些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批评。”显然,这是对胡风、路翎而言。

12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矛盾公开化了。

周扬的发言分三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周扬在发言中反驳胡风的观点。他认为“胡风先生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

周扬针对胡风在会上的发言特别指出:“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周扬在结束发言时着重地发出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在《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发言的同时,《文艺报》第22期也出乎常规地延迟到12月9日出版,公开发表了胡风、袁水拍等人的发言。

按照出版周期,《文艺报》第22期应该于是年11月30日出版。但到了11月25日,编辑部

才通知袁水拍,决定将他和胡风的发言同时发表。于是,一本特殊的《文艺报》推迟十天问世——封面印着:11月30日出版,第40页上却加注明:本刊本期因故延至12月9日出版。

12月8日召开最后一次联席会议时,被不同的人都涉及的人物阿垅,也被从天津安排来京参加。关于这一天的会议,他在笔记本上的“备忘录”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 1954年12月8日,上午,丁玲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说对于我的文章,同意袁水拍的意见。本次会议我已到会。
>
> 我当即以字条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说:不同意丁、袁两同志的意见,我将以书面意见请予处理;并提到,如丁、袁两同志意见发表时,我的书面意见亦请予发表。
>
> 茅盾要我交书面后再处理。
>
> 下午会前,见陈白尘,说书面意见补充后交去,并请转主席团代我向会上说明一下。陈要我把书面在星期五交他(因有一个会),我说整理补充来不及,他说下星期寄他亦可。对于第二点,他不知向主席团转达了否,主席团未宣布。
>
> 下午周扬报告,说到我的一篇文章时,说:我“隐瞒”作者为特务;反对“神化”即反对写新人物;说“其他阶级”可作“主角”即等于说资产阶级有资格作“主角”等。详见次日(10日)报纸。但笔记请他看时,在会上他提了一下,发表时删去了。

没有更多的当时会场的现场记录,但从公布的讲话之中,完全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火药味。政治风云真是变幻莫测,仅仅一个来月的时间,进攻者与被攻者的位置就彻底倒过来了。欣然出击的胡风和路翎,刹那间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卷起,掷到自己的所难以摆脱的逆境。

不仅仅是胡风、路翎,包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被无形的力量纳入一个超乎文学意义之外的角逐场上。不管情愿与否,不管是悲是喜,他们一同创造出这段艰难复杂的历史。从这里,他们走向未来。

“我们必须战斗”。这是沉重的云层间隆隆的雷声。

第八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

上海,锦江饭店。1955年初。

北京12月8日联席会上开始的变化,目前还没有让胡风在上海的朋友们感到严重威胁。他们从信中得到胡风在会上的发言消息,接着,刚刚出版的《文艺报》上,又见到了胡风的发言全文。虽然同一期上有袁水拍的反批评,但他们依然为胡风的大胆举动感到兴奋。

春节将临,他们相约来到这里。

贾植芳回忆:

> 当时胡公在文联扩大会议发言后,该期《文艺报》也作了刊登。适春节来临,正是张禹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介绍台湾的书,拿到一笔稿费(约二千元),我劝他拿出一百元大家吃一顿,不足之数,由我补偿。(后由泥土社许史华补贴。)因此才在锦江饭店楼上吃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到席的除我们夫妇和小燕外,有王戎及其前妻张某、耿庸夫妇和他们的大孩子东林、何满子夫妇、罗洛、张中晓(罗石,已故)、顾征南夫妇、许史华(泥土社老板)、梅林以及张禹等人。
>
> 席间,我多喝了几杯(那时年轻酒量很好),由于几年来对左的教条主义势力对胡风的排斥、压制不满,感到文艺上限制太多,没有创作自由,为此,我对胡公的发言十分赞赏,认为他伸张了正义,控诉了极左教条主义的错误。我站了起来,拿起酒杯,大声说:"胡风的发言,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他敢于说话,我提议为他的

健康干杯!”

我发言突然,因此,环座的大家一时感到惊愕和出乎意外,但总算响应了我的倡议,迟疑了一下,但终于一个个地站起来干了杯。

(1988年6月致李辉信)

不仅仅这些上海的朋友没有及时预感形势发展的严峻,就是胡风本人,在听了袁水拍11月17日的反批评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不利于自己的局势开始形成。他依然认为,是袁水拍及会议的主持者们,在改变毛泽东开始的部署,在歪曲毛泽东关于批评压制小人物的精神。“会议变质”,这是他的看法,他还准备将这一情况再写信上告毛泽东。11月25日,胡风给方然的信中,便透露出自己的想法:

[谷即要补一汇报老先生。会议变质一事,更可以使上面看清问题。听说,中枢完全主动,不表意见,使爷们很焦急,云。]

给B信,这样当然是好的,应如此。但注意两种新情况:一、B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宣一级,老底子作主,其他个人感情上对立因素,又不摸中枢底。所以,毫不能解决问题。[准备,在新的情况中,如给了你回信之类,考虑直接寄老先生。]

……

这里所写的“B”,指陆定一。10月11日方然在给胡风的信中,曾提到要写信给陆定一为胡风辩解。

胡风显然是一厢情愿,显然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过,信中这句话——“中枢完全主动”,倒是完全正确。关键是,他不知道,天平并不偏向他。

很快,《人民日报》12月10日发表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胡风这才猛然醒悟自己的失策,开始意识自己贸然出击,没有赢得胜利,反而为想整自己的人,提供了良机。

很少悲观失望的胡风,此刻,真正失去了信心。内心更使他痛苦的,是他觉得辜负了那些朋友们的信任和热望,他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也无从知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12月13日,胡风又给方然一信,那心情、语气,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他承认自己犯了轻举妄动的错误,承认自己为毛泽东的指示所鼓舞而造成目前这一

结果。

文章都已出来，想已见到。由此事，浪费一定很大。[被斗争需要和中枢决心所鼓舞，]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党和事业，]愧对战斗者们。

如时间允许，来玩一次，旅费由这里筹措，如何？

在胡风沉痛反省的时候，因《红楼梦》研究批判而展开的对《文艺报》的讨伐，也以冯雪峰的下台而告结束。12月8日的联席会上，一方面号召批判胡风，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冯雪峰的主编被撤职，组成新的编辑委员会。

12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23期、24期合刊，发表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同时，在第46页上，加框刊载编辑部的一个启事：

本刊重要启事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本刊的编辑机构应予改组。兹经1954年12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议：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刘白羽、王瑶等七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为常务编辑委员，并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拟出新的编辑方针和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案。编辑委员会将从


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風思想同路人

馮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三十年来一貫反对党的領导

反属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風一致

馮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

反动的社会思想

文革期间，报纸上刊登的批判冯雪峰的文章。

1955年1月起开始工作。本刊12月份23、24期合刊暂由原编辑部负责编辑。

在第22期《文艺报》的封底上，还印着：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侯金镜，这一次的合刊封底，便改成只有编辑者“文艺报编辑部”的字样了。冯雪峰在新的编委会名单中被降为一般编委，而陈企霞干脆被除名在外。

同一期上，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也同时发表。冯雪峰、胡风，鲁迅晚年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位朋友，被一起推入逆境，这是令人吃惊的巧合。

无法推测胡风、冯雪峰他们自己，面对这一现实时的心情。他们一起被视为鲁迅的弟子，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也常常被认为与冯雪峰有渊源关系。他们亲密合作过，一同协助鲁迅工作过。这几年来，他们发生过矛盾，胡风更是在一个多月前毫不留情地指责过冯雪峰。可是，山转水转，变化莫测，两人同时从不同的方向被掷到同一境地，这无论如何是他们未曾料想的，而在以后的岁月中，共同的经历，仍会将他们常常联在一起。

历史产生种种巧合，对胡风、冯雪峰，这巧合，却是不幸。

二

盼望几年的岩浆迸发，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这时胡风才真正醒悟自己在打一场永远不可能获胜的战斗。对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他惶惑，令他惊奇。来自最上方的指示，似乎难以捉摸，他不清楚究竟那矛头是预备指向哪里的。

原本指望借助毛泽东的支持，把周扬他们击败，没料想，形势变化莫测，射出的箭，方向忽变，折向了自己。

自己的苦心，自己的计谋，简单而天真，把整个命运的把握，都交给了不愿交给的人们。胡风的痛苦，是任何人也无法体验的。

他必须低头了，不仅仅承认自己的过失，自己对命运的屈服，更是为了弥补错误——这错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他，许多人，都将随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绝不能说错误就在胡风身上，可此刻，胡风只能这么认为，在一连串的批判发表之后，他感到也许正是自己向《文艺报》、《人民日报》的开火，影响了毛泽东原来的部署，破坏了毛泽东指示精神的正确贯彻，这样的后果，是他无论如何不敢轻视的。

与周扬相争对峙，他不怕，可与毛泽东——他所崇拜的人——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冲突，他是绝对不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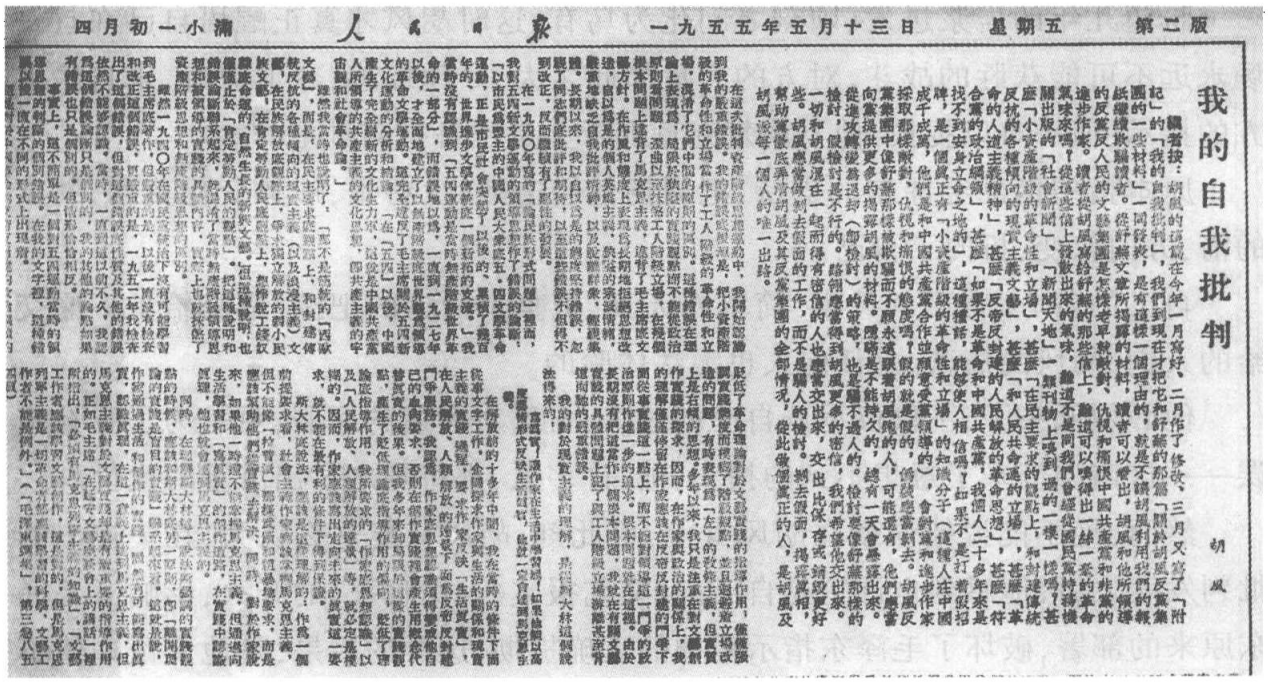
胡风决定写检讨了。关于这份检查是否写，在北京的朋友们意见有分歧，有的主张写，有的反对。赞成者认为事情已到这个地步，再硬顶下去，无论如何不会有好结果，写份检讨能渡过险关为好；反对者仍然理直气壮，认为事已如此，索性顶下去，看又如何。再说承认了错误，也难保一定过关。

北京的徐放、绿原、路翎，以及由南京到京的欧阳庄，都主张写。胡风权衡再三，同意写检讨。不过，他内心矛盾重重，他还是不认为自己文艺观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能不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办，他咬咬牙，决定为了维护不可能犯错误的“上面”，要反省自己。他的精神在写检讨过程中，几乎要裂成碎片。

胡风的检讨曾征求过路翎、绿原、欧阳庄等人的意见，后作修改而成。

1955 年 1 月 11 日，胡风写出了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检讨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有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这种严厉的自责，是他过去所从没有过的。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


我的自我批判 胡风

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胡风写的长达一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致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致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胡风在自我批判中，检讨自己在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思想的论断，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论断；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片面强调实践，陷入了唯心论……他把自己的过去来了个系统清理，但是，从文字当中，仍然可以使人感觉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地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

倒是对自己1949年后的一些举动，胡风毫无保留地作了检讨：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却又自以为是。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几天后，胡风补充写了一份《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在检讨了几个理论观点方面的错误之后，胡风在结束语中表示自己的愿望：

我感谢同志们指出了我的这种发展下去会不堪设想的错误，使我多次地玩忽了同志们的批评之后，仍然能够再一次地得了一个“大喝

一声”的警告。我渴望深入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的这个补充检讨一定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希望继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批判。

检讨呈送上去了。如果几年前胡风就写出了这样的检讨，那他早该成为另外的角色；然而，如果几年前就写出这样的检讨，那他就不会是胡风。

三

胡风写出检讨之后，在1月20日将检讨的要点，同时分别写信告诉上海的张中晓、杭州的方然，以便他们了解情况，作出相应的准备。

给张中晓的信中说：

我希望你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评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就现在能有的理解写了“自我批判”，如果能发表，这就第一步放下了我的负担。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的劳动去看的。

胡风这几天忙于四处写信，劝说关心自己的朋友对事态保持冷静。自己的贸然出击，已经带来严重后果，他不愿让朋友们在自己的事情上，也犯自己同样的错误。如果有朋友为此也遭受挫折，那是他极不情愿看见的。苦酒既然自己酿就，那就自己一人去喝。在一封封信中，一个共同的内容，便是主张他们都不必站出来为他申辩，而要尽可能保存自己。

1月24日给张中晓的一信：

现在已经不是被动与否的问题了，你当能够很冷静很沉着研究问题的。前信所说的情况，文章出来之前，不必明显的说出去，只是有意见的人，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同一天又给重庆的冯异一信：

冯异同志：

[这里的情形是无从说起的。]

我希望你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事情。

[我惟一的努力是自己担负应该担负的，惟一的限度是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应该被损害的东西。至于个人以外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来日方长，用不着担心的。]

再说一遍，望你用沉着的心情对待就要发生的事情。其次，好好自己研究，不要写信写文章或者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最要紧。

祝好！

风

1月24日

1月26日给贾植芳、任敏夫妇一信：

久不通信，想来你好？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望你用极冷静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行事，参加讨论，这只有更使问题难以处理，有热心的人，也希望你代为阻止。不要写文章或信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较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

2日2日再给张中晓一信：

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所以将来在会中，千万不要生硬，应就胡等的错误发言。浦兄组织上如要他表示，可以写文章的，这已经没有什么了，究竟错多少？对多少？在群众的心里是有数的。[但错总是错！尤其做法错！就应该正视，应该批判的。本着这样的心情痛苦可以少些。声兄处一直没有信来，很为他耽心，不知你有所闻否？]

四

关于胡风写出《我的自我批判》之后的局势变化，林默涵的回忆，从他的角度为后人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记录。

林默涵说，胡风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组织公开讨论后，于1月14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

>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按：即《意见书》）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
>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
>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
> 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立即就此问题于1月15日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主席。他在信中写道：

>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
> 他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为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的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存阴暗心理。

他最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做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二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星期发，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周扬信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陆定一当日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是可以登载的。

毛主席当日也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

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报告首先指出了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按：即“三十万言书”）的主要错误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他片面

地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报告还追溯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历史根源和进步文艺界自1945年以来对他的多次批评帮助，分析了"胡风及其一派"错误的主要表现，认为"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肃清他在文艺界及其读者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个斗争又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

为此，中宣部提出："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发，同时也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我们已将这个做法征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这样做。"

林默涵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找过陆定一、周扬和林三人到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临走时，毛泽东站起来送他们，周扬对他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主席说："我就是要他痛苦！"据林的解释，毛的意思是要痛才会改。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通知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于是，一场令胡风无法招架的全国性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全面展开。

五

毛泽东终于发话了。继《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之后，他再次领导了批判胡风的运动，尔后一切发展，均依照了他的意愿。

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虽然是胡风前所未有的自责，但显然不如早在几年前彻底抛弃旧我的舒芜的检讨，能够获得毛泽东的赞许。何况，在毛泽东，现在关键问题已经不在胡风检讨得如何。批《文艺报》、批胡适思想，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思

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么,文艺界胡风文艺思想这最后一块顽石,是绝对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了。

人们总是习惯于看到胡风与周扬的私人恩怨,仅仅从现象上看到文人间宗派主义的相争相斗,还有胡风的固执和偏颇,以为如果没有这些,胡风也许会永远平安无事。其实,这只是将目光停在表象上,实际上,历史发展到1955年,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左的人,不管他是谁,都不会安然无恙的。

毛泽东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作出了批示。"文革"中小报上这样报道:

> 一月,毛主席决定把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公开发表,展开批判。毛主席还针对胡风在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掩盖退却,指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

毛泽东的这句批示,正是针对胡风检讨中这样的话而作出的:

>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差别,这就是我前面简单地分析了的错误的阶级根源。

"反人民,反党的思想",毛泽东的话已经给胡风思想定性,在他的指示下,那些本来就欲整治胡风的人,便雷厉风行了。

《文艺报》这次又将两期合刊出版。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1、2期合刊,虽然还是以批判胡适为主,但对胡风的批判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通栏标题"对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的意见"下,《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等人的5篇文章。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批判胡风,给姚文元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在今后几个月中,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批判者之一,由此,他也走上了通往未来显赫年代的大道。

《文艺报》同时开始连载路翎的申辩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自然,和上次发表胡风的发言一样,仅仅作为供人批判的反面材料而已。

这一期《文艺报》最为引人注目的举动,是破天荒地免费随刊物送一册《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便是胡风去年7月送呈毛泽东的"三十万言书"。这一册

中，只收入原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附件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另外两部分内容分印两册《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这两册仅在极小范围内送阅，未公开发表。

随《文艺报》附送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在扉页上印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于1955年1月12日的出版说明：

> 胡风在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也是针对着1953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
>
> 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重印附发。

从这期之后的《文艺报》，批胡适的文章逐步减少，批判火力集中到胡风身上。第3期发表田间等人的4篇文章，第4期便集中了9篇文章。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开始发表批判文章。新年伊始，第一篇批判文章是周姬昌的《胡风先生的立场是什么？》，尔后，陆续发表读者来信，批判胡风的发言。

批判胡风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月上旬中国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之后。

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作协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中国作协所属各部门、各刊物编辑部负责人，以及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6个分会的负责人：沙汀、刘白羽、萧三、陈白尘、聂绀弩，严文井、康濯、吴伯箫、邵子南、曾克、郑伯奇、胡采、草明、师田手、于黑丁、欧阳山、吴强、方纪等，赵树理、艾青、袁水拍等则以作家身份参加。

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2月11日，新华社报道了这次会议。消息说：

> 会议指出……他长期地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形成一个小集团，来和在共产主义思想以

及共产党领导下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文学队伍相对抗。他的关于文学活动方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作家协会的统一领导，使文学运动变成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会议决定对胡风的错误理论展开彻底的全面的批判，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加强文艺思想的团结，更好地为国家的总路线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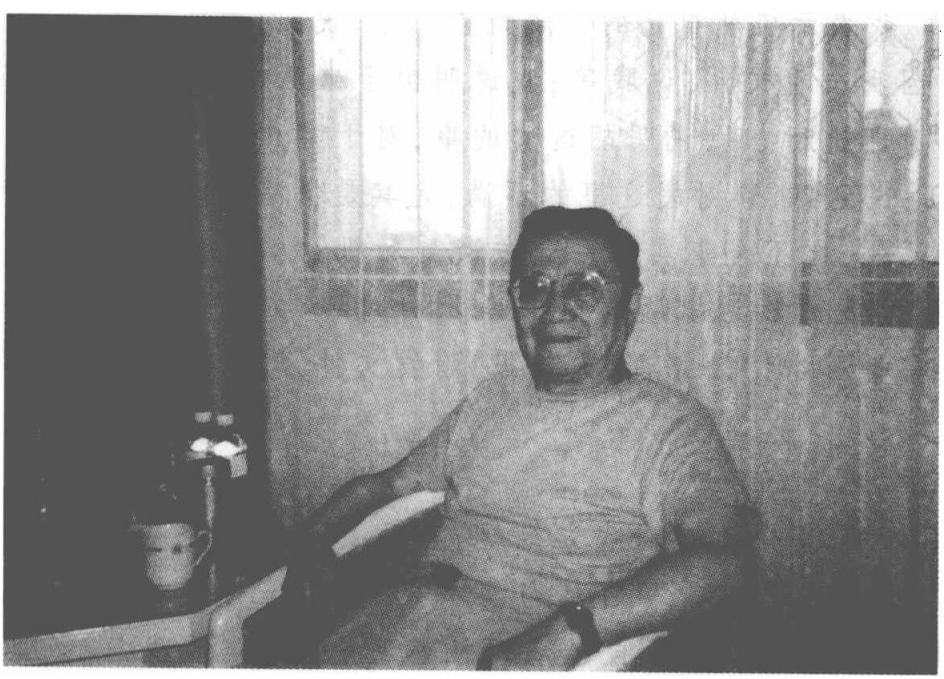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2月12日在头版发表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

六

胡风的朋友纷纷表态，或是真诚的醒悟和忏悔，或是听从了胡风的劝告，积极表态以保全自己安然过关。在沛然而至的政治压力面前，在历史摆出的严峻的选择面前，他们无法回避，不可能闭上眼睛，保持沉默。

3月6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3年前，在文艺整风中，他曾经因为反省过自己，招致胡风的朋友的指责。3月29日，《人民日报》特地转载王元化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文革”结束后，“胡风分子”之一的王元化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3月9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月15日,绿原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

3月25日,曾卓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谈起》。5天后,在作协武汉分会举行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3月27日,彭燕郊在《长江日报》发表《必须激起最严肃的责任心》。

4月15日,鲁藜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

几乎所有朋友都提起了笔。上海的贾植芳怀着满肚子不情愿,还是写了一篇应付性的批判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但很快被退回,认为写得太简单。他又改寄《文艺月刊》。他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的最为接近的几位学生,也出面批判。曾华鹏4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揭开胡风"写真实"的外衣》,施昌东在《文艺月报》第3期上发表《评胡风的"创作实践"》。然而,这两位贾植芳的得意门生,最终仍然没有逃脱惩罚。

在天津,阿垅自然成为一个重要对象。他在"备忘录"中记载了方纪与他的谈话内容:

> 1955年2月5日,晚7时~9时,方纪约谈话。内容:一,要我写关于胡风的文章。我表示应就自己的问题检查。二,说,同意或不同意,都要写。三,因我未看文件,说我等;我说明由于生活情绪,孩子干扰,到他开学后即进行。四,说明胡这次的事,对于党和群众的影响,感到不好。五,说到鲁、甸对胡这事的不满,尤其是情绪上。六,自己觉得,提到自己处,有不合事实处。七,方谈到动机、效果、动机之思想内容。八,问到我解放后出版的理论等。九,问到"方生未死之间"。十,我要求有材料。十一,方说《文艺报》附发文件,即看出是唯心论。
>
> 谈话时人来,岔断时很多。
>
> 1955年2月6日,下午1时许找方纪。我表示:一,对党的多年的追求和依靠,正视问题。二,写自己与写胡的问题。三,要求帮助。方谈:一,要正视问题。二,写自己或写胡都可,他并非要我怎

样写，看写时自己考虑需要。三，强调正视问题，不要沉重。给我找材料。

阿垅在备忘录中还记载："1955 年 3 月 2 日，接乔木信及退件。"是什么退件，胡乔木的信是些什么内容，现在无从知晓。

3 月 3 日，阿垅当即复胡乔木一信。

乔木同志：

给我的信和附件都收到，请勿念。

这次，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使我深深感到：一切问题在丧失前提，在丧失前提里酝酿着危机，而且爆发了危机。

从这里，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和考察自己。

对于党，愿自己始终是赤忱的。

渴望能得到您的指示和帮助。

敬礼！

陈亦门

3 月 3 日

真诚也好，虚与委蛇也好，胡风和朋友如今的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结局已经给他们安排好，由不得他们选择。

七

为时几个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4 月 1 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在思想范畴展开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

郭沫若的文章主要批判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到的"五把刀子"问题，在结尾部分他说：

从胡风的思想实际和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看来，他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不亚于胡适的。他所提出的纲领是有一般意义的、思想的和行动的纲领。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和人民群众结合，实际上就是反

> 对全中国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事。必须彻底批判胡风思想的原因，我以为就在这里。

不知道此时的郭沫若，是否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将胡风打成“反党、反革命”的意图。不管怎样，郭沫若的文章已透露出了别的文章所没有的新的趋向。

4月，是政坛风云、文坛风云交叉出现的日子。

在郭沫若文章发表后第5天，4月5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3月21日到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31日，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是，1953年底七届四中全会上所解决的高、饶问题，正式公之于世。

几天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因遭台湾特务破坏失事一事，又成为国人普遍关注的热点。

4月11日，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中外记者11人，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飞往雅加达。飞机自香港起飞，在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恐怖事件激怒了人们，《人民日报》报道，各地人民纷纷集会，抗议台湾蒋介石特务的阴谋暗杀活动。

一个突发的、与胡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正好发生在此时，无疑更加渲染出一个月后成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和朋友们的社会背景，人们对蒋介石特务的仇恨，非常容易倾泻在被说成是“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胡风等人身上。

邓子恢此时也忙碌着，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他面临着合作化运动产生的问题。受中央委托，他和同事们，于4月下旬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整顿合作化，纠正急躁冒进。

1951年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农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发生过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出版时，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一文的注释中，这样写到：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从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便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逐步展开。第二年，毛泽东又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认为刘少奇等人是犯了右倾错误。1953年11月在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对合作化运动采取的“纠正急躁冒进”的做法。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到1954年秋收前，合作社可以发展到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

可是，到了1954年秋，合作社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原定计划，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整顿和巩固，并允许适当压缩。但冒进的势头仍然很猛。到3月、4月，合作社总数猛增到67万，大大超过中央批准的在春耕前合作社由10万增加到60万的原定计划，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邓子恢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他倾向于放慢步子，稳妥地发展合作社。纠正急躁冒进，在4月，便成为他在合作化运动上极力主张的方针。

邓子恢此刻和胡风一样，都不知道自己一个月、两个月后，将会遇到什么。在经济上，或者在文艺上，不同于毛泽东主张的人，都会以自己的遭际，在1955年的历史之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八

舒芜忙碌着，他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沿。

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就在这期间，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他拿出了胡风40年代给他的信。他拿出这些信，他想用这些信证明胡风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当年是不赞同他的《论主观》的观点，而是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并对当时的批评极为反感。

那位编辑把信带回了报社，交给了袁水拍。

不管舒芜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交出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批判的武器意味着什么，他的举动，在这场事件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管他是否情愿，是否承认，

他在历史悲剧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上面所求之不得的人选。

舒芜拿出的信,为文艺领导人十分重视,决定将这批信由舒芜整理分类,配合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并在《文艺报》上发表。这样,既可以证明胡风的检讨,并非讲的真话,而是在掩饰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又可以将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高潮,再往前推进一步,彻底灭掉胡风的气焰,以取得胜利,让胡风从此抬不起头,去干不为人注意的教学或编辑工作。

舒芜整理出的信和胡风的检讨,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大笔一挥,定胡风等人为"反党集团"。形势骤然发生巨变,周扬等人也毫无思想准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的胡风一案的专案组,便相机成立,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由中宣部牵头组成,他们是: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他们之下,由中宣部文艺处的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如外调、整理信件等。

专案组搬进了公安部工作。主要分为两间办公室,一间是公安部人员使用,一间是中宣部人员使用,周扬极少到这里来,基本是五人小组的人不时来到这里。

原有的设想被毛泽东突兀而至的升级全部推翻,现在,一切都必须在新的调子下重新组织材料,公安部的人员开始集中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以证明他的反革命历史。中宣部的人员便向各地发出通知,收集有关信件,准备继舒芜的材料之后,再推出新的证明。

一台几乎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机器,就这样制造出来,开始运转了。

根据要求,舒芜的信分成四类。四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

>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
>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
>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
>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领域所进行的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

界观作基础。

舒芜将信分类，还在每一类信的后面，加上批注性的话。在整套材料的后面，他写下两段言辞激烈的话，既表示出对胡风的憎恨，又恳切地表示自己悔悟的愿望：

>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
> 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

舒芜整理信件的时候，全国也很快行动起来。4月，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便由各作协分会、宣传部文艺处人员组成的专案小组收集胡风的信，上海特地将收集到的信打印成册，送至北京，由北京的专案班子整理、删减、归类。

胡风感受到了弥漫的紧张气氛，他坐在家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灾难。但他仍然相信只会是越来越猛烈的思想批判，至于拿信件做证据将他置于政治深渊之中，他毫无思想准备。这段时间，除了上午打拳，便是和常来家中的聂绀弩的夫人周颖闲谈，打牌。北京的一些朋友，也偶尔来串串门，互相安慰一番。

他听到消息说即将发表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但伴随检讨一起发表的，他不会料想到是舒芜整理的材料。

5月11日胡风给李正廉一信，这是目前所知的胡风被捕之前的最后一封信：

> 正廉兄：
>
> 在祖国青春焕发的当中过着止水一样的日子，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收到了你的信的。三个月来，为了早日恢复身体，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时间对于我是很“长闲”的。
>
> 在集体底荣誉和力量面前，不但不能有什么个人权威，连个人责任的感情也是非得因时因地制宜不可的。虽然多少在存心上没有以什

么个人权威为念,但终于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原因之一,可以说是主观唯心论地理解了个人责任的缘故罢。将近十年以来,在对集体的关系上,一错再错,是不能原谅自己一分,是要愧对一切战斗者的。读到"痛定思痛"这地方,我似乎懂得了你的"懈怠"。你也可以理解我的"长闲"了。

"划清一下生活的界限",当然应该如此。但这,在主观上做得好既不易,使客观上觉得好当更是困难的。一月份就写出了,经过修改,这月中听说要发表。看到以后,望直白地把印象和感想告诉我。二十多年的劳动,替自己挖了一个坑,

这不知道算是"爬"了出来否?当然,这也会受到批评的罢。

那部稿子,下次当寄上。早时未看,现在身体情况不允许看(当然现在有的是时间),实为憾事。我更感到应该通过那去了解你。

有空望便中写点什么来。

风,5月11日

九

最为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声霹雳,一道狂风,它来得倒那样突然,那样猛烈,不仅使胡风和朋友们目瞪口呆,就是一直在进行批判的许多人,也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5月13日,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在第二、第三版分别发表了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

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本来计划由《文艺报》发表,但在发表前,周扬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改写的按语,便是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舒芜揭露材料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按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甚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甚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甚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甚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甚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甚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

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

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到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

反党集团？反党集团！不容置疑，明明白白。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思想；宗派主义——胡风派——小集团——反党集团；谁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

把胡风和朋友们一下子定性反党集团，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的，现在暂时无法获知。是为了彻底灭掉胡风的气焰，是为了以政治上的打击来解决思想斗争，还是为了随后开始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制造舆论？

也许，这永远是个谜。

5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开始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1月初展开的胡风思想批判，从此转为另一性质的声讨。

没有分析，没有论证，只有撰稿人严厉的揭露、痛骂。

同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动态性消息：

新华社18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5月18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7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月20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与胡风和朋友们命运有关的，正是最后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决定了其他事

项”,这便是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逮捕。

9个月前,胡风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195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为一名人民代表,他感到荣幸。他举起手,和所有代表一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第九十条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在那次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的结束部分中说:

> 我国宪法的公布,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获得了伟大胜利的一个成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宪法公布以后,宪法所规定的任何条文就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起来,不是的。……在这宪法公布以后,违反宪法规定的现象并不会自行消灭,但是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我们面前还有遥远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必然会有艰难,有曲折,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

胡风亲耳听到刘少奇讲出这番话。

现在,他再也不可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了。

十年后,刘少奇也被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经毛泽东修改,有的是毛泽东亲自加的。

6月6日,毛泽东在收到第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批示:

> 定一、周扬同志:
>
>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
>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林默涵回忆,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泽东写的。他写道:“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和周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便由我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社论之后,又批示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后,社会各界掀起了声讨胡风的浪潮。中共中央决定将关于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6月12日毛泽东批示: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批示: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曲文坛悲歌由此而在历史舞台上酿成。

悲剧命运在等待着胡风和他的朋友们。

第九章 在被捕的日子里

一

1955年5月，三个“5”重叠，耸立起一块历史之碑。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中国当代政治史，都在这块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13”这个数字，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吉利的，对胡风和他的朋友，以及受牵连的人们，“5”才是真正不吉利的。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个黑色的5月。

在1982年6月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总59期上，一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冤假错案平反概述》（作者苏东海）说到了这个5月：“5月18日，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在全国清查中，共触及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逮捕，其实在5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全国各地就已经开始了。这样，1955年5月到6月，成了“胡风分子”们黑色的日子。

在北京被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阎望……

在天津被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

在上海被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据1955年7月9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第01747号布告，宣布上海共逮捕17人。）

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

在杭州被捕的有冀汸、方然……

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郊……

在湖北被捕的有曾卓、郑思、伍禾……

……

签署逮捕令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十几年后，他也被关进了关押胡风集团成员的监狱——北京秦城监狱。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曾在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中这样沉痛地写道：

> 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十一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的公安部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当然，我并不是在把这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我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分量。这确实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它们因为产生于同一阴暗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难道不是吗？它们同时的、必然的存在能够提供人们的思考，比它们单独偶然的出现要有意义得多。(《第一任公安部长》)

二

北京，5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

胡风，梅志——

5月13日报上出现的“胡风反党集团”的字样，委实让胡风大吃一惊，说他有宗派主义，也许他不否认，说他坚持个人主义，与集体不合作，他也会承认。在年初的检讨中，他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反省自己的。可是，要说他是反对共产党，却是绝大的冤枉。

胡风历来将自己作为左翼作家看待。在30年代初，他在日本便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和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秋田雨雀等，都有密切来往。回国后，他跟随鲁迅继续在左翼文艺的工作，在40年代重庆国统区，他从来被视为进步文艺的重要人物，并长期领导了全国文抗的工作，与周恩来、乔冠华、邵荃麟等共产党人，他也有密切往来。1949年后，他由衷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他想不通，自己怎么是反党的呢，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

13日当天晚上，谢韬和妻子卢玉来到家中看望胡风夫妇。之后几天，平静如常。

5月13日到15日,胡风记下被捕之前的最后三天的日记:

13日上午练拳。

“自我批判”在人民日报上加上按语发表,同时发表了舒芜的“材料”。

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要征用。

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康濯和严文井来。

14日上午练拳。

周颖来。

15日上午练拳。

与周颖闲谈,玩扑克。

得荷芬信。

5月16日,白天一切平静。距家不远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树正绿,花正红。

下午,正吃晚饭,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

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们感到事情严重了,但没有想到会抓人。

5月16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吃饭。那时大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女儿也在中学住读,只有8岁的小儿子晓山、我的母亲,和我们一块吃饭。饭还没有吃完,刘白羽和几个人来了。胡风见是作协领导,非常高兴,便招呼里屋去坐。晓山以为来客人,赶紧放下碗,走开了。他走到门外,看到外面站着不少人,还有车。

胡风和他们在里屋单独谈话,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我坐在客厅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和我谈话,无非是说反党问题。

随后,抄家开始了。进来了一群人,把书柜上的书翻了个遍。我和

胡风一直被隔开,在这期间,两人没有见面。他的饭还没吃完,也就没再吃。对,他们抄家时,还向我掏出搜查证要我看,我什么也没说。

一直折腾到半夜十一点,也可能是一两点,胡风从里屋出来,要把他带走。也不准我们俩谈话,胡风只好和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让带,就出门了。

胡风走后,搜查的人又把一间间房子都搜了个遍。

大约凌晨时候,我也被带走了,留下了母亲和晓山。从那以后,有十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胡风他在哪儿。

(1986年9月17日、10月13日与李辉的谈话)

胡风的女儿晓风回忆:

我当时16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逮捕我爸爸和妈妈那天我正在学校,星期天(22日)回来才知道。当时家里留下了三个人看管,住了三个月,守电话,还负责送晓山上学。晚上家门口附近,总是可以看到有人在巡逻。

(1986年10月13日与李辉的谈话)

三

北京,5月14日,牛汉——

牛汉回忆他被捕的日期,比胡风还要早两天,这样,牛汉要算"胡风集团"中第一个被捕的。(关于这一被捕时间,也许当事人回忆有误,早于胡风被捕似无可能,21日的可能性较大。此处暂取当事人说法——作者注)

牛汉是胡风的朋友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此时他31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党支部成员。牛汉是4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大学时与胡风开始通信联系的。那时,牛汉和几位文学爱好者由中共西安办事处王超北提供经费,创办了《流火》杂志。胡风给牛汉寄来文章,在创刊号上发表。

1949年后,牛汉来到北京,与胡风见面,之后,又经胡风介绍,他认识了路翎等住在北京的人。至于外地的许多人,如耿庸等,他是1979年平反之后才第一次

见面。

被捕的前一天,《人民日报》的材料一公布,牛汉就意识到形势变得严峻了。这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开会,对牛汉做帮助工作,会议由王任叔(巴人)主持。王任叔和同事们很关心牛汉,他们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对牛汉会上的悲观不能理解。王任叔只是对牛汉讲:问题不会那么严重,认真检查就行。

王任叔的妻子也是支部成员,她单独找牛汉,表示关心和同情。在以后的岁月中,牛汉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王任叔的关怀,他永远难以忘怀。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王任叔夫妇的意料之外,第二天,牛汉被捕。

牛汉回忆:

那天是星期六,中午吃完饭我去打排球。打了一会儿,准备去洗澡,这时,来了两个人叫我出去。

后来我才听说,这两个人是随公安部负责胡风案件的专案组组长一块来的。他们先到社领导办公室谈话,然后由社领导带着来找我。

我跟着他们,不让我回办公室,只穿着衬衣,外套没拿,手表、钢笔都没让去取,就在办公桌上。

出门以后,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苏式卡车。他们让我坐在里面,后面是四五个公安便衣。一车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里。那时候托儿所还没有人。在那里,他们拿出了拘捕证,让我签字。

这时候才大吃一惊,心想,不是一直说是内部矛盾问题吗,怎么要拘捕?

"你必须签。"他们说。

我问:"拘捕多少时间?"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没有问题就放出来。"

我还是不签。过去我被国民党拘捕过,知道这套手续。当然,不管我签不签,我就被监禁在这里,以后又押到别的地方。

(1986年10月与李辉的谈话)

牛汉的夫人吴平回忆:

那时我在铁道部教育局当秘书。只知道胡风在挨批判，并不知道牛汉也会出事。

只想到他193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后，1946年又重新入党，对党很忠诚。

那天晚上，出版社来人到家中，还跟着公安部的不少人。他们告诉我牛汉已经被抓起来了，要搜查家里。

我对党非常信任，一点儿杂念也没有。听完他们的话后，我一句也没吭，就由他们搜查。搜是公安部的人干，出版社的坐在一旁不动。我也不动。第二天，领导对我说：听说你表现得还不错。

（1986年10月与李辉的谈话）

四

北京，5月18日，徐放——

在《人民日报》文教部工作的徐放，与胡风认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徐放从沦陷的东北家乡，辗转到了四川，喜爱诗歌创作的这位青年，对《七月》产生了感情。

当时，胡风住在重庆乡下。徐放带上自己的诗稿，步行到胡风家中求教。从那以后，徐放便与胡风建立了通信联系，成为胡风扶植的一个文学青年。在徐放的心目中，胡风与党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甚至说："没有胡先生，我不会参加革命。"

徐放在重庆参加了《新华日报》的工作，后来撤回延安。1949年夏天，已到《人民日报》工作的徐放，去北京饭店看望胡风，恢复了联系。他和胡风一度发生过矛盾，来往减少，但到了1954年底胡风挨批后，徐放反倒几乎天天去胡风家。他极力主张胡风检讨。还动员诗人王亚平也去做胡风的工作。

5月16日抓胡风的那天晚上，徐放和路翎在一起，在一家酒馆里吃饭，排遣郁闷。

对胡风、梅志被捕的事，一无所知。

第二天，一清早，徐放和同事到团中央，商谈为报社撰写"六·一"儿童节社论事宜。

徐放回忆：

那几天，不断有领导找我谈心，总是说："你要争取主动，不要被动，要谈清楚。"我回答："胡风的问题有天下大白之日，我徐放是无愧于党的。"

那天从团中央回来，还没进办公室，上台阶时，有人通知我，说党总支书记来找我。在这头一天，我给总支书记送过一封信，信上建议中国文联党组开个会，找乔冠华等人也参加，把胡风的事情作为文艺问题讨论。

我见到了总支书记，当即宣布：组织上决定要你停职反省。我说要回家吃饭，还要照顾一下孩子，就让我先回去。中午，我回到麻线胡同12号人民日报的宿舍，准备吃完饭后去报社。我刚吃完饭，抱着刚刚一岁的孩子玩，这时公安部门的人就来了。

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要我到煤渣胡同去。于是，放下孩子，什么也没带，就被汽车押送到煤渣胡同。由两个公安人员负责审我。他们告诉我，胡风是反革命，已经查明，昨天被逮捕了，现在对你实行拘留，在24小时内谈清楚。我说，用不了24小时，两个小时就谈好。我又被从2号院送到23号院，我便如实写我与胡风的关系，他们还说我们通信有暗号，这才知道早就被盯上了。很奇怪，在那里，我发现有的人在头一天酒馆里面出现过，我才知道，我和路翎喝酒时，也被盯住了。

（1986年9月7日与李辉的谈话）

后来，徐放在监狱中翻译起唐诗宋词。他选中了杜甫的《莫相疑行》：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五

北京，5月17日，谢韬——

在胡风凌晨被捕的当天，在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任负责人的谢韬，也被捕了。

谢韬被视为胡风写"三十万言书"的一位"参谋"，时常帮忙胡风查找马列著作中的原文。

看了5月13日的报纸，谢韬心里不是滋味，认为舒芜整理的信件并加按语，是断章取义。当晚便携夫人去胡风家中慰问。

谢韬回忆：

5月17日，公安部来人找我谈话，宣布隔离审查。说完就把我押上车，带到东四六条39号院的东厢房。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家。据说，公安部门说我是胡风反党集团的，吴老不相信。吴老是罗瑞卿的入党介绍人，他便给罗瑞卿打电话，说对这件事要慎重一些。这样，公安部门便临时改变主意，押到吴老家。吴老临时把秘书的东厢房腾出来给我住，西厢房那时住着王若飞的夫人。吴老当时在党内很有威信，又是中央委员，如果不是他保护一下，我的苦头就要吃大了。

我关到那里，没有宣布逮捕，只是要我反省交代，还派人看守。在那里几个月，从没见到过吴老。

后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宣布逮捕，可我一直关到1965年才出来。

（1986年12月8日与李辉的谈话）

六

北京，5月21日，路翎——

在诸多友人的创作中，路翎可以看作是受胡风理论影响最大、关系也最密切的一个。奇怪的是，路翎的入狱却要迟一些。

由于多年监狱生活的折磨，等80年代平反时，路翎的身体遭到严重摧残，曾经患过精神病的他，对被捕经过的回忆，远没有其他人那样详细和清晰：

1955年5月13日报纸上发表第一批反党集团材料，16日第二批发表反革命材料。5月21日，我被从剧协机关宿舍（东单二条）带到机关，然后到公安部，在钱粮胡同关了一年多。要我写材料。又到昌平县的秦城监狱。

在钱粮胡同，我和谢韬、绿原都在一起，但我不知道他们。我天天在里面嚷嚷，骂人。骂“秦始皇”之类的话。神经不大好。

在钱粮胡同没有报纸，到秦城后才有。钱粮胡同是普通民房，每天呆坐那里，精神受折磨。家属不让来看。

我在钱粮胡同两三年，西总布胡同半年多。

公安部来人从机关将我带走，说让到公安部写材料，交代问题。在那里审问了几次，钱粮胡同期间没有审。在公安部几乎天天审问。问胡风说了哪些话，有哪些活动等等。在西总布胡同时家里送过一条烟，钱粮胡同送过一条裤子。公安部每人每月发10元钱，买烟、糖果。

（1985年4月22日与李辉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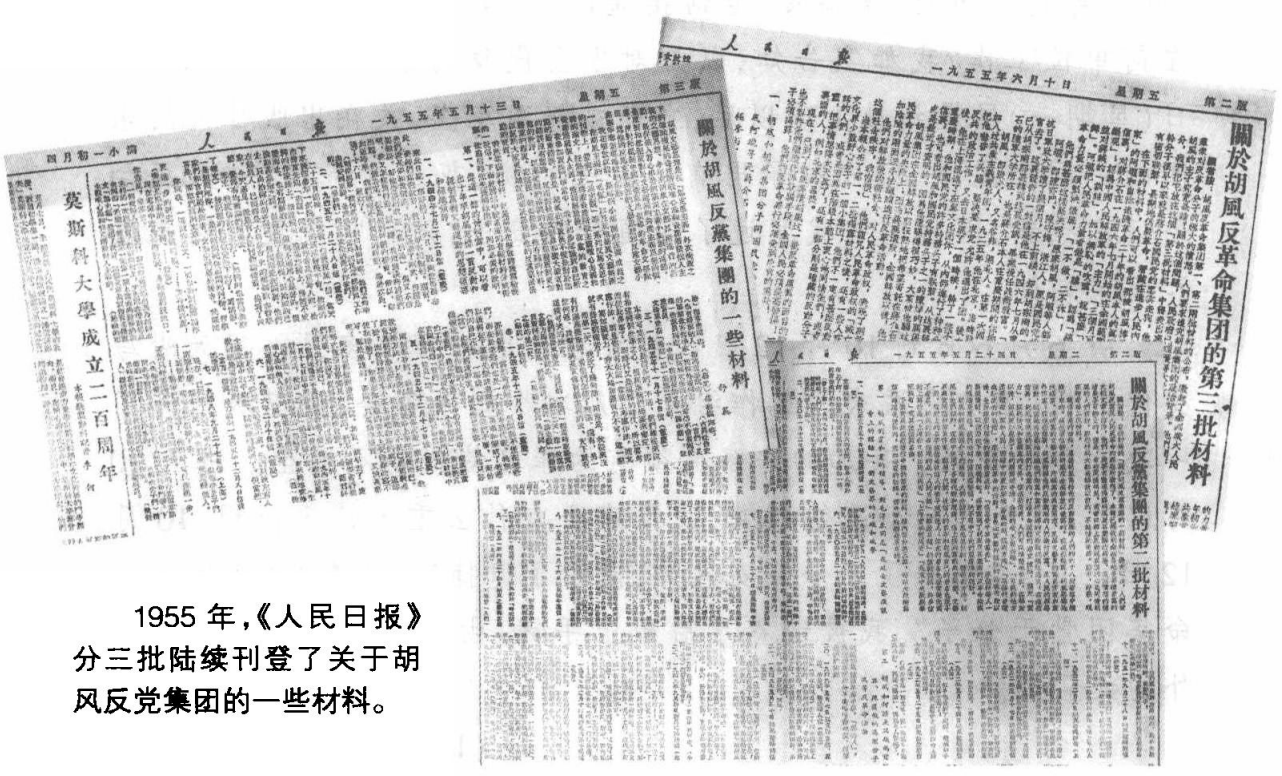
根据路翎夫人余明英的回忆，路翎的正式被捕，应该是在6月16日。

我们1955年5月26日从家中搬到机关。

我们住细管胡同的剧协宿舍，让他搬到东单头条的宿舍，说那里写东西安静。我和孩子去偷偷看。咫尺天涯不能相见。

6月16日被抓到公安部。

（1985年4月22日与李辉的谈话）



1955年，《人民日报》分三批陆续刊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七

北京,6月6日,杜谷——

在北京,杜谷的被捕要算最晚了。

杜谷回忆:

1950年至1954年我在重庆"青年团西南工委"宣传部任主任秘书和团刊编辑主任。1954年冬因为大区撤销调至北京,由团中央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起初在文学编辑室。1955年4月调到《旅行家》杂志社协助子冈主持编务。当时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仅与三四十年代的旧交有所往来,特别与40年代在成都一同创办"平原诗社"的卢甸一家过往密切。那时卢甸在天津文联,他的爱人李嘉陵在中宣部工作。195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所谓"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我看到十分惊讶,不知为什么把文艺问题忽然提高到政治斗争。6月4日是星期六,我估计卢甸会从天津回家度假,就打电话(确否可查日历)给李嘉陵。电话接通以后,李不在,对方问我叫什么在何单位工作?我如实告知,以为对方会代我向李转达。不料6月6日(星期一)早晨到社上班以后,立即被隔离审查,关在出版社大门东侧的一间小屋里。门外院子里有一盆夹竹桃,花正开得红艳艳,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陪我度过了那痛苦的日子,只有它对我依然是温和而亲切的。

从6月6日到10月12日我被关在出版社四个多月,每天叫写交代材料,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开了几次小型斗争会,全出版社开了一次大型斗争会,妄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痛不欲生。进入10月以后,门外摩托车来往频繁,我预感会有什么重大情况出现。10月12日上午,忽然来了三个公安人员,出示了逮捕证,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被迫签字后戴上手铐。由小轿车押送到德胜门外的大监狱。

(1986年8月致李辉信)

八

上海,5月15日,贾植芳——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室内共有三位教授:余上沅、方令儒、贾植芳,另有两个讲师,两个助教。

开始批判胡风后,没有发给贾植芳《文艺报》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他是在方令儒家中看到的。

尽管风声已紧,贾植芳旧习难改,仍然常约朋友们见面,买点猪头肉、花生米,喝上几盏,胡侃一通。在系里面,他的固执也是出了名的,组织上找他谈话,让他检查,他居然拍桌子大叫:"我不干!"甚至要提出辞职。

第一批材料13日公布后,贾植芳对胡风的处境很为关切,也很反感。他拿出10元钱,特地上街买来胡风爱吃的酥糖、虾子酱,又买上一双长统袜子,包在一起,约好请一位近日去北京的朋友给胡风捎去。

这只能是一场白日梦了。

贾植芳回忆:

> 星期六,一大早我刚起来,正在洗脸,学校领导杨西光就来了电话,通知到高教局开会。不一会儿,他来了,告诉我,车在外面等着。我还没吃早点,说到了高教局再吃。
>
> 那时候风传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台湾,复旦大学要搬到重庆去,我以为去谈这件事。因为去高教局开会是经常的事。我没有一点儿别的思想准备。
>
> 和任敏打了声招呼,我就和杨西光上了车。
>
> 在车上杨西光什么也不讲。我烟瘾大,就掏出一盒大前门抽。杨西光这时掏出几盒中华烟送给我,我和他很熟,知道他从不抽烟,所以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我猜想,他是知道要抓我,特地带上给我的,至今,我也忘不了那几盒烟。
>
> 到了高教局,吃完早点,便来了三位领导,随后六七个姑娘低头进来,都拿着本子,坐下作记录。

“你看报吗?”其中一位姓陈的领导问。

“我看呀,订了好几份。”我答。

“关于胡风的材料你看过没有?”

“我看不懂。”

姓陈的领导掏出报纸,又念了几段编者按。我说:

“我似懂非懂,你这一念,更不懂了。”

他们很恼火,显然我的态度被认为太不老实。他立即宣布:“我代表高教局宣布,贾植芳停职审查。”

杨西光这时对我说:“贾先生,我们学校缺老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出来,我们需要。”

他们要我交待历史问题,我说:“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没有提出我有什么问题,还让我当了干部,不信,你们去查。”

吃完中饭,我就躺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忽听到:起来,起来。又开始审。

我还是那些话,审不出什么名堂。到了晚上8点,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三位高教局的领导对我说:

“我们三个人苦口婆心挽救你,你还不悔改,那只好让你到公安部门去。”

说完,他们拿出逮捕证,来了两个公安便衣便把我带到上海公安局的第三看守所,一直关到1966年。

(1986年11月10日、14日与李辉的谈话)

贾植芳的夫人任敏回忆:

贾先生带走那天,我以为他去开会。下午,就来了人要胡风给我们的信,我找到一些交给了他们。

晚上来了公安局的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拿出搜查证,在家里住下,当天晚上开始搜查。

晚上,余上沅夫妇可能听说出了事,就到家里来看我。我一夜睡不着,也想不通,还放心不下贾先生的情况。

第二天,他们还在家中。泥土社的老板许史华来家中取稿子,我

不能讲话，在外面直使眼色让他走。他不明白，我赶紧写了个条子给他："老贾不在。"这时他好像看出点问题，就连忙回家。他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上，一到家，很快就被抓了。本来他也跑不脱的，泥土社出的书几乎都是胡先生、贾先生他们的。

第三天早上，公安部门的人对我说："叫你去交待问题。"就把我也押走了。

（1986年11月13日与李辉的谈话）

自这一天贾植芳与任敏分手，一直到1967年。整整12年，他们互相不知下落，不知生死。

九

上海，5月15日，耿庸——

和贾植芳同一天，耿庸被捕。

胡风编辑《希望》时，耿庸是杂文的主要撰稿者，在这之前，1938年时就开始与胡风通信。1946年到上海后，又通过胡风认识了贾植芳、阿垅等。和贾植芳一样，他的嗜好也是喝酒，他，贾植芳、何满子、王戎等便是常常聚在一起的酒友。

这几年，耿庸和张中晓、罗洛、王元化等，都在新文艺出版社当编辑。5月13日公布第一批材料后，组织上便动员交信，他没理睬。一天晚上出版社开会，耿庸没有参加，张中晓去后回来当即找到耿庸，忿忿地说："他们要动手了！"

可是耿庸仍然不在乎，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每天陪三个孩子玩，最小的刚刚学会走路。

耿庸回忆：

抓我那天是星期天，5月15日。

早上5点多钟，我正在睡觉，被敲醒了。由吴强带了三个人来，没有介绍是谁。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负责文艺工作的，也是上海市胡风问题专案组的负责人。

我开门请他们进来，吴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请他们在楼下

客厅谈话。说到那批材料，我反驳。一直谈了两个小时，我还是不服气，这下子他们火了，说："你们这是反党的，是反革命的。"

我也火了，把桌子一拍："胡说，这不是反革命！"

吴强连忙劝我，说："你别和我说，你跟他们三个人讲。"然后，他就走了。

那三个人这时拿出了拘捕证，让我签字。

我问："去干什么？"

"到那里去讲好了。"

他们就要带我走。孩子们还没醒，我没法打招呼，就和妻子王皓讲了几句话，跟他们往外走，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王皓了。

公安局的人对我说："我们不铐你，你自己往外走，前面那辆车就是，你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转过身告诉王皓："我了不起三两天就回来。"

我被拉到建国中路原来法国租界的水牢处。一间房，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烟灰缸，可是没有烟。把我带进去，问我：

"你看可以吗？"

"可以。"我答。随后门就锁上了。

（1985 年 4 月 4 日、1986 年 11 月 11 日与李辉的谈话）

耿庸一关便是 10 年零 10 个月，等他出狱时，妻子王皓早在 1957 年投黄浦江自杀了。

十

上海，5 月 17 日，何满子——

何满子与《七月》、《希望》没有任何联系，与胡风也不熟悉。胡风因听阿垅讲过何满子当年到过延安，却又离开了那里，为此，他对何满子颇有微词，也不乐意与何满子来往。

与上海的贾植芳、王戎、耿庸等人，何满子倒是过往甚密，40 年代在成都，他与卢甸关系也较密切。但对胡风批判一下子牵扯到自己入狱，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何满子回忆：

5月13日舒先生所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感到了一点紧张气氛，但我自感即使有事情，也牵连不到我。15日，星期天，王戎到我家，十分紧张，说他已作交代，劝我也交代和“集团”的关系。我说我与“集团”有什么关系？他说，他是奉了吴强（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之命来叫我交代的。我未予理睬，这是第一个预兆。

但我仍然觉得无论如何牵不到我，当时我住在利西路44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几家人共住，有电话。星期一（16日）我外出回来，邻居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姓吴的，打电话来，约我去一谈。我心里就料定是吴强，心想素无来往，要谈，他可来谈，他有的是车，何必要我去。当即打了电话去，吴不在，托接电话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请他来。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这是第二个预兆。但当时仍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

次日晨7时，我刚起床，全家也都正在梳洗，门外有敲击声，我小女儿的奶奶开门。进来的是两个便衣，未等我问来意，就问我名字，宣布：“你被逮捕了。”我一怔，问：“犯什么罪？”来人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一人说：“去了就清楚。”于是取出逮捕证，是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接着用手铐将我铐上。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人，警服，将我带出；那两个便衣留下（以后我才知道两人是在我走后进行搜查罪证）。

门前停一辆小汽车（花园内的门，不是栅门外），我被拥进车中。其中一个警衣者再上楼去交代（或请示）了片刻，下来后才开车。车出门外，总算去了手铐。

车子东转西转（这是特意如此，不让我知道所去的地方），大约开了至少一个半钟头，才又在一条马路上停下。从一个小门中把我带进，我看手表，其时已近10点。

进入一间过道式的房子，命我坐下。引来一个人，问我早餐否？我说没有，也不想吃。其人说：“我们对犯人也讲革命人道主义，饭你要吃。”进去张罗了一下，端来一碗面条。

这时，人们大概在办什么手续，决定关押在什么地方之类。大约11时，才又由押我来的两个警衣人带出，乘原车到那个房子附近的一幢楼房，由大门驶入。在一间办公室，命我将身上的钱、笔、手表、皮带、鞋带，一律取出。开单，命我点数签字。我还点什么，签字就是，接

着就被关入一间单身小房,有地板,但无光,整天开电灯。并给了毯子和被子。

我的牢狱生活从此开始。下午,我从要香烟的声音,听出耿庸就关在我里边的一间中。我在此屋关了三天,才开始提审,而且换了一间有两三个案情不同的人合居房间,以后不断换房。后来知道关的地方是建国中路卢湾区的公检法办事处(公、检、法联在一组房里)。

(1988年6月致李辉信)

十一

上海,6月8日,王戎——

和其他人不同,王戎最初喜爱舞台艺术,参加过左翼剧团的工作。他和胡风熟识的程度,远比不上和夏衍、阳翰笙等人的关系。

王戎只是高小毕业,以后全靠自学写些评论文章和诗歌。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讨论话剧《清明前后》时,王戎写出被认为反映了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从〈清明前后〉说起》,交由何其芳发表。从此,他便与胡风牢牢连在一起了。1949年何其芳重提国统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时,就一再点到王戎的大名。

可王戎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胡风"一伙"的,只是在性情上,与上海的几位朋友更为接近。至于为什么会被捕,他始终也不明白。

王戎回忆:

关于我的被捕,那是1955年6月8日,30年后的这个日子,恰好是胡风先生去世的一天。自从第一批材料刊出后,我自知不免。我的妻子也已不上班,据说是她的领导要她在家安慰我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那是为了看守我,怕我逃跑或自杀。

6月8日上午大概10时左右,我们所的人事干部笑吟吟地从楼下到我的卧室(我住三楼),说有个问题请我到办公室去一下,当我跟她走进办公室时,只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立即分站我的左右,低声说:"你就是王戎吧,你被捕了,我们给你留面子,不铐你,你跟我们走,不要声张。"我那时只穿一双拖鞋,赤着脚,因此,我要求上楼穿鞋。



与胡风遗体告别后，梅志在大儿媳和二儿媳的搀扶下走出整容室，站在她左边的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王戎。

但没有被允许，只说：你很快就回来的。就这样强制的一前一后把我带进停在大门外的吉普车上。

我先被带到附近的江宁分局（我住江苏路武宁路市西女中对面的花园洋房三楼，那里现在是上海乐团了），注销了户口，然后把车子开到建国西路。当时我以为是把我送到思南路看守所，然而不是，车子到了卢湾分局隔壁一个大院子停住了。那个地方外面没有招牌，不知是什么地方，只在这时，他们才说，现在要委屈一下，戴上手铐，我顺从了。下车走了进去，在一间屋子里，一个被叫做管理员的人把我的衣服里的东西包括皮带全抄了去，然后说，从现在起，你就叫1068，不能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能说你的案情。听他这一说，我一阵酸楚，因为我没有想到我活到今天，连自己的姓名都丧失掉，只剩了一个1068的号码了。

（1988年6月致李辉信）

十二

杭州，5月21日，冀汸——

在阿垅的笔下，冀汸是这样的形象："斐多菲的脸型，亚热带的性格，热情，然而蕴蓄。鬈曲不整的头发，排列不美的牙齿，隆凸的额和深陷的眼睛对称，突然会射出明亮的光来，细看，光又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常常的，庄严的一脸怒容；这种怒容是

很单纯的，但是是坚持的，有的时候显得仿佛悒郁了似的。这种单纯，往往为朋友们所奇怪。一种单纯的认识，常常作为他底激怒底尺度，而且能够被他保持得很久。”

冀汸的怒容也许不常见，常见的是他的固执。1949年后，他的诗，他的长篇小说，被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批评过，可他从不肯检查，组织上做工作让写检讨，可他依然如故，不予理睬，似乎悒郁、怒容之外，更有一种傲慢，那是对批评的蔑视。

在写“三十万言书”时，在批判全面展开时，冀汸与胡风的通信从未间断，作为浙江省文联创作组组长，他可以反映许多文艺创作上的实例，还有，他的苦闷和忧虑。

5月21日前两天，冀汸的妻子住进了医院，为他又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降生此时，仿佛注定与灾难一同来到这个世界。

冀汸回忆：

5月21日以前，我就被勒令隔离审查，那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因为我爱人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就允许我每天晚上回家照顾一下刚刚几岁的儿子。

21日这天，机关来了一个陌生人，文联秘书长介绍说：

“这是省委文教部的杨处长，为了你能好好交待问题，给你安排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你现在就去。”他转过身又问杨处长：“什么地方？”

杨处长回答：“浙江旅馆。”

我说：“我回去先和保姆讲一下，再带点钱。”

“不用了，你先去吧，去了再说，车在外面等着。”

我什么也没能带，自行车留在单位，孩子扔在家里，爱人住在医院，还有一个刚刚几天的孩子，我就上了停在外面的一辆吉普车。

把我拉到了浙江旅馆，安排一个房间，一会儿，走廊上又出现不少年轻人，他们都住在左邻右舍。

杨处长把我送到房间，对我说：“别的不要顾虑。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舒芜的材料，人民日报也是毛主席的意见，你应该把问题讲清楚，与胡风有什么来往，有什么交待什么，不要存任何幻想。”

“你认识李浩吗？”他突然问。

“不认识，我只认识一个叫王浩的，是我复旦大学的同学。”我答。

“什么地方人？”

“南京。”

“你有事可以和左右的人打招呼。”这时，我发现走廊上的年轻人，把戴着的省人民政府的胸章都摘下了。

我提出要求：1.拿换洗衣服；2.拿点钱来，要买烟抽；3.通知住在医院的妻子。

他走了，对我的审问马上开始。来了一个山东人，说他是公安局的。

我一口咬定胡风问题是文艺问题。

审问者说：“不是，是政治问题。”

“为什么是？”

“你们是用文艺问题打掩护。”

他又问：“胡风是什么人？”

我说：“是诗人，是作家呀。”

“你这个认识现在跟不上形势了。惟一的出路是讲清楚。你知道傅作义起义吗？舒芜也是起义的，你起义是来不及了，不过投诚还不晚，给你一个机会。”

这时，一位记录员偶尔叫了他一声“李科长”，我想，他可能是杨处长提到的“李浩”。

审问没有结果，来了一些领导劝说，我还是没有想通。于是，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看守将我推醒。

“起来，给你换个地方，把东西收拾一下。”

“换个房间？”我问。

他们不回答，只是说带我走。

已是下半夜了，一辆吉普车把我带到了小车桥监狱，真正的看守所。李科长说我把投诚的机会也错过，现在正是到监狱争取宽大的机会。

（1986 年 11 月 7 日与李辉的谈话）

十三

北京——南京，5 月 19 日，化铁（刘德馨）——

第一次见到胡风，是在重庆胡风家中，那时化铁只有十几岁，在那之前，他已认识了阿垅、路翎。

化铁的诗很快获得胡风的赏识,《希望》上屡屡可见他的名字,阿垅写出《化铁片论》,极力推荐化铁,称"他有着拥抱人类的巨心,他有着突入理想的强力……"

胡风酝酿撰写"三十万言书"时,化铁和南京的欧阳庄一样,积极帮助收集基层文艺情况,虽然,他不在文化部门工作,而是一位南京空军的气象参谋。

5月13日,化铁正好在这一天离开南京,到北京参加空军气象会议。在火车上,他看到了发表舒芜材料的报纸,自己买上一份。他想到的,只是对胡风的批判又要升格了,会更加严厉了,但并没有和自己的命运挂上。没有预感,没有准备,只知道自己是无罪的,是忠于党和毛泽东的。

化铁回忆:

到北京后,开了两三天会之后,一天晚上,大概是5月19日,空军保卫部来人把我叫去,把我带的枪先卸下来,通知我回南京。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只能把你带到南京去。"

二三十年后我才听说,当时南京公安厅到南京空军抓我,空军不给人,说公安无权抓空军的人,还认为我不是反党分子。后来可能被说服了,同意抓我。

因为我带着枪,就派了不少人将空军大院给包围住,翻墙进我的宿舍,谁知扑了个空,他们这才知道我到北京开会去了。于是,他们赶紧通知北京,让火速押送我回南京。

我被押上了火车。从卸枪后就给我戴上了手铐,在火车上,不知怎么回事,手铐坏了。押送我的人便到餐车借铁丝把我的手拴上。后来餐车上的人说铁丝捆手容易把手弄断,这又找来绳子捆住,比起戴手铐,这下子更难受了。

我还是挺要面子,总怕有人看到我戴着手铐,所以一上车,我就宣布,拒绝喝水,吃饭,目的是免得上厕所。

火车到南京后,由一辆小轿车把我拉到省委招待所,就在玄武湖旁边。我关在二楼,由6个人昼夜轮流守护。我住得还挺不错,一个人关一个套间,还有卫生设施,吃中灶。

两天后,将我移交给公安部门。

出示逮捕证是11月份的事了,到那时,被关进了真正的监狱。

(1986年1月14日与李辉的谈话)

十三年前，1942 年，化铁写了他最早的诗歌《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胡风把它发表在《希望》上。

年轻的他吟唱着——

风走在前面，前面。

十四

南京，5 月 16 日，欧阳庄——

在《七月》、《希望》上找不到他的名字，但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他频繁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为三十万言、为胡风出谋献计，自然逃不脱眼前的灾难。

生于苏州的欧阳庄，14 岁时当学徒，在苏州文心图书馆开始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转到南京，参加了地下党。正是一位地下党员的介绍，也才知道了胡风。

路翎的话剧《云雀》在南京上演，欧阳庄给路翎写信，两人结识了。

欧阳庄成天和机器打交道，却又喜爱文学，他和化铁一起办起《蚂蚁小集》，不定期在南京、上海出版，刊名多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想尽办法让杂志具有政治色彩。有一期刊物，他以冀汸的诗《迎接明天》为名字。他特地将“迎”的“印”部分，设计成共产党的英文字母缩称：CP。

他忘不了入党介绍人对胡风、路翎的推荐。那位姓唐的党员，后来经欧阳庄联系，躲避搜查，辗转到了刘邓大军中当随军记者，牺牲在大别山区。

欧阳庄读到第一批材料时，正担任南京下关电厂的党支部书记。他很年轻，只有 26 岁，没有结婚。

欧阳庄回忆：

> 那天早上，只有 5 点多钟的样子，我听见有人敲门。
>
> 起来开门一看，是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位副局长，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
> 副局长没有介绍那个人，只是说：
>
> “组织部部长要找你谈一谈。”
>
> 我马上警觉到是和胡风问题有关，不然怎么会大清早把我叫走，再说，定好那天上午要去局里开会的。
>
> 我问“是不是谈胡风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要是谈胡风的问题,我这儿还有一些信,要不要也带上?"你看那时候,我该多好呵!

"不用。"

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也用不着和谁告别,就跟着他们上车走了。

车开到玄武湖旁边一个两层楼的房子前,把我带下上了二楼,一会儿,楼下就到处站着人了。

坐下来后,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递了一封信给我们的那个副局长,我也要过来看,上面写着:你们单位的欧阳庄有严重政治问题……信记得是组织部写的。

副局长什么也说不出。我掏出身上的笔记本递给他,交代了工厂最近的一些工作安排,请他代为处理。

从此,我失去了自由。一关就是十年多。

(1986 年 1 月 14 日与李辉的谈话)

1982 年,欧阳庄结了婚,这一年,他 53 岁。

十五

天津,5 月底,鲁藜——

若论亲友关系,与毛泽东,鲁藜还算有点联系,他的妻子王曼恬,和毛泽东是比较近的亲戚。和江青,鲁藜也是相识多年的朋友。30 年代在上海时,鲁藜和江青同在一个地下党组织内活动,有时鲁藜还在晚上,陪江青去排戏。自那以后,他始终尊重江青,到延安后,也是如此。

有这与众不同的双重关系,也无法使鲁藜避免磨难,倒是他的妻子后来在"文革"中,成为天津通天人物,炙手可热的第二书记。

鲁藜回忆:

我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是记忆力最薄弱的,也许因而比一般记忆力强的人产生另一个优点:多大的苦痛也很容易淡忘。

1955 年被捕时的情况实在模糊得很。如果当时也在场的王曼恬今

天尚在，她会提供很具体的情状的。那天可能是她的休假日，没有去女中上班，呆在家中同我在一起。

我自有毛主席按语的关于胡风第二批材料发表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同胡风集团的问题已经提升为政治问题了。我的情绪一直处在低沉与紧张状态，整天同我的妻子默默无言相对，深感到我自青年参加党之后每次被组织怀疑时的内心痛苦。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曾经发生过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我也是被清洗者之一。这次是在党的执政之下，全国性的肃反斗争运动，来势甚猛，深感个人命运没有保障，孤立无援。因此，连我的妻子也不可能相依为命——昔日我在旧中国地下斗争时，尚有群众或亲人可以依靠。我曾有在1934年受到被捕的经验，后来又受到缉捕而逃亡的经验。而今天，我只能枯坐在我的书房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了。

那天，当我市当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江峰同另一公安人员进来，向我宣布逮捕令时，我并不震惊。我很平静地对着我的妻子说："如果我是反革命的话，你可以作证，我比任何当代的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去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不利用我的妻子同毛主席的亲戚关系。"(这是我今天记得的大意，原话已经记不起来。)

我记得我的妻子是出乎意料地含着惊讶的泪光。而我却悻悻地走了，觉得太冤枉了，专政太多疑了。我大概记得我当着一些作协的旁观者说："这也是生活！"

(1988年5月给李辉的信)

鲁藜入狱后的第一个打击，便是妻子在外面一次大会上宣布已与他离婚。他真的开始孤立无援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十年里，他胸中再也无法涌出歌颂、赞美的诗情了。

十六

武汉，5月16日，曾卓——

和胡风的关系，曾卓谈不上密切。40年代在重庆，曾卓和邹荻帆等人一起创办复旦大学的诗刊《诗垦地》，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曾向胡风投稿，却不为胡风满

意,认为他的作品中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所以,1949 年以前,曾卓从不被人们视为胡风派的成员。

到了 1953 年第二次文代会,曾卓和胡风的来往渐渐多起来。在那次会上,他们有过几次长谈。曾卓看到胡风的情绪非常激动,对文艺界冷清的现象,也有些幸灾乐祸。同时,曾卓还感觉到胡风有点盲目乐观,政治上也不太成熟,显得幼稚。

一些朋友建议曾卓多和胡风谈谈,劝他冷静一些,曾卓没有再去成,至今引以为憾。

1955 年时的曾卓,刚刚 32 岁,是长江日报社副社长、武汉文联副主席。

5 月 15 日,曾卓晚上刚要出去观看外国团体演出,市委领导李尔重来到家中,留住谈话。关切地问曾卓:"你和胡风究竟是什么关系?"

5 月 16 日情况就变了。

曾卓回忆:

> 5 月 16 日晚上 12 点,有人敲门,来的是报社的一位副社长,通知我到社长李致的房间去。
>
> 我到了那里,看到满屋子都是人,有好几十个,有李尔重,公安局副局长等,旁边还有做记录的。
>
> 由公安人员发问,说我是胡风分子,这次不能混过去了,得好好反省交待。由于我在市里人际关系还不错,对我还比较客气。
>
> 我被留在了李致房间,在那里开始反省,家也不能回了。在反省期间,我写了好几份材料;和胡风的关系、和绿原的关系,还有自传,写好后交上去。
>
> 一天,李尔重深夜来找我,说:"人一生能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你的反省材料口气语调还是不对,没有反对胡风。"他很关心我,委婉地劝我早点过关。
>
> 6 月 10 日,通知我从李致的房间,搬到报社宿舍去。我不肯搬,让叫李尔重、李致来。我提出两个条件:一,背后不能有人跟着。那时还是有点顾面子的。二,让我带一批书。我的要求满足了。
>
> 搬到宿舍住下,晚上洗完澡睡觉,还没有入睡,有人敲门了,这时是 12 点。
>
> 门一打开,进来几个陌生人,说:"曾卓,你被捕了。"我一点儿不吃

惊,跟着他们走了。

(1986年11月6日与李辉的谈话)

曾卓在诗集《悬崖边的树》的代跋《从诗想起的……》里面回忆:

1955年5月16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6周年。我的生活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而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景只能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怀念和担忧。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

后来,曾卓在60年代写出一首著名的诗《悬崖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坚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第十章 风暴袭来之后

一

逮捕在悄悄地、隐蔽地进行，只有极小范围的人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绝大多数人们面前，在一切真诚、单纯的人们中间，批判、控诉的闹剧也在庄严地上演着。

一明一暗，一正一反，都以各自的内容，各自的形式，丰富着这一段历史。每一个卷进这场历史大剧中的人物，或悲或喜，或积极参与或消极卷入，无数条散漫的力，一旦汇集一起，那便拧成一道巨大的力，将历史牵向未来。

每个人都在创造着这段历史，历史又会将同样的印痕深深烙在他们未来的命运上。

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全国性的、升了调的批判、声讨便随之展开。5 月 18 日，《人民日报》以二、三两整版的篇幅，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内容主要是批判胡风的“假检讨”，“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文章提出，应该尽早撤销胡风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各项职务，并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一主张，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文艺界集会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上海率先召开群众集会，因为这里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5 月 20 日，上海文化界举行大会，参加者有 1400 多人。大会由巴金主持，先后有张春桥、陈望道、金仲华、姚文元、孙峻青、吴强等讲话。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几位教师联名发言。由于胡风一贯敌视党和人民，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他从革命阵营中清洗出去。他们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转达原选举

单位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同时向中国文联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全国委员职务，向中国作协主席团建议，撤销胡风的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委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

1000多人举起了手，一致通过这一建议。此时，胡风早已关进了监狱。

5月22日，杭州文艺界集会。

5月23日，重庆文艺界集会。《人民日报》特地指出：重庆是“胡风反党集团”“盘踞”多年的地方，“不少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受了他的欺骗和毒害”。

同一天，成都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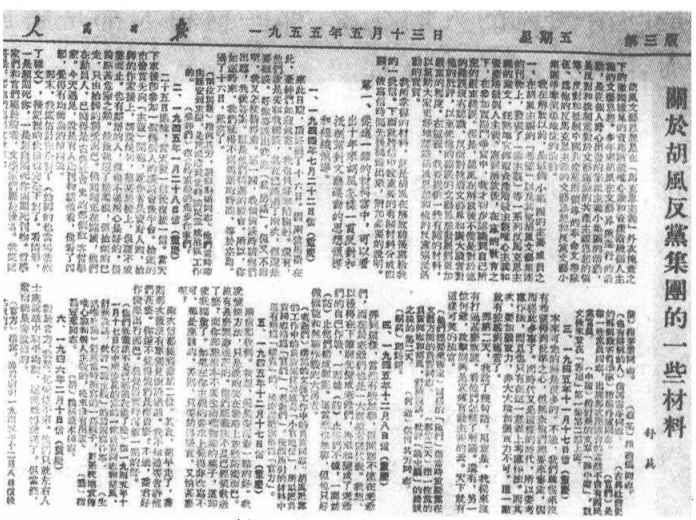
同一天，沈阳市文艺界100多人集会。

还是这天，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十多位负责人，联名给中国文联写信，建议把胡风从文艺界队伍中清洗出去。在他们笔下，胡风被冠以“一个无比丑恶和十分卑鄙的角色”。

文艺界之外的读者，也被舒芜的“材料”勾画出的胡风形象激怒了。仅5月14日到5月24日，《人民日报》便收到了将近800份来信和来稿。工人、士兵、学生、职工，都以神圣的姿态，开始参加这场批判。套用两年后那句名言：我们工人发言了。

一位徐州电业局的工人来信说：“胡风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他和他的集团，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打击党和进步力量，大喊大叫不要向党‘妥协’，像这样的家伙，我们还能跟他磨牙吗？还能让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不能，绝对不能！”

一位石家庄汽车修理厂的工人来信说：“过去我们只知道胡风是一个有名的文人，读了舒芜揭发的材料，才知道胡风是阴谋分子。我们原来被胡风欺骗了，当我们看穿他的可耻勾当时，我们真是愤恨极了。我们工人，夜以继日的紧张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而他却暗地里在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是决不能容许的，我们一定要弄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底细，


人民日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星期五 第三版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
舒芜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批材料”。

清除这群毒蛇!”

他们虔诚地相信报上的一切,他们的心中容不得一丁点儿对自己热爱的党和事业的玷污。他们不需要自己的思考和了解,也无从去思考和了解,在他们心中唤起对一伙“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是轻而易举的事。

虔诚、神圣、热情,一起汇向这里。

二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1955 年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又一个高潮,在 5 月 24 日掀起。

这一天,《人民日报》又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时,仍定性为“反党集团”,至于“反革命集团”的最后正式定名,是几天之后的事了。

第二批材料,全部是胡风在 1949 年以后写给朋友们的信的摘录,依编者按所说,集中收这几年的信,是因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报上发表“第二批材料”时,除一头一尾的按语外,中间并无按语。后来出书时,毛泽东在第 43 号、第 58 号两封信后,又新增两大段按语。

第二批材料,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胡风对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1. 胡风采取种种手段,“联络人”,为他的集团的分子安插活动地

盘，指挥他们的活动；

2.胡风和他的反动集团使用阴谋手段，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3.胡风派遣他的集团的分子打进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分子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1.胡风指挥他那个反动集团的分子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攻击《文艺报》，企图达到不准批评胡风的目的；

2.胡风指示路翎用狡诈手段欺骗领导同志，并掩盖胡风集团的真面目；

3.胡风动员他的反动集团的力量，准备向党进行疯狂的进攻；

4.胡风在疯狂进攻中的布置；

5.胡风在进攻后布置他的反动集团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从胡风的68封信中，整理材料的那些人，便分别归成了这样几类，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审定，以这样赫然醒目的面貌，出现在几亿读者面前。

暂时无法一一考证每封信的真伪，删减的用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信中私人间毫不顾忌的情绪发泄，与令人不寒而栗的归纳联系一起，是不会太费事的，何况面对着的是虔诚、热情的人们。

这些材料中，有的引用却是显而易见的“错置”。

第19号信，称为195x年6月16日给冀汸信，摘录有：

> 杨某之流，如小女人，无法当作人看待的。一篇关于曹禺的文章，就想当作飞黄腾达的资本，《希望》上登了吕荧的文章，从此就结下了血仇。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这封信并不是写于195x年，而是写于1946年的6月16日。信中被省去的内容为：

稿及信都收到。

嗣兴来住了四晚,刚才回南京去了。

〔材料引用部分——引者注〕但那《文艺信》,如有,不妨寄来看看。

长篇写完了,就好好整理吧。好在靠学校复员,事前不必有什么奔波的。

二期明后日可达。

处境无是处,疲乏得很。

对于此信,冀汸后来注明:

1.这封信写于1946年的上海,当时我尚滞留四川,等跟着复旦大学"复员";

2.杨晦先生在《青年文艺》第六期发表《曹禺论》之后,吕荧在《希望》第一集第三期发表了《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蒜》一文,批评了杨先生的论点,艺术理论上商榷,本来是正常的。杨先生对此则颇为不满,啧有烦言。我给胡风先生寄诗稿,附信中谈及自己的长篇小说《走夜路的人们》已经写完,顺便说到抗战后期他在重庆近郊赖家桥时,曾与杨先生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似不必弄得过于紧张。胡先生的回信写了上述一些话。信中用语对杨先生的确有不逊之处。

3.然而,第二批"材料"摘引这封信时,把写信时间移后到"195×年",变成解放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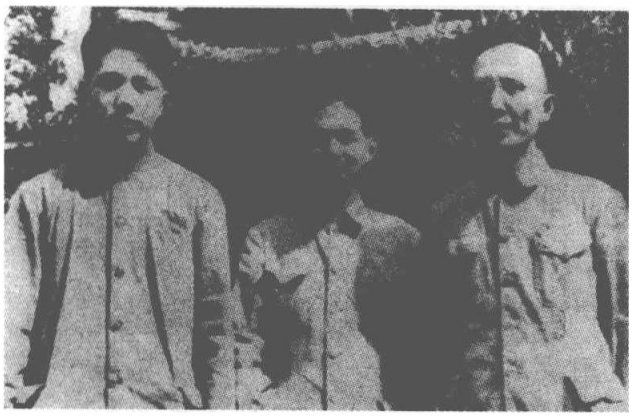
(原信及注明均由冀汸提供)

错置也好,嫁接也好,目的只有一个,证明胡风及其朋友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整理者,认认真真地在做;读者,认认真真地在看;惟有那一封封信,再也无法认认真真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了。

三

人们提出的撤销胡风在文艺界一切职务的建议,在"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



周扬(左一)与郭沫若(右一)、茅盾在全国文代会中的合影。

天就确定了。

这一天,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又一次召开联席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文联主席团和各协会的负责人郭沫若、周扬、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郑振铎、冯雪峰、老舍、田汉、洪深、江丰、吕骥、马思聪、戴爱莲等700多人。

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完全可以推测,他的讲话精神是来自毛泽东的。

郭沫若说到:

> 反革命的坏分子,到了今天依然在猖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1949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有许多坏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了人民的坚决镇压,有些坏分子表示愿意悔改,经过五年多的教育之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改造了过来。到了今天,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内部破坏,这是怎么也不能容忍的。
>
> 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700多人以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一项郑重的决议:

>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
> 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

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38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已经被逮捕将近十天的胡风，这样一个决议，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对于其他先后陆续入狱的人来说，决议也不过等于一张白纸。文艺已离他们远去。

在文艺天地里滚爬二十年，对文艺曾是那么钟爱的胡风，如今，被文艺唾弃了，被他所相识的或矛盾重重或友情切切的文艺家们唾弃了。

二十七年后，胡风被恢复了文联委员、作协理事的职务，此时，距生命的终点，他只剩下三年的行程。

四

有个人端坐在700多人中间，如果他和所有人一起鼓掌，一起举手，人们也许永远不会注意到他。可是，一旦他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如果他发出与集体不合谐的声音，那么，他就会被人牢牢记在心里，哪怕十年、二十年也会记得那一片刻的他。

新华社报道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这个与700多人不同的人——吕荧。

“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5月13日“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曾经和胡风关系密切的吕荧，不知为什么，没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单，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还发表了一篇《评〈明朗的天〉》的评论文章，分析曹禺的新作的优劣。

5月25日，吕荧来到了会场。

将胡风的问题，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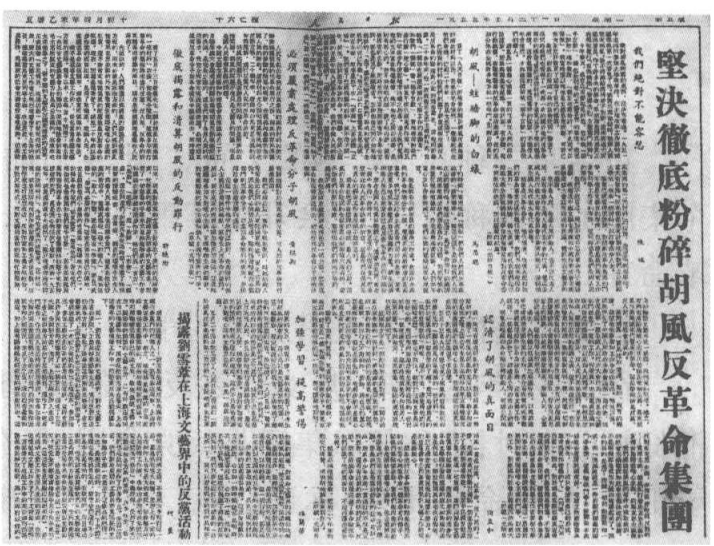
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

吕荧与胡风开始联系,早在1937年初。当时胡风编《工作与学习丛刊》,收到了署名倪平的青年的来信,倪平便是吕荧。吕荧给胡风寄来了两篇文章:《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田间与抒情诗》。吕荧在信中开头写到:

> 当你接着这两篇东西的时候,因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举动,你会感到惊讶吧?
>
> 你是不认识我的,也许还是第一次看见我的名字,不过你的论文对于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学修养使我感触到一种亲切的印象,并且使我决定了这个突兀的举动。
>
> 这两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无情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我相信,你是不至于使我失望的。

胡风没有使吕荧失望,两篇文章虽然因丛刊被查禁未能及时发表,但胡风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几年后,分别发表在《七月》上,而两人从此也就成了文学上的好友。

在朋友们眼中,吕荧书生气十足,又是一个孤傲的学者。对任何事情,他总是依着自己的性子。同时,他又迷恋于书,迷恋于文艺理论。1949年后,吕荧开始在山东大学教书,后来《文艺报》发表了学生来信,指责吕荧的文艺理论是误人子弟,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再也不回大学,纵使校长华岗亲自给胡风来信请胡风说服,吕荧依然不回。1952年,舒芜在"反戈一击"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吕荧的名字。



195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了陈垣写的"坚持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文。

冯雪峰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吕荧到了北京,在出版社任高级翻译员,这时他年过四十。胡风全家1953年搬到北京后,他便成了胡风家中的常客。在梅志的印象中:"他比过去显得更为古板了,学究气更重了。他在我们家聊天,很少有开怀畅笑的时候,只有文文

静静地说点什么,他年纪并不大,但看去已没有了青年人的朝气,成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学者。”

“老成持重”的描述,绝对与5月25日的吕荧挂不上号。

这一天的会上,有二十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这时,吕荧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词地说:

“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

他的话未说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大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地为一个正受到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

于是,喧哗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斥责、咒骂,人们轰他下台。

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将他一把拉开。在700多人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

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

十几年后,在“文革”中,吕荧被捕入狱了,罪名是持刀威胁革命群众。

那把刀是水果刀,他正用它削苹果。

他死在狱中,无法看到他为之辩护的胡风后来终于平反出狱。

五

正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三十年后的人们,面对1955年5月出现的对一个集团的不同称谓,也许会郑重其事地像语法分析一样,去辨析一下“反党”和“反革命”的差异。

真要是这样,那只是书斋里的学究气。

在1955年的中国,反党即是反革命,是毋须区别的。所以,第一批材料、第二批材料公布时,都称胡风集团是反党集团。但在许多批判文章和新闻报道中,又屡屡出现“反革命集团”的称谓。最后将罪名确定为“反革命集团”是在5月底。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以整整四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自此,基本上不再出现“反党集团”的字样。

为何开始称为“反党集团”,最后定名为“反革命集团”,是因为胡风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因为“反革命”比起“反党”,更具有广泛的政治含义?不管如何,一个因信件为罪证而定名的“反革命集团”,从此,便深深刻在了中国当代史上。

短短二十天,仅仅两批材料,全国对胡风集团的愤慨便被激发出来。决策者再一次显出他的英明,纠缠不休的理论问题,无论如何不会引起千百万人的注意。它深奥,它仅仅是文人间喋喋不休的争执。而政治问题,却是每一个人关注的。刚刚以饱满的热情和虔诚崇拜步入新时代的人,对于“反党反革命”的憎恨,那是一堆干柴,一点即燃。

文化界的集会,到6月初,已经蔓延到社会各界。

6月4日,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2000多人集会,指出:粉碎胡风及反革命集团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绝不仅仅是文艺界的事,它带有全民性,工会组织和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不能处在旁观的地位。

6月6日,青年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举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动员大会,1900多人与会。

6月7日、8日,各民主党派也行动起来,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以及工商联纷纷集会。

全国各地声讨集会,同样纷纷召开。

仅6月8日这一天,许多城市同时开会。保定,13000多人集会;郑州,1700多人集会;西宁6000多人集会;内蒙古5000多人集会……

似乎为了证明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在报道声讨胡风集团的消息时,《人民日报》有意识将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的活动报道安排在一起。6月8日报道青年团中央等单位的集会,紧挨下方发表一则消息:美国和蒋贼训练“特别部队”,企图武装骚扰我沿海地区。6月9日报道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声讨大会,紧挨下方发表一则消息:蒋贼飞机扫射福建海面渔船,打死打伤渔民七人。

版面上的组合安排,正是反映了报纸背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工作。这时,第三批材料已经整理出来,6月初即排印出清样。这批信比起前两批有了很大不同,毛泽东等人在一些认为重要的信后面,都加上了按语,达19处之多。更有分量的是,这批材料将证明,胡风集团早就与蒋介石特务有密切联系,有的人本身就是特务。

难怪从胡风处搜到的绿原致胡风的一封信,会格外引起整理材料者的重视。

绿原这封信写于1944年5月13日: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的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底战术。以后我觉得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这封信真是绝妙的证明，无须找狱中的两人核实，无须了解绿原根本就没有去成合作所，而是逃离重庆的历史事实，只要能进一步证明胡风集团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就足够了，一切都是多余。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

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在最初排出的第三批材料的清样上，并没有绿原这封信，6月6日新补上去。

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众，对胡风集团的定性正式明确下来。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强调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

> 今天本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进一步证明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
>
> 现在，胡风集团的假面目已被完全揭穿了。胡风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现在大体有了眉目。可以说，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就是这个集团的基本骨干。

胡风和朋友们，再也不是诗人、小说家、理论家了。这山一样沉重的“判词”，牢

牢压在他们的头上，任人们控诉，唾弃。此时，他们已无法申辩；纵能申辩，又管何用？又能改变现状吗？

第三批材料分为六类：

一、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联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衷心拥护或者积极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他们妄想"肃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

二、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三、胡风分子千方百计打入共产党内，取得党员称号，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报告胡风，向胡风表示无限忠诚，对党采取欺骗手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

四、胡风集团从他们的反革命立场和反动"理论"出发，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五、胡风集团分子异口同声地用种种恶毒的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

六、胡风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第三批材料中的十九条按语，已经明确为毛泽东所写而收入《毛选》五卷的有六条，其余部分，"文革"中也都作为他的文章看待。实际情况可能是，有些按语整体并非毛泽东所写，但肯定由他终审、修改才予以公布的。

在毛泽东那里，张中晓格外为他重视。其原因，显然是张中晓在给胡风的信中，总是对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极为不恭敬甚至贬低。

张中晓1951年8月22日给胡风的那封信，在材料中列为第41号。这封信后加了一大段按语，是批判、反驳张中晓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攻击。这按语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但也是他首肯的。

材料的最后一封信，还是张中晓的一封信，按语则是毛泽东所写：

按：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举行分组会议
討論國家的決算和預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分组讨论中发言
√要求徹查潘漢年和胡風的罪行
印度任命拉·庫·尼赫魯爲駐我國大使
北京、天津、重慶、西安、武漢各界人民
√擁護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漢年胡風

文革期间，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要求彻查潘汉年和胡风的罪行”和“拥护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的两则消息。

张中晓后来死于“文革”中。

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便开始了。《人民日报》6月13日的通栏标题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6月18日，报道吉林逮捕一批“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7月19日，公布了已将胡风逮捕的消息，同时公布的，还有将上海市原副市长潘汉年逮捕的消息。

胡风被捕的消息，马上引起了外电的注意。路透社7月17日发出电讯：中共新华社今日声称：被指为领导一个“反革命派系”的作家胡风已经被捕，并将受审判。

台湾《中央日报》7月18日刊登了路透社播发的这条电讯，同时刊载了美联社关于潘汉年被捕的电讯。

据唐弢1989年回忆，1955年春天，当开始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时，他还在上海工作，曾奉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的潘汉年指示，撰写了批判文章。他说：

> 我写完《不准胡风歪曲鲁迅》（这是潘汉年要我写的，题目也是他定的，王元化以为极好。话虽尖刻，但始终从文艺思想问题着眼），即去苏联，记得是四月底，后来已是六月初，三批材料发表，已成“反革命”问题，目瞪口呆。但还是奉“命”作文，欠了许多债，内疚得很。
>
> （1989年2月12日致李辉信）

此刻唐弢仍奉命批判，只是下达指示的不再会是潘汉年。

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地位与身份本差别悬殊的潘汉年和胡风，便一下子有了相同的处境，他们被一起推到了灾难的中心。随着他们的被捕，肃反运动也由此大范围地在全国展开。二十几年后，他俩先后平反，胡风尚侥幸活了下来，潘汉年则屈死在平反前。

六

第三批材料的公布，激怒了所有关心政治，热爱共产党的人们，那些对第一批、第二批材料还无动于衷或持观望态度的人，一下子也被卷入全民性的讨伐队伍之中。

6月10日的《人民日报》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仅上海一地，当天的航空版加印七万多份，转载全文的其他各报，又多销十四万多份，赶印的《新华活叶文选》印数达二十万份。

6月20日，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收入三批材料，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初版印数即达七十万册。

这本书的出版，即是按照毛泽东的安排进行的。他还特地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撰写书的序言。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地将胡风分子同一切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

>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能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是的，胡风彻底被打败，被打垮了。信件成了文件，牢骚成了活动的策略，作家

成了反革命,他还能说出什么?胡风的兴衰,无非又一次证明,反对毛泽东,或,与毛泽东的观点相左,毛泽东所不喜欢的人,在他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胡风集团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存在着联系,新华社特地摘发了两则消息,《人民日报》于6月15日、6月30日分别刊出。一则题为《蒋贼报刊对胡风反革命阴谋败露表示懊丧》,一则题为《台湾报纸透露胡风早就和蒋贼特务有关系》。前一篇主要介绍《中央日报》一篇述评中的内容,后一篇则是介绍《中央日报》上陈纪滢的文章内容。

陈纪滢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著名文化人,曾主编过四十年代《大公报》的副刊,和许多左翼文化人都有往来。

新华社这样介绍陈纪滢的文章内容:

> 这篇文章透露了反革命分子胡风老早就和蒋贼特务有了勾结。……他的文章透露说:还在1937年,胡风就和他在武汉发生了联系。当时胡风出版的《七月》杂志中的一部分稿件,就是他供给的。1941年陈纪滢在重庆《大公报》编副刊的时候,胡风曾介绍一个编辑给他……

1970年,陈纪滢在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年代作家记》一书,其中收入了《记胡风》一文。在"接受国民党的协助"一节中,陈纪滢写到:

> 二十七年十月(即1938年10月——引者注)武汉沦陷。胡风并没有直接去重庆。他在香港、广西省桂林住了一阵子。当时桂林是西南地区的文化城,住有大批文艺界人士,前后司令长官李济深及张发奎两位将军,都是喜爱文艺,乐与作家来往的。
>
> 三十二年,胡风自桂林来到了重庆,生活相当困难。蒋委员长就命令中国国民党文化负责人张道藩及陶希圣二氏接待这一批左倾文化人,其中之一便是胡风。茅盾也是一位。茅盾曾在张道藩氏主办的《文艺先锋》上发表《清明前后》。中国国民党以种种方法接济中共作家,通过支领稿费就是方法之一。
>
> 胡风也给《文艺先锋》写过短稿。那时张道藩氏所主持的机构叫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
>
> 我清楚地记得,文运会至少替胡风办过百次演讲会,都是讲"创作

问题”。文运会借此一方面表示敬重胡风,另方面借此给他一点金钱上的补助。……

另外由我开列名单通过大公报张季鸾先生的关系,拿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由中央宣传部直接接济的作家,何止百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左倾作家或真正共党作家。因此,今天大陆上老一辈的作家。差不多都接受过中国国民党的帮助,无怪乎在文革期间,他们良心发现,写些怀旧的文章,被中共认为是中国国民党的潜伏分子。这批分子,应该说始自郭沫若、茅盾与胡风。

后来胡风被指为与国民党有关系,大体上就是指这些关系。

把胡风一下子划到国民党一边,在台湾的人们看来,也是出乎意料的。胡风历来以左翼文艺中坚人物为自豪,国民党方面的文人,也从来把他视为左得很的人,何曾想过他会一夜之间,变成了与国民党关系源远流长的“反革命”。

有一个统计材料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查扣的文艺作品原稿共有 110 篇左右,其中即有胡风、绿原、化铁、曾卓、耿庸、方然、孙钿、何剑熏等“胡风分子”的 10 篇文章,属于《七月》、《希望》送审被查扣的便有 14 篇。

1955 年 5 至 8 月,台湾《中央日报》关于胡风集团一案的报道约有 4 篇。

5 月 31 日,报道胡风“被整肃”的消息;6 月 8 日,发表述评《胡风和梁漱溟》;7 月 18 日,报道胡风被捕的消息;8 月 29 日,报道继胡风之后的肃反。

比较重要的文章是《胡风和梁漱溟》。文章说,胡风是一个共产党党员,“自命为搞红色文艺理论的‘权威’”,作者认为,所谓胡风思想,只不过是胡风“亲身历验过的”、一些反对共产党中央文艺领导组织的意念而已。说明胡风基本思想与共产党理论有多大出入,“也是一种不情不实之论”。

文章分析胡风被批判的原因主要是宗派造成的,是因为胡风和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不睦”,“这是私仇”。作者认为,胡风并无与共产党有敌对的思想存在,只是胡风在文艺界中“树大招风招致了同行嫉忌,因而有了如此悲惨的遭遇”。

台湾更有人认为,胡风不仅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本身就“左得出奇”。

台湾 1970 年出版了一本《三十年代文坛与左翼作家联盟》,作者陈敬之写胡风的一章,题目就是《左得离奇的胡风》。

看看他眼中所呈现的胡风——

陈敬之认为胡风之所以一直抓住文艺写作及其活动而不松懈,其动机和目

的,显然是认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为共产党执行并贯彻其文艺政策而"献身效命"。在对党的"忠心耿耿"上,陈敬之说胡风与周扬毫无两样,在提倡革命文艺,宣传共产党的思想,鼓动青年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上,胡风与周扬也是一致的,功劳也甚为显著。

胡风与周扬的不同,陈敬之认为在于胡风在从事文艺创作及其活动的时候,"多少还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和作法"。

> 他在本质上虽然是一个比较天真的醉心于马列主义的人,但他在个人的打算上却想借着马列主义为工具,从而希图使他自己能够在左翼文坛上成为一个文艺理论的权威。

多么严酷的现实。在大陆,被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和支持者;在台湾,依然被视为信奉马列主义而"左得离奇"的人。对胡风,说不清是讽刺,还是嘲弄,反正他已无法证明自己。

七

肃反以胡风、潘汉年等人的率先被捕而在全国展开了。

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保卫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将胡风集团和另一领域正在进行的运动联在一起。

邓子恢从此也面临着毛泽东的批判。在经济思想上有不同见解的人,会遇到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之前一样的命运。

在4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传达了刘少奇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下来的当前合作化发展的方针——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在此之前,邓子恢已根据中央指示,给浙江省委发出电报。收缩了1.5万个合作社。按照邓子恢的经济思想,农村合作社应该放慢步子,稳妥地向前发展,这才符合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

毛泽东却不然,他坚持认为农民中有不应忽视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新的合作化高潮已经出现。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对自己能将中国农村尽快引入社会主义这一点,同样毫不怀疑,邓子恢的作法显然不合他意。

在将胡风打成反革命期间,写出一篇篇言辞激烈的按语的同时,毛泽东对邓

子恢的指责也渐渐升调了。

邓子恢等人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要求在1956年秋季之前,合作社总数达到100万个,在原有65万个的基础上翻半番。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消极情绪,按照他的意见应该翻一番,达到130万个。

6月下旬,邓子恢等人的意见,便受到了警告,并指责为犯了"右"的错误。

7月31日,毛泽东讲话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

>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
>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再次认定: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

毛泽东所作的这个《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全国迅速传达、讨论,本来开始压缩的合作社,一下子比6月份增加了将近一倍。

10月,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召开,毛泽东这一次点名批判邓子恢,并将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分歧,与阶级斗争联系,认为牵涉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肃反。他的发言题目即是《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以"出谣风"等等词句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他将邓子恢的农村政策,斥为资产阶级的纲领。

>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决定的。

本想认认真真做有益工作的邓子恢,本想老老实实按照农村实际发展合作化的邓子恢,从此无形中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以后的文章中,毛

泽东索性将1955年上半年邓子恢的纠"冒进",形容为"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对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决战。

毛泽东又一次胜利了。农业合作化按照他的意见高潮迭起。1955年6月,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14.2%,到1956年1月,就猛增到80.3%。1956年又从初级合作社马上转入高级社,年底高级社的农户即达到87.8%。几年前,毛泽东自己设想集体化发展需要10年、15年,现在,已被他自己的举动而缩短到两三年。虽然,1956年以后,粮食增产速度逐年下降;虽然,棉花产量1956年比1955年减产147万担,生猪减少350万头,水牛、驴、骡减少70万头。这一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热情,是理想的早日实现,是尽快进入共产主义。

高潮一旦涌起,便会不可遏制地向前涌去。毛泽东此时认为1958年春,农村人口的一半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

迅猛的发展也会改变他的设想。他会永远站在时代的前沿。他会在一年之后,发出一个号召,整个农村便以神奇的速度实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历史便这样从1955年走向1958年。

邓子恢被迫改变思想,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去贯彻他并不情愿的农业经济政策。尽管如此,后来,他被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职务。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对中央,他不止一次告诉儿女:"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但不是背着中央,更没有反中央。"

1966年8月18日,邓子恢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参加检阅红卫兵大军。他见到了毛泽东,又一次郑重建议:要允许农民私养耕牛,发展养牛业。

邓子恢没有逃脱被抄家、被批斗的命运。1969年,又被下放到了广西。当身患重病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回北京治疗时,邓子恢已接近生命的终点。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逝世。这时的胡风,已被判无期徒刑,神经开始错乱。他们都不可能回首往事,记忆起1955年发生的一切。

八

既然飓风已经卷起,枯叶和花朵都会掠向天空;既然洪流已经奔涌,泥沙和珍珠,都会搅成一团;既然不可能的事已经成为现实,美与丑、善与恶,再也无法截然相分。

1955年，历史难忘的夏日，正是一切都可能发生的季节。

胡风和朋友们，几个月前还作为文艺家在批判，一篇篇文章多多少少需要点染几道文艺论争的色彩。现在，彻底解开了手脚，批判已经过时，任何控诉、挖苦、讽刺都变得普普通通，任何手段，任何判断，任何花样，都会应运而生。而任何过去想不到的要求，也会被认为神圣而庄严。

聪明的人们，这时会充分显示这一部分天赋。

许多青年读者，从工厂、图书馆、学校等处给《文艺报》写信，控诉胡风分子的理论和作品对自己和周围人们的毒害，他们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查禁、销毁胡风和胡风分子的一切书籍。

南京人艺剧团在“五·一”、“五·四”前后上演了卢甸的话剧《第二个春天》，理所当然被视为严重事件，人们发出质问：该剧团居心何在？

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于6月出版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书末附录一个“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作品索引”，收进了卢甸、绿原、鲁藜、曾卓、张禹等人的批判文章题目。这又成为一个政治性错误。批评者振振有词：难道这不等于承认这些虚伪、肮脏而恶毒的东西还是“批判”了胡风吗？……把它们混在许许多多真正批判胡风的文章中向读者推荐，那么，在错误的本质上，和选刊出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几年前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因为肯定了胡风、阿垅、绿原、鲁藜、路翎等人的创作，也遭到了批评。批评者说，王瑶的书完成于1952年，却这样



1955年，漫画等各种批判方式派上了用场。

对待胡风等人，显然是错误的。“本书第十二章的标题是：为祖国而歌，作者就声明借用了胡风诗集的题名，可见作者对胡风的尊重到了何等程度。”

漫画派上大用场了。几乎每张报纸，每期刊物上，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漫画。

无须精巧的构思，只须丑化，就足够了。于是，画面上出现的是手执棍棒、手枪、手榴弹的胡风，是浑身挂满匕首的胡风，是率领朋友们高呼“坚决反共”的胡风。一套“自我扩张颂”的漫画，是吹大肚皮最后爆炸的青蛙，而伴随漫画的，是作者从胡风的诗中抄录出的句子重新编成的诗。

一篇篇批判胡风分子的奇文留给后人无限的回味。

胡风对毛泽东由衷的歌颂，变成了蓄意攻击。那首《时间开始了》，在批评者看来：

> “把领导人民作长期革命斗争、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发挥了这智慧和力量、谦虚诚恳、一直教导我们要作群众的先生必先作群众学生的伟大领袖，描写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个人英雄，这不明明是假借‘歌颂’之名来歪曲侮辱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吗？下面，他又用了‘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里的巨人’，‘一个新生的赤子’，‘一个初恋的少女’种种形象来比拟毛主席，实际上也就是侮辱毛主席。”（《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诗”的实质》，《人民文学》1955 年 8 月号。）

胡风 1949 年后写新人物的报告文学，在批评者看来，原来是“利用写新人物来更隐蔽地向我们党和人民进攻，向青年进攻，企图从这里也打开一个缺口，来实现他的反革命阴谋……”

鲁藜在延安时，1944 年写出脍炙人口的《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辟成一条道路。”现在，它却成了典型的宣扬个人主义的“反动”作品——

> 不论是“珍珠”也好，“泥土”也好，都是为了要把自己看成是超凡入圣的英雄好汉，都是宣扬着极其可耻的个人主义，宣扬着对于革命，对于群众的蔑视和敌视。（《鲁藜的诗——毒害青年心灵的鸦片》，《文艺报》1955 年 16 号）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如今有了更任意的批驳,小说虚构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牺牲之后,团政委将他的带血的手帕送给朝鲜姑娘金圣姬,这被斥为给读者造成一种"无可奈何的、阴暗的、绝望的效果"。批评者发出质问:

> "在自己的作品里为了对革命进攻,竟至用了这类完全捏造的,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除了对革命极端仇恨的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人能够做得出来呢?"(《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载《胡风反革命集团"作品"批判》,作家出版社 1955 年)

因一封信而成为"军统特务"的绿原,他的所有诗自然被视为"反革命的叫嚣"。他在 1949 年以前的诗中出现的对旧制度批判的诗句,如今被批判者巧妙借用,组合成讨伐他的檄文:

> (一) 绿原也自称是 "家住在青面獠牙的旷野","歌颂过一切残酷",要在"中国的黑夜里","用血洗着仇人的尸体"的这样"一条好汉"。(二)他在中美合作所去"工作"的期间,在杀人的"刑场"上,"一阵旋风","天昏地黑","脚爪系着银圈的苍鹰,在半空中飞旋",而他"微笑着"……

批判形式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批判语言别出心裁,史无前例。人们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创造着最具独特性的文体和语言,到了 1957 年反右,到了十年"文革",这一切,都会重新出现,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九

历史从 1955 年出发,通向 1957、1958、1966 年。

卷入批判胡风集团的所有人, 谁都难以意识到自己正在参加创造未来的历史,更不可能设想,或早或晚,或快或慢,或重或轻,都将踏上与胡风相同的道路,遭受自己参与创造的历史的惩罚——尤其是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们。

把胡风选为目标,动员人们抨击,在文艺界来说,恐怕没有比他更为合适的人选。这不仅仅因为他的文艺观多少与毛泽东有所差异,也不仅仅因为他与担任文

艺界领导的人们有深深的矛盾,还在于他在20年的文学生涯中,已经因为思想、性情、见解等等原因,树立起了不少对立面。

胡风善于论争,也勇于论争,更敢于批评——点名——那些他认为不好的作家和作品。除了前面多次提及的周扬、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外,胡风在文章中提到名字进行批评的人,计有数十位之多——朱光潜、周作人、陶希圣、李长之、郑伯奇、徐迟、罗荪、向林冰、郭沫若、田仲济、光未然、陈伯达、艾思奇、葛一虹、巴人、曹禺、沈从文、朱湘、蔡仪等等。在《希望》上,胡风发表的书评中,就对严文井、碧野、姚雪垠、沙汀等人的作品,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被胡风批评的人,并不是同一阵营或同一流派的作家,然而,当现在胡风大祸临头时,如果那些本来与胡风格格不入的人,积极参加这场批判,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对与胡风关系密切的人来说,却面临严峻的考验和艰难的抉择。不能说对过去的胡风他们毫不了解,但现实已认定胡风是反革命,纵然过去情谊切切,此刻,也不能不违心地作出新的举动。

聂绀弩和胡风30年代在日本一同参加左翼运动,一同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两人和两个家庭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可是,聂绀弩也卷入批判之中,而且表现得比别人还要主动、积极。一方面他到处写文章参加批判,到上海等地作报告,另一方面,私下里却仍保持着两家的密切关系。聂的妻子周颖在胡风一家最困难时成了常客。后来,在"文革"前后,他们依然关怀着胡风、梅志及其儿女们。

艾青是胡风最早予以高度评价的诗人,也是被公认的"七月派"诗人的代表。他也不得不写出应景的诗,当然不会再有《大堰河》中的才情——

最可怕的是戴着假面的人,
最可怕的是"阴暗的聪明",
看他们外表也有人的模样;
但在身体里却是狗肺狼心;
……

田间被认为是胡风一手培养起来的诗人,此刻,也不能保持沉默。他写出《刽子手》——

他的眼睛是机器，
一拉开就会滴水——
“我呀是多么的真诚，
祖国万岁，万万岁……”

他的声音有问题，
这不是人是恶鬼
……

更多的人真诚地相信了公布的一切，责无旁贷地投入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斗争。另外一些与胡风昔日无矛盾，但又不属于同一流派的作家，既然卷入风波，重要的便是保存自己，随大流漂往前方。他们不相信胡风真是反革命，但又不能不相信；他们本意不愿伤害胡风和朋友们，却也不能不伤害。身处这段历史中，以他们当时的政治热情和处境，必然是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去。

巴金是鲁迅在那封信中与胡风、黄源列在一起为之辩护的另一位作家。他和胡风私交不深，却因鲁迅的缘故，而一度站在与周扬对立的一面。由于巴金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对苏俄、列宁都作过激烈批评，虽然三四十年代被当作进步作家，但走入 1949 年后，他不得不以谨小慎微的心理接受考验。而对他存有戒心的领导人，也同样对他执有观察的态度，看他能否抛弃旧我，跟上这个时代。

巴金真诚地欢呼新时代的到来，也真诚地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承认自己一切需要从头学习，从头改造自己。第一届政协会议开幕之前，他和胡风在上海，是两个最后临出发前才接到开会通知的作家，对此，他和胡风一样，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

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埋头写作了，他主动要求到工农中间去，到朝鲜战场去，按照新的要求，去改造自己，去写为这个时代所接受、所欢迎的作品。

巴金终于获得了信任，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他的名字在沉寂两年之后，才又在报端上频繁出现。这时，他已是上海文学界的领导，顺理成章地要主持开会，批判胡风集团。他还举起手，赞同所有惩罚胡风的决议。

巴金在一开始，并不想参加对胡风的批判，但他无法躲避编辑的催稿、记者的访问；更无法摆脱那种潜在的无形压力，他害怕种种莫须有的指责会压到自己头上。于是，他表态了，写出和别人一样的文章，重复报纸上大同小异的语言。他知道

鲁迅不相信胡风是特务,却解释为鲁迅受了胡风的骗;胡风1955年2月对巴金说希望多给他提意见,巴金却说是胡风"做贼心虚"。巴金惟一的希望,是自己能以此过关。

对毫无了解的路翎,巴金因为被人催逼,也写出批评文章《谈〈洼地上的"战役"〉》,以自己在朝鲜战场的所闻所见,来指责"这里没有一点真实,这里充满了恶毒的谎言"。

30年后,经过了"文革"磨难后的巴金,反省着自己的过去。1986年,他在宣布封笔之前,写出最后一篇"随想录——《怀念胡风》。他忏悔,他醒悟,他向历史承认自己的一份责任。

巴金向胡风道歉,也向路翎道歉,更重要的是他清醒了:

> 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文艺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创造了1955年这段历史。挖井者,将人推入井中者,落井下石者……真诚者、违心者、勉强者……汇聚一起,都站到了历史的前沿。

比文艺界更为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无一例外地和作家们一道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史无前例的批判规模,各自创造的批判语言,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自己的革命。他们无法了解那帷幕后面的一切,却相信帷幕前面的一切。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对于他们,除了参与创造,别无选择。

胡风和他的朋友入狱了,肃反也开始了,批判他们的人又会被卷入新的历史创造之中。虽然一些在批判胡风时的积极者,相继在肃反中被推入逆流,如丁玲等,但更多的人平安无事,向前走去。

在批判胡风时由文艺家、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的人创造的批判样式,远远不会失去生命力,他们所参与创造的历史,也会奔涌向前。只是绝大多数人不会预料到,仅仅两年,这历史——1957年的历史——会在更多人的身上再现。

谁能解释一切?反正,历史从这里走向未来……

第十一章 1957年—— 一个怪圈

一

一年多的时间，有时显得悠长，有时显得短促。对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的胡风分子来说，这段时间，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以往平静的生活比，在狱中度日如年，悠长得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和仍在狱中的胡风分子比，和还要在狱中再呆上5年、10年的胡风分子比，先行释放的一部分人在狱中呆的日子，多少显得短促。

在1956年夏季过后，陆续被释放归来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满子、梅林、王元化、任敏、王皓、罗洛等，北京的牛汉、李嘉陵等，天津的鲁藜等，南京的化铁等，武汉的曾卓等……

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品尝铁窗滋味，虽然出狱了，但一旦回想起狱中挨过来的日子，心里总会掠起辛酸、痛苦，为此，他们会更加深切地想念仍在狱中的亲人和朋友。

北京。牛汉1955年5月14日被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修的托儿所后，一直单身禁闭。关到11月，又转至顶银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刚到关押处，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着他天天写检查、写证词。夜晚睡在床上，头顶上吊一盏100多瓦的灯泡，彻夜通明，不让睡好觉，以便考虑问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不准看报，不准看书，与外界彻底地隔绝了。

牛汉感到了孤独，他不愿意承认严酷的现实，自己从小追求革命，加入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学生运动、搞地下工作，如今却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对共产党的人。他无法想通。他为自己辩解，为朋友辩解。在关押时，写出的第一份交代，就是为绿原辩诬。他了解绿原，他绝不相信绿原是什么军统特务。他举

出自己所知的证据，说明当年绿原如何受国民党迫害，在诗中如何讴歌进步和革命。

1957年五六月间，牛汉被释放回家，继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两年关押，没有审判；释放回家，依然没有任何说明。对于他，能早早获得人身自由，已是幸运的事，谁也不会想到去深究一切有关法律程序的细节。在人们心中，没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何满子开始关在建国东路的一个看守所，后来换到上海第一看守所，他的房间号是1047。

起初不能看报、看书，1956年初，周恩来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之后，狱中情况有所好转，允许看报，生活待遇也略好一些。

最后一次审讯，没有结论。只是对他说："你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我们花了不少钱，飞机火车，总算对你了解了，这对你也有利嘛。"

1956年9月底，何满子释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

上海。王戎与何满子等都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偶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何满子、耿庸、贾植芳等人的身影。

这是一个性情梗直的人，不平则鸣。何满子的号房与王戎相邻，时常听到他和看守吵架的声音。

1956年9月，王戎被释放回家，安排到群众文化馆工作。

上海。罗洛在狱中，看到了胡风、潘汉年被捕的消息，才知道胡风也遭到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先关在一个看守所，一天深夜给转至第一看守所，和别的朋友关到一起。

1956年11月，罗洛释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后释放回家。罗洛拿到一份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上海。贾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1956年国庆节之前释放回家。

武汉。曾卓被捕之后，开始半年，生活待遇还算不错。虽然不能看书看报，却给他开干部伙食，和别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听报告。

半年之后，情形骤变，审问者的态度顿时恶劣起来，原来公安部门在四川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写有：运用通讯员曾卓400元。经手人：陈蓝逊。

曾卓承认和陈蓝逊认识，是小学同学，但在重庆从无来往，根本不存在提供

什么情报，领取报酬之事。后来公安部门查明，是当特务的陈蓝逊当时为了虚报多领钱，将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还虚报了白杨、秦怡等当时的影星。

对无辜关押，曾卓满肚子怨气，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审判，为自己辩护。自然，这只是书生之见。

他被逼着写揭发别人的材料，也给他看别人对他的揭发交代材料。他看到胡风写到："我记得他从没给我投过稿，只通过几封信。"阿垅写到："他对文艺理论从来不感兴趣。"曾卓看到这些材料，反倒从心底更感激这些朋友们，更怀念不知下落的这些人。

在狱中一年多，惟一消磨时间的办法，是写诗。先用草纸写，后被抄走，改为口吟，一首诗反反复复吟诵，牢记在心。他想象着三本诗，一本送给女儿萌萌，一本送给友人于黑丁，另一本是给儿童们的诗。

1957年3月27日，曾卓由于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第一个消息，是妻子提出离婚。

天津的鲁藜一关进狱中，就听到一个令他心酸的消息：在他抓走之后，天津开过一次大会，他的妻子当场宣布和他离了婚。实际上他并不知此事。

从此，鲁藜在狱中成了无人探望、无人关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们也不理他，连换洗衣服，也没有人送。冬天，阴冷的日子里，鲁藜没有棉衣，还是5月抓来时的单衣，只好和难友换着穿一下棉衣，或者钻在被窝里，动也不动。

可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虽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说只要承认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却反复一句话："我不可能承认。"

1957年春天，鲁藜被释放出狱，发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情节不严重，免予起诉。

一回单位，鲁藜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和妻子正式离婚。

南京，化铁；湖南，彭燕郊。

……

他们出狱了，有的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有的依然是昔日的性情，昔日的固执和坚毅。

他们都惊奇地发现，1957年的春天，中国，和他们入狱前的春天，多少有些不同。刚刚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他们还来不及了解中国，以至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更没顾得上考虑未来的岁月又将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更多的情感，维系在对仍在狱中的亲友们的身上。

在上海，王戎的家，又成了任敏、梅林、王皓等人常常相聚的地方。他们在一起发泄不满，在一起议论时事，任敏和王皓，更是各自议论起自己的丈夫——狱中的贾植芳、耿庸……

此时，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一场比1955年更大的政治风暴，也即将来临。

二

以胡风集团而引发的肃反运动，到1956年初，高潮已经过去。(对于肃反运动，因牵涉问题甚多，且与胡风集团直接联系不大，故略而不写。)

周恩来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胡风问题、肃反运动之后，第一次重点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

和前几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比，报告的基调多少呈现出松动的迹象。

在报告中，周恩来尽管也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强调在知识分子中，仍要继续肃清暗藏其中的反革命，但侧重点毕竟是如何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他甚至这样说："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下面的一番话，可能导致了牛汉、任敏等胡风分子的早释。

> 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不要把只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普通社会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如果曾经不正确地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混淆在一起，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对于只在历史上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以后确实已经改变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以后，也应该同普通的人一样看待。

3月5日，刘少奇在同周扬、刘白羽的谈话中，这样说到对待作品的批评："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

据"文革"中的材料，刘少奇在谈到有的干涉"是应当的"时，还说了一句"如

《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问题”,而没有谈到胡风集团问题。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第八部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中,他谈到为什么不杀胡风等人:

>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胡风也许可以为自己庆幸,因为上面的几条原因,他没有被杀头,保全了性命,等到了平反的日子。

这些领导人,此时无疑都在注视着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社会开始了新的转机。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由赫鲁晓夫的控诉斯大林罪行的报告,而掀起了否定斯大林、恢复列宁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潮。

无法了解,也无法猜测毛泽东此时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与苏联共产党发生分歧,不赞成完全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现象,令人深深思索的历史关联。仅仅一年前,以信件为证据,将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性质严重的反革命问题,转瞬之间,又提出了令多少人欢欣鼓舞的“双百”方针。历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两个举动之间,又有什么必然,或者偶然?

尽管宪法的条文,事实上没有阻止胡风分子的入狱,也没有对思想、文艺的自由发展,表现出些微的权威性;尽管历史后来的发展证明,“双百”方针的寿命是那么短暂,生命力那么微弱。但它毕竟如一阵春风,吹入人们的心坎,刹那间,知识分

子心情舒畅,因胡风问题和肃反而带来的沉闷和压抑,被这股春风驱散了。

"双百"方针一提出,胡风文艺思想中曾被批判的部分观点,无形中便为他人论述而证明其正确性。

6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对文艺界、科学界代表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具体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其中谈到文艺创作中的题材问题时说:

> 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文艺既然要为工农兵服务,当然要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要歌颂进步,同时要批评落后,所以文艺题材应该非常宽广……文艺作品可以写正面人物和新社会,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和旧社会,而且,没有旧社会就难以衬托出新社会,没有反面人物也难以衬托正面人物。

陆定一的提法,和阿垅1950年受到批判的观点、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五把刀子"之一"题材"问题的批评,是大同小异的。

种种大的变化,小的变异,一起呈现出不仅不同于1955年,也不同于1950年到1954年的任何一年的活泼局面。人们感觉到能够畅抒己见了,能够对过去失误的东西予以矫正了。

6月,刘宾雁在《人民文学》发表《本报内部消息》。

7月,田汉发表《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随后,11月又发表引起强烈反响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9月,秦兆阳(何直)在《人民文学》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12月,钟惦棐在《文艺报》发表《电影的锣鼓》。

1957年1月,丁玲、陈企霞为自己1955年肃反时的结论大呼冤枉,要求平反。

……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指示。

几个月里,报纸、广播、通知,所有媒介,都号召对共产党提意见,展开前所未有的大鸣大放运动。和过去历次运动不同,这次号召人们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党内,

放在领导阶层。

民主党派动起来了,知识分子动起来了,青年学生动起来了,和过去一样,他们充满着热诚,充满着真挚,自然也夹着某些激昂。

对整风运动,对大鸣大放,毛泽东依然胸有成竹。他相信自己的威信,自己的魄力,相信几年来中国越建越好,人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他的。头一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暴乱事件,他毫不害怕,相信中国"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他认为,"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就讲出了这番话。在这时的讲话中,他在极小范围里,重点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确立了战略。

大鸣大放就这样全面展开了。

被释放出狱的"胡风分子"们,刚刚感受到自由后的欢欣,随即卷入一场令他们鼓舞的运动之中,比起狱中的朋友,他们又多了一次品尝政治运动的机会。

三

鸣放将胡风集团问题,重又摆到了人们面前。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的3位教师,在鸣放发言中说:

> 胡风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就说他是反革命。可是根据"三批材料"是无法认定他是反革命,至于他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针对周扬的,因此只有能证明周扬没有错误时,才能说明胡风错了。
>
> 如果胡风是反革命,为什么至今还不审判?还不敢见人?

5月23日,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鸣放中最为活跃的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来到这里,参加师生集会。

她发表长篇讲话,胡风问题成了主要内容之一。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

我过去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1%!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么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也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4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察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

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80%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一些高级干部还退席了。

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5月30日,林希翎又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再次谈到了胡风问题:

胡风问题: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和主席有关系,是不是反革命谁也没有肯定,是否和台湾有联系?过去他向党中央提出的意见书,和三批材料,都不是确切的根据,虽然我也写了两篇反胡风的文章,但现在看来有问题。

阿垅、绿原是反革命,但别人没有材料,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沫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当然胡风有些论点我也不同意,其小喽罗尤可恨,骂人骂党中央这是不对的、下流的。但骂人也反革命吗?胡风的建设性意见是正确的,文艺竞赛是对的。

现在人们有怀疑,国家还没做出结论,我觉得案子给检察院处理是没办法的,他们只是死扣又不懂文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有斯大林上述错误理论作指导,起义的勇士舒芜起了不光彩的作用。

三批材料中张中晓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主席的报告当时是起很大作用,现在也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不是科学的文艺理论,再加上那些个人崇拜者鼓吹,起了很大害处,为什么不能反映知识分子,限制在工农兵,别的不要。

……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侦察当中没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见,这

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错的,但也没有关系)。

……

四

些微自由活泼的春风,让狱外的胡风分子和亲人们也陶醉了。他们相信眼前所闻所见,也是一种现实,他们意识到又可以讲出心中的一切,两年前的那番冲击,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丝毫威慑作用,也没有一年后、十年后,许多知识分子所存有的余悸。

他们一个个向上申诉,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也不承认有反革命集团。

何满子牢骚满腹,直言抗议:

"为什么要关我,我又不是反革命!"

"周扬是通天教主,是搞宗派主义。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是宗派陷害。"

鲁藜的胆子更壮了,他说:

"坚持我的观点,我们不是反革命集团。"

他写出3000多字的申诉材料交上去,不承认罪状,抗议开除他的党籍。

曾卓充溢心中的,是获得自由后的欢欣。他在1957年3月27日出狱,就在这个月,他讴歌《呵,有一只鹰……》,在他的笔下,鹰在高飞,在高唱生命之歌。也许他以鹰自喻:

呵,有一只鹰在高飞
怀着真正的鹰的心
它的翅膀有时牵引着狂风暴雨
有时驮负着阳光白云

那么,此时,曾卓会以为自己"驮负着阳光白云",因为在此时写的另一首诗《我期待,我寻求……》中,他从心底发出呼唤:不要遗弃我呵,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

卢甸的妻子李嘉陵,此时最大的愿望是早日见到卢甸。一出狱,她便三番五次去公安部、中宣部,要求去看卢甸。

在王戎的家里的聚会中，任敏、王皓和李嘉陵的心情也是一样的，王皓胆子更大，她以妻子的身份，要求尽快释放丈夫。

化铁出狱仍回到军区，却无法安排工作，他给南京空军党委写信，说自己很年轻，希望赶快分配工作。信中也提到胡风问题，他说，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不敢承认，不知道，但自己绝对不是反革命，抓他是错误的。……

他们都有良好的愿望，做着美好的梦。但梦终归是梦。

大鸣大放的形势，转瞬之间，发生巨变，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顿时令人们目瞪口呆，也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时时感到困惑。

在《人民日报》5月1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之后，鸣放在五月间，达到了高潮，许多原来在校园、座谈会上发表的言论，都被披露到报刊上，俨然一幅自由讨论，自由争鸣的局面。

这时，毛泽东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事实上，几个月的进展，的确符合他在一月间就设想过的层次和趋势。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迅速印发给党内部分干部阅读。

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右派”问题：

>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毛泽东所说的“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实际上是23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高潮的终止，随后展开的是反击，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开始的反右运动。

就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这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再次强调：

>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

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处小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

紧接着几天，《人民日报》陆续发表社论，尤其是6月11日发表的《工人说话了》，一下子将反右斗争扩展开来。

知识分子未能避免的历史，终于出现了。55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将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个个家庭演出一出出悲欢离合的戏剧，中国也从此大伤元气，久久不能复原。

23年后，邓小平说：

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突兀其来的反右，打碎了李嘉陵、曾卓、任敏、王皓、化铁……所有“胡风分子”的梦，更把许多以各式各样的心态参加批判胡风、声讨胡风的人，卷入新的政治风暴。

五

冯雪峰最终给推入逆境了，罪名之一：胡风思想同路人。

1954年底《文艺报》改组之后，冯雪峰虽然仍任编委，那只是挂名而已。他的作协副主席也没拿掉，但远非前几年那样显赫了。

对胡风批判的逐步升级，一直发展到被捕入狱，确实令冯雪峰不寒而栗。他知道以自己过去同胡风的关系，是难免有一天遭到打击的。将胡风朋友间的通信作为证据公布，这更让他预料不到，因而，他时时感到惶惑和惧怕。反右批判冯雪峰时，便说过：冯雪峰的阴暗情绪甚至发展到怀疑党不信任他，在检查他的信件。

然而,冯雪峰在1955年,没有违心地积极参加围剿胡风的运动,除了一次应景式表态发言外,他没有写出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揭发胡风罪行的文章。他的这一举动,显然,令一些人极为不满。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在批判胡风刚开始时,他曾试图保护牛汉。在1955年3月,冯雪峰通过人找到牛汉,让他写出四五百字的文章即可,在《文艺报》上与胡风划清界限,表表态以避过风头。牛汉按照冯雪峰的意思写出一篇,《文艺报》已经发排,但形势已经恶化,没有刊出,冯雪峰只好将稿件退回牛汉,稿件上,牛汉看到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编辑批的字号。冯雪峰对牛汉无可奈何地说:

"不能发了,事情严重了。"

冯雪峰未能帮助胡风脱离险境,就连保护牛汉这样小的事情,他也无能为力了。

他沉默了,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醒悟。尽管自那以后,批判浪潮一浪高一浪,可他私下里,仍然发表自己对文艺,对政治的独立思考出的见解。

舒芜这时和冯雪峰来往甚多,两人谈话时,冯雪峰总是毫无顾忌,大胆地说出自己想的、忧虑的一切。他谈到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这几年人们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发挥。他不满于这种文艺观点:

> 政治标准第一,当然是对的。不过应该是说,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政治标准才是第一的,现在却弄成先不管它是不是艺术品,即使不是,只要政治性强,也就是好的。正好像我们说干部标准,德是第一,这是对一个活的人来说的,不能摆一个木头人在那里,就说他德怎样怎样好。

冯雪峰也关注着苏联文艺界因反对斯大林而带来的明显变化,他对舒芜说话中,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

> 苏联文艺界这些年老是转来转去,一会儿抓住这个理论,一会儿抓住那个理论,一会儿反对无冲突论,一会儿又跟着尼古拉耶娃大谈艺术特征。其实都不是关键,所以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这一回,根本关键才抓住了,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作家其实都知道应该怎么写的,不用人去教。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他怎么也不可能写得好。有了

社会主义民主,都会写出好东西来。

这些和舒芜的谈话,没有成为私人间永远的秘密。反右开始后,舒芜将它们交代了,于是,又成了批判冯雪峰的重要证据。

冯雪峰的厄运来临了。

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外,冯雪峰是文艺界另一个大右派,反党分子。给冯雪峰的罪状很多,如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30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动的社会思想,其中重要一条,便是冯雪峰"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

1957年7月25日起,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连续召开,在批判冯雪峰时,林默涵发言说:

> 他的文艺思想是和党的文艺思想,具体说是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
>
> 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和胡风思想有共同点。怪不得反胡风时,雪峰同志作为文艺理论家,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一篇批评文章也写不出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
> 有人说,在文艺思想上,过去胡风是雪峰派,后来雪峰倒成了胡风派,批评胡风思想而不批评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是不公平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两年前本应做而未做的事情,现在反右中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了。

何其芳在发言中更是明确指出,冯雪峰、胡风的文艺思想形成的发展线,"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一条隐蔽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企图从内部夺取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堡垒的。"

冯雪峰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个老党员,鲁迅晚年和共产党联系的中间人,以右派的身份,将度过凄凉、黯淡的19年。1976年,冯雪峰因病死于"文革"尾声。

1979年11月,出狱不久的胡风,为冯雪峰追悼会发去长达400余字的电报。这是胡风最早以文字与外界的公开接触,冯雪峰也是胡风悼念的第一人。

六

舒芜,在胡风案件中被人们誉为"起义勇士",反右中同样也被毫不客气地推入漩涡之中。

胡风集团刚刚粉碎的时候,在北京,舒芜一下子成为红火人物,被各单位请去作报告,现身说法。

他内心中也许从未有过片刻安宁。作为一个作家,对文艺现状,他不能没有自己深深的思考和忧虑,不然,在和冯雪峰一起时,冯雪峰是不会轻易讲出许多会被认为离经叛道的话的。

大鸣大放的春风,让舒芜也沉醉了。他抛开了顾虑,放心大胆地发言。

在作协1957年五六月间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批评1949年以来的文艺批评,并对毛泽东的《讲话》也发表了不同于1952年的意见:

> 解放以来,文艺批评所以到了这般地步,是用一篇批评可以判决一个作家的命运,所以谁也不顾虑作这个判决者。批评者粗暴不可怕,就是骂我也不怕,怕的是它后面有东西——行政命令。
>
> 理论批评现在也很难搞,好像有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像真理到这里已经完了。毛主席的《讲话》是个方针,不是解决了一切问题,只是开辟了真理的道路,路还得我们走。

舒芜还时时感觉到胡风问题的阴影,依然或浓或淡地在他头顶上掠过。在他自己看来,已经彻底划清了与胡风的界限,作出了一般人未能作出的举动。可是,在别人眼中,他依然是胡风集团的人,这不能不让他伤心、气恼。

还是在作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舒芜向大家举出一件事例:一个人批评他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最凶恶的进攻",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胡风余孽,人人得而杀之!"

舒芜一方面在座谈会上直抒己见,另外还写文章发表见解。在《关于改进文学刊物现状的一个建议》中,他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他写到:提倡一个刊物一种花,一个流派,同人性,建议同时兴办小规模的同人出版合作社。

这和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出的建议毫无二致。

舒芜被打成右派了。提倡同人刊物，攻击文艺界党的领导等罪名罗织其身。这个“胡风余孽”，还是没能躲闪开政治风浪的冲击，和一些胡风分子一样，踏上通往劳动改造的曲折道路。在田间地垅上，他应该有时间反思过去的一切了。

七

一些与胡风有过关系、或者发表过与胡风文艺思想相近意见的人，此时，也成为右派了，自然，这只是所有罪状中的一项而已。

和胡风交往甚密的聂绀弩、周颖，无疑被打成了右派。

在胡风被捕前写出的最后几则日记中。周颖的名字出现了两次。她无时不在关心着胡风全家，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她陪着他们聊天，以最难得的情谊，慰藉他们的心。

在鸣放中，周颖为胡风鸣冤叫屈，于是，在报道对她的斗争时，报纸上用了这样的大标题《周颖原是康泽的密友胡风的亲信》。报道中说：

> 这个右派分子对伟大的肃反运动极其仇恨……她还制造了一套极其荒唐的定义，说什么“不直接夺取政权就不能算是反革命”，说什么“胡风只是想在文艺界占点地位，并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她还厚颜无耻地到处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辩护，企图为胡风翻案……
>
> 早在1926年她在日本时期，就同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勾搭在一起，长期拜倒在胡风门下，成为胡风的亲信。直到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开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反革命材料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她仍同胡风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在戏剧界被斥之为“吴祖光统帅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罪状之一是：这个小集团完全继承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衣钵，并曾和胡风反革命集团配合作战。

北京戏剧电影界9月6日到13日，陆续召开4次批判吴祖光“小家族”的大会，被列入这个集团的有戏剧出版社编辑杜高、《剧本》月刊编辑汪明、北影编辑田庄、对外文化联络局干部陶冶等。4次批判大会上，有20多人发言。赵寻在发言中明确指出：首都戏剧电影界揭露了一个以吴祖光为家长、与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有密切关系的反动小集团——“小家族”。赵寻说：

他们自始至终，从思想到行为，都是忠实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服务的。在小集团里，胡风被尊为“导师”，路翎被当作“榜样”。杜高熟读了胡风的反动理论，汪明是路翎作品的义务宣传员，他连写字也努力学路翎的笔迹。胡风也很看重“小家族”，他在某些重大事件上通过路翎来征求“小家族”分子的意见，让他们也来一同积极向党进攻。例如，为第二次文代会的代表名单，路翎就曾召集杜高、汪明等集议过，一致认为某些青年作家不应当被推为代表，而为胡风分子阿垅、绿原、吕荧等未列名为代表而愤愤不平，并四处为之活动。在剧协创作室改选领导人时，他们曾帮路翎竞选，当竞选失败以后，他们便诽谤这是党的“宗派主义”……

吴祖光、杜高、汪明等始终同情胡风，支持他的反动言论，一直到今年整风期间，他们还认为胡风的意见书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极力为胡风集团辩护，跟台湾、香港的特务唱一个调子。“小家族”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表现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甚至连胡风、路翎在监狱里有没有报看、有没有香烟抽，都要他们经常操心。

为什么“小家族”要在胡风、路翎问题上这样热心，大做文章呢？这一点杜高说得很明白：“胡风的问题就是路翎的问题，路翎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



1984年，病卧在床的聂绀弩与夫人周颖。

在反胡风时，吴祖光没有掉队，他写过文章控诉“反革命集团”，两年后，反倒把他和已成“死老虎”的胡风集团，又紧紧地捆到一起了。

河南文联负责人苏金伞，这时被戴上了“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发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报》的标题是：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毕露。肩题就是那顶“帽子”。

苏金伞在1937年，曾给胡风的《七月》投过稿，《七月》也发表过他的诗作。但两人并无深交，所以，在1955年时，苏金伞安然无恙。现在他却逃不脱了——

> 苏金伞在解放以来，一直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他时常贩卖“到处有生活”和“每篇作品里不一定有一个政治目的”等胡风的反动文艺观点。
>
> ……苏金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求师的心情拜倒在胡风门下，并常把自己的诗稿寄给胡风求教。今年6月，苏由北京回来，竟无中生有地说胡风放出来了（据他说，这是从姚雪垠那里听来的），并到处散播这个有意制造的谣言。

四川省文联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与胡风集团“臭味相投”，文艺思想上一脉相承，也是他们的罪状之一。

在批判石天河、流沙河时，引出了四川省二师学生徐荣忠给流沙河的信，以此信作证据说明他们与胡风文艺思想的关系。徐荣忠的信写到：

> ……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指日可就。当然，困难重重，至少亦需十年功夫才能奠定这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来，如果它们不用卑劣的政治手段打倒胡子们的理论，此理论体系已经接近完成……石先生说：走在我们前面的人跌倒了，我们不讪笑他，但更重要的还是吸取经验教训，另辟新天地，走另外新的路。这话不错。

批判者说，以此信证明，石天河、流沙河们，“追奉的祖师爷是胡风，要吸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开辟另外的新的反革命的路。”

胡风在狱中，无法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可是，他已注定和许多人的政治生命联为一体了。

八

历史是一个怪圈，天真的人无法摆脱它的控制。或者说，政治运动是一个怪圈，人们，特别是文人们，在里面身不由己地作出各式各样的选择和举动，而又会被它推到说不清是悲剧还是闹剧的境地。面对一件件山一样沉重、实在的事实，也许会油然而生几丝既不是幽默、又不是讽刺的感觉。是荒唐，不是。是佛教循环反复的报应说，又不是，因为那毕竟是唯心的胡诌。可以是一幅反差强烈的历史画面，使后人伫立良久，沉思良久，也许会从中悟出在别的画面前难以悟出的东西。

如果说，前面列举出的冯雪峰、舒芜、周颖、吴祖光、苏金伞等人的遭际，多少能让人觉得从胡风到他们的命运之间会有某种依稀可见的联系，那么，下面的事例，却太奇特、太令人费解了。

也许，这就是中国政治运动中文艺家特殊的结局。

文艺批评家陈涌，是1949年后，率先批判阿垅的文艺观点的人。他是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后而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1949年之后，担任《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委。在批阿垅之后，陈涌在随后的文艺批评中，历来不甘人后，从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一直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都有力作问世。

鸣放时，陈涌发表了探讨典型问题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他的一株毒草。

陈涌一下子成了右派分子。罪状之一居然是：陈涌在批判胡风的同时，接受了胡风的影响。

1957年8月7日，在作协召开的第十三次反右会议上，何其芳作了《保卫党的原则，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的发言，昔日在批胡风时与陈涌紧紧站在一个阵营的人，现在同样严厉地批判陈涌：

> 你们看，他竟至狂妄到认为胡乔木同志也是“教条主义”和“不懂文艺”了。在整个发言中，他只肯定了一个人“懂得文艺”，那就是冯雪峰同志……陈涌同志在发言中竟至照抄胡风的某些反动文艺思想，他也宣扬“艺术实践”“可以改造作家自己的思想”。他也反对所谓“题材论”（我们知道，这是胡风为了反对提倡写工农兵群众斗争而捏造出来诬蔑我们的。）他认为“作家协会不应该成为领导作家的机构”。他主张

> 采取“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的方式，个人影响作家的方式”。这和胡风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中的组织纲领也是相同的。

另一位批评者毛星，在8月23日的批判会上发言中，也指出陈涌在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是反党的，是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相反的，而和冯雪峰及胡风的文艺观点相同的或者基本上是相同的。”

就这样，陈涌落进了怪圈。曾经坚决反对胡风，积极批判胡风的人，反倒成了胡风的伙伴、同路人。

早在国统区最早写文章批判舒芜的《论主观》的黄药眠，是在同胡风斗争中的另一个主要理论家，他写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是重庆时期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两篇批判胡风的文章。

这时，黄药眠因为同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关系，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显赫的右派。《光明日报》揭载他的消息标题即是：口口声声“不搞政治”，干的都是反党勾当，黄药眠是章罗联盟进攻高等学校的主将。北京师大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批判黄药眠时，便出现了这样的词句——

> 文艺界大概都知道，黄药眠过去写过一篇批判舒芜的《论主观》的文章，题名《约瑟夫的外套》，曾几何时，不料现在黄药眠自己也披着“约瑟夫的外套”来迷惑人，蒙蔽人了。黄药眠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的本领，是比当年的舒芜要更胜一筹……

两个事例，可以说充满着耐人寻味的含蕴。

还有更多的在批判胡风时写文章表态或批判的人，在反右中，也纷纷落马。在《人民日报》上写过批判胡风文章的作者中，据初步统计，仅文化界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的就有30多位：如丁玲、萧乾、秦兆阳、钟敬文、梅朵、江丰、钟惦棐、丽尼、邵燕祥、聂绀弩、黄源……

艾青也在此列。两年前写诗批判胡风，现在仍然成了右派，而且，到了1958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将在延安时期艾青、萧军、罗烽、丁玲、王实味等人的作品集中发表，由毛泽东修改按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供人们“再批判”。

漫画家丁聪没有例外。在批判胡风时，为了完成布置的任务，与胡风毫不相识的他，根据照片，三天两头赶画批判漫画。如今，也成了右派……

两年前批判胡风时出现的各种批判样式，现在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漫画、讽刺诗、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各得其所，时有创新。

以信件为证据的办法，再次得到应用，在将罗隆基等人定为反共组织时，其根据便是几个人交出的"密信"。有了胡风事件作先例，此时这样做已不足为奇了。

反右时最大的创新，是毛泽东高度评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到了"文革"，这些方式便得到充分利用。

与"四大"同时出现而1955年没有的，是大学中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刊物和社团。仅北京大学，就由学生出版了《浪淘沙》、《论坛》、《五月》、《说理》、《啄木鸟》、《思想战线》等。北京师大成立的社团达100多个，清华大学反右派社团就有：左锋社、尖兵社、刺槐社、击右社、东方社、火山社、匕首社、旗社等以及130多家刊物。观点各异，针锋相对，可视为开"文革"初期红卫兵派仗的先声。

历史仍在继续创造着。两年前参与创造了1955年历史的人们，有的已经尝到了这历史滋味，更多的人，机会尚未到来；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和历史一道走向九年之后的"文革"。

九

刚刚出狱的胡风分子们，美好的愿望成了泡影。

牛汉在1957年秋天，被开除党籍。听到宣布后，他只说了7个字：牺牲个人成全党。开始两年在社里当编辑，后来去养过猪，1962年党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对他的管制更严了，一直到"文革"的爆发。

曾卓在1958年要求下放农村，到武汉郊区的花山人民公社劳动，先后在小卖部当售货员，放牛，看管仓库。1961年秋天回城，分到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当编剧。

王皓因给毛泽东写信，性质严重被打成右派分子。性格刚强的她，忍受不下冤屈，跳黄浦江自杀。

王戎在鸣放时不听动员，拒绝写大字报，被加上"坚持胡风反动立场"的罪名，再度被抓，遣送安徽一个农场，三四个月后，流放甘肃修水库。1960年初，又被弄到新疆，仍在农场干活，一呆就是18年。

罗洛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在1958年底，作为有问题的人，连同右派分子一起，遣送到青海。和他一道去的，是刚刚结婚半年的妻子。他们在青海20余年。

任敏也在1958年被遣送青海。在那里，她又将重新入狱，在狱中度过艰难的“三年灾害”。

李嘉陵在反右中被开除党籍，随右派分子一道下放到山西运城。1960年她分到天津，每个月去狱中探望卢甸一次，总算实现了夫妻见面的愿望。

鲁藜在反右后因涉及到为胡风翻案，被打成右派，和2000多名右派一起，在板桥农场劳教。1963年劳教归来，又分到天津拖拉机厂工作。

化铁被开除军籍，回家做临时工，拆城墙、挑矿石……

何满子因为胡风翻案，成为出版系统的右派分子，开大会批判。9月底，宁夏来上海招聘，单位动员他去报名，何满子和妻子一道到了宁夏，在那里拉板车养家糊口……

他们每个人又体味起社会给予他们的另一种生活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有更多更多的人，55万“右派分子”，是在和他们一起体味了。自然，还有早在狱中的亲友。

来到青海，罗洛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雪，那么高的山。他吟唱，是心底深沉情感的流露——

雪使人想到洁白也使人想到寒冷
雪使人感到战怵也使人感到振奋
望着雪，不觉增添了对阳光的怀念
望着雪，更想在冬天里创造出春天

第十二章 狱中

一

狱中的生活，或紧或松，像是一面不甚光洁的镜子，只能隐隐约约折射出狱外社会每一时期的局势。“双百”方针提出时，外面一片轻松活泼，里面的人也开始允许读书看报；反右开始后，外面寒风凌厉，里面的管制便骤然严格；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盛行，里面的伙食便胜似往昔；三年困难时期，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一样经历饥饿的磨难，幸运的是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多一些温饱……

胡风，和狱中的其他胡风分子，自然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报纸的文章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在狱中，苦苦捱着时光，盼望党最终能弄清楚他们的一切，给他们自由和信任。

1956 年未被释放的胡风分子有：胡风、梅志、路翎、绿原、谢韬、阿垅、卢甸、贾植芳、耿庸、徐放、欧阳庄、冀汸、方然、张中晓等。

胡风在狱中一直关到 1965 年。刚刚释放又见“文革”，再度入狱，精神发生混乱，产生自我恐怖感。

路翎在狱中患精神病，几度住院。1961 年因病出狱，随后因给中央写信抗议，又被关入狱中，直到 1975 年才出狱。

绿原在狱中 7 年，1962 年出狱。

谢韬在狱中 10 年，1965 年出狱。

阿垅在狱中 12 年，1967 年死于监狱医院。

卢甸在狱中 10 年，1965 年出狱，“文革”中下放农场，1973 年病逝。

贾植芳在狱中近 11 年，1966 年出狱。

耿庸在狱中近 11 年,1966 年出狱。

徐放在狱中 10 年,1965 年出狱。

冀汸在狱中 4 年,1959 年出狱,仍由劳改局安排到劳改农场工作。

方然在狱中 10 年,1965 年出狱,"文革"爆发后,于 1966 年 9 月自杀。

欧阳庄在狱中 10 年,1965 年出狱。

……

二

胡风关进了秦城监狱。他不知道,在同一高墙之内,还关着因他而罹祸的其他人,他们与他一样在孤独、痛苦中企望自由,胸中充溢的,有比昔日更为炽烈的忠诚和热情。

独处一室,没有纸笔,没有书报,写不完的交代和证词,度不完的日日夜夜。他不知道自己离家后,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也惦挂着那些与他共命运的朋友。

吟诗,此刻成了他消磨时光的惟一方式。他有至为深沉而炽烈的情感要发泄,无法倾吐在纸上,便独自对着囚室的目光和灯光,反反复复默念。在 1957 年被允许看报和文艺书籍之前,他的日子便这样打发掉。

他熟悉鲁迅的诗,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现在成了他吟诗参考的范本。自由诗容易忘掉,胡风便首先步鲁迅诗的原韵吟出一首首抒发心情的诗。

在狱中,胡风怀念着春天。于是,他将自己的号房命名为"怀春室"。

1955 年除夕之夜,胡风吟诗一首。他吃惊于自己居然会在牢中独自一人度新年,对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他仍然不承认。惟有对着囚衣,感伤于自己 20 年的文学生涯居然落到罪犯的境地。他吟道——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他是步鲁迅诗原韵。他忘不了鲁迅,他也难以想象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是

怎样的命运？

整整一年。1956 年 5 月 16 日，入狱一年整的胡风，更加思念妻儿。一年前被捕的情景历历在目，最难忘的是只有八九岁的儿子晓山。他回想着儿子调皮、玩耍的模样，遥寄他的思念。胡风同样步鲁迅诗原韵专门为儿子吟诗一组：

无情刀割久分时，恋子心如指纹丝；
认得无人拼短句，学分敌我画红旗；
惯同阿姐争鲜果，戏伴狸猫读小诗；
累汝孤零依老祖，可怜白发补童衣。

敌骑圈中托养时，可怜小命弱于丝；
望回蜀道思亲梦，怕见耶稣救世旗；
异地连年没字信，离愁一卷恋儿诗，
何期又陷无情别，抚涕心伤泪湿衣。

不仅为儿子吟诗，在“怀春室”里，胡风吟出的几首诗，有怀念家人的，怀念朋友的，追悼早逝的友人的，包罗万象。诗，对胡风来说，真正成了他狱中心灵历程的记录，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

早日出狱重获自由，是狱中的胡风最大的愿望。他说自己写无数交代和材料，盖上了千次手印，所期望的便是“只为循直脱黑衣”。

胡风也感受到了 1957 年春天的气息。狱外传说胡风已经出狱，而他在里面也做着将获释的梦。春天，他吟出《拟出狱志感》。他设想自己马上就要告别牢房，与妻儿团聚。两年的囚禁生活，已使他对从事文学生活心灰意冷，他决心不再涉足于文坛，如乡间老农，田间耕耘，无忧无虑。

其一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邪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其二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桶底幸存三斗米，墙头重挂万年旗。
远离禁苑休回首，学种番茄当写诗。
负荷尚堪糊数口，晴穿破纳雨蓑衣。

和狱外归家的胡风分子们一样，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新的政治风暴会使胡风的出狱，遥遥无期。

胡风由热望转为失望，失望顿成焦虑和抗议。1958 年，已是 56 岁的胡风，向上面提出全面对证审查，他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坐下去，消磨生命。他的要求没有答应，他便开始绝食，这是他惟一可以行使的权利。绝食几天后，要求被同意，他便停止绝食。实际上，他的要求最终仍没实现。

1965 年 6 月，妻子梅志获准探监。分别整整 10 年的胡风夫妇，终于在胡风即将出狱之前见到了一面。

三

徐放也在狱中吟诗。

刚被捕后，徐放关在北京煤渣胡同反省。他只看到过报上公布的第一批材料，后来从贴在墙上的报纸上，才得知“反党集团”已成为“反革命集团”。

到 1956 年春天，徐放和姚蓬子（姚文元之父）关一间房，后者为肃反时入狱的。

当年冬天，徐放又转到安福胡同。一个大院子里，关着在北京被捕的大部分胡风分子，有绿原、路翎、刘雪苇、谢韬等。徐放与绿原相邻，敲墙壁，是惟一的联系方式。

1960 年 8 月，徐放和其他人一起关进了秦城监狱，他的号码是 0685。这时，他被允许家人探望，可他拒绝了，他不愿这副模样与妻儿见面。对上面陈述的理由是：妻子孩子来了要哭，这影响我的改造。

就在从安福胡同转到秦城监狱之前，徐放给公安部写信，要求尽快审查案件，给他答复，他再次表示，至死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

他已被斥为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忘记过去是个共产党员，家里送来的钱少，他

戒掉抽烟,将钱交党费。

可他的脾气却比其他人更为暴躁,他认准一个理儿,在这里,闹得越凶,待遇越好。在西总布胡同,和姚蓬子关一间,他总是吵房间太挤,换到安福胡同时,居然给他分一间大房子,比别的人都舒坦;在秦城,他时常反映伙食不好,便得到特殊供应。

徐放干出一件别人难以办到的事,他了解到伙食标准,便把每天吃什么都记下,发现看守从中克扣,他便将情况反映上去,闹个不休。最后上面派人调查,那位管理员果然有贪污罪,被撤换,判刑。

春天,总是让身处逆境的人,感到前景的美妙。徐放和胡风一样,在1956年春天,还关在西总布胡同时,从墙头上飘落的柳色,看到一片光明,看到一束束阳光剪碎了他心中的阴暗。他吟唱:

这时候,
我才感到:
春天哪,
也挨近了我的这家!

自进入秦城之后,徐放可以看书了。他借来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最使他迷恋的是唐诗、宋词。曾经热心于新诗创作的他,现在从古人的感愤之作中获得共鸣,更想仔细研究古诗,探索一下诗歌创作的道路。

于是,徐放一边哼着京戏,一边开始尝试翻译古诗,以自由体重现古代诗人描绘的意境。他译李白,译杜甫,译陆游,上千首古诗,在他心中变幻出绚丽而诱人的画面。他更醉心于那些能引起他强烈共鸣,能表达他此时此境此情的古诗。他是在译诗,更是在抒发自己的感触。

难怪他那么偏爱杜甫。光杜甫的诗他就译出了一二百首。那些最能体现他的心境的诗,译出来就更富感染力。他译杜甫的《梦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完全可视作他自己在吟唱——

对那些死去的朋友
还可以止于吞声一哭,
但想到活着而永远别离的朋友

却不能不使人常感到无边的哀痛。
江南一带自古就是瘴厉之地，
你——
被放逐的人哪
一去，便没有一点消息！
今夜，
你到我的梦里来啦，
是你知道我苦苦地在把你相忆，
否则
你现在被拘禁着
又如何能够长羽翼？

四

谢韬也关在秦城监狱，他的号码是0688。

1955年，在吴玉章家住了几个月后，谢韬被转到北京旮旯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监禁，随后到安福胡同，也在1960年进了秦城。

在吴玉章家中时，谢韬被破例允许会见了一次外宾。

这位外宾是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文幼章。当年在重庆时期，文幼章和谢韬是好朋友。身为基督徒的文幼章，通过谢韬，和《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以及周恩来都有了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了解。文幼章曾当过蒋介石的顾问，可他倾向于共产党，想到解放区去。谢韬将他的要求反映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认为文幼章回加拿大作用更大。

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成了加拿大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他编辑《远东通讯》，后来成为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1955年，在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文幼章见到了郭沫若，就提出访问中国时，希望能见见谢韬。

文幼章夫妇来到了北京，安排他们与谢韬见面。

谢韬在吴玉章家见到了当年的老朋友，令他高兴的是妻子卢玉也陪着一起来了。

文幼章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谢韬的处境十分关切。谢韬反倒安慰他，对他说："党是正确的，我犯了严重错误。我们都一定要相信共产党，也请你相信，

我不是反革命，党是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谢韬讲出了这番话。过后，他受到了表扬，认为他态度不错。

进了秦城，谢韬和一些正在狱中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关在一起，和他同房间的，就曾有过文强、徐远举，后来和李仙洲、康泽也混熟了。

在他们面前，谢韬自以为有优越感，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口咬定是文艺思想的错误。在大学教室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的他，这时，绝没想到，又成了秦城里的教师。他被安排给战犯管理所的犯人上马列理论课，有时一天要作六七个小时的报告。

和战犯们混熟以后，记日记又成了谢韬的嗜好，他足足记满了两大本。他的活动，战犯们的活动，还有他们各自心境的写照。“文革”开始后，他害怕出事，将它们烧掉，至今引以为憾。

五

被斥为“军统特务”的绿原，在秦城监狱的编号是0686。

绿原刚刚入狱时，外面控诉他是特务的根据，便是那封1944年5月13日给胡风的信，信中告诉胡风，外事局不去了，被分到中美合作所。

绿原回忆：

> 1942年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和邹荻帆同学。1943年底，我和他一起参加美军翻译。先受训，后被分到航空委员会。我在重庆报到，邹荻帆去成都美军招待所，我当时用的名字是“周树藩”，因为我当年高中没有毕业，是用周的文凭考大学的。到航委会后，改调外事局，去了后，负责人杨萱城就对我们说：“中央团部来人说你们几个都有思想问题，我不相信，青年人发点牢骚没有什么，不过我这太挤，也留不下你。昨天我碰到戴先生，他那儿有多少要多少。你们有问题，可以让他洗刷。”
>
> 当天下午我就写信给胡风。信发出后，仍感到忐忑不安，就坐车到他家。我人到，信还未到。胡风知道杨萱城是特务，就要我不去。这时，又碰到一位同学，告诉我正在被暗地通缉。我在胡风的帮助下，连夜逃

离重庆，到川北岳池县一所私立中学教英语。和13日的信相隔十二天，我给胡风写了第二封信，这时已到了岳池县。

我入狱后，就审查过这十二天期间我干了些什么，要我讲清楚每天在什么地方。

我尽量回忆。

只有几个月的功夫，公安部就查清了我根本没去当特务的历史。

（1986年11月25日与李辉的谈话）

事实上不是特务，名义上必须是特务，在狱中坐下去。一位诗人，这时与诗彻底绝缘了，而埋头于外语学习。1956年初通过组织绿原向妻子罗惠请送一箱子书到狱中，其中主要是外文书籍。几年时间里，绿原除了系统学习马列著作、文学名著外，集中精力学习外语。他温习过去已学过的英语、法语、俄语，又新学起德语。

单身监禁，最可怕的是孤独。绿原借学外语消磨时光，忘掉孤独。他自己编了一本德语文法，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自己学会了德语。出狱后，狱中学会的德语，使他成了一位德国文学翻译家。

二十几年后，因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附合1955年的说法，提到绿原是戴笠领导的翻译之一，此书被要求停售销毁。群众出版社1979年7月24日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公函中说：

据白杨、童芷苓、绿原、谭兴诤等同志和张乔啬同志兄妹三人先后来函称，我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提到的下列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

……

五、66~67页中讲到，戴笠领导的翻译当中有绿原和二百多名翻译。绿原同志说，这一说法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解放前，他不但根本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而且一天翻译也没有当过，他的这段历史早在1955年经组织审查清楚。

根据以上情况和国家出版局1979年7月20日（79）出版字第389号来函意见：“为挽回不良影响，此书应停售销毁，并向白杨等同志致歉。”请你们通知各地新华书店将该书立即停售销毁，并将此函原文

抄转各地新华书店。在此，我们向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白杨等同志深表歉意。

六

路翎在秦城的编号是0684。

路翎没有吟诗，没有学外文，他连书报也拒绝看。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他无法理解。过去，他写出《财主底儿女们》，写出《洼地上的“战役”》，写出几万字的答辩文章，可如今，他什么也写不出，什么也不想写。

在活下来的朋友中，路翎被认为是最为凄惨和令人痛心的人之一。在20年的监狱生活中，路翎精神常常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有许多事情他想不明白，强加于身的许多罪名他无法接受。最终，他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然后，在病愈之后释放回家，靠做扫地工挣一点儿工钱养家糊口。

每天，他呆坐在房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

和他相邻的难友，常常听路翎在房间里困兽一般发出几声叫声，或者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他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似乎也从不想知道，就是妻子来探望，他也言语不多。

1961年，路翎因精神上刺激过大而失常，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保外就医回到家中一年多。随后因给中央写信发泄不满，又被关进了监狱。

1979年人们见到的路翎，再也不是那个英俊、才气横溢的路翎，而是若痴若呆的老头。经过几年的恢复，他才重又开始写作，但40年代的那个路翎，永远不能复还了。

路翎回忆：

> 1961年我住进结核病医院，然后回家一年多。
>
> 回家养病一年多时间里，又写信骂中央，抗议。被关到宣武门劳动大队。也就是第一监狱。
>
> 1966年—1973年，我关在秦城监狱。我在监牢里不知道别的事情，宣判我20年徒刑。1974年到延庆农场劳动大队。1975年6月期满释放。1979年平反。1981年彻底平反。
>
> （1985年4月22日与李辉的谈话）

七

阿垅的逝世,使人们对他在狱中的情况了解甚少。

1954 年端午节时,几年受挫的阿垅,借纪念诗人屈原,排遣胸中的苦闷。他吟诗一首:

汨罗江水故沉沉,江水不如谗谤深!
总是蛾眉违众女,还将香草遣孤心。

就在被捕之前不久,阿垅还写出了另外一首诗《髭须行》,抒发将届 50 时的感怀。自然,他不会料到,50 岁的生日会在狱中度过。

髭须行

年少喜拔髭,年老髭不拔。春风吹野草,秋霜入毫发,人生将五十,骨格因兀突,不弹琴上尘,不惜剑刀铗。郁郁如有怒,遂自胸间发。老马骋长鬣,雄狮顾荒樾,丈夫气如此,吾头不可杀。

阿垅入狱时背的历史罪名是"反动军官"。

阿垅是杭州郊区人。1931 年"九·一八"事件后,他立志从军报国。在从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后,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

耿庸 1985 年谈到阿垅的情况。阿垅在 1937 年淞沪抗战受伤之后,写出了列入"七月文丛"之一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1939 年通过作家朋友、原在共产党长江局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的吴奚如的关系,前往延安。吴奚如后来回忆说,他送阿垅去延安,让阿垅化了名,准备他在抗大学习后再回国统区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阿垅在延安的野战演习中眼珠受伤,到西安治疗,因局势恶化,无法回延安,便又通过旧时中央军校几个同学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随后他到重庆,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

耿庸说:"如果说,他第一回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就他自己而言是个迷误,那么,这一回他却是带着预定的清醒而明确的目的。当时,了解他的朋友们都灼烫地

感到了他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绿原回忆,1944 年,他曾受阿垅的委托,带一包袱东西送给住在重庆市郊赖家桥的胡风。送到后才和胡风看到,是十几册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和部署的印本和图表。胡风当即送给廖梦醒转至延安。胡风也记得许多次这样的递送情报。国共内战时期,在上海,阿垅因中央军校教育长发出通缉令而从重庆逃到这里,他继续利用关系尽可能收集军事情报。

1979 年为胡风一案平反时的相关文件,澄清了阿垅的这一历史:

> 阿垅,原被定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1941 年 2 月阿垅在国民党军事委会政治部军务处二科任少校参谋三个月编审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但 1947 年以后,阿垅曾多次给我党送军事情报。因此,阿垅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也不应以反动军官对待。

阿垅在狱中不承认自己是反动军官。对罗织自己身上的罪名,他一一反驳。

第三批材料中,收入阿垅 1946 年 7 月 15 日写给胡风的信:“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注:指蒋介石)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材料把这信中的话当作阿垅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罪证。

阿垅在狱中获准看报上公布的材料,他写出申诉。他说,这是“歪曲事实真相”,他给胡风写这封信是为了“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在磨刀了。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

那时候,万般申诉也是无济于事的。

阿垅依然留恋早已逝去的妻子张瑞。入狱时,什么也没能带上,存款,几千册藏书,还有几岁的儿子,都留在了身后。惟一随他入狱的,是手上戴着的那两个戒指,那是妻子当年送给他的,上面刻着用英文写的“勿忘我”。

儿子陈沛留在家中,由公安局派人照料他的生活,不能与父亲见面,每年安排儿子照一张相片,带到狱中,让爸爸阿垅看上一眼。

1963 年,阿垅在狱中给陈沛写出一信。这是陈沛八年来第一次收到爸爸的信。信中说:我的事以后再说,你要多读书,多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好好

学习。

陈沛现在只记得信中这几句话。当时,他收到信,十分突然,也感到害怕。八年来,在特殊环境中长大的他,不敢与父亲联系。他将信交给组织看,上面不置可否。有好心人劝他别把信留下,免得惹事生非。他寄回狱中,这对阿垅肯定是一个大的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

1966 年底,公安局通知陈沛到监狱医院去看阿垅,在当时"文革"已盛的情况下,他没敢去。阿垅身患骨髓结核症,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于 1967 年 3 月 21 日逝世狱中。

临终前,阿垅还给中央写一信,表示自己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并再次申辩自己是清白的,坚信党迟早会弄清楚的。

在他逝世 13 年之后,一切终于弄清楚了,阿垅得到平反。

八

卢甸和路翎一样,在狱中也疯了——文疯。

在狱中卢甸始终不认罪。李嘉陵在 1960 年到天津后,得到公安部的照顾可以前去探望。

出现在李嘉陵面前的卢甸,因是三年困难时期,已经骨瘦如柴。他的情绪十分不好,不过尚未疯。他忍不住偷偷告诉妻子:"简直有点受不了,真够苦呀!"

尽管不像以后那样精神失常,这时的卢甸,已经显得有些麻木不仁的样子,李嘉陵不敢相信自己面前的,就是那个充满诗情的卢甸。

卢甸每次见到李嘉陵,从来不问家里情况,母亲和孩子似乎在他心中已不存在。

只是要书,要手纸,或者向她数说:和他同房间的,是来监视他的。有时为了把灰弄到他的床上,他会忘掉文人的架子,互不相让,打起架来。一会儿过后,他又和别人成了朋友,请那人教高等数学,教英语。

卢甸背会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当李嘉陵来时,他会认认真真地背上一遍,根本不去看妻子噙着的泪花。

他终于疯了,但不打,不闹。每次爆发时,只是把书和梳子一把扔到地上。他想不通为什么说自己是反革命,他从小受苦,找到共产党搞革命,怎么会反革命呢?他的脑子里总是转悠着这些。他想不通的更有,是给党中央写信,又不是给国民党

写，怎么是反革命纲领呢？可他又无法向难友们解释这一切。

李嘉陵与卢甸的见面，从此也取消。1965 年，当卢甸获准释放时，李嘉陵前去接他，那是一个完全变得令她吃惊的人。

九

冀汸和方然，在杭州一个看守所里，同关一个天井，却隔窗相望，无法交谈，然而，和别的朋友相比，他们这算是巧遇了。

在 1957 年春天冀汸从被台风吹垮的监狱转到公安厅内部的看守所。这时，家里带信讲，让文联帮忙把被捕时留在单位的自行车卖掉，家里等钱用。从那之后，冀汸可以给家里写信，家里也可以寄书、带东西了。

冀汸此时的住处中间是一个天井，他住角上一间房，对角一间正好是方然。开始相互并不知道，后来通过看守互相借书看，从书上，冀汸知道对面就是方然，方然也知道这边是冀汸，在他们这是一种特殊的喜悦，便常常在互相借来借去的书上，作一些特殊的标记。同时两人与看守讲话时，也故意提高嗓门，让对方能听到。

有几个月，方然的声音没有了，冀汸丧魂落魄一般。一位好心的理发师知道他俩的关系，告诉冀汸，对面你们的那个人住院了，直吐血。

方然出院后，关进了另一个天井里，冀汸从此再也听不到方然的声音，永远也听不到了。

冀汸关到 1959 年 2 月，检察院来人告诉：你是反革命，但根据惩罚条例，对自己的罪行有认识，可以免予起诉，出狱安排工作。

冀汸出狱，而方然仍在那里孤独地听自己的声音，看自己的书。

十

耿庸入狱时，被定为叛徒、军统特务嫌疑。

1980 年平反文件中写到：

> 耿庸，原被定为叛徒、军统特务嫌疑。经查，耿庸曾于 1940 年参加我地下党，后脱离关系。1941 年 7 月在江西赣州被蒋经国逮捕，9 月释放，没有发现他有出卖党的行为。1943 年 6 月他到国民党财政部货运

局人事室作科员，是经他的姐夫军统特务吴文宇介绍的，但他不是军统特务。

用耿庸自己的话说，审讯者曾说他在狱中是“最调皮捣蛋、顽固不化”的人。

第一次开审，刚要审，耿庸就先开口：

“别先问，我提两个条件，一是要抽烟。”

“烟不是给你了吗？”

“二是要看报纸。”

“我们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回答耿庸，暂时不能看报。

第二次审问。当斥责耿庸说到：“你们披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耿庸不慌不忙地说：“你们说错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外衣。不是，如果要是，那你们不穿马克思主义衬裤吗？”

一次大审，来了 11 个人，问耿庸：

“你和小蒋认识吗？”

“我朋友中没有姓蒋的。他有没有别的名字？”

“蒋经国你不认识？”

“哦，是他呀，我们从来就叫蒋经国，不像你们叫得那么亲切。”

有时，耿庸索性一声不吭。审判人说他这是学胡风，他因而了解到胡风在审问时也是不回答的。

耿庸没有忘怀文学创作。当可以给纸和笔之后，他就在狱中开始创作。他写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文，写一部长篇小说，已写十二三万字。他通读一遍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作了不少笔记。到 1966 年出狱时，已写出各种作品七八十万字，“文革”中均被抄走，杳无踪影。

十一

贾植芳罪名是汉奸，而且在 1980 年平反文件中仍然给他留下这条定语，一两年后才彻底平反。

在平反文件中写到：

贾植芳，原被定为汉奸，经查，贾确曾于1944年，投靠汉奸郝鹏举，任汪伪淮海省参议，曾向郝献“兴淮十策”万言书。

综合上述，除贾植芳当过汉奸外，其他人都不是“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也没发现胡风把这些人组织了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事实。

贾植芳回忆：

1935年底，我在北京念书，“一二·九”运动后被抓起来关押两个多月。后由家里托人辗转花一千多银元才保释出狱。北京不能再留下念书，伯父给我提出三个条件：1.去学医学、银行管理；2.绝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然不再保；3.不能娶日本老婆，杂种是进不了祖坟的。除了第三条我做到了，其余两条都没有做到。

我1937年回国，到国民党军队当翻译。因为给《七月》写文章，要被关进干训班审查。我借故溜走。后到《扫荡报》当记者，到山西战时新闻检查处。就在那里，帮忙把李星华（李大钊的女儿）辗转送到延安，在这之前，也介绍过四个人去延安。

通过一个日本同学，我进了杨虎城部队一个团里当翻译，替团长译日文工程书。在这期间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经常有来往，也替他们搜集一些情报。有人告发我，我连夜逃走，逃到徐州，被郝鹏举任命当他的副省议长。我劝他不要帮助日本人打共产党或国民党，要在目前形势上保持中立。日本人把我给抓起来，说我是搞策反的。把我关了几个月，1945年8月16日放我出来，我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1986年11月10日与李辉的谈话）

1987年12月5日，贾植芳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详细谈到平反后对他的“汉奸”结论的再处理：

关于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实际情况你可查阅四川文艺出版社印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书中所说的“两次受党派遣到国民党新闻机关工作”，就是指《扫荡报》和新闻检查所而言。关于1945

年在徐州一段，书中也有说明。

关于1980年文件，当时那个中央文件未向我正式传达，只是传达了上海法院对我的案件的批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作为正式平反文件。我当场提出那个文件的不实之词后（在复旦党委监委会，这个单位当时经办我的事件），他们回答说："那是北京说的，我们上海没说你不好。"他们要我向中央提出申诉，因此我向胡耀邦同志写了信，后来交由上海公安局办理，上海公安局承担责任，自责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原来的结论不当，表示在文化教育界发函更正。胡风逝世后，家属也就1980年中央文件所留的那些尾巴，要求澄清。当时中宣部也答应在政治上彻底平反。后来因为政治的动荡，如反自由化等等，因此延而未办。这就是事件的概况。

1955年为了打倒我，报上还说我当过土匪、少将、人口贩子、鸦片



1948年，为庆贺贾植芳出狱，胡风与友人一起同游杭州。前排左起：罗洛、朱谷怀、冀汸；后排左起：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胡风、贾植芳、贾植芳夫人任敏。

贩子等，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作法，经过接踵而来的反右，以至文化大革命，才彻底使老百姓们，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看穿了，认识了。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老人的无情而又有情。

贾植芳在狱中的番号是1042。从一件衣服上，他猜想任敏也入狱了。那是在刚入狱时，临近冬天，需要从家中拿衣服来。贾植芳从送来的一抱衣服里，发现了任敏的睡衣被当成他的衣服拿来，这下他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

从此，他身处狱中，更加惦挂妻子的处境。

坐牢对贾植芳来说，已不是新鲜事儿。在这次之前，大大小小，他已坐过3次牢了。第一次，是在北京，“一二·九”运动之后；第二次，是在徐州坐日本人的牢；第三次是1948年在上海，被作为共产党抓进国民党的牢。如今，第四次，他又坐牢了。

他已感受到1957年短暂的春天，狱中每人发了一本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贾植芳认为形势好转了。看守干部也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弄清楚了，你随时准备出去，像你们这样的人是国家的宝贝。不过，你出去后不一定回复旦。”

于是，贾植芳作好了出狱的准备。

不久，拿来一个名单，问他是否认识。上面写着王造时、孙大雨等人的名字。

贾植芳说：“我都认识，但没有来往。他们都是英美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呢？”

“我人还小一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看守干部一会儿就严肃地说：“他们是右派分子。”

从那之后，又停止了看报，待遇变差，烟给停了两年。1961年开始让贾植芳出号房劳动，由他带两个判了刑的犯人当勤杂工。每天负责扫地、挑饭、送开水，每天送三次饭，两次开水。这样，他见到朋友耿庸等人的机会就多了，但只能相互望望，一切尽在无言中。

送完饭，剩下的归他们三个人吃，这样，他们多少能比别人多吃一点。

每天，贾植芳挑着饭担，在三层楼里，上了下，下了上，似乎有永远上不完的台阶……

十二

狱中的胡风分子，到1965年秋天，除胡风、阿垅、贾植芳、耿庸、许史华等人外，基本上都释放回家。

1965年11月26日，是审判胡风的日子。在关押了10年之后，终于要给他判刑了。在宣判之后，通过梅志做工作，与胡风达成默契，不要再上诉，就可以宣布。

这一天，胡风被带到天安门附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里。被传讯来出庭作证的，有牛汉、绿原、徐放、卢甸、谢韬等。另外，看席上，一些文艺界领导人也应邀前来。

牛汉回忆当时的情景：

> 我们几个是个别地被传呼进去的，由一位法警领着，发完言就退出法庭。……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法庭，周围是怒涛般的眼睛，似乎要淹没了我，我自然不敢东张西望。迎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孤零零站立的人，这只能是胡风。他面朝着审判席，我向他认真地望了一下，比起十年之前明显地消瘦了，但面孔并不苍白，还是赭红色的，只是略有点发暗而已……记得胡风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袄，出奇地肥大，几乎长及膝部，他的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挑在袖口内，过去可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个闲散人的袖手习惯。他的整个形象使我感到很陌生，陌生这个词太不恰当，或许用“异样”二字较为贴切。胡风侧过脸向我这里望了一眼，我们有一瞬间的对视，他神情的冷漠并不使我感到惊愕，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种冷漠，我从冯雪峰那些年的神情里早已经熟悉了。冷漠的内涵是强烈的自尊，还有些难以察觉的轻蔑。……法庭最后宣布判决时，我们几个鱼贯进入大厅，被允许坐长椅上。胡风仍一个人站立在原处，双手袖着，微微闭着双眼，认真地在聆听着判决词，记得他并没有说话。随即法警把胡风带了出去。
>
> （《重逢》）

宣判结束后，参加出庭作证的这几个人，一起走到前门西侧的一家饭馆，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聚会。他们一人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然后分手，卢甸显得比谁都要

激动,泪汪汪的眼睛,有着复杂的内涵。

胡风被宣判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对于别人,这判刑也许失去了意义,可胡风却极为认真,他在盘算着,还有 4 年即可释放,到那时,他该干什么呢?1966 年 2 月 8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阿垅有期徒刑 12 年。

1966 年 3 月 25 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给贾植芳判刑。

在此之前,贾植芳已经得知要判刑,对于他,这已经无所谓了。他与狱中人员有一番对话:

"可以给你交个底,不会枪毙你。"

"什么?我们犯了什么罪,还要枪毙吗?"

"现在你还替胡风讲话?你再写份材料!"

"我不写,我全忘了。"停了一会,贾植芳补上一句:"你们写吧,写什么我都承认。"不知此时他是否真正想明白了。

25 日下午两点,开庭审判。贾植芳站在那里,听到一句:"1965 年 11 月 26 日,胡风认罪服法。""服法"他听成了"伏法",以为胡风已被枪毙,脑袋一下子发炸。周围一切仿佛不复存在,神情恍惚,后面说什么,判他多少年,也没有听清楚。

和阿垅一样,贾植芳也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这样,在 1955 年逮捕的胡风集团 92 人中,最后真正正式判刑的只有 3 人:胡风、阿垅、贾植芳。

第十三章 受难的妻子们

一

谁都能解释“妻子”的含义，却未必都能感受到这含义的分量。谁都能用诗、用画，描叙一番丈夫与妻子的感情世界，但未必能像胡风集团的丈夫们，对陪伴自己走过30年艰辛历程的妻子们，能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感激。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爱情就意味着一起品尝痛苦，爱情就意味着妻子以献身精神来支撑丈夫可能崩溃的精神世界，或者可能消逝的生命。

1955年被捕时正当青春年华的化铁，30年后，在1985年写一首诗，特地献给1957年与他结婚的妻子：《又一个画像——献给妻子》。他的诗，表达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许多作为丈夫的胡风分子们，对与他们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感激之情：

有一种感情叫爱情；
有一种感情叫感激。
是感激吗？
历史的发展由它记叙；
是爱情吗？
一分，一秒
一年，一月，
你的手，我的手
你的话，我的话
重复，累积。

是感激，是爱情，
都是，又都不是。

那么，是什么？在后人看来，也许他们的生活中充满浪漫情调。可是，在每一位妻子那里，那是度日如年的磨难，是他人难以想像的忍受、坚毅、抗击、柔情，是情感与理智的糅合，是理解和同情的糅合，是万千种情绪的升华。

有的妻子，为了丈夫，早早地死去。耿庸的妻子王皓，在反右高潮中，弃儿投江，未能与丈夫再见上一面。

有的妻子，受丈夫牵连而身陷狱中。胡风的妻子梅志，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卢甸的妻子李嘉陵，或长或短，都品尝了身为犯人的滋味。

更多的妻子，成了右派，成了反革命家属，在日常生活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遭受打击、屈辱。

然而，活着的总算活下来，和丈夫一起迎来了 1980 年。她们用生命，用情感，在丈夫的心中，写下了比他们的所有的创作还要美的诗篇。

二

梅志在被捕的妻子中间，在狱中呆的时间最长，是 5 年零 10 个月。

她是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捕的，何况还是胡风的妻子，刚入狱头两年，她不能看书看报，每天，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房中。晚上电灯高悬，几乎有 3 个多月无法安睡，过后，才渐渐适应这陌生的生活。

梅志关押在北京城内的监狱，和关在秦城监狱的胡风，同顶一片蓝天，然而，相互之间，谁也不知对方的下落。对母亲，公安部门是照顾的，只要梅志提出要求，便会安排她与女儿、儿子见面。

和儿子晓山的见面，是夹杂着辛酸的片刻欢乐。小儿子天真烂漫不谙人事，每次来，总要高高兴兴地告诉她学校里的事情。他说自己当上了少先队中队长，满脸喜悦；他又说，当大队长没有批准，满脸沮丧。每次晓山来，还带上一副象棋，这个年纪，正是对一切都好奇的时候。

为了让儿子高兴，每盘棋梅志都让孩子赢，晓山自然不明究竟，只是略带喜悦地责怪自己："我怎么能赢妈妈呢？"儿子毕竟渐渐长大，懂得了妈妈的处境。

1958年，递给她的第一套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从家中拿来的。她没学过经济学，但在这里面，她可以静下来，逐字逐句地啃下去。值得欢欣的是，从此她有了书，有了笔，比起前两年的狱中生活，这总算换了天地。

三卷《资本论》，5个月里，她居然看完了！每一卷后面的衬页上，她都用铅笔留下了学习心得。这不是用来上交的思想汇报，故她可以更真实地记录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在第一卷后面，梅志写上一段：

为富不仁

想不到英国的资本家的财富是靠妇女和儿童的血液喂养肥胖的，正如英国国家的财富是靠鸦片和殖民地国家的白骨一样！

在第二卷后面，梅志用100多字概括全卷的主要命题，她感叹："这里有着许多详细的计算，可惜我的数学太差了，但道理还是能懂的。"

1958年5月1日，梅志又打开《资本论》第二卷，拿起了铅笔。

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套红挂出了新近提出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反右之后，农业、工业，都进入了"大跃进"即将来临的准备期。工业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在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英国超过美国！农业方面的口号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提前，再提前；超过，再超过；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将在这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

狱中的梅志，感受不到千千万万的人们同样的热情和兴奋，有的只是悲哀。她写下：

今天是五八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外面正在欢腾鼓舞地庆祝这个节日。而我可坐在玻璃窗内，读着工人阶级伟大的导师的《资本论》。这，当然可以说是无上的幸运的，但同时也无比的悲凉，我已被摈弃于无产阶级之外了！

我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的书，但我可把《资本论》读完了。这在过去我是不能想像的，当然我不能说我完全了解了它。从《资本论》中，我是更具体地体会了辩证法，尤其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成就。

这样的读后感中，隐约流露梅志的复杂心绪。唯物辩证法，多么伟大的哲学，可在她内心，却也引发出几丝讽刺。既然事物可以相互转化，那么无产阶级不也可以转化为资产阶级吗？不过她当时还无从想到，还有更顽固的封建意识，会假无产阶级之手来给人们带来灾难。

她写了长达2000字的题记，感慨万分。但这并改变不了她继续坐牢的命运。改变坐牢命运的是她母亲的死。

胡风、梅志入狱后，由梅志的母亲照料孩子们生活。1961年初，母亲由于照顾不周，由感冒转成了肺炎，死于医院。她的尸首停放医院太平间，无旁人能够办理，在这种情况下，梅志获释出狱，料理母亲后事。

被捕时的家，现在已被拆掉，盖起了一幢大楼。房子作价付给一笔钱，现在，失去工作，背上黑锅的梅志，就得靠存款养家糊口了。胡风在哪里，是否还活在人间，她不知道。

1965年11月，梅志拿到了自己的《不予起诉书》，上面大意是：屠圻华原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因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于1955年5月17日被拘留，她过去帮助胡风从事《七月》、《希望》及“希望社”的工作，后又参予了“三十万言书”的抄写，因此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因在押期间表现尚好，特予以不起诉处分。

5年监狱，5年失业，得到的便是这样的一纸文书。

然而，苦难并没结束，对梅志精神和身体的更大折磨，还在后面。那是在“文革”中与胡风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三

路翎被捕之后，夫人余明英独自一人拖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度日如年：

> 我是湖北沙市人。国立联合中学念书。一位朋友写信寄来路翎的照片，我们就开始通信。1942年到重庆第一次见面。1944年5月结婚，是在北碚，胡风参加我们的婚礼。在一个旅馆租两间房子，胡风住一间，我们住一间。他俩谈话很晚。我到重庆后，先在中央通讯社、电台工作，一个多月后才和他见面。没住在一起。到南京后生第二个孩子时才有房子。1950年底我来北京，他是年初来的。

他是很自信，怎么会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呢？1954年我因身体不好从科学院辞职回家。1955年之后没法工作。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上托儿所，老大10岁，老二8岁。开始组织上给70元生活费，文革时卡掉。

开始几年还请保姆，我不会做饭。后来只好辞掉。1973年我很困难，带三个孩子。有政治压力，经济压力。我到麻袋厂。只有一个孩子有工作，另外两个插队。

我找工作要登记。他们说："你还要工作？"

"为什么不行？"

"你自己知道。"

我进了街道麻袋厂。一个月28元。路翎判刑后给我写信，让我带东西。孩子出去借10元钱，带牙膏、烟叶子。来信才能去。

1973年不让探监。1964年元旦(1月2日)回来一次，住一年多，1965年11月初又被抓走。抓走时他正在邮局写申诉书。被抓到派出所。我们吃晚饭时想，怎么还没有回来？公安人员来，问："路翎呢？"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才告诉实情，说送到安定医院了。

(1985年4月22日与李辉的谈话)

四

任敏在1958年底从上海到了青海，这时已出狱两年，没料想，到了青海，她会第二次入狱。

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告任敏在王戎家中曾攻击毛泽东，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又被关进了高原监狱。

她时刻惦挂着贾植芳。自1937年在西安认识贾植芳结婚之后，任敏一直跟着他走南闯北。贾植芳坐日本人的牢或者坐国民党的牢，她总是在外面四处奔波，以求保释。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贾植芳的哥哥的孩子，在1955年他们同时入狱之后孩子被送回了山西老家，如今，只有他们俩在相互默默地为对方祈祷。

任敏被关进看守所，凑巧碰上所长也是山西人。遥在西部高原，遇上老乡，毕竟是一幸事，于是任敏被安排当女犯人头目，协助所方管理。每当新来犯人，

都由她来搜身。她也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

她在狱中正是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的时候。一位牧民犯人饿得不行，求她帮忙弄一碗牛奶喝。她想方设法偷来一碗，谁知那牛奶是公安局长的，结果她被关禁闭，戴上了手铐。

从此，她增加新的任务：从监房里往外搬尸首。尽管她也体弱无力，又饥又寒，可是，每天她都得将饿死的犯人往外抬。常常抬完回来，她会头晕目眩，一躺下再也不想站起来。她想在脑海里抹去惨像的痕迹，然而无能为力。

1962 年，她出狱了，回到山西襄汾贾植芳的家乡，和贾植芳的父母一起生活。她的出狱并不是正式释放，而是当时那里实在无粮，让她自寻活路，临行时还抛给她一句话："先让你回去，什么时候要你来你就来。"

回到家乡，任敏才知道贾植芳仍在上海狱中。许久没有缝鞋的她，在灯下为贾植芳细心缝做一双布鞋。托贾植芳的弟弟寄到了上海。从鞋底的针线，狱中的贾植芳猜想任敏回家乡了。

贾植芳 1966 年春天出狱之后，仍属管制对象，任敏和他只能书信往来，未能见面。一个月，两个月，一年……1967 年 9 月，任敏终于凑够了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植芳自己来探望他的消息，也许她更愿意让他获得瞬间的惊奇带来的欢乐。

任敏来到并不陌生的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时已中午，贾植芳自己还没有回房间，任敏静静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不愿意让更多的人见到自己。



1967 年秋，贾植芳和夫人任敏在一起的合影。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

贾植芳来了，他刚走进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

“植芳，我来了！”

五

和一年狱中生活相比，丈夫的疯才是最折磨李嘉陵的痛苦。

自和卢甸结婚之后，本来与文学无关的李嘉陵，也多少同作家们有了接触，特别是胡风等这些卢甸的朋友。李嘉陵是在中宣部宣传处工作，胡风写“三十万言书”时她正好在家养病，卢甸带回几千字的原稿请她帮忙抄。她当时还开玩笑说：

“我做你们的秘书，我不干！”

就是这几千字的抄写，使李嘉陵成了骨干分子，入狱一年。到这时，她才知道，那个玩笑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到天津与卢甸的见面中断后，她一直不知道他在狱中的情况，脑子里只是那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头的印象。

1965 年，李嘉陵接到通知去接卢甸回家。她去了，没想到接回来的卢甸已让她感到陌生。

一见面，卢甸问：“你贵姓？”

“我是李嘉陵呀！”她很吃惊，几乎涌出眼泪。

他不再回答，回到家里，母亲也不认识。听到李嘉陵说“你回家了”，他应也不应，只是四下仔细瞧，疑心重重，他甚至怀疑李嘉陵是派来监视他的。晚上给他盛饭，他站起来连声说：“谢谢你。”白天给他一些书看。晚上李嘉陵回到家中，他赶紧站起来，说：“你分配的任务，我完成了。”

李嘉陵无言以对，只有把痛苦压在心里。

一些朋友闻讯前来看望，等送客时，卢甸便会站起来说上一句：“我一会儿再给你们汇报。”李嘉陵只好请大家不要再来探望。

到公安部门一问，她才得知卢甸患了文疯。

待病情稍稍好转，“文革”的风暴又将卢甸转到了一个名叫 919 粮油的农场。李嘉陵多想陪他一块生活，然而没有允许，只是从别人的嘴里，打听丈夫的情况。

在农场里，卢甸劳动十分积极，神智已经清醒的他，决心以劳动态度好来

弥补自己的错误。工人农民打内战，他承担别人该干的活儿，每年30天的假也从来不用。水中打蒲草，因水凉无人敢下，他一个人首先跳下去。猪生崽，无人管，他厮守一夜，还把皮大衣拿来给猪盖上。瘦弱的身体，却硬要背上140斤重的草席。除了劳动，他还教工人文化，什么事情，他都显得那么认真。

卢甸终于病倒了，住进医院，李嘉陵又来到他的身旁，陪他住院，坐在凳子睡觉，半年就这么过来了。李嘉陵学会了打针，学会了一切照顾这样的病人所该学的东西。卢甸大便出不来，她用手一点一点地抠，卢甸不会小便，她学会用手挤。

是妻子，也是一个尽职的护士，而且，从不会有这样尽职的护士。

同病房的其他人死了，卢甸却活着出院了，虽然落下了半身不遂。李嘉陵像教小孩一样，又教起卢甸讲话，使他慢慢恢复了记忆。卢甸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和别人不同，卢甸的党籍一直没有正式开除。恢复记忆的卢甸，又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他不知，此时正“天下大乱”。

李嘉陵不愿搪塞卢甸，只好去市里反映他的要求，回答自然是不置可否。卢甸仍不死心，竟硬硬让李嘉陵请人用三轮车拉着他，去要求恢复组织生活。

丈夫的话，丈夫用左手颤颤巍巍写出的材料，让李嘉陵心中涌出复杂的情感。她总是反复在心里说：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卢甸终于离她而去了，没能等到恢复党籍的日子，没能和朋友们重逢，更看不到他的诗作重又出版。

1973年3月21日，卢甸病逝。他走了，李嘉陵生命的一半，也随他而去了。

那一天，北方还不是春天。

六

绿原入狱时，给妻子罗惠留下4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4岁。她注定背着沉重的生活包袱，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罗惠和绿原是青梅竹马的情谊。她熟悉他，信任他，伴随他走过一段艰难历程。

1944年罗惠与绿原结婚后，和他的一些朋友，如曾卓、邹荻帆、冀汸、胡风、阿垅、路翎，她也建立了友谊。从他们的作品中，她看到了从它处所无法窥探的丰富内心世界。

但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绿原在全国性的报刊上被先入为主地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漫画中的他牵着狼狗，叼着烟卷，十分吓人。罗惠知道这不是事实。此时她在工人日报社被隔离审查，不仅被要求交代和揭发胡风的“反革命言行”、绿原的“特务罪行”，而且因为“绿原是特务”，她被推断是“三青团员”，被要求交代加入“三青团”的时间。罗惠说：“我不是三青团，绿原也不是特务。我和他从小认识，说他是特务，我不相信。结婚十年，解放前，我们那么穷，失业，到处借钱，怎么会有这么穷的特务？我从来没看见他和国民党的人来往。报上说他是特务，是不对的……”虽然她说的是真话，但引来的却是“革命人”的“革命行动”，一位男同事使劲煽了她一嘴巴，另一位女同事将一杯开水向她迎面泼来。罗惠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蒙受这种屈辱，也不知道是否还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离开单位后，她走向了附近的铁轨，她想一了百了。她等着火车的到来，她想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火车没有来，凉风却吹起来，这使她想起家中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在等她回家，她不能让孩子们在失去父亲后再失去妈，于是她离开了铁轨，踉踉跄跄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很偶然，她在某一天遇见了一个过去的同学，她不敢和她多说话，只问了这位同学当时的工作单位。后来工人日报社向这位同学调查罗惠的历史情况时，她证实了罗惠（学名罗德明）上学时“一心念书，不太过问政治”，到此，“三青团”的嫌疑才被取消。一年后，罗惠离开了被隔离的小屋，恢复了工作。

1957年，办公室里有人主动引她聊天，提到两类矛盾，提到胡风的问题，罗惠心无城府，率直地说：“胡风问题是个文艺问题，应算是人民内部矛盾”，“绿原确实不是特务”。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私下的谈话却被告密和揭发。于是在小组会上她被要求谈出自己的思想，她也实话实说：“绿原一直是追随共产党的”，“胡风是文化人，不搞政治，又没有当过国民党的官，怎么是反革命分子呢？”

虽然是有问才有答，然而有一天，她被带到一个批斗会场，横幅上写着“右派分子罗惠批斗会”。后来她被划为“六类右派”。虽然她不曾主动公开她“鸣放”过，却没有避免被引入陷阱。在两年后，她被下放到北京人民机器厂，虽然是个弱女子，干的却是男壮劳力的活儿，拉煤、拉砂、洗煤，等等。“文革”中又历经了种种磨难。1978年当她退休离开工厂时，一身病痛，手上伤痕累累，人们已完全看不出她当年曾是一个骑着自行车到处采访的报刊记者和编辑。

1979年,罗惠拿到了工人日报社党委给她的平反决定,决定说:

> 总起来看,罗惠在反右斗争中有一些错误言论,但这些言论大部分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在批斗会上主动交代出来的思想情况。也有一些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和对个别人讲的。话虽有的很错误,但据此不足以定为右派分子。原来的政治结论也认为"情节轻微",据本人申诉,当时被划为六类,我们查阅了档案,当时罗的行政组长晓亮找罗的谈话汇报中,也反映了对罗按六类处理的情况。
>
> 关于对六类处理的办法,我们查阅了中共中央1957年25号文件,文件规定,六类不戴右派分子帽子,"可以作中右分子处理"。
>
> 因此,当时既将罗划为六类,却又给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劳动,这是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总之:政治结论定罗惠同志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应予改正。

看了平反结论,罗惠才知道,当年她本不该戴右派分子帽子,本不该下放劳动。

平反决定在"错误言论"中还留有尾巴,其实这些言论客观上也没有错(几年后尾巴也撤销了)。不过文字的结论还可以改正,而时光却不能倒流。当罗惠拿着那份沉甸甸的文字结论,回首不堪再想的二十多年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往的苦难生涯再也不要回来了,尤其希望第三代人再也不要经历祖辈那样的灾难了。

七

牛汉被捕当天,公安人员到家中搜查,妻子吴平一声不吭,翌日得到了表扬。其实,她心中尽管相信党,她同样相信牛汉不是反革命。

她太了解牛汉了。1946年她毕业于西北大学外文系,与牛汉(当时叫牛汀)是同学。在她眼里,牛汉调皮,学习不专心,中途休学后,回校便领导起学生运动。

虽然她不像牛汉一样积极参加,却因为相爱的缘故,也给予牛汉不少支持。一次牛汉和20多个学生被捕入狱,吴平靠在校任教授的叔叔的关系,一次

保释3个同学,其中有牛汉。

保释出狱后,要求随传随到,不能到处走动。几个同学商量后,陪着牛汉和吴平逃离学校,由汉中、安康,逃到开封,就在开封,他俩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一切,都化成云烟。吴平面对的是无休止的盘问和交代。她并不从事文学创作,又不善言谈,每次见到胡风时,总是静坐一旁,任丈夫与他交谈。可现在却逼她交代每次胡风谈了些什么。进而,必须交代几年来到过家中的每个人的情况,来干什么,说些什么话。

吴平只得绞尽脑汁,一一写出,甚至将她和牛汉双方家中的所有亲朋好友的情况,都交代清楚。

那时吴平在铁道部工作,也让停职反省。久而久之,盘问和训斥,使她精神日益紧张。走在街上,总疑心后面有人跟踪;小纸团不要了也不敢扔到窗外,害怕说成递情报;亲戚朋友的来往中断了……在铺天盖地的声讨浪潮里,她只是一叶扁舟。

大鸣大放时,她恢复了工作,领导来动员她给党提意见,这次与罗惠不同,吴平的性格特点使她变得谨小慎微,她不敢提。

领导启发她:

"你对大家谈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意见,怎么看?"

"我没意见。"

"对你的处理怎么样?"

"我没意见。"

"那你就参加战斗吧!"

她仍然没有参加战斗,她知道自己早已失去了战斗的资格和权利。她的谨慎使她免受反右之苦。

最大的苦难是在"文革"中。吴平在北方交通大学外文系任班主任,"文革"开始,便给扣上"漏网胡风分子"的帽子,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伤。加在她身上有三条罪状:一、在北方交大给胡风送情报,因为吴平懂英文。将铁路的英文资料送去。二、替胡风抄"三十万言书"。三、阿垅在1953年到家里来与牛汉长谈,住过一宿。为了查清吴平的这三个问题,造反派专门派人到四川调查胡风,索取旁证。胡风回答:第一,没送过铁路资料,只送过牛汉的诗。第二,没有抄过。第三,吴平不爱说话,到我这儿来从不讲什么。

无法找阿垅对证了，这时他已死于狱中。

吴平也无法证实自己的清白。从1955年活到“文革”是多么不易。最苦闷的时候，她和罗惠都想去自杀。那是在1956年。罗惠想去卧轨，而吴平想跳护城河。坐在家中，吴平想到自己死后，孩子无人管，要跳就带两个孩子一块跳，可是……见孩子回来，天真活泼，她的心便软了。

不管怎样，10年已经挺过来了，眼前的挨打、审问，她也必须挺过去。

咬咬牙，她默默地在群众专政指挥部的管制下，干起扫厕所、拔杂草的劳动。

八

26岁的罗洛入狱前，正和杨友梅在谈恋爱。

突兀其来的变故，年轻的杨友梅承受了和别的妻子不一样的打击。

她最初是从诗中认识罗洛的。她喜欢他诗中对生活、对艺术的表达，更佩服他的才气，在相爱之后，她更加感到自己如果没有他，生活将会苍白无力。

杨友梅不相信自己爱恋着的人是反革命，她只听说过，国统区时，罗洛在成都学生联合会当负责人，组织读书会，1949年之后，这个读书会的成员，上百个都成了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他们不是早就在参加革命吗？

一个个疑问萦绕于心，杨友梅更加坚定了永远与罗洛相爱的信念。多少人相劝，多少人介绍对象，她没有改变初衷，而是更加坦然地承认自己与罗洛的关系。她知道，这种时候，狱中的罗洛更需要她的精神上的支持。

罗洛1956年底出狱后，杨友梅马上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恋爱，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对“怎么能和老虎在一起呢”这样的话，她也置之不理。1958年5月，他们结婚了，在许多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她把自己的命运和罗洛紧紧拴在一起了。

刚刚结婚，新的打击就来临了。上海派一部分人支援边疆，实际上是将大批有各类政治问题的人赶出上海，罗洛也在此列。

杨友梅又一次选择了陪伴罗洛的道路。没有豪言壮语，她只是从心里觉得，应该和他到困难的地方去，他需要她用妻子的爱慰藉痛苦的心。越是这种时刻，她越应该为他作出一切牺牲。

他们一起到青海，幸运的是罗洛被有关方面看重，不让他下放更苦的地

方,而是留在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虽然是搞自然科学,不能从事文艺,但对于罗洛,这时,有书,有安静的环境,比什么都要好。

罗洛先在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分到了图书馆当资料员。懂英、法、德、俄4国文字的罗洛,成了一位得力的资料员,他先后翻译了200万字的科技资料。

为杨友梅,恋爱时罗洛在1957年写过了一首首情诗,那是在出狱之后由爱情来填补心灵的空白。后来,即使在高原,在科技资料堆里,罗洛仍然没有忘情于诗歌创作;只不过不再像热恋中的诗人,仅仅写一些儿女情长。

从苦难中走了过来后,罗洛应该为杨友梅写诗。一首《文竹》讴歌大自然弱小而坚毅的生命,不妨视为他为杨友梅而写:

你是那样纤秀
你是那样瘦弱
这多年,没有阳光
没有温润的风
你救幽禁于
无星无月的夜之谷
依靠几滴清水
几粒泥土
和执着于生之意志
寂寞使你憔悴
凌辱使你坚强
苦难使你成熟
你给世界一个希望
一个不屈的生命
一片纯净的翠绿

第十四章 受株连的人们

一

据1980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1955年胡风集团的清查中,共触及了2100余人。

将受牵连的人一一查清,几乎永远也不可能了。

在惊涛骇浪汹涌而至的时候,许多与胡风等人有亲戚关系、友情关系、同事关系的人,相继受到冲击,或者被捕入狱,或者隔离审查,从此命运发生根本变化,一直到"文革"之后迎来生命的春天。

湖北蕲春县,是胡风的家乡。胡风案发,这里自然掀起一股热浪。与家乡素无往来的胡风,他的作品却导致全县许多语文教师的磨难。一些亲戚,也为此被推入逆境。

罗洛在国统区时期,是成都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因他之故,一些当年一同搞学运的同学、领导人,难以解脱,被打成胡风集团的影响分子。一位曾与罗洛共事的地下党员,林祥志,1948年曾到农村组织武装暴动。这时被说成是罗洛在成都的代理人,以他为首,又牵连几十人,直到1979年才平反。而林祥志,因为与罗洛关系密切,又与阿垅、方然要好,更和胡风通过信,结局更惨。他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四川组织"的"头目",妻子离婚,自己也神经错乱,死于"文革"初期。但林祥志自1955年到死,从未抱怨过一句。平反追悼会上,称他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1946年曾在胡风的《希望》上发表过一首诗《秩序——向北方的诗人们写的一篇报告》,诗中他向田间、鲁藜、孙钿、艾青等诗人致意,这是郑思发表在《希望》上的惟一一首诗。1949年以前在香港时,因

为与胡风杂志的关系，郑思曾受过批评，他表示划清界限。1949 年后曾看过胡风一次，但并无其他来往。1955 年，郑思也被抓起来审查，他受不了思想矛盾的折磨。一位老党员，便偷偷藏起安眠药。然后，把儿子送走，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饮药自杀。

在《民间文学》任编委的侯唯动，也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的作者。胡风事件前，他因别的事情，已经受过处分，这时却因为胡风的关系，又将他定为坏分子，下放到廊坊地区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一直劳动了 30 年。

四川永川县一位老师，40 年代与徐放有过通信联系，后中断，50 年代又给徐放一信，由徐放的妻子代回一封。这时他交出此信，却未能避免打击，老婆与他离婚，自己从此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罪人。

与耿庸在新文艺出版社同事的一位校对，考取厦门大学历史系。他从未去过福建，而耿庸是福建人，熟人较多，便写信让他去见大学的两位教授。事发后，他被说成是耿庸派到厦门大学作联络员的，抓起来审查，自杀多次，却又侥幸地活了下来。

出版过胡风等人作品的上海海燕出版社经理俞鸿模，同样逃不了审查、关押。他吃一把大头针想自杀，被抢救过来。可是，“文革”中仍然自杀身亡。

南京部队一位军人，喜爱文学，曾到复旦大学听课，和贾植芳握过手，还见过王元化。回部队后，他为此感到骄傲，曾对许多人讲过，这时，被打成“受影响分子”，下放劳动。

费明君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的，贾植芳 1951 年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由梅林介绍他来学校任教，后任华东师大副教授。1955 年，因他与贾植芳的关系，加上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被捕入狱，判刑后送青海，后来饿死青海。

一位在公安部文工团工作的人，来复旦大学进修，有时到贾植芳家中请教。1955 年，在贾植芳被捕的第二天，他身穿公安服，仍来找贾。随后即被逮捕，开除军籍。

受到牵连的人数恐怕是难以统计完整的，除了已经提到的名字外，文化界中受牵连的人士还有贺敬之、李瑛、邹荻帆、冯白鲁、伍禾、林希、何苦、李离、胡天风……

一串由苦难凝聚而成的名字。

一件件难以令人相信的牵连。一封信，一次握手，甚至对某一位骨干分子

作品的喜爱,都可能招致打击。

二

因贾植芳而受牵连的复旦大学学生有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等人,命运最为坎坷的是施昌东。

施昌东是浙江温州人,出身贫苦,1951 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给学生讲授写作课时,贾植芳第一次认识了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和学习精神,从此,施昌东便成了贾植芳家中的常客。

看到施昌东对钻研美学兴趣浓厚,贾植芳鼓励他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他借给施昌东有关美学的外文书籍,还专门为施昌东从俄文翻译出普列汉诺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供施昌东参考。在贾植芳的指导、帮助、鼓励下,施昌东在学术研究上很快崭露头角。在三年级,他发表了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这时他才二十二三岁。随后他又写出了20 万字的《鲁迅美学思想》书稿,毕业论文《朱自清论》。就在毕业前夕,胡风集团一案将他卷进了无情的政治漩涡。

在贾植芳被捕后不几天,施昌东也被捕入狱。

施昌东后来写了自传体小说,其中写到自己被捕的情景,除了人名更动之外,细节均可看作他的回忆:

> 不多久,我就到了人事处。我立即看到一个身材矮小,戴着眼镜,长着一副很像老太婆面孔的中年妇女在那里整理着档案袋。她就是人事处长。我问:"吕处长,是你叫我来的吗?"
>
> "史可夫,公安局来了两位同志……"她还没有把话说完,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公安人员急速地走到我的面前,大声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
> "史可夫。"我回答说。
>
> "你是胡风分子,你被逮捕了!"他迅速地把一张长方形的纸头放在我的面前,我还没有看清那是一张逮捕证,就被另外一个身穿毛蓝色中山装便衣的公安人员抓住了。
>
> 那个身穿毛蓝色中山装便衣的公安人员挨近我的身体,一手搭

在我的肩膀上，一手握住我的左手，如同我的亲密朋友同我手挽手地走在一起那样，把我从人事处带了出来。他轻声地温和地对我说："史可夫，你老实点呀！老实点，知道吗？"

"我绝不会逃跑的。你放心吧。"我也温和地说。

一辆很小的草绿色军用吉普车停在公路桥桥头旁边，我想大概这辆吉普车就是用来逮捕我的吧。果然，那个公安人员打开车厢的后门，要我进去，然后他也跟上车来。咔嚓叮当的一声响，他从裤袋里摸出了一副手铐，把我的双手扣上。这时，我才明白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史可夫，竟然被当作一个罪犯，一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我要坐牢了……。我突然伤心起来，不禁流下泪来。我眼光透过那小小的车窗口，天上布满乌云，阴沉沉的一片，那公安人员看我朝窗外看，吆喝着说："你看什么！"说罢就把那小窗上的一块草绿色的窗帘放了下来。然后，他又拿了一条手帕，盖在我的手铐上。

施昌东在狱中关押一年后出狱，紧接着在反右中，他又因为胡风一案打抱不平被打成右派，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施昌东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仍不放弃美学研究，1976 年，他患了胃癌，动手术后，医生宣判他少则活三个月，多则半年。然而，"文革"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形势，使他得到彻底平反，又看到了贾植芳先生的平反和幸福的晚年，精神于是为之一振。他顽强地与癌扩散斗争，奇迹般地又活了将近 7 年，7 年间他又写出了 7 部著作，达几百万字，被世人誉为"与生命搏斗的美学家"。

1983 年 8 月 21 日，施昌东逝世。就在垂危之际，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贾植芳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贾植芳说："我本来应当是他走向知识海洋的带头人，结果反而倒成了他苦难生活的引路者，现在以我 68 岁的年纪为才 52 岁的学生办理丧事，这于我说来是彻骨的痛苦和无尽的悲哀。"

这是他的悼词。面对学生的遗像，贾植芳想说的很多，很多……

三

苏予比姐姐张瑞小 3 岁，1944 年张瑞和阿垅结婚时，苏予才 18 岁。

40年后，苏予找到了张瑞1940年9月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上的诗《真理的花开》，那一年，张瑞17岁。见到姐姐40年前的诗作，苏予有着比诗中描述的寂寞更为深沉的情感。因为阿垅是她的姐夫，她在1955年之后，政治生活道路也发生根本转折。

张瑞的诗的附言写着：献给那些为自己制造痛苦的灵魂，愿能在他们的心上，减轻一点沉重的负担。

诗开头是：

你说玫瑰的刺伤害了你，
丁香又使你抑郁。
月见草使你的灵魂
染上沉浊的夜色
轻愁的兰花在你心里
开出了寂寞。

但我告诉你——
真理开了花。
……

对于苏予来说，真理最终开了花。只是没有想到时间要那么久，开得那么艰难。

姐姐自杀的那天，正好是苏予的20岁生日。她没想到刚刚结婚两年的姐姐，会走得那么早。自姐姐死后，家里和阿垅还有一些联系。但苏予和他除偶尔通通信外，没有什么往来。

和姐姐不一样，苏予虽然喜爱文学，但更热衷于学生运动，是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在19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由组织联系她到了解放区。1949年，苏予随人民解放军进京，先在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后到市府任副秘书长的秘书。

组织上对苏予十分信任，让她负责机要工作，担任保密委员会秘书。后又任市府办公厅秘书，同时，被选为党支部纪检委员和青年委员。她的文才也受到重视，任《人民日报》特约通讯员，并时常为市内报纸撰写社论、短评。

她的前景，铺着彩虹一般的美丽。

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浪潮一起，对她的信任、重视顿时化为云烟。就因为，阿垅曾经是她的姐夫；就因为，她在一次文代会时去看过他一次，并且通过信。

第一批材料一公布不久，市府办公厅保卫科，便带着公安局的人来到苏予家中，拿出了搜查证，将阿垅的信、姐姐的照片、她的日记等一并抄去。

苏予随即被停职反省，写交代材料。8月份，随着肃反的全面展开，她被隔离审查，那时孩子刚刚一岁，可她半年多不能回家。审查结束后，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到1956年底，才回到市办公厅秘书组。

1957年春天，给苏予作出肃反结论，大意说，苏予和阿垅是亲戚关系，但政治上没有联系，思想上受胡风反动思想的影响，根据这几条，不给予她党的处分。苏予的党籍保住了，但“控制使用”4个字，却压着她不能舒畅地工作、生活，丈夫也受她的影响，内部控制，不能入党。

反右运动之后，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苏予离开了办公厅到郊区农村劳动一年，留下丈夫和两个孩子，小的只有9个月。

劳动一年后，苏予被安排到中学教书，但一遇运动，原机关就把她召回。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一案发生之后，机关反右倾，便将她弄回开会，批判她的右倾思想，当年冬天，又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苏予又回到学校教书，后调至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文革”中，又用两年的时间反复审查她的历史，审查结束后，下放农村劳动，然后又调学校教书，直到平反、落实政策，苏予才结束四处奔波、受歧视的生活，成为大型文艺期刊《十月》的主编，为文学界同人尊敬。

1980年11月，十月文艺出版社收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来函：

阿垅系你单位苏予同志之姐夫，请将阿垅的判决书，让本人过目后存入本人档案。

苏予看到了阿垅的判决书：

> ……现经本院复审查明：阿垅解放前虽曾在国民党军事部门任职，但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罪不能成立。解放后与胡风等人的联系及其活动，无反革命动机和目的，现行反革命罪亦不能成立。故依法撤销原判及(66)法刑——裁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宣告阿垅无罪。

“阿垅无罪。”

因无罪的阿垅，因当了两年姐夫的阿垅，还因早已死去9年的姐姐。苏予从1955年起，就这样走了过来，一生最好的年华29~52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四

鲁藜那首《泥土》，短短4句，当年却为许多青年人喜爱。抄录在笔记本上，更有一些年轻人，为学写诗，慕名写信求教。

沈阳一位正在大学念书的学生王志刚，因为与鲁藜通过两封信，而受到难以想象的株连。更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只到过他家两次的一位卫校的女学生。

王志刚的母亲住院时，正在医院实习的鞍山卫校学生关洪竹负责照料。王的母亲出院后，出于感激，请关洪竹到家中来过两次。此时的王志刚已与一个青梅竹马的姑娘谈恋爱。

胡风事件案发，因给鲁藜通过两封信，王志刚被所在学校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本无任何关联的关洪竹，也被所在学校列为审查对象，后给予警告处分，扣发毕业证书。

看到一个热情照料自己的姑娘蒙此不白之冤，王志刚的母亲于心不安，她强迫王志刚与原来的恋人中断关系，而改与关洪竹结婚。仿佛这样，她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王志刚在1986年10月2日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写到：

> 因附的复印件复印，误了两天才寄去。洪竹的档案至今存放在鞍山市档案馆，为落实政策鞍山卫校抄了一份，今天看来，当年定案是多么可笑。为了我和鲁藜通了两封信，大动干戈……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把洪竹隔离反省一年，一个农民的女儿，双亲承受不了这突来的灾难，洪竹的母亲疯了，给她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大弟弟病故了。
>
> 母亲因葡萄胎住院认识了热情服务的当年卫校实习生关洪竹，得到了她的照料。不料想，只到家两次的关洪竹，竟为我与鲁藜的两

封信给她带来了灾难。这样，母亲叫我与她结婚，我在经过痛苦的与童年相处的嘉娘(苏联侨民)分离之后就遵母命了。嘉娘后来离了鞍山，家迁到比利时。1955年后，内控失业，接着又把叛国的罪名加于我的头上。这样我在铁路当养路工十八年。我与洪竹有四个孩子，这十八年中，我工资42.50元，有时病休仅25.50元。生活痛苦极了，但总算活过来了，1979年平反，直到1986年5月才彻底平反，那是由于有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的帮助。……

关于关洪竹平反的决定，是比任何描述更能反映她的悲剧性命运的文字。兹全文录出——

关洪竹，女，5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中专文化程度。原籍辽宁省辽阳县人，现系鞍钢立山医院退休职工。

关洪竹同志于1953年8月入鞍山卫生学校学习，应于1955年9月毕业。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由于其对王志刚的问题，以及在平时的恶劣表现及其反动言论，做为斗争对象”，进行批判斗争、隔离审查，令其交代问题，并以所谓“思想落后，对抗领导，打击同学”，“在肃反运动中不积极交代问题”等为结论，于1956年3月21日给予关洪竹同志当众警告处分后分配工作。(扣发毕业证书)经复查认为：

1.关洪竹同志与其男朋友王志刚同志的交往是正常的。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王志刚同志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鲁藜”有通信联系，怀疑王志刚同志有问题(已平反)而使关洪竹同志受株连，并以关洪竹同志平时所谓“恶劣表现与反动言论”做为斗争对象，给予批判斗争，隔离审查，拆看两人之间的通信，并认为“态度不好，抗拒运动”是错误的。

2. 据关洪竹同志的班主任傅俊民等老师反映，“关洪竹同志在校学习期间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表现十分良好，听从党和教师的教育”，定案中写有“思想落后，对抗领导，不遵守纪律”等问题，没有证据，给予定案是错误的。

根据复查结果，学校党委于1986年7月28日讨论决定：

1. 撤销辽宁省鞍山卫生学校五人小组1956年1月21日对毕业生关洪竹同志的处理意见。

撤销辽宁省鞍山卫生学校1956年3月21日对关洪竹同志行政当众警告的处分决定,恢复名誉。

2. 退还本人的交代材料。

3. 因错误处理使关洪竹同志毕业后拖延半年分配工作,造成经济损失,给予200元生活补助费。

200元,对于关洪竹已失去任何价值。重要的是,这纸文字,毕竟证明了她的无辜。虽然比其他受株连的人,她拿到得实在太迟,太迟。

五

冀汸的亲戚中,二内弟殷为良受的打击最为严重,由审查到开除公职,由精神分裂症到"文革"病故。

1981年4月1日,冀汸给浙江省文联党组写一报告,请求协助解决殷为良的平反问题。信中写到:

我的二内弟殷为良同志(又名立奇),原为青海西宁石油勘探局所属某地质调查队的一名职工,与我从不曾见面。只有过几次通信联系。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和我的关系受到审查,过火的斗争使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受到极不公正处理:开除公职,驱逐外地,而且不能转出粮户关系,致使生路断绝,于1966年病死在故乡。他是因为我受株连的亲戚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

……

殷为良的哥哥石奇,写了关于殷为良的情况的材料:

立奇,原名为良,1936年生,1954年温州读中学时考取西北石油工业学校,去西安学测量,1955年分配到青海西宁石油勘探局工作。

初时来信，情况正常。同年，肃反开始后，来信谈到受审查，受处分，主要是因为和冀汸有亲戚关系（尽管并没有什么接触），曾经写过一两则什么小东西通过冀汸投寄给少年报这类的儿童刊物，就要他交代和冀汸的关系，揭发冀汸。他当然交代揭发不出什么东西，可能表示过不相信冀汸是反革命。因此，又被加上隐瞒、包庇的罪名。他信里还说，身体不好，工作不下去，想回家养病。

1956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兰州一家旅馆的来信，说立奇住在他们那里，表现不正常，似乎有病，又没有钱，我立即汇了钱去，请旅馆照顾他上车回上海。

几天后，他到了上海。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个精神已经失常的人，问他情况，他说不清楚，只是在他行李里找到一份材料，说他除前述问题外，还旷工、打人，受过管制，屡教不改，是个坏分子，已经法院判处，行政上开除。

不和家属联系，不管他是个病人，甚至也不管他的粮食、户口，当然更不管他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驱逐出境”了。

在上海，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为了弄清楚他在青海的表现，他起病的时间、原因和过程，特别是他的某些表现和他的精神病是个什么关系，也为了解决粮食户口这些实际问题，我曾请组织上一再给石油局写信，几经周折，也没有弄清楚。最后我只好自己给青海省监察所去信，也没有能解决问题（粮食户口解决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不了了之，相反，后来我自己倒背上一个“包庇坏分子”，“为坏分子鸣冤叫屈”的罪名，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问题之一。

立奇在上海住了一阵，住不进医院，无法治疗，以后送去杭州，住了半年精神病院，后来又送温州住半年医院，都未见效，只好送回家，由年迈的父母照顾。

父母为了立奇问题伤透了脑筋，特别是立奇有时恶性发作，无法制止。母亲原有高血压病，1958年某日，父亲不在家，立奇又发作了，母亲制止不住他，被他推倒在地，引起脑溢血，父亲回家时，母亲已经死亡。

立奇本人，在父亲勉勉强强的照顾之下，拖到1966年也病故了。

六

冀汸为受株连的内弟的平反四处奔波，他不会想到，一个曾经与他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因他而遭受了不幸。

1985年，冀汸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者是读了冀汸新近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之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而写出此信的。信中写道：

> 您未必会想到，我这个陌生人远在1954年，也曾和您有一面之缘。我所以至今还保留着这个记忆，是因为它是一条“魔索”中的一环，这条“魔索”二三十年间一直无端地捆缚在我身上。
>
> 您当时是在浙江文艺社工作的吧，因为我曾把我的一组诗稿寄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不期由《人民文学》的编委胡风先生把它转寄到您处，您便来信约见了我。我见到了一位很年轻的人，目光犀利（有点咄咄逼人），然而吐词恳切，手头也忙着，把我让到会客室，抽了三五分钟的时间跟我谈了谈稿子的事。分手的时候，您亲自把我送到大门口，在热情有力的一握中，对我说：“诗歌是文学的初阶。你既然热爱文学写作，不妨也写点别的什么吧！”
>
> 我压根儿不认得胡风先生。先生纯粹出于作家的责任感，表现出他对一个热爱文学的小青年的提携之忱。在把我的稿件寄给你的同时，他亲笔给我来了一信，写了不少赞许和慰勉的话，同时他下了“饱满有余，严肃不足”的评语，大家之见，一语中的。我是去信致谢的，漫然涉笔，还扯了一句因病居家，工作无着之苦。然而我万没想到胡风先生竟是一个如此热血心肠的人，他了解了我的处境就又给省政协的方然同志去了信，请他过问一下我的生活。由此我和方然同志也见过两次面。说来可笑，先生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是用王晓起的笔名寄稿去信的）；我是1949年在福建参加革命，1953年因肺病久治不愈由组织上动员暂时返回杭州原籍在家养病的，这一点，先生也不知情。一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一位长者，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子能垂以爱助（它足见先生精神品德之弥高），本来是一宗十分感人的美事的善举，然而不然，它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株

连和祸害。

1955年,先生事发,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三批材料,我这个青年团员在惊骇之余,出于"第一种忠诚",就主动地交出了先生给我的来信(仅有一封),并坦诚书告其中的原委。没想到,中共杭州市委的三人小组说我不老实。要我详加交代,听候审查;同时由上城区团委下属的病号团员小组对我进行批判帮助。直到1956年夏才算审查结束,出以一纸证明,"王虽不是胡风分子,但受到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究实而论,这种戴帽法对于一个党心即我心的革命青年是个莫须有的鞭斥。

自我于1956年冬到萧山县任教中学语文的二十余年间(我于1980年冬调来杭州幸福丝织厂教育科搞职工业余教育),一直尝到了个中滋味。大好前程,从此顿失。"文革"期间,我也理所当然地挨到了上纲揪斗的斧吻。

如今,"魔索"已去,时光已逝,"那堪云鬓影,来对白头吟!"

七

和冀汸一样,平反后的鲁藜,也收到一些当年因与他通信或读他的作品而株连的人的来信。

一位在延安鲁艺上学的人,喜欢鲁藜的诗,将《泥土》抄在笔记本上,为此被打入"胡风七月诗派",背上"鲁藜密友"的罪名,还被勒令交出鲁藜给他的40封信,而实际上他一封信也没有,更不曾见过一面。

一位来信者说:

1961年,我在浙江临海师范学校读书,一天,班主任老师发给学生一张小纸条,上面有4句诗,未署名。(诗即鲁藜的《泥土》——引者注)班主任问我"是好诗还是坏诗?"我回答说,"是好诗。"后来知道是您的大作。学校说我"同情右派",当年4月10日将我清理回家。最近,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替我落实政策。

一位来信者不仅用信、也用一首诗记叙自己受株连的奇闻。他在信中说:

这首诗，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没有任何虚构与典型化——1954年我正上初中二年级，因酷爱文学却又是个穷学生，便硬凑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您的诗选《鲁藜诗选》。结果1955年毕业后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教书，被另一位教师告密：说我私藏“胡风分子鲁藜的诗选一本”。一个大雪天的夜晚，我莫名其妙地被一群区、乡学校的干部抄检了书桌，当晚我便被送进县里“肃反”的高墙里，整整被折磨了一个春天……直到作家胡风同志平反后，我的这桩“天外冤案”才终究了结。……

这位因《鲁藜诗选》而受株连的中学生，写信时已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了。他写的诗题目就叫《我买了一本〈鲁藜诗选〉——致诗人鲁藜》。

他是用整个青春、整个生命写出这首诗的：

……
我买了一本《鲁藜诗选》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的诗选
竟给我这十七岁的青春带来灾难
为了这本充满新生活的“诗选”
在高墙里，我整整反省了一个春天
待到山花烂漫——作家胡风平反
我才爬出了漫漫长夜的文字狱的冬天
因为我爱上了一本《鲁藜诗选》
——一本充满生活、泥土和阳光的诗选

八

1982年7月，《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李辉对胡风的专访《京华访胡风》，这是报纸上较早地介绍胡风近况的文章，它马上勾起了一个当年受到株连的读者的心。他无法得知胡风的地址，更不知道专访的作者的地址，但他有满腹心事要倾吐。于是他直接给《羊城晚报》写信，托报社将信转给专访作者——

今年7月，读了您写的一篇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访问记《京华访胡风》。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认识了您。我从此心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胡风同志自由了。我能不能知道他的住址，或他的通信处，写一封信给他，同他说一说我过去的遭遇呢？这样，我就想到应该先通过您，请您告诉我与此有关的事情。因为我读了您的文章以后，才点燃了我心头的火。其实，这火早已熄灭了。现在不过是灰烬。

李辉同志，在50年代中期，胡风案件是轰动了中外的大案，在肃清胡风集团的肃反运动中，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手段：拘禁，以后是逮捕、坐牢。在中央13人小组关于处理肃反中的问题的若干规定文件下达以后，不得已把我释放了，但又留下一条沉重的政治尾巴。原来弄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胡风党羽”的材料，一律归入档案，我的思想包袱是极沉重的。至于碰钉子之多，颠沛流离之苦，更是难以说清的。

原来，我并不认识胡风。我是从读鲁迅先生的书里知道胡风的。在1949年，作为一个兵，我在上海解放以后的第二天进入上海。1950年夏天，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举办“星期文学讲堂”，其中有胡风同志主讲的一个专题。我听了他的讲座。1952年，我学着写诗。我苦于没有老师指导，便写信请求胡风同志为我看自己的诗稿。但我并没有将诗稿寄给胡风同志，此后也没有向他求教。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有关我的“检举”材料，排山倒海地寄来了，与胡风的接触、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的联系，组织胡风小集团，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些具体材料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手段搞出来的。就这样，残酷地折磨了我23年。现在仍然在以同样的强度折磨我。肃反运动中，主管我的案件的人告诉我，有关胡风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管，他们已经从那里弄清了我和胡风通信的情况，也查到了胡风的日记，据说记着这个，应该说，我的问题该清楚了，但那些假的检举材料，假的证词，就是不肯放弃。

李辉同志，文章作者和读者之间往往有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我读了《京华访胡风》以后，虽然我只知道胡风现在干什么，但我也由此想到更多的事，比如，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

西，可见对他就不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以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我只是一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喜欢读书，由于我文化水平低，也没写出一篇好东西，一直在做工，当兵。从那以后，连学习写的勇气都没有了。又背着沉重的包袱。

……

九

受株连的人，一封封信，倾吐着真情。劫乱之后，他们没有太多的怨言，更多的是庆幸，是思考。他们在思索，株连九族，封建社会的遗物，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一度出现；他们在期望，历史阴影永远会驱散。

中国的历史，将因十年“文革”的出现而发生伟大的进步——尽管这是血与泪的教训换来的进步。

第十五章 十年“文革”——又一个怪圈

一

狱中关押整整10年之后，胡风在1965年11月26日，接受了法庭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按照宣判之前通过梅志做工作而达成的默契，胡风没有上诉，默默地接受了加在身上的罪名，不过，他仍然向中央写了题为《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

他“心安”，接受加在身上的所有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又“理不得”，他无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处。这种矛盾心理缠绕着他，终于导致几年后的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铁窗外的世界，胡风一概不知，他更不会料想到——以他的思想和忠诚是不可能的——这次他上书的中央，很快就要发生震惊中外的内部斗争，并导致十年“文革”的出现。

就在这一年的1月25日，毛泽东决定，刘少奇——仅次于他的地位的人——必须下台。这是来京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高级领导证实的。就是在这次访华中，斯诺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

胡风判刑之日的前半个月，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了对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的批判。“文革”报刊上称，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经过七八个月的反复修改写成的，并经由毛泽东不止一次的审阅。

10天之后，11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姚文元的文章说到：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

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随即,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于是,围绕姚文元的文章而发生北京市市长彭真与毛泽东的冲突,便揭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

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何能发生,一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文字:

> 当然,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一些因素,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然而,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还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个人的性格、品质、心理、爱好,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的。对毛泽东个人来说,他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同他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等人竭力推行"个人崇拜",成了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刘少奇下台"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主张的好意见,一概当作"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来批斗,从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

历史终于违反人们的良好愿望,从 1955 年经由 1957、1958、1959 年,而走进了 1966 年新年的门坎;从批判邓子恢、从"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走到一个个显赫的人物被打倒在地、一个个"反党集团"应运而生的年代。

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胡风还来不及观察、思考。他回到了家里,这一天是 1965 年 12 月 30 日,入狱 10 年零 7 个月之后,他与梅志第一次坐到了自己家的屋顶下,他与儿子、女儿第一次重逢。

胡风又将被卷入蓬勃兴起的运动热潮,更多的当年参与创造 1955 年历史的人们,也将卷入进去,和当年的胡风一样,在逆境中生活,在狱中,或在干校——变相的劳改场所——劳动。比反胡风更为猛烈、更为持久的这场"文革",将使许多人在痛苦中思考,在思考时醒悟,在醒悟后奋起。

又一个怪圈,更大,更怪,在形成,在旋转。

二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对中国的文艺界已经深为不满。《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集团事件、反右……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早已树立了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绝对思想权威。可是，他仍然不满于文艺界的种种现象，特别在1962年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之后，他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形成，阶级斗争在他那里，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离不开它。在1963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1962年9月，就小说《刘志丹》，毛泽东提出了“利用小说反党”的观点：“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政治、经济，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文艺界。于是，周扬、茅盾，甚至陆定一等，他们所经管的文化部门的工作，自1962年之后，便一再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斥责。

1963年9月，毛泽东两次指责如今戏剧舞台都是陈旧的内容，指示要推陈出新。他说：“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下推陈出新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员外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点名批评文化部，这时的文化部部长是茅盾。

毛泽东说：“《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就不给他们发工资。”

同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毛泽东作出更为严厉的批示:

>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
>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毛泽东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分期分批地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长期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同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重要批示:

>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作这个批示的同时,毛泽东又专门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写到:“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毛泽东的批示,7月11日就作为正式文件下达,文联各协会的整风运动便又展开。

当年8月,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批判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展开。

毛泽东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

胡风在狱中10年,文艺界并不因为他的消失而风平浪静,除1957年反右之外,大大小小的风波从未停息过。一次风波,便跌倒一个或几个甚至一批人,他们或者批判过胡风,或者压根儿没介入过从前任何风波。

如今,“文革”毫不留情地向一切人卷来,文艺界的领导人,除了郭沫若几乎无一例外。不管他过去如何积极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管他过去如何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一切批判运动,都像先于他们跌倒的人一样,也被无情地当作敌人推翻了。

三

首当其冲的是周扬。

1966年2月2日到2月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率先从林彪势力范围内,向文艺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艺黑线”。

会议整理出的座谈会纪要,交给毛泽东,由他作了3次审阅修改,纪要中说:

>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括号内为毛泽东所加)

批判“文艺黑线”随即在报刊上展开。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的内容,就是上面提到的座谈会纪要中的观点和内

容,将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第二天《人民日报》便转载这篇社论。

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文艺黑线”,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戏,正如批判胡风,成了肃反的开场戏一样。文艺,似乎永远为政治运动铺平道路。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正式开始。批判“文艺黑线”的浪潮由此一浪高过一浪。

6月29日,江青、张春桥组织撰写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作为中央68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提出对文艺界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

>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
>
> 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红旗》杂志出版的第二天,7月2日《人民日报》也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11年前,胡风的罪名之一,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讲话》,现在,历来被认为宣传、贯彻《讲话》精神的周扬,也成了反对《讲话》的敌人。

《讲话》从一诞生,似乎就成了文艺界敌我之分的标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高擎起它,批判起周扬等人了。

全国性学习《讲话》的高潮顿时掀起,和1952年文艺整风时的重新学习相比,此时的高潮发生了量和质的巨变。

7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出现通栏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集中发表各地各单位批判周扬的大字报。7月17日,该报又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发表《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武继延的这篇文

章中给周扬列出八大罪状，除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外，还批判周扬“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妄图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宣部举行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从此，周扬像当年的胡风一样，受到当年所使用过的各种形式各种语言的批判，不容辩解，不容反驳，面对发生的一切，他已无能为力，只能如胡风一样，无条件地承受加在他头上的一切。

周扬入狱了，关进胡风刚刚离开的秦城监狱。在狱中，他将度过8年的时光。这8年，胡风也被重新关入狱中，并由有期徒刑14年改判为无期徒刑。

林默涵作为“文艺黑线”的“第二号人物”，也被推入逆境。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批判。

1966年9月22日，继批周扬之后，《人民日报》又以一整版篇幅批判林默涵，并且加了“编者按”。按语中说：



周扬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挂上了黑牌。

林默涵和周扬一样，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他们滥用职权，发号施令，阳一套，阴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文艺界以及在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干尽了坏事。

……

林默涵一贯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与周扬合谋，篡改历史，围攻鲁迅，妄图为三十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他与周扬合伙，扯起了“全民文艺”的黑旗，为各种毒草的出笼大开方便之门。他与周扬一起，结党营私，安插亲信，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林默涵也入狱了。关押几年后，又下放到江西劳动。

和胡风曾有较深私交的邵荃麟，40年代在重庆时赞同过胡风的文艺思想，后来到了香港，受到批评，转而撰写长文批评胡风。在1949年后的十几年间，他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如今，他同样和周扬、林默涵一起关进了监狱。

1971年6月10日邵荃麟病死在狱中。

就在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陆续被捕入狱的同时，上海的评论家以群，北京的作家老舍等，先后忍受不了迫害，自杀身亡。

1955年批判胡风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曾负责签发三批材料。这时，他承受不住批判“三家村”的巨大压力，蒙受冤屈，也于1966年5月自杀身亡。

整个文艺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1955年，被声讨的仅仅是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几乎文艺界所有著名人物全都被列入另册。不管他们过去在反胡风、反右时如何紧跟，如何想尽办法保全自己，此刻都成了罪人。

请看一份材料中对一次文代会上文协(作协前身)主席团成员的“判词”：

主席，茅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副主席，丁玲——叛徒、右派；

柯仲平——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常委，巴金——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艾青——右派分子；

曹靖华——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赵树理——叛徒、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萧三——反革命分子；

周扬——文艺黑线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雪峰——反党集团骨干、右派；

胡风——反革命集团头目；

何其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乃超——反共老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欧阳山——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俞平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黄药眠——反共老手、右派分子；

钟敬文——反共老手、右派分子。

再看对历届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成员(上面已列出者除外)的判词:

刘白羽——周扬死党、漏网右派、文艺黑线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陈企霞——反党集团头目;

严文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周立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邵荃麟——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韦君宜——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沙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张天翼——反共老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陈白尘——叛徒、反共老手、漏网右派;

戈扬——右派;

田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陈荒煤——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张僖——走资派;

张光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康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郭小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林默涵——文艺界牛鬼蛇神的二号头目;

吴组缃——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臧克家——叛徒、漏网右派;

曹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侯金镜——走资派……

严酷的事实,就这样出现了,出现在胡风出狱不到一年的中国大地。它冲击着每一个人,也让每一个人痛苦地思索。

历史的代价,难道就应该这样沉重,这样无情?

四

"文革"的怪圈,将周扬与胡风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如同1957年把陈涌说成"受胡风思想影响"的情况一样,这时的周扬,不再被认为是胡风的对立面,而被说成两人本是"一条黑线"上的人物,两人的思想、文艺观点,也变得是"一致"的。

系统发表这一论述的,正是姚文元。

姚文元在文艺评论界的崛起,恰恰是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高潮中,当时他是有名的批判胡风的几位年轻评论家之一。他最早在《文艺报》参战,文章得到过文艺界领导人的赏识,随后,他一鼓作气写出十几篇批判文章,在《解放日报》(当时由张春桥任社长)、《文汇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胡风为姚文元提供良机,铺平了通往以打棍子著称的显赫前景的道路。在每一次文坛批判风波中,总是活跃着他的身影,难怪江青、毛泽东看中了他,以他的笔,撩开"文革"的帷幕。

如今,他的笔又指向周扬。

1967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在文中把周扬、胡风紧紧捆绑在一起,他说以周扬为"总头目"的文艺黑线之内的人物,就包括了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等早被打倒的人物。在谈到反胡风的斗争时,姚文元索性明确指出,周扬和胡风原本是一致的。姚文元写到:

> 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的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1952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兵是要分工的"(1949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1953年)。他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1949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1941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1952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

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面”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像，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与姚文元的这一说法相配合，一些关于文艺界路线斗争大事记的“文革”报刊，便将1949年后对胡风的历次批判中的周扬，说成是包庇胡风的“黑帮头目”。由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撰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有几处这样写到周扬如何地包庇胡风集团——

1952年12月解放初，毛主席一再指示要批判胡风反动思想，文艺界整风期间，革命群众也要求展开这一批判。周扬等不得不组织了所谓“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周扬在会上吹捧胡风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又说“胡风一向的确抓到我们文艺运动中的真正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竭力包庇胡风，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1954年3月18日　1953年底到1954年初，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路翎接连抛出大毒草《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其后台就是胡乔木、周扬。胡乔木十分赏识路翎，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周扬还自称是路翎作品的“欢迎者”。3月18日，他在旧作协党组讨论路翎小说的会上，胡说什么路翎的小说“是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

1954年10月11日　周扬黑帮一直包庇和纵容胡风的反革命活动。旧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鼓吹“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要展开自由竞赛”，提出“是不是能让胡风搞一个刊物”。林默涵、刘白羽马上

表示支持。11月13日,在另一次党组会上,周扬宣称“与胡风的合作还有可能”,说要“回答”“胡风提出的问题”,“但又不要伤害自由讨论的积极性”。

1954年11月7日　胡风在11月7日和11日的旧文联主席团和旧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趁机进攻,猖狂攻击党的文艺路线、文艺方针。发言后,周扬对胡风说:“我觉得很好。”直到12月8日,周扬在这个会上还为胡风及其党徒唱赞歌,说什么并不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甚至肯定胡风的反革命“意见书”“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好的,值得重视”,表示“欢迎”他参加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周扬还吹捧胡风分子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而又努力的作家”。

1955年1月17日　刘少奇百般包庇胡风反革命集团。周扬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一些会,根据政治原则对他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周扬秉承主子意旨,说:“解放以前的账不算,批评他解放以后的文章就可以了”,“(胡风的)反批判也要发表。”

周扬就这样在“文革”初期,被戏剧性地加上了“包庇胡风”的帽子。

在张春桥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罗瑞卿、陆定一也受到类似的指责:“五五年五六年搞肃反结果没有搞多少,有的人查出来也不处理,现在才懂得那是陆定一、罗瑞卿领导肃反的,他们本身就是反革命,怎么能行呢?五五年五六年反胡风集团也没有搞下去……”

天津的方纪,这时更是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1955年,方纪作为天津作协领导人,曾在天津负责胡风集团一案的处理,同阿垅、卢甸、鲁藜等人多次谈话。

1967年11月,由方纪、孙振等人组织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被打成是“一个黑会”。批判方纪时,便写到:“方纪,何许人也?是漏网的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批判文章还写到:

解放以后,又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胡风分子阿垅受到批判后,方纪还写信为其打气鼓动,说:“不能躺下,……人生必须

> 战斗，否则何以生存。”好一副反革命的“骨气”！方纪这个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穿后，却被资产阶级司令部包庇下来。于是，他马上又投靠周扬，成为周扬的心腹干将……

上海的吴强，也未能逃脱方纪同样的遭际。1955年，吴强负责上海胡风集团一案的处理，可是如今他被打倒了。罪名中便有：漏网的胡风分子，包庇胡风分子王元化等。

即使与胡风毫无关系、又不属于文艺界的人，在被批判时，往往也与胡风联系起来。

叶飞是福建省委负责人。在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谬论”时，就将叶飞的观点同胡风的文艺思想相比较。已经被定为反革命的胡风，任何时候，都会被提出来“陪审”：

> 叶飞鼓吹“形象”地写贫农“忘本”的“内心斗争”，不过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所谓写农民几千年来“精神奴役创伤”谬论的翻版而已，直接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邵荃麟之流的黑话遥相呼应，企图变革命的文艺为反革命的文艺。
>
> 叶飞还荒谬提出：“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都可以写，应该写。”“无论哪个角落，都充满了最有生命的东西”等等。这是明目张胆地贩卖陆定一、周扬之流所喋喋不休的极其反动的反“题材决定”论和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

令人惊奇的糅合，令人困惑的现实。“文革”，这个巨大的政治怪圈，就这样将胡风、将一切人都糅为一体，成为高山一般沉重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人们观望它，惊诧历史的巧合和无情；人们抚摸它，感受心底真切的隐痛。或许，玩世不恭的人，会轻松地报之以笑，然而，那笑的背后，一定会有浓浓的苦涩。

五

林彪的折戟沉沙，标志“文革”进入另一个阶段。令人奇怪的是，与林彪集团风马牛不相及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又被拴在对林彪集团的批判战车上。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对全国人民公布,他的代名词是:刘少奇一类骗子。

为了批判林彪,人们这时又借助于毛泽东当年对胡风的批判,报上也正式宣布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红旗》杂志1971年第13期发表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名义写的长篇文章《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文章说毛泽东在序言和按语中,“对胡风集团的一整套两面派策略,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教育我们如何掌握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规律”。此话显然是针对林彪而发挥的。

历史真正成为面团,任人揉来揉去。

文章通篇,貌似归纳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实际条条与林彪对号——

> “把大旗抓到手里。”胡风一伙在他的文章中,抄录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自居。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抓住了大旗,捞到了资本,就可以在红色外衣的掩盖下招摇过市了……
>
> “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反对党和人民。胡风集团一伙十足的伪君子,是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
>
> 总之,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搗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表面上用几句拥护马列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文章,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这就是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策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以及刘少奇一类骗子,都采用过这种策略。

胡风,就这样被一双神奇的手,和周扬、刘少奇、林彪联系在一起了。

文章的另外一段,更是明显地暗示出批判林彪的本意:

> 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不管他们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手

> 段多么狡猾，他们终究不可能逃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洞察，不可能逃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人民的天罗地网……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走的人没有几个，他们最后必然变成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落得个可耻可悲的下场……

有了毛泽东的按语，胡风和朋友们似乎永远无法澄清自己。到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序言和按语集中公开，人们又会将胡风同“四人帮”连为一体加以批判。是悲剧？还是闹剧？

六

“文革”的骤然爆发，刚刚出狱获得片刻安宁的胡风，马上被推入新的混乱、动荡、痛苦的生活之中。

胡风 1965 年年底出狱后，由公安部安排，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他入狱后新修的建筑。老友聂绀弩、周颖夫妇，成了家中的常客，相互吟诗唱和。胡风还将在狱中默吟的诗陆续抄出。

这时，公安部领导通知胡风，说中央安排他们到四川安家落户，并为梅志安排工作，也动员子女同去。胡风不愿离开北京，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他又写出出狱后的感想，呈交周恩来，请求留在北京，然而，没有回音。他何曾知道，1966 年春天的周恩来，面临着多么严峻的局势和艰难的抉择。

胡风、梅志最终离开了北京，留下子女，两人相依为命，于 1966 年 2 月前往四川成都。在那里，他们将呆上 13 年。

胡风的女儿晓风撰写的《胡风年表简编》，简略记载了胡风在“文革”期间的概况：

> 1966 年 4 月—8 月　四川省中医院治疗耳鸣、口苦及尿频等病；写了《在余年里从头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安排》作为思想汇报。又写了一篇思想汇报，题为《我的表态》。
>
> 成都“文化大革命”日渐激烈，对从文化方面忽然转为批党内走资派感到迷惑不解。
>
> 9 月 8 日，深夜十二时，由两名持枪解放军押送，乘吉普车至芦山

县劳改局苗溪茶场居住。梅志同往。由于心情不好，得血压高、头痛、尿潴留等病。

就在1967年初，胡风看到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颇不以为然。有关方面遵照上面的指示，叫胡风对姚文元明确表态，并要他揭发周扬以立功赎罪。

胡风无法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更不会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周扬成了包庇自己的人。但是，他的梗直，他的倔强，他的良知，都不会使他屈服于外加的淫威，对自己昔日的对手落井下石。于是，他的表态十分明确：

“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在理论问题上，我和周扬有不同看法，但是姚文元的文章，是在胡说八道。”

胡风的话招来了打击，广播喇叭对准他们的住房，反复播放姚文元的文章，11月7日，成都市公安局来人将他押解去成都。

与丈夫团圆刚刚一年，梅志又眼睁睁看着在一卡车解放军的押送下，胡风离她远去，留下她一人在茶场劳动。从此，她和胡风又将分别整整5年。

胡风这5年在狱中的情况，晓风写道：

1967年 在成都。住在看守所单间。恢复了默吟诗篇的习惯。因手边有笔无纸，就在报纸的空白处记诗，但即被搜出，如此多次。

报上发表姚文元或张春桥的文章，干事们要求写感想，都拒绝了未写。

1968年5月，14年刑期届满。向四川省公安厅提出了应该释放的问题。后又催问。

1970年1月初，由两名解放军和劳改局干部押送，戴着手铐，离开了成都看守所，来到大竹县第三监狱。第二天，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宣读重新加刑判决书，始知因“写反动诗词”，“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也不让看判决书。

从此，和重刑犯住在数十人的大监里。被派在浆子房做轻微劳动。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坏。

1971年8月，看到国内形势很坏，终于对解决自己的问题完全绝

望。一次，用大石头击脑部，企图自杀，未成。精神开始混乱，自我恐怖严重。

1972年迁至小院，与四五个犯人合住。病情更为严重，生活不正常。

1973年11月，领导上将梅志从苗溪茶场调来，同住小院，照顾生活。生活逐渐正常。

分别5年的梅志，又来到了胡风身边。梅志设想过重逢丈夫时的各种心情，但没想到自己会以惊奇而惧怕的心境看面前患恐怖症的胡风。5年茶场的劳动，种种劳累和歧视，她没有被压垮。如今，她必须咬紧牙关，以更大的坚毅，以更深的温柔，尽快让胡风康复，哪怕挨训、挨打。

胡风对周围的一切发生恐怖。他时常觉得空中有一个审问组在审问他，便一件事一件事地详细讲一遍。梅志害怕，也吃惊他的记忆居然那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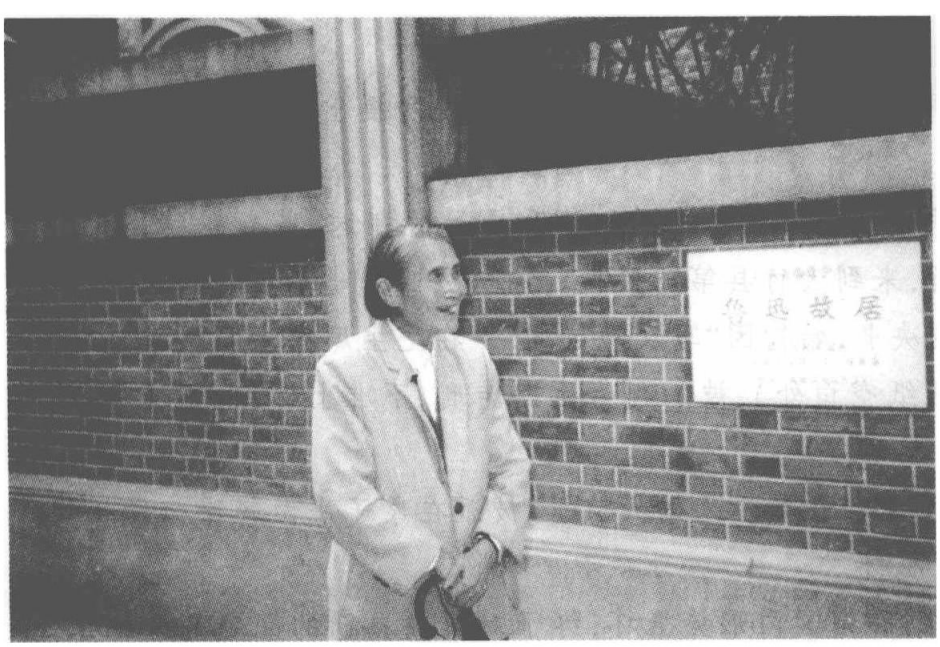
梅志好言相劝，说没有审问组，却招来胡风的斥责。胡风恨她，赶她走，不让她听。他们曾有这样的对话——

胡风对梅志说："你听，他们在叫你的名字，我说了你就不会有事了。"

"我怎么没听到，可见是假的，空中没有。"

"怎么没有？你不知道现在科学发达，可以控制你的脑子。"胡风坚持说。

"无线电要有天线，你看，怎么没有？"



2002年10月在上海参加纪念胡风诞辰100周年活动期间，梅志又来到鲁迅故居参观。

"你走!"胡风害怕梅志听见自己的讲话,便走到厕所小便池旁,独自一人大喊大叫。

看着精神失常的胡风,梅志惟有咽下眼泪,苦苦支撑,照料他,安慰他。尽快使他摆脱病魔的缠绕,是她惟一的愿望。

七

在全民族受难的时候,胡风集团的人们,遭受着同样的折磨。在过去十多年里,尽管关押狱中,或流放边塞,他们都活了下来。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和千百个人一样,含冤死去。

在"文革"中,因迫害或病魔缠身逝世的有方然、阿垅、张中晓、彭柏山、卢甸、吕荧等。

方然在狱中关押 10 年后,于 1965 年释放出狱。妻子早与他离婚,头上又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又不能安排工作,他只好寄寓姑母姑父家。方然的姑父曾当过国民党的军长,判过刑,也没有工作。两人便在家中下棋,聊天,以度时光,偶而街道让他发挥一下文人的专长,出出墙报。或者由派出所介绍到街道老残人员组里去洗漂染布。

"文革"爆发后,姑母家便不能安宁,派出所动员方然回家乡安庆。方然知道,以他这样的身份,回到家乡必然凶多吉少。坚决不肯走,并说:"如果要我回安庆,我就死掉。"

不多时,方然的姑父被遣送了,方然的压力,来自社会或家内,越来越大。

一天,方然劳动回来,看到玻璃板上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方然滚出去。"方然终于失望了。

他对姑母说:"我去看病去,给我几毛钱,四根香烟。"带上钱和香烟,方然出门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人们四处打捞,没有他的踪影。有的说跳了西湖,有的说跳了钱塘江,还有人说,漂洗布匹收工时,方然很累,等别人都走了,他倒在不深的水沟里,再也没起来。

派出所的死亡登记上写着:方然,1966 年 9 月 21 日,死因不明。1983 年 1 月 25 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为方然举行追悼会时,他的骨灰盒里只能是空的。

被朋友看作书呆子的吕荧,1955 年在过了一年禁闭式的生活后,又开始了他

的美学研究，可是他的身体愈来愈糟，精神状态也日见恶劣。1959 年他到上海，被上海作协将他关进了精神病院，开始他却以为是带他去招待所。在医院里，无人过问，被关了几乎一年，这样，他的病情更严重了。

回到北京后，书生气的吕荧，行径更为古怪，与所有人几乎断绝往来。他住在房子里，门窗都用东西遮住，烟囱孔也用纸堵上，房间没有家具，惟一的一张凳子，早已破烂不堪。他只和萧军时有来往。一次萧军带聂绀弩前去看望他，他把门一开，一放进萧军，看到身后有人，不问是谁，就把门关上。萧军告诉他是聂绀弩看他，他也不开门，说萧军带特务来抓他。萧军见状，只好和聂绀弩离去。

就是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吕荧迎来了“文革”。以他的身份，无法逃避尘世间的斗争，研究美学，翻译名著，一切都成为泡影。恐怖感折磨着他，最终他也因这种病态的恐怖，而导致入狱身亡。

梅志回忆：

> 偏偏是他这不识时务的病人，还要为他的房产权、为他住处的安静斗争，结果是，又和房客吵起来。最怕的是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分子吕荧“持刀杀人”（当然是阶级报复了），以这罪名告到派出所。吕荧真是有口难辩。其实，他手里拿的是一把削水果的刀，因为正在水龙头下洗什么，和他们吵起来时可能用手里握的小刀比划了一下，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病人就成了持刀杀人的罪犯！他成了妨碍治安的罪人，被押去强制劳改了！
>
> 当时的吕荧，刚过 50 岁，仍幻想着做自己心爱的工作，在被送去劳改时仍带了英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台打字机和许多包蜡烛。可是在那人性湮灭、兽性横行的地狱世界里，他又遭到了百般的凌辱，连惟一的度命的窝窝头都被骗走甚至抢走。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而当时“四人帮”的法律也不保护弱者。最后，1969 年初，他因冻饿而死在劳改大队。

没有在“文革”中死去的胡风集团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受到磨难。

路翎 1965 年 11 月，在邮电局的桌子上写申诉书时，被扭送派出所。先被送到精神病院，后又关进了监狱和劳改农场，1975 年 6 月释放回家。

回家后，路翎由街道派出所监督，安排打扫厕所，收水费等。一直到 1979 年

平反时才结束这种待遇。他的妻子余明英一直陪伴着他受难而忠贞不渝。

徐放出狱后，在1966年被安排到劳改人员就业工厂工作。1969年工厂战备疏散，徐放遣送回家乡辽宁农村劳动，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了10年。

冀汸在1959年出狱后，即到劳教农场当办事员，负责整理图书资料，办小报。1964年，将他从场部调到农业试验区，说是可以利用他的知识搞科学试验。同年劳改局通知调冀汸去杭州，安排他写一个电影剧本，要求反映一个人物解放前受苦，解放后翻身却又犯罪，最后被改造好了。

好不容易又有了与文学创作结缘的机会。冀汸由一个人陪着，到监狱调查，限期写出向国庆献礼。剧本写出了，正在修改，"文革"爆发了。

冀汸又多了一条罪状：为罗瑞卿树碑立传。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抓了起来，和过去劳改农场的场长、政委，一起关进了"牛棚"。1973年放出后，他被安排当了农场科研所的出纳会计。

在复旦校园里，贾植芳自然成了红卫兵轮番批斗的对象。这时的复旦大学，有5个赫赫有名的典型：日本特务苏步青，反动权威周谷城，英国间谍、大右派孙大雨，反动权威谈家桢，胡风反革命分子贾植芳。

开始，看到姚文元在《红旗》上批判周扬，贾植芳曾说："周扬同志对革命也有贡献，现在和我一样了。"不免流露出得意和满足，结果，招致斥责，说他是为周扬评功摆好。

批斗中，贾植芳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跌倒在地，回到家里，任敏总是抱头大哭，劝他："你可千万别自杀！"

贾植芳显得异常平静："我才不会，我没罪，不能让人说是畏罪自杀，我怕啥？你放心，来，咱们吃饭。"

吃完饭，他作好准备，参加又一场批斗。

何满子在"文革"初期，对号召学习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著作颇有微词，私下说："这有什么学头，学习马列还差不多。"结果为人告发，被遣送原籍。

在家乡，他成了批斗对象，只是，农村中都是本家，对他的批斗，总是戏剧般收场。

有人大声宣布："何满子是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自己交代。"

"不彻底！"本家们齐声高呼。

"那让他认罪。"

何满子便朝着观众三鞠躬。然后，有人宣布："好，散会。"

在家乡，何满子一直呆到1978年。

鲁藜1957年出狱后，到了农场，和妻子也离了婚。他想见见孩子们，却不被允许，自己一个人就忍受着思念之苦，在田间改造。

“文革”一开始批判周扬，鲁藜顿时兴奋起来，心想自己过去不是反对周扬吗？1967年5月，便写出两万字的《我的自白》，寄给中央和毛泽东。

后来，鲁藜听说他的《我的自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的第一句话便是：“鲁藜这人还在世上？”

批斗随即开始了。批判鲁藜翻案，挂黑牌，拳打脚踢。紧接着，一件与江青有关的事发生了。

1946年鲁藜从延安到太行山区，在和一位任区委书记的抗大同学谈话中，说到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周恩来曾不同意。那位同学将谈话记在日记本上，“文革”中被抄出来，成了鲁藜新的罪行，脸上从此又添上新的伤痕。

鲁藜在农场受折磨，离了婚的妻子，“文革”中因为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官运亨通，步步青云，一下子成了天津市有名的“通天人物”，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又到北京出任文化部负责人。

鲁藜回忆与王曼恬的最后一面：

> 我看见她的最后一面，是在1976年9月9日。那天我从农场进城到农林局领每月的生活费。上午10点多钟领完出来，过马路上桥到车站。就在桥上，一辆银灰色的汽车从我身旁驶过，我恍惚透过玻璃窗看到了王曼恬。她胖了，丰满了，脸型我还记得。她坐在后座上，半躺着，脸上是泪花。我心里一慌：她病了？她不舒服了？
>
> 我看着汽车开远，就转身走了。
>
> 当天下午四点，听到了主席逝世的消息。我才明白她为什么哭，她肯定是先知道了消息。
>
> 鬼使神差让我这样见她最后一面。
>
> （1986年6月与李辉的谈话）

鲁藜与妻子的最后一面，这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

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一天，中国历史也将记载这一天。

第十六章 劫后重逢

一

胡风沉浸在《红楼梦》之中。自1956年允许看书以来，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胡风在半年之内就读了五六遍，尽管他不满于它合并了高鹗的后40回，但在他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生活的填补。

20年来，胡风一直在想着《红楼梦》，想着高鹗此人。他越来越认为高鹗违反了曹雪芹的创作初衷，高鹗的续作，否定了曹雪芹的所有战斗性。他宁愿称《石头记》，而不愿称《红楼梦》，因为后续是骗的文学的产物。在他的笔下，高鹗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骗子："至于宝黛悲剧，他如果不想模仿出一个悲剧结局，他的续书就根本无法骗人，他的反对曹雪芹战斗目标的思想阴谋就无法骗取读者接受。高鹗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最狡猾的骗子：构成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骗局和冤案！"

不知为何，胡风1976年构想这些观点时，斟酌这些词句时，总是强调"'五四'以前"。在他的清醒意识里，或者潜意识里，他也许将自己的命运摆进了历史之中。

在梅志的精心照料下，胡风的精神好转了。1976年，他开始写《〈石头记〉交响曲》，采用连环对诗体曲的形式，将他对书中人物的思考，对曹雪芹的思考，一一写入诗中。

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翻天覆地的一年。

1月，周恩来逝世，胡风在狱中写出《向周总理伏罪》。他总觉得自己辜负了周恩来当年对他的关切，对他的期望，他有愧于周恩来。9月毛泽东逝世，胡风又写出《在极沉重的日子里的一些感应》。

中国在巨变中。

197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胡风和梅志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狄克何许人也?》,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张春桥倒了。因为早在30年代,胡风就知道鲁迅批评过的狄克就是张春桥。

管教人员来了,一问,他们才知道,中共中央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

不久,北京来人找胡风谈话,再也不是过去冷漠、严厉的态度,而是谦和、礼貌,请胡风谈谈对张春桥的了解,鼓励说:应该帮助政府,揭发"四人帮"。

胡风一时转不过弯,眼前的变化,使他感到突然。梅志则显得格外兴奋,高兴地对胡风说:"不是让你写检讨,是让你揭发。"

胡风的心情渐渐好转,根据自己所知,写了有关当年狄克的材料。他在狱中,和人民一起,分享着瞬间的欢乐。

可是,对于他和他的朋友们,春天远远没有来临。

二

怪圈仍在旋转。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阐明新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执行的思想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历史进步的步履依然缓慢、沉重,批判"四人帮"的方式、语言,依然承袭当年批判刘少奇、林彪的遗风。遗风强劲,无情,胡风又被奇迹般地和"四人帮"捏为一体,就像当年批周扬、批林彪时一样。

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顿时又掀起学习热潮。《毛选》中所收录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再次成为人们批判"四人帮"的武器。

工人依然被报纸视为批判的主力。《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分析仪器厂试制车间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序言和按语",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

按照毛泽东的按语,工人将胡风集团与"四人帮"对照起来批判,得出结论:

他们有共同的本性,都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

有共同的罪恶目的，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有共同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都是“给人以假相，而将真相隐藏着”；他们必然有共同的可耻下场，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

4月20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的文章《“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不顾1955年入狱之后早已落实的调查结论，仍然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刚刚觉得前途有望的绿原，又被推入新的失望之中。

还是这篇文章，也批判“四人帮”两面派手法，毛泽东对胡风集团的“按语”，正好可以借用，正如批判林彪的两面派一样。文章分析“四人帮”与胡风集团的异同。从人员成分来看，“四人帮”与胡风同中有异：

他们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样，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稍有不同的是，还多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

文章最后归纳两者的共同性：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结帮之宗旨同，基本队伍之组成同，“抓大旗”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之策略同，用以想事的方法同。一言以蔽之，他们反革命的本性同，有此一“同”而众“同”俱焉。

批判的高潮，又将姚文元、周扬、胡风单独联系一起。在人们的笔下，姚文元顿时也成了“包庇胡风”的人——

本来是包庇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姚文元，不也写过几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反胡风的“英雄”吗？而一旦他们认为时机到来，就像胡风一样，恶狠狠地挥舞着毒剑向党扑来。

写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姚文元，这时同样被回应一篇《评反革命两面

派姚文元》。姚文元不再是反周扬的，反右的，而是和周扬关系密切，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这样，在1977年的批判声中，胡风、周扬、姚文元全成了一条线上的人物，“一丘之貉”：

> 姚文元同周扬为什么观点如此吻合，原来姚文元爬上文坛、步步高升的过程，正是追随周扬、亦步亦趋的过程。姚文元是大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起家的。而他的第一篇批胡风的文章，正是受到周扬的启发，以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为蓝本写出来的。他自己就这样写着：“看到……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姚文元这一“划”，就把自己“划”到了周扬一边。的确，从此以后，姚文元就紧紧追随周扬，不遗余力地鼓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的路线，甚至不惜用诬蔑鲁迅的办法为周扬张目。

1955、1967、1977年；胡风、周扬、姚文元；位置不断变换，星斗不断移换，胡风却永远是陪绑的对象，只是被绑在一起的人，时有不同。

鲁藜此时也被重新拉上了批判前线。

由于前妻是“四人帮”的亲信，在批判她的大字报中，点出了鲁藜的名字，说王



从姚文元批判周扬到姚文元被批判，胡风集团都是陪绑者。

曼恬表面上与鲁藜离了婚,但实际上还有来往。这样牵挂,无非说明她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一时间,车站、大街上,标语、大字报,都少不了"鲁藜"二字,他又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

鲁藜心中却是说不出的辛酸。自1955年入狱之后,他没有获得过妻子的温暖,离婚后,更是断绝了往来。"文革"中,一位是声名显赫通天的人物,一位却是阶下囚。她走运时,自己没沾上光,如今,她垮了,却让自己来沾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鲁藜无言以答。

一天,鲁藜做了一梦,梦到了王曼恬,似乎是一个在哪儿见过的女人,这是20年来第一次梦见她,也是惟一的、最后的一次。3天后,鲁藜听说,她自杀了。

她去了,对鲁藜的顺带批判,也渐渐消失了。

真不知是历史在开人们的玩笑,抑或人们在开历史的玩笑。胡风集团的成员们,注定要更艰难地从寒冬步入春天。

三

邓小平的复出,才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贯穿他的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向胡风和朋友们传来了春天的讯息,更是向全世界传达出新的讯息。

早在"两个凡是"提出的1977年,邓小平就反对这一思想。5月24日在和当时的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一再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才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予以重新评价的开始,也意味着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他所反复强调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实际上摈弃了长期以来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会议强调邓小平的思想要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会议公报发表了,与胡风和胡风朋友们的命运直接相连的是这样一段话:

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由此全面展开。1979年，在当代历史上，将是特殊的一年。

1月11日，中宣部印发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同一天，中共中央决定为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将地富子女成分改定为公社社员；2月17日，为彭真平反；2月26日，为毛泽东定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错案平反；6月8日，为陆定一平反；6月29日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平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平反的通知；8月4日，为小说《刘志丹》平反……

1979年1月14日，胡风的喜讯果然来了。就在前一天，四川省公安厅给监狱打来电话，通知释放被判无期徒刑的胡风出狱。

轿车驶到了胡风和梅志所在的大竹县第三监狱，车上走下四川省委和公安厅的人，他们向胡风、梅志传达了中央指示：无条件释放，到成都进医院养病，工作暂定在四川省作协。

胡风、梅志1月14日离开坐了9年监狱的大竹三监。车过重庆，他们参观了中美合作所罪行展览和渣滓洞。第二天，1月16日便到了成都，住进省革委会第二招待所。

儿子晓山来了，陪伴分别13年的父母欢度春节。他在1978年春天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当时曾特地予以报道。

2月10日，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向胡风宣布：原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所判的无期徒刑无效。

胡风从此真正自由了。监狱，24年相伴的地方，永远不再属于他了。

6月，胡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这是他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他的名字，开始见诸报端，人们在悄悄议论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胡风又写起呈给中央的材料《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他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当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短短几个月里，他写出了14万字。

本想出狱后抛弃文学的胡风，却无法摆脱文学对他的诱惑。他对文学有着本

能的热爱，近于如痴如醉的状态。

出狱不久的胡风，很快为一个名字所吸引：张志新。报刊广播纷纷报道这位在“四人帮”时因说真话、因敢于独立思考而被枪杀的女性的事迹。诗人、作家们也以各种文学形式讴歌她。胡风从广播中，听到瞿弦和朗诵的雷抒雁的诗《小草在歌唱》，激动不已。后来从《光明日报》上他又一遍又一遍读这首诗。

性情更具诗人气质的胡风，抑制不住感动，一方面他精心对诗作了详细修改，一方面又准备向《诗刊》推荐转载。7月22日胡风化名“宴敖”给《诗刊》编辑部写信，同时附上一封致雷抒雁的信。这是胡风出狱后，除和亲友的通信外，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与外界，与文学界——他曾经活跃其中——发生联系。

编辑同志们：

这首诗，先是从广播里听到朗诵，后来才从报上看到的。读了几遍，每一遍，这里或那里引起了我的感动。举例提出一些感应，如果编辑部认为是捣乱，诗人自己认为是对他表现了骄傲态度，那就撕掉，丢到字纸篓去算了。

列位当然经验丰富，发现一首好诗，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报上还发表了另外几首诗，我认为是从理念出发，企图在形式上补救。结果是，长于文学语言的他在这里露出了不能使读者入情的文字技巧而已。

从张志新这句话产生了真情实感的诗已经有了一首：《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强者》，同一作者还有一首《风度》，觉得都是真情的悼念。如果要转载，我以为是值得的。至于某种“做”出来的诗，发表了，要引起消极性的影响。还在《光明日报》有一首《日月光芒××》也是值得转载的。存报一时找不到，不能查明了。

还有，我以为张志新母亲和丈夫的文章，应该是非转载不可的。弟妹们的，似乎还不能写出深切感情来。

编辑同志们，发表这样的诗，是不是可以采取和发表招牌诗人的招牌诗不尽相同的态度呢？

我是新诗的老读者，所以对诗很有偏见，也就是坐井观天，诸位见笑之后，连拟稿、给作者信一同撕掉罢。

发信地址，并非实有。因为挂号要写地名，自己没有定址，就随便

捏造一个，不敢麻烦诸位回信的意思。

专此即祝

笔健

一个新诗的老读者

宴敖 1979年7月22日

《诗刊》编辑部没有重视这封“宴敖”的信，也没将给雷抒雁的信转交。两年后，梅志根据原稿重新抄出，经邹荻帆、邵燕祥之手，辗转到雷抒雁手中。看到胡风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改，雷抒雁感受到一个老人对诗的执着的偏爱。胡风的诚挚和认真使他鼻酸眼热。

对胡风，雷抒雁并不了解，1955年胡风入狱时，年轻的雷抒雁刚刚开始喜爱文学。他所知道的胡风，是批判文章中的那个胡风。如今，看到胡风的信和修改稿，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尊敬的老人。他才深切感受到，一个人一旦爱上文学，纵然监禁、流徙，也不能离开它。他感慨地说：

> 文学是会使人上瘾的，你会终身摆脱不了它的纠缠。那是为什么呢？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我想，那是一种责任感，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事业的责任感。当这种责任感一旦和对于艺术的爱好融在一起，就会变成一种合金钢，水不能使之溶解，火不能使之熔化，酸和碱不能使之腐蚀，时间的巨流，或急、或缓、或波折、或跌宕，而这块合金钢，就像激流里的石头，是不会游移的。而且，因为波光的闪动，还会使它发出奇异的，甚至是神秘的波纹来，使你觉得它在轻轻地颤动，使人为之动情。
>
> 啊，这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心，不就是激流里的石头么！

重新呼吸到自由的、新鲜的空气，胡风便以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昭示他的存在，他的复出。

四

“胡风集团”的其他人，也陆续复出了。他们曾和胡风一道跌入苦难，如今，也

和他一起呼吸自由的空气。与胡风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胡风更早地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他们开始互相通信,互相寻找分别多年的受难的朋友,打听每一个人——活着的或死去的——的下落。

贾植芳在1978年解除了监督,回到中文系在资料室工作;何满子从家乡也在同一年回到上海,在古籍出版社工作;耿庸1979年在辞书出版社开始当编辑。他们又凑到一起喝酒了。

王戎1978年还在新疆农场劳动。这一年他请了假回到上海,想到文化局系统工作,却无结果。他给北京的凤子写信,这是他第一次和过去话剧界的朋友联系。凤子马上回了信,告诉他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他,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希望他到北京去。王戎到了北京,由朋友们陪着去见了夏衍、阳翰笙,两人都对他仍在劳改队劳动感到吃惊,答应帮忙与新疆地方领导联系解决。

王戎回新疆后,1979年先调到场部学校教书,随即拿到通知,回到了上海。

耿庸与杭州冀汸开始了通讯联系,得知冀汸已调农场学校当教务主任。在给冀汸的信中,耿庸告诉了上海一些朋友们的情况,也谈到妻子王皓早已去世。

冀汸身在海宁乔司农场学校,却惦挂着所有的朋友。可是过去的教训,又使他不敢轻易给人写信。在给耿庸的一封信中,他表达出这种复杂心情——

> 7日信收到。汪灏(王浩?)我只见过一面,那是1954年12月,华东作协开会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庄重、温和,说话鼻腔共鸣很重,没想到她"已随波而去"。那么,孩子们呢?……
>
> 我孤陋寡闻,昧于实情,对"全面解决也为期不远"这一设想,并不乐观。阻力很大,这倒感觉得到,现在任何一桩事情要办得合情合理,极不容易。两个"凡是"依旧威风凛凛。
>
> 这两年,荻帆在何处,干什么,我是知道的,但未给他写信。他至今也没给我写信,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自以为是个"不祥之人",总怕给别人带去灾难。经验告诉我:偶然地路遇,或者若干年前曾经交换过一次信件,均后患无穷。这个"经验"是否也适用于今后,现在还是康德的哲学——不可知!……
>
> 也想写点什么吧。这叫做积习难改,但时间都花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很难办到。

寒暑假有的，却无意走动。你不必奇怪：我二十多年没进过电影院或戏院。今年6月，贵阳的侄来杭旅行结婚，才破例带他们到风景区走了一趟。弟弟，在海外的母亲、妹妹，也是今年才联系上的。

心情尽管复杂，但渴望旧友重新联系，却是冀汸此时在农场的一种精神补充。在1979年的《诗刊》上，他看到了署名曾卓的一首诗《悬崖边的树》，不敢断定这是当年的友人曾卓，便写信由编辑部转诗作者，信中问："你是不是那个叫曾庆冠的曾卓？"曾卓马上回信，兴奋地告诉冀汸：我就是。

两位当年在一起创办《诗垦地》的老朋友，在中断二十几年的联系后，重又互致劫后的问候。

北京的牛汉、绿原、徐放等人，也陆续和友人恢复了联系。

大家打听到了死去的朋友的消息：阿垅、方然、卢甸、吕荧等，一直未打听到化铁的下落，几年来人们都以为化铁已经死去，绿原、牛汉1980年编选《白色花》诗集时，在序中就将化铁归入已经逝世的朋友之列。直到1982年，人们才费百般周折，从南京一个小副食品店里，找到了失去踪影20余年的化铁。

活下来的人中，最让人痛心的是路翎的状况。当年才气横溢、英俊潇洒的路翎，1979年重新出现在朋友们面前时，已成了一位表情呆然、双鬓花白的老头。派出所告诉他结束被管制生活，不用再扫地了，可他仍然每天一清早就拿着扫帚出门扫街道，扫厕所，还坚持每月写一次思想汇报。

第一个去看路翎的是牛汉，那是在1978年冬天。他感到震惊，路翎已经不会兴奋，说话语无伦次，没有了笑意。年轻时，路翎大而亮的眼睛，已经衰老无神，而过去它曾是被认为是朋友中最有魅力的一双眼睛。

曾卓来到了北京，这是从外地来京的第一个"胡风分子"。他和牛汉、徐放、绿原重逢。他穿行在北京窄小胡同里，也去探望了看了让人揪心的路翎。他还给北京的友人带来了冀汸的消息。随后，曾卓由北京到达上海，又在上海寻找友人，给上海的朋友带来北京友人的问候。

这是朋友间平反前第一次大范围的沟通。曾卓仿佛成了一名"交通员"，一名将劫后的朋友相互串联一起的穿针引线人。为此，胡风后来感激地称他是"一个大勇者"。

胡风的下落也渐渐为他们知道了。上海的何满子，打听到了胡风出狱后的地址，便写信给成都的小姨子，请他前去看望胡风。于是，何满子的亲友，成了胡风、

梅志出狱后第一个前来探望他们、请他们吃饭的人。为此，胡风深为感动，过去对何满子的偏见和冷淡，早已随时间的消逝而烟消云散了。

牛汉从萧军处，也知道了胡风在成都的通讯地址。牛汉不知胡风此时的处境，不敢贸然去信，只是抱着试探的初衷将自己编辑的《新文学史料》第2期寄去，在信封上留下详细的通信地址。刊物寄走了，会是什么样的回音，牛汉惶惶不安。

胡风收到来自北京的刊物，从通讯处他断定是牛汉，激动不已。

就在这一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刊有赵浩生访问周扬的文章《周扬笑谈历史功过》。经过十年浩劫的周扬，第一次谈到30年代和胡风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葛。牛汉寄这一期给胡风，也许就有意让胡风看看这篇文章。

赵：后来您决定到延安去是什么原因？

周：因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引起了争论。那时候胡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赵：我们听说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鲁迅让他写的。

周：鲁迅的文章是这么讲的。不过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让他写的。胡风原来是"左联"的一个领导成员，不过他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对他早有怀疑。当时他在我们地下党和鲁迅中间确实做了很多挑拨的工作。所以他的文章一发表，地下党里一些搞文学工作同志很不满意……我们觉得我们提出"国防文学"，他又另外再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力量，所以就跟胡风展开论战。大家本来对他就有意见，这里面当然也有宗派情绪，因为那时候还不能断定他的各个方面，对他个人的历史还有很多疑问。这个争论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跟他争论。他提出"大众文学"，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对不对？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要跟他争论。拿我来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是有右的东西，因为那时我负责嘛，不管文章是我写的也好，是别人写的也好，我都有责任。同时呢，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克服。

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

这期杂志上还有茅盾写于1978年、冯雪峰写于1966年的关于"两个口号"问

题的文章。茅盾的文章中,胡风仍然是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出现。

胡风收到牛汉寄来的杂志,感到对自己正在写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材料很有帮助,更为牛汉向他伸出友谊的手感到兴奋。8月16日,胡风在刚收到杂志之后,就立即给牛汉回信。对周扬的谈话,他没有提及,只提及了茅盾和冯雪峰的文章。

胡风的信不是直接写给牛汉,而采用写给牛汉的妻子吴平的形式。这是他与北京的受难朋友的第一封信,他惦挂着牛汉、吴平夫妇,绿原、罗惠夫妇。

平兄:

《材料》(2)收到。茅冯二文,很有用处。正在写这问题(过去写过不止一次,现详写一次),已成二万余字,还有万字左右。冯文有几处不符实际,在那种时候,他能这样写自己是难能可贵了。不得不说点过关话,那是难怪的……

前此从三耳兄(即聂绀弩——引者注)信中知道与汀兄(即牛汉——引者注)见过,也与原兄见过,能无恙到今天,实为幸事。在井中观天时,曾有怀兄与惠兄韵语杂文,还有赠汀兄与原兄韵语杂文。赠文被检查收去了,仅有残句残首。怀文曾在成都时抄出,底稿发还了。现在正在乱中,等口号负债还了后,当抄出寄呈,以博诸兄一笑。

……

在井中,曾两次查问兄事,提示兄给我看过英文的铁路什么材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很耽心兄为我受累。

仅寄数语。汀兄与原兄夫妇统此。

祝好

8月16日

胡风的信到了北京。牛汉欣喜地看到熟悉的流利而刚健的字迹,他把信拿给全家人传阅,让大家都知道胡风还活着!他当即给胡风回信,谈及路翎的近况,他知道胡风最关心的,一定是路翎。

在随后的几封信中,胡风感慨路翎的遭际,自责对路翎的牵连。

9月10日致牛汉:

真有死人复活之慨。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别的都能过眼云烟,但

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人至受害致废的心灵劳动的有生力量，总不胜万憾。200多篇近3000首的韵语杂文中所记，犹不过有形举例而已。你提到嗣兴情况，更大出意外。多年来，我总以为会给他以应有的维护和劳动条件，使他出世带着难于估计的精神财富与人民相见。两年前，我又一次提到他说：即使仅仅算到1955年止，他也是世界文学上的人物，他为中国无产阶级，付出了呕心沥血的劳动。今年春又写过：他为无产阶级的血肉兄弟贫苦农民也付出了呕心沥血的劳动。想不到几月前才得挂名领薪，生活还相当困窘！可见我对客观情况还是陷在仅凭实际的主观幻想之中，希望你和原兄考虑情况，如不致招意外麻烦。去看看他。再坚强的人也是要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

此信刚寄出，胡风话犹未尽。9月23日又寄一信：

上次信说过，能和外界通消息后，我也害怕打听嗣兴的消息，但看到你提到的情况，我还是感到震动！居然有这样残酷的事！要尽情摧残，也只应该摧残我这个祸首呀！

……

二十多年来，并没有正面审问我对有关作者的关系、看法等。但用一句简单话说：我的观点不变。甚至还更深一点，更坚定一点。

原来，我只想在余年里依然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但也许要改变主意了。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

……附一张照片，请带给他看看。上次和这次给你的信，也带给他看看。另抄稿也带给他。目的只有一个，如你所说，把他失落的灵魂招回来。尽可能地招回来。就是历史本身也没有权利剥夺他还应该有二三十年为人类呕心沥血的劳动权利。

10月之后，牛汉再也没有收到胡风的来信。他不知道，胡风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治疗。

胡风在最后一封写于9月28日的信中，谈到了即将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告诉牛汉，他没有“直接听到任何关于我的话”。牛汉失望了。本来他和北京的朋友

们,都听说将邀请胡风出席大会,那么,他们就会和胡风重逢了。然而,事情的进展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那么迅速。

和胡风的重逢仿佛遥遥无期。

五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十年浩劫后文艺界的第一次大聚会。

绿原、鲁藜、王元化、彭燕郊参加了大会,但其他"胡风集团"的人,未被邀请。对于与会这些人来说,没有胡风,没有路翎,没有本应前来的所有朋友,这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广泛团结的大会。

准备在大会上提出胡风问题的倒不是他们几个,而是两位与胡风同时代的好友:聂绀弩、吴奚如。

吴奚如和聂绀弩同是湖北京山县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代书记等职。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吴奚如曾担任鲁迅和中共中央联系的承转人,与胡风关系密切,也是"大众文学"口号的支持者。

对于未邀请胡风出席大会,聂、吴二人极为不满,吴奚如写出《胡风的功过》一文,要求在大会上发言。

周扬找到他们两位,劝他们不要在大会上提出胡风问题,免得影响原定会议议程,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同时告诉他们,中央正抓紧胡风问题的落实,很快就要平反。

聂、吴听从了周扬的劝说,没有在会上"发难"。

在大会发言中,柯岩朗诵了曾卓发表在《诗刊》上的那首诗《悬崖边的树》,赢得了热烈掌声。曾卓没有到会。可他的声音——他在1970年写出的这首诗——却这样传到了会上。人们议论着他,自然会想到历史遗留下的胡风集团这个悬案。

耿庸的一位朋友,作为记者采访了这次大会,他将会上的情况简略在信中告诉了耿庸:

> 胡风事,据周扬在作协闭幕式上讲,中央即将解决,他已承认自己有"教条"加"宗派"的错误。发言中,白桦、柯岩、王蒙、丁玲、刘真等人

较好!曾卓未来,柯岩讲话中特别提到他的诗,引起全场鼓掌。王元化、鲁藜、绿原、彭燕郊等都参加,吴奚如曾有《胡风的功过》,此次要发言,周扬会上说,他劝他不讲,因为中央要解决了。

文代会结束了,未能参加大会的胡风却病倒了。已经好转的心因性精神病又复发,幻听、幻视、混乱重又纠缠他的刚刚安定两年的精神世界。

牛汉认为,胡风的病情恶化,原因便是本来希望参加文代会,却被又一次的冷落伤害了:"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

胡风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80年3月,中央决定,由四川省政协派人护送,乘飞机到北京治疗,先住进北京友谊医院,后住进北医三院。一年内,病情反反复复,忽好忽坏。1981年5月,又由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亲自联系,由北京到上海治疗住进了上海精神病总院。

北京。上海。病中的胡风终于和朋友们重逢了。

在北京,萧军来了,聂绀弩来了,牛汉、绿原、徐放、路翎等人也来了。25年,对他们是悠长而艰难的岁月,但毕竟活着走了过来,活着在一个新的时代重逢。

路翎夫人余明英回忆说:

1955年后谁也不敢来找我们。周围的人都打听。

粉碎"四人帮"后,梅志来找我们。是在1980年5月。胡风没来北京时,晓山、晓风都去过我们那儿。胡风来北京住在招待所,路翎那时身体不好,没去机场接,后来胡风住友谊医院我们去看他。大概1980年5月,穿长袖衬衫,带件外衣,但天气热用不着穿。

我们去他很高兴。坐在沙发上,重又讲自己哪一年到哪去,快吃饭时我们走。胡风恨不得早见到路翎,一到机场就巴不得见到。

(1985年6月与李辉的谈话)

在上海,因胡风而受难的朋友们,来医院看望胡风了。他们约到一起,由市内奔向龙华精神病院。他们是贾植芳、任敏、耿庸、何满子、王戎……

贾植芳回忆说,重逢的时刻,一个病中的胡风揪紧着他们的心:

我们进屋时，他还在床上躺着，听见我们和梅志说话的声音，他吃力地挣扎着下床，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我们也很激动，但强自克制着，强颜欢笑地扶他下床坐在沙发上。他显出一幅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眼泪，梅志不断地替他拭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我们不能自持了，我们夫妇泪流满面地离开了这个变相的监狱——精神病院。是的，相隔二十六年之后，我们终于又相见了，我们的泪水里，有着欢欣的激动，而在他的这种激越的感情里，还包含着对因他的名字而遭株连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青年的歉愧之情。但是人们是不会怪罪他的，因为这是历史的恶作剧……

1980年，胡风在北京与朋友含泪重逢时，海内外舆论界已经在关注着“胡风集团”的平反进程。

1980年5月出版的香港杂志《开卷》2卷10期，发表了徐盈在美国的演讲纲要《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中的轴心》，集中谈到了关于“胡风集团”彻底平反的问题。

作者认为：“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以后的‘反右’和‘四人帮’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虽然更大，但就严格意义上说来，已不属于文字狱的范围，而是政治性事件了。”

作者认为对胡风集团一案如何处理，将关系到文艺界是否真正团结、是否有前途。他写到——

但是，中国文艺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能否真正安定团结，就要看宗派统治是否能得到彻底铲除；那试金石，首先就是要看胡风案件是否能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这是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的轴心。这并不是要不要“向前看”的问题，也不是要“翻老账”，而是因为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文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看来，阻力仍相当大，这还得经过相当曲折艰苦的斗争，但前途应该是光明的，否则，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在这篇文章发表4个月后，仍是香港的报刊最早透露了胡风即将平反的消息。9月23日，香港《文汇报》以醒目标题发表消息：

有关方面复查当年案件
胡风事件即将平反
胡风已自四川到北京　住进医院治疗休养

[本报北京二十日专讯]二十五年前因上文艺问题意见书达三十万言的胡风，被批判后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从此销声匿迹。最近有关方面重新审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构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应予平反。胡风多年来在四川成都居住，因身体不好，精神不正常，已由中央派人由成都接来北京，并送入北京市第三精神病院治疗休养。日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偕作家萧军于15日到医院探视病况，已向他谈及平反的事，待中央审批后即可宣布。文艺界领导人物周扬、夏衍亦预闻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事，预料这一历史悬案将可澄清。


10 AUG 1985

胡風遺體何故未葬？

有關方面復查當年案件

胡風事件即將平反

胡風已自四川到北京　住進醫院治療休養

胡風案重審有結果

撤銷當年控罪判刑

從胡风1979年出狱到逝世期间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

六

周扬和胡风也重逢了。

在香港《文汇报》刊载胡风即将平反的消息的前一天，1980年9月22日，现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由梅志陪同，来到医院，看望经历多年磨难的胡风。

对于两个人来说，这次见面，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他们都不再是四十几年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也不是二十五年前剑拔弩张的对手，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是受到不同程度政治风霜打击的历史见证人。

周扬先到胡风家中见到梅志。他带来了中央关于为胡风集团平反的文件初

稿,征求胡风、梅志的意见。他告诉梅志:“中央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

周扬提出到医院去看望胡风,告诉他即将平反的喜讯。

胡风躺在病床,伸出了手。周扬走上前,紧紧握住,对胡风说:

“你们都受苦了。我也受了苦。现在中央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周扬又重复一遍对梅志讲过的话。

重病中的胡风没有多说话,周扬带来的平反文件初稿他也没有看,没有签字。周扬征求梅志的意见。梅志说:“我作为一个家属……”

话未说完,周扬忙打断说:“不,不,你也是老左联的,是同志。”

梅志对能在政治上给“胡风集团”平反感到高兴,但她不同意在文件中还留着对文艺思想持否定口气的结论。

周扬又问胡风有没有其他要求。胡风说:“我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个家,希望能解决房子,让我安个家。”

周扬当场答应解决:“这是应该解决的,应该的。”

周扬走了。几天后,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9日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真正的政治生命的春天到了。尽管胡风和朋友们对文件中有的结论不满足,



1983年,胡风与梅志在北京新居安度晚年生活。

会为此再经几年努力，得到圆满解决；尽管贾植芳对文件中将自己定为汉奸感到冤屈，再次上诉，一年后又予澄清；……这毕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将荒漠变成绿洲的春风甘霖，是苦尽甜来的欢乐颂歌。他们深知，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复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这份文件决不会诞生。甚至，如果不是十年"文革"的灾难教育了党和整个民族，他们的平反，也许还要往后拖10年，20年，半个世纪，或者，永远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胡风是激动的。11月15日，他拿起笔为《文汇月刊》写《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

> 二十多年来，我与世隔绝，恍如过世之人。如今拿起笔来，要与千千万万的读者见面，心情是复杂的，那感触就更多了！
>
> 我想到了党，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我、教导过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的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对于因自己而受连累的人们，胡风感到深深的内疚：

> 但在后来的岁月中，由于我的原因，不少的幼苗，中途夭折，今天，想到那些曾经见过及从未见过，但都因我而受株连的朋友们，自惭之情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但我深知，这种谢罪是他们所不需要的，这些劫后余生与死者需要于我的，是鼓起余勇，继续前进！

胡风一俟病情好转，就开始勤奋写作了。住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先是在北京前三门安排了几间房，随即搬进了木樨地24号楼——当时北京有名的高知楼。

对1954年的上书，胡风从没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提问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胡风，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历程。

第十七章 一段历史的终结

一

1984年12月29日,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

800余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汇聚这里,代表着新时期文学创作队伍逐步繁荣的景象。

胡风走进了礼堂。早已失去一次文代会时的风采,但也没有了当年在中南海怀仁堂里的那份苦恼和忧郁,82岁高龄的他,由女儿晓风搀扶,目光显得黯然,却又显得有力,哪怕是时隐时现的神采。

1981年胡风去上海治疗,效果显著。到10月精神逐渐恢复正常,便回到了北京。

10月13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恢复胡风的作协会籍;11月28日,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胡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政协常委;12月23日,被补为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胡风的心情稳定、愉快,虽然不时因为撰写悼念旧友的文章,而产生痛苦。他毕竟是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无形的压力,甚至摧残。1983年冬到1984年夏天,他的创作达到一个旺盛阶段。长达五万余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平均一天写一两千字。每天在写字台前一坐下,他就不愿离开,在家人一再催促下,他才肯放下笔去吃饭,或者休息。家人们很惊奇他的精力在久病之后,在垂暮之年,居然会如此旺盛。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癌细胞已经在胡风体内开始扩散了。

1984年6月18日,胡风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是他自1954年之后,第

一次行使公民权。选举归来，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赋诗一首，很快附上一信将诗寄给《北京晚报》的编辑李辉。

喜投神圣的一票

6月18日，力疾赴中国艺术研究院投票选区人民代表。我选了候选人中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和一位音乐教授。我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名字，但我信任候选制和她们的职务。

在旧中国，我没有行使公民权选举过代表，我连是否有这种权都不知道。开国后，我才凭公民权选举过人民代表，也被选过。现在是和社会隔绝了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亲自投这神圣的一票。占一绝志感。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

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7月1日发表了胡风的新作。见到报纸，胡风和梅志激动不已，第二天，梅志给晚报编辑李辉一信：

今天见到了胡先生的《喜投神圣的一票》刊出，很是高兴，这一票真是来得不易！

我想托你将有我的小文的报和胡风先生的短文的报，一同寄几份给贾先生，让上海友人传阅。

胡风的朋友们都在分尝胡风的喜悦。几年来，平反后的他们也都在以自己新的创作，丰富着文学世界，重又赢得读者的喜爱。

死去的人也许可以安息了。方然、吕荧、阿垅、彭柏山、郑思……所有含冤死去的“胡风集团”的成员，都得了平反。人们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如今，胡风以中国作协顾问的身份，又走进了中国作家的一次盛会。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作家代表大会。

当年“胡风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也来了。他们是：鲁藜、贾植芳、绿原、牛汉、冀汸、耿庸、徐放、曾卓、路翎和杜谷等。

这是“胡风集团”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聚会，1949年以前，1955年以前，他们从没有这么相聚过，也从没有有意识要这样聚会过。他们中间，有的人过去从未见

过面，也无通讯联系，如耿庸和牛汉，便是平反之后才在北京相识的。

来参加大会的这些人，相约到胡风家中，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相聚。一年后，等这些人重又相聚胡风家中时，胡风已经仙逝，不可能像现在一样坐在中间，和他们合影留念了。

经过20多年的磨难，他们活下来有幸参加这样的大会，感到无比自豪和兴奋。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说是生活的强者，是曾卓笔下描绘的“悬崖边的树”。他们相约好，在大会开幕时，一起走进会场。

以年龄大小为序，他们不引人注意地列队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是瘦小的贾植芳，两年前他被自行车撞伤大腿，现在拄拐杖，步履仍然轻快。这几年他成为全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又担任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还带起一届又一届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

紧跟其后的是鲁藜，现在他是天津作协副主席。

路翎、绿原、徐放……一个接一个，神采飞扬地走进了大厅——自然，路翎除外，他的病情好转，开始了长篇小说、诗歌创作，但“神采飞扬”已与他无缘了。

这几年他们大多成了各地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绿原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专门负责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曾卓任武汉作协分会、湖北作协分会副主席，诗作屡次获奖；冀汸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耿庸成了上海出版界有名的劳动模范，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们，还有没有前来参加大会的罗洛、何满子、彭燕郊等等，都在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之后，以自己的工作在体现自身价值，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二

周扬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几乎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了。

“文革”后复出的周扬，重又获得许多人的尊敬。在人们看来，他在“文革”浩劫的磨难之后，真正开始从过去的盲从，过去极左路线的怪圈中醒悟过来，以新的精神状态，新的独立思考，走入又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新的一代。但是，他愿意跟上这个时代，和所有觉醒的人，和所有正视历史、正视现实、面向世界的明智者一起向前走去，和历史告别，和旧我告别。

然而，他病倒了，无法和老的朋友、新的朋友相聚，也不可能和胡风一道，坐

在同一屋顶下，听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向作家们作出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报告，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但周扬关心着大会。在开幕的前两天，12月27日，他从医院打来电话，向大会表示祝贺。开幕式上，宣读了他的贺词。《人民日报》第二天报道写到，“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因病未能出席，特从医院来电话祝贺大会成功，全场代表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开幕式结束了，代表们仍在下面议论着周扬，他的过去，他的现在，都引起人们复杂的思绪。几位中青年作家凑到了一起，他们商量，是否采取一种方式向周扬表达他们、以及大会代表们的心情。

于是，宾馆五楼的一个房间，成了议论纷纷、出谋献策的场所。郑万隆、冯骥才、陈建功、李陀、王安忆、史铁生、乌热尔图、郑义、孔捷生，最后商定写一封慰问信，代表中青年作家向周扬寄以敬意。

慰问信草拟出来，由郑万隆毛笔一挥，抄写在两张大纸上。不知是谁最先提出要将这份慰问信贴出去，请大家自由签名。

1985年1月3日，中午，郑万隆没有休息，在大伙儿的簇拥下，将慰问信抄出来了——

敬爱的周扬同志：

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中青年作家，都热切地想念您！您病了，不能参加会，多么遗憾！



1984年岁末难得的相聚。坐者左起：徐放、鲁藜、贾植芳、曾卓；立者左起：绿原、杜谷、黎丁、耿庸、冀汸、牛汉、路翎。除了黎丁之外，他们都是“胡风分子”。

您一定知道，党中央多么关心这次会，多么爱护、理解和信赖我们！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般的时代，终于来到。自信和勇气在我们的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您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您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

我们很激动。但您有病，还是希望您克制激动，我们只想用这封信，使您快活，舒畅，尽快恢复健康，早日走进我们中间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中青年作家代表

下午，在饭厅入口处的墙壁上，贴出的慰问信在代表中引来了强烈反响。每个人都驻足观看，有的拿起放在一旁的毛笔，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青年作家签名了，中年作家签名了。年老的作家看到注有“中青年”的字样，便遗憾地离去。

冯亦代来了。这位老作家，看完信，随即提起笔签上了名字。不等他把笔放下，便有人提醒他，这是中青年作家的信，老头把头一扬：“不管它，我也是中青年！”

于是，签名高潮在老作家中掀起了。凤子、卞之琳、韦君宜、汪静之、冯至、田间、唐弢……他们和周扬是同时代的人，有的比周扬更早走上文坛，比周扬品尝更多的时代的酸甜苦辣。

一批在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也签上了名。他们不把自己的苦



1984年岁末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前排左起：冀汸、曾卓；后排左起：耿庸、杜谷、贾植芳。

痛归结在某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上,更情愿将目光注视着现实和未来。他们中间有:吴祖光、唐达成、从维熙、邵燕祥、白桦、蓝翎、鲍昌、流沙河、李国文……

胡风的朋友们也来了,郑重地签上他们的名字:徐放、鲁藜、杜谷、路翎、贾植芳。自然也有人还不愿签名。一位朋友对贾植芳说:"你干吗签?我就不签。"

贾植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这几年表现得不错嘛!"

356位代表签上名字。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和周扬也有着种种不同的历史关系,在这一新的时刻,都怀着同样的心情。他们不仅是在向周扬致以敬意和问候,更是在礼赞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进步。

在这次大会上,牛汉、路翎、绿原、鲁藜、曾卓、冀汸当选为作协理事会理事。对于他们,这是新的开始。

三

胡风病倒了。他的生命之火在短暂几年里猛烈燃烧后,又骤然黯淡下来,即将熄灭。

1985年3月,是胡风83年人生旅途上最后一个忙碌的月份。

3月14日,作协对外联络部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书写《我为什么写作》,这是他最后一次拿起笔写出的与读者见面的文章。他告诉世界读者,他为什么要热爱文艺、要毕生写作,自然,更多的外国人并不知道为此他所付出的代价。

他的手已经发颤,字迹凌乱,歪歪斜斜,但依然是惯有的语气和句式:

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
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
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
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
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3月25日,胡风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3月26日,胡风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

3月29日,胡风出席作协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在后两次的活动中，胡风与巴金连续两次见面，这是30年后他们的第一次重逢。

因为鲁迅的缘故，30年代和胡风有过多次往来的巴金，这几年常常为自己在反胡风、反右时，为了保存自己过关而说出违心话感到内疚，从而，巴金也以敢讲真话、具有历史忏悔意识而赢得人们的爱戴。

巴金回忆他与胡风的重逢：

> 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的女儿陪着来了，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会议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呵。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胡风刚刚参加完4月8日结束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4月11日就住进了友谊医院检查身体。经超声波检查及CT检查，确诊胡风患贲门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动手术，只能作化疗、吃中药缓解。医生确定，很难活到10月。

对梅志，这消息实在太突然。看到胡风近两年有那么旺盛的写作精力，本以为他还能陪伴着自己走下去。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有了安稳、舒适的家。小儿子晓山，刚刚得了一个儿子，胡风高兴地起名叫"张本"，说这个"本"字笔划不多，好写，意思含蓄，他诗中吟道："知否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一切，无法挽留胡风，家不属于他了。属于他的，是病房……



八十年代初，梅志抱刚刚出生的小孙子，她很高兴孙子在平静的日子里来到这个世界。

在北京的朋友得知胡风住院的消息纷纷前来探望。

路翎和余明英不止一次来到病房。他们家正好在医院附近，路翎拿来了刚刚重新出版的《财主底儿女们》。40年前是胡风最早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将它出版，并在序中称："时间将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胡风高兴这本书重又问世，更多的人懂得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

胡风爱吃沙丁鱼，有不少朋友送来鱼罐头，他一定让路翎带走一盒。路翎刚刚回到家中，就又把罐头交给要去探望胡风的李辉。不愿多讲话的路翎，这次一再重复："你带去，一定让他收下。你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就说是你在街上买的，他爱吃。"

鱼罐头又回到了胡风的病房。他不知道，这一盒就是他刚才送给路翎的。罐头旁边，躺着那本《财主底儿女们》。

外地来京的朋友，也来探望病重的胡风。

何满子回忆他与胡风的最后一面：

> 胡风住在单人病房，病人的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和一张小沙发。胡风闭目坐在沙发上，我进去后只是微微张一张眼，下颌微微点动，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表明他神志是清楚的。但自始到终不发一言，魁梧的身体已很瘦削，脸色暗青，病魔已把他侵蚀得异常萎顿了。
>
> 病房里除了女儿晓风在陪侍以外，聂绀弩和周颖派了吴丹丹正在看望他，不久，路翎也带着刚刚印好的第一部的《财主底儿女们》来了，把书捧在他面前，翻开给他看他所写的序言。这时他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张着眼，在路翎指点着书时，他脸上闪过一脉轻微的，如不注意难以察觉的欣悦，但立即闭上眼，不再有表情了。连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时，也只是闭着眼啜入，口唇的翕动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四

1985年6月8日，胡风的生命之火，在燃烧了83年之后熄灭了。

这一天，胡风开始显得很平静。住院以来，家人一直没有向他透露病情，总是对他说：大夫说会好的，会好的。但家人们都害怕那注定的一天突然来临。外孙要考大学了，晓风征求他的意见，他重复道："不报文科，不报文科。"胡风对自己选择文学为职业，没有后悔过，可他不愿意后人步他的后尘，从事这一带风险的事业。他心底，毕竟有历史的余悸。

全家人来到了医院。上午11点多钟，胡风再也讲不出话，只能点头，表示听见别人的话。下午4点，胡风停止了呼吸。

胡风停止了呼吸，留下让人评说的历史。他来不及对自己的一生，对历史作更深一层次的思考和剖析，在大儿子晓谷问到毛泽东为什么将他打成反革命集团时，病房里的胡风只是说出简单的一句："可能他嫌我不尊重他。"

胡风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个世界里，有阿垅、吕荧、方然、卢甸、彭柏山在等着他。有鲁迅、冯雪峰在等着他。那个世界里，还有邵荃麟、何其芳、袁水拍……那里，也许永远没有了人世间的纷争，每个灵魂都能自由地交谈，自由地翩翩飞舞。在人间没有得到的满足，胡风也许在那里能够得到。

这也许是许多人乍一听到噩耗时的心境。

6月10日，新华社报道胡风逝世的消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同志因患癌症，不幸于1985年6月8日在京逝世，终年83岁。胡风同志生前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6月16日，《光明日报》最早发表聂绀弩的悼诗，随后，6月24日，《团结报》发表聂绀弩赠胡风的旧作。聂绀弩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悼诗加以修改，将八句改为十句：

悼胡风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除了聂绀弩一人的悼诗，一时间不见其他悼念文章。北京的报刊几乎保持了沉默，有的编辑准备约稿刊载，得到的指示是：听上面的精神再决定如何悼念。

聂绀弩的诗句不幸言中，尸藏太平冰箱里，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胡风的追悼会迟迟未能开成。他的死，顿时又成了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一个焦点。

原因出在胡风的家人，不同意文化部拟定的悼词。

自 1980 年在政治上给予平反之后，局势忽明忽暗，消息忽好忽坏，胡风直到死，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反的文件。梅志和孩子们要求，不能让胡风在受二十几年的冤屈之后，还将带有贬斥内容的悼词带到另一个世界。

追悼会就这样无止境地推迟，胡风的尸首便冻藏在友谊医院的太平间里。

对于这件事大陆报刊均无报道，香港的各报刊则纷纷就胡风逝世一事作各种各样的报道，或评述胡风其人其事，或介绍探讨胡风一案历史根由。

《中报》刊文《关于胡风》：

胡风死了，如果鲁迅在天之灵有知，我肯定他是最悲痛的一个。

胡风死了，他是中国现代文人蒙难史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一个。

胡风的一生充满了缺点，他自信，孤傲，甚至有些过敏和猜忌，但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最坚韧、最勇敢的一个！有几多文人能看清真理后，至死不回头的？有谁能够忍受单身监禁三十年——其间又屡传将被处死的消息——而信念不变的？我认为，除了胡风，再难举出他人了。

……

在中国现代史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人是不多的，大陆将来要树文人纪念碑的话，我坚信，胡风决不会没有的。

《镜报》月刊报道：

目前胡风遗体之所以仍然存放在 P.U.M.C（协和医院）（有误，应为友谊医院——引者注）的冷藏库内，迟迟难以发丧，既不火化又不

开追悼会，原因在于有关方面拟就的悼词，无法被胡风家属接受，如开追悼会时宣读这样的悼词，则胡风的妻子儿女势必缺席。双方在认识上差距颇大，彼此不肯让步的结果，使胡风只得静静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等待。文化部也不得不为存放胡风遗体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

……胡风悼词内容的争议分歧是什么？据说，有关中央领导对胡风在政治上加以肯定，用了“党的同路人”，“早期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之类的词句，对其政治身份不再加以贬斥。(过去是“托派”、“特嫌”等等。)然而，有些五十年代在“毛批”材料留下的恶谥，如“宗派主义”、“五把刀子”、“和党的文艺理论争夺青年”等等，却仍旧不能忘情，一句话，胡风在政治上应予平反，“在文艺思想上仍然存在错误”。

《明报》发表《胡风寂寞身后事》，也谈到了围绕悼词发生的风波：

人们也听到这样的传言：由于家属对已经拟好的悼词不同意，追悼仪式因此一拖就是两个月，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据说胡风得到平反时，还拖了几条尾巴，包括有名的“五把刀子”论，宗派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家属要求悼词对这些能作彻底的平反，因此出现了僵局。又据说，有人还想在悼词中加上这样的文字，说胡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这就更使家属无法接受的了。胡风当年的心情是不是复杂，谁知道？凭什么知道？但人们却不免感到，倒是今天的事情才似乎有些复杂。

一个月，又一个月，胡风的尸首在冷藏室里躺着，死后的胡风，仍然未能摆脱人世间的纷扰。

五

从6月到8月，胡风的尸首在近两个月里没有火化。8月初，家属决定自己办理火化，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开追悼会，先让胡风的灵魂得以安宁。

上海的贾植芳、王戎特地赶到了北京，其他朋友或因病，或因出国访问，未能来京参加火化仪式，再看胡风最后一眼。

8月3日，贾植芳、王戎来到胡风家中。在北京的朋友，一部分先来到这里，另一部分直接奔往友谊医院。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来了。喜爱摄影的海婴，带上相机，要拍下重要的时刻和场面。丁玲的丈夫陈明来了，他代表病中的丁玲来与胡风告别。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来了。聂绀弩早已卧床不起，只好由周颖一人前来，寄托他们的哀思……

一辆客车将会集胡风家中的来宾一道拉到了友谊医院，和八宝山火葬场约定的时间，是上午9点。

车到那里，已经有一些朋友在友谊医院西边马路上等候着。北京前来参加遗体告别的有：牛汉、绿原、徐放、路翎、鲁煤……



胡风的遗体在北京友谊医院被抬上灵车送往八宝山公墓。



痛苦不堪的梅志和她的儿女们伫立在胡风遗体前。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领导来了，邹荻帆等当年受到胡风培养的诗人也来了。

参加遗体告别的约有30人。

这一时刻，最劳累的是晓山和晓风的丈夫。他们忙前忙后，在医院联系有关事宜。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灵车的到来，还算准时，9点钟过了不一会儿，灵车驶来了，停在冷藏室的门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谈的人们，声音顿时静下来，全都把目光注视着冷藏室的大门。

大门开了。灵车上下来几位工人，走进门内，晓山和姐夫也走了进去。人们的心揪紧了。

晓山和姐夫，同工人一起将灵柩抬了出来。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小心翼翼，害怕惊醒胡风似的。

周围的人们屏住呼吸，目光随着灵柩移动。灵柩上的玻璃是深色的，他们看不见里面的人，但那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人，闭上眼睛就能浮现出他的形象。

灵柩抬上了灵车，后车门一关，车便急驰而去，晓山先打前站也走了。

其余的人分乘几辆大小汽车，跟着灵车，前往八宝山驶去。

胡风的遗体运到了八宝山，先放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地上积满水的库房一样的房间里，说是没有联系好遗体的告别仪式，没安排在悼念大厅——原本是没有正式规模的悼念仪式。

先把遗体放在一张高高的床上。晓山、姐夫、还有海婴，拿来了扫帚，准备把水扫走。其余的人在外面静静地等候。

海婴举起相机，拍下几张不同角度的胡风遗像。50年前，他父亲鲁迅逝世的当天，1936年10月19日，是胡风赶至他家中，起草一份讣文公告，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个伟人的逝世。

水还未扫干净，事情有了转机。殡仪馆临时安排出一间环境较为像样一点的房间：整容间。遗体告别将在这间窄小的房间举行。

人们又从院子东边绕到西边，在整容间门前排好了队。房间里正忙着布置。遗体运到房间中央，又拿来一个花圈——惟一的花圈。



专程从上海赶来的王戎，向胡风家人表示对胡风去世的哀掉。

人们开始悄悄地走进整容间。梅志和几个孩子，并排立在遗体左边，梅志显得很平静，孩子们脸上则挂着泪花。

第一个朝胡风鞠躬的是周颖。她哭了，很伤心。半年之后，她又会来到八宝山，在礼堂里向患难与共半个多世纪的聂绀弩告别。

周颖走到梅志面前，紧紧握住梅志的手，没有一句话只有眼泪。梅志也没有说

话，连眼泪也没有，只是猛地一把抱住周颖，然后，松开了手。

紧接周颖之后的是贾植芳。年过古稀的他，一跨进门槛，就嚎啕大哭，所有人中，只有他如此不能自抑，哭得那样伤心。他的声音很粗，“哇”的一声哭叫，一下子使气氛变得更为压抑。

他哭的时间很长，站在胡风的遗体面前，嘴里不时喊一声“老胡”。他好久也不愿离开，没有人来劝他，没有人来拉他，任他放情恸哭。他一边哭，一边朝梅志走去。梅志平静依旧。

路翎脸上看不出悲戚和痛苦的表情。他默默地鞠躬，又默默地站在遗体旁。他似乎很平静在观看什么，眼睛里没有泪花。在朝梅志走去的时候，他又回过头看了胡风一眼。这时，似乎才有几丝恋恋不舍的神情。

人们一个个走进来，又一个个走出去。这时，房间里只剩下梅志和儿女们。遗体就要推出去火化了。梅志在遗体刚刚推动离去的一刹那，突然失声大哭，这是自6月8日听到胡风的噩耗之后，人们看到她第一次这样悲伤地痛哭。也许只是到了这一时刻，梅志才醒悟胡风要和她真正告别了，把她一个人留在人间。

梅志的恸哭，人们并不奇怪，他们知道，刚才梅志的平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她这一哭，引得周颖、贾植芳等人刚刚擦干眼泪，又陪着她哭起来。

没有哭的人，都明白，梅志是在哭胡风一生的艰难，也是在哭自己的坎坷命运，更是在哭她和胡风间患难与共的情感的终结。这样的哭，他们不该去劝。

儿女们不忍心母亲这样哭伤身体，扶着她走出整容间，在迈出门坎的瞬间，梅志又扭回头看了一眼，遗体已去，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这个地方她不会忘记，深深地刻在她的心上了。

汽车载着大家离开了八宝山。此时，已是中午时分。这次火化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没有任何新闻媒介予以报道。

六

悼词的内容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终于获得了胡风家属的认可和有关方面的认可，追悼会可以举行了。时间，1986年1月15日，距胡风逝世的日子7个多月。

在胡风家属的要求下，文化部同意请部分因胡风而受难的主要人员来京参

加追悼会。

短短几天里,北京西直门外一个并不起眼的上园饭店,成了"胡风集团"的成员们相聚的地方。从上海来的有:贾植芳、任敏、耿庸、王戎、何满子,罗洛因出国访问,由妻子杨友梅代表前来;从杭州来的有冀汸;从南京来的有欧阳庄、化铁、华田;从安徽来的有张禹;从宁夏来的有罗飞;从广东来的有朱谷怀夫妇;从宁波来的有孙钿;从西安来的有胡征;从武汉来的有曾卓。

阿垅的儿子陈沛也从天津赶到了北京。彭柏山的女儿正好在京有公务,也前来参加。

一位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胡风的青年学生,利用假期自费来北京。

王志刚和关洪竹夫妇从沈阳赶到了北京。这对从未见过胡风集团任何人却受株连的夫妇,一见到胡风的家人,话未说出,就失声痛哭了。

……

纸、墨、笔买好,拿进饭店的会议室,由擅长书法的何满子挥毫,抄写人们草就的挽联。

路翎的挽联是:沉痛哀悼我的导师胡风同志　良师益友胡风今逝去,心中痛感悲凄与哀伤;旧时感情灯火常闪耀,内心永念督促与勉励。

绿原、牛汉的挽联是:以耳耶诗句足成一联敬悼胡风同志　上海伏蚓西蜀蒙尘哀莫大于心不死;桂林听诗渝郊避法名曾羞与鬼争光。

谢韬的挽联是:千古后千古文章,自有千古评论,千古有史;一生事一生风雨,终证一生肝胆,一生无愧。

冀汸、殷子实的挽联是:含垢廿五载,获咎由鲠直,招怨由真诚;幸赖壮心不已,终于跨过坎坷岁月,昭雪沉冤。文章千秋业,起点在脚下,人民在周围;全仗正道犹存,才能迎来清明时节,光耀遗篇。

贾植芳和任敏最初草就的挽联是: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块假招牌。后觉不妥,重拟一副:因直而获罪,可叹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

……

1月15日上午9时,八宝山公墓礼堂悬挂起横幅:胡风同志追悼大会,北京各界人士数百人和胡风的朋友们一起来追悼一个让人们众说纷坛、一个一生坎坷的人。

"胡风分子"们的挽联挂在大厅里外,在风中飘着。胡风的老友聂绀弩、楼适

夷也写来了挽联。

聂绀弩抄录旧作一首以挽胡风：

不再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楼适夷的挽联是：诤言三十万风骨足千秋，巨笔见忠悃江河万古流。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前来参加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30年前，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就是亲自交给他转给毛泽东的，他们当时谁也不会料到，事情会因此发生令千古惊骇的变故。习仲勋当时也不会料到，在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之后仅仅7年，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反党小说，他也被打成了“习仲勋反党集团”，直到1980年方才平反。

给胡风送花圈的有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胡乔木，



习仲勋（前排右二）出席了胡风的追悼会。后排右一是李锐，他以《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等力著记录了当代中国的政治风云。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等。

巴金从上海拍来电报,托人代他送来了花圈。

文学界的著名人士来了。他们有艾青、曹禺、萧军、唐弢、陈荒煤、唐达成、王朝闻、冯牧……

夏衍身体有病,不能前来,他专门给治丧委员会打来电话,表示他的悼念之情。

1955年时的《文艺报》编委康濯,从湖南给《文艺报》拍来电报向胡风表示哀悼。电报中说,1985年1月,他在北京拜望胡风,谈到1955年批判"三十万言"的错误作法,"胡风'以过去事不必再提'相答,使人激奋。不意遽而辞世,创恸极深。"

周扬重病住院,不能前来,连印好的悼词也看不成。他的夫人苏灵扬看到悼词后说,如果周扬能够知道现在对胡风的评价,周扬会感到欣慰的。苏灵扬感慨地说:"周扬和胡风应当是好朋友。"

历史毕竟不能够重新安排,人们的愿望只能成为历史的遗憾。

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悼词。一份来之不易的悼词。悼词称胡风是"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肯定了胡风在三四十年代从事左翼文艺的功绩。这样评价《七月》、《希望》:"《七月》和后来在重庆出版的《希望》,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

悼词肯定了胡风的一生:

> 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
>
> ……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以肯定;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人们对着胡风的遗像和骨灰盒默哀、致敬。黑色的木盒上,嵌有一行小字,这

是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习仲勋朝梅志走去,握着她的手,表示慰问。人们一个个,熟悉的、陌生的,陆续走过去。

梅志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虽然,中央电视台意外地没有接到前来拍摄追悼会新闻录像的通知;虽然追悼会拖了这么久才举行。但这些对梅志都不重要了,她最大的满足是毕竟举行了这样的追悼会。有了这样的追悼会,胡风在天之灵可以安宁了。

七

追悼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胡风集团”的成员,和北京的朋友20多人一起来到胡风家中,梅志请他们来吃午餐。这是有史以来“胡风集团”的人们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他们是:贾植芳、任敏夫妇,谢韬、卢玉夫妇,朱谷怀夫妇,耿庸、绿原、牛汉、冀汸、曾卓、化铁、华田、欧阳庄、孙钿、徐放、路翎、何满子、罗飞、鲁煤、杨友梅、张禹,以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阿垅的儿子陈沛。时在《北京晚报》工作的李辉及夫人也应邀参加。

周海婴给大家拍完照片便走了。陈沛有事也提前离去。



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第一次相聚,“胡风集团”从没有在一起相聚过,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所谓组织联系。他们相互熟悉或者陌生,因历史的缘故,此刻坐在一起,共同凭吊冤魂,共同庆贺新生。

本来宽敞的客厅，第一次涌进这么多人，顿时显得拥挤。烟雾缭绕，人声嘈杂。

没有正规地摆酒席，而是零散地围坐一起，可叫中西结合式的自助餐。

客厅外过道的小厅里，贾植芳、任敏、路翎、化铁、杨友梅、梅志、鲁煤围坐一席。客厅里摆有两桌，一桌坐有徐放、曾卓、冀汸、牛汉、绿原、耿庸，另一桌以茶几为席，坐有孙钿、谢韬夫妇、欧阳庄、何满子、张禹。书柜与书桌之间，单独站着朱谷怀夫妇，饭碟就放在电视机上。罗飞则坐在过道和客厅的交界处。

客厅的一角墙上，挂着嵌有玻璃的胡风遗像，遗像下是供奉的几束淡雅的花。

胡风的孩子们都来了：大儿子晓谷、小儿子晓山、女儿晓风。他们来回为大家敬酒、端菜。

曾卓站起来，大声提议："第一杯酒，我们大家敬梅志。"人们都站起来，举起酒杯。梅志连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大家一饮而尽。

大家来回相互敬酒，他们中有的人还是初次见面。

互相敬酒之后，何满子站起来。他背对阳台，面朝所有人说道："来，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们干杯。"声音高亢中又带几丝凄凉。

大家一起来凑死去的朋友的名字：方然、吕荧、郑思、彭柏山、满涛、阿垅、卢甸、黄若海……

说到阿垅，卢玉问道："阿垅的儿子不是来了吗，他呢？"人们告诉她，陈沛已经走了。

不知是谁插一句：还有张中晓。

贾植芳站起来，声音有些发颤地大声说："还有一个王皓同志，耿庸的老婆，凭吊她的幽灵。"

曾卓补充一句："她跳黄浦江自杀了。"

大家一起站起，耿庸平静地说："这一杯我得先干光。"仰头一饮而尽。

又有人说，还有那些与胡风不认识，与我们也不认识的人，受到了株连，我们也应为他们干杯。

大家又一饮而尽。

几次敬酒，整个房间都异常安静，连刚刚一岁的胡风的小孙子，也没有吵闹。

"胡风集团"从没有在一起相聚过，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所谓组织联系。他们相互熟悉或者陌生，因历史的缘故，此刻坐在一起，共同凭吊冤魂，共同



梅志(左)与贾植芳在一起开怀畅饮。

庆贺新生。

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聚一起饮酒。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胡风集团”的第一次人数最多的聚会,也会是“胡风集团”的最后一次聚会。该来的都来了,却少了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集团的人。

人们在怀念他,也在反思他以及与他紧密相连的这段历史。

曾卓说:“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样,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

贾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

徐放说:“对‘胡风集团’事件这段历史,值得研究。过去人们对党是一直忠诚的,也很崇拜的。现在的人也许不理解,我们其实那时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

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是宗派在整人。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的基础。”

“我们要正视历史。”不止一个人这样说。

朱谷怀没有说话。因为和胡风的关系，他自1955年以后作为反革命分子而受磨难。此刻，他在回想与胡风40年代的交往。也许他想到了1946年他发表在《希望》上的诗《碑》。

碑
是死者
向世界飞去的足迹
碑
是死者
活在活人心里
不灭的记忆
太阳在碑前
升起又沉落
风打碑身流过
花草在碑下
盛开又谢落
而碑屹立着
碑给人们的记忆
要活向无穷
要活向永远

胡风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长达30年的历史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

从此，“胡风集团”只会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供一代代历史学家了解、研究。对于这些人，历史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把握现在和未来。

他们离开胡风的家，陆续踏上了归程。他们不会忘记彼此的友情，他们还会相聚一起饮酒吟诗，但随着胡风的逝世，随着追悼会的结束，“胡风集团”——一段历史就从此结束了。

一段终结的历史，便是一块历史之碑：太阳在碑前升起又沉落，风打碑身流过，花草在碑下盛开又谢落。碑高高耸立着，碑给人们的记忆，要活向无穷，活向永远……

尾声 三年之后

1988年6月，胡风逝世三周年整。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对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作几处重要补正。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6号文件。

文件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了复查结论。

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此刻，又对文艺思想、宗派诸问题作了澄清和新的说明。

原文件中，指责胡风是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新的补充通知认为这是胡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说法，应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一起考虑，如此指责不符合他的本意，故撤销。



2002年10月，耿庸（左）和王戎在一起畅谈。

原文件对胡风的宗派活动有很严厉的指责，认为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新的补充通知提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涉及面广，牵涉人员也多，不宜简单下结论。从胡风的一生总体来看，在政治上他是拥护党中央的。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精神，这一指责也予撤销。

原文件曾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新的补充通知认为，这类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

三条重要的补正，是胡风生前梦寐以求的。现在，他的灵魂可以安宁了。

1988 年 7 月 16 日，《文汇报》驻京记者陈可雄，向上海发回一条电讯，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当天联合召开“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是对中央办公厅文件的第一个积极反应。

据报道，参加座谈会的首都评论家、学者有朱寨、陈丹晨、乐黛云、严家炎、王信、缪俊杰等。他们早已年届中年，三十几年前胡风案发时，他们或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或是报刊编辑，或是大学学生。今天，他们一起在反思历史。

《文汇报》发出这条电讯之后，7 月 22 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高宁的报道。与《文汇报》不同，《人民日报》的消息第一次明确宣布了中央办公厅文件的精神：



2002 年 10 月，贾植芳（右一）与冀汸（左一）还有曾卓的夫人薛如茵（左二）相聚在一起。

三十三年前，胡风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受到错误处理。八年前，中共中央对胡风进行甄别，在政治上给予平反。最近，中央再次下达文件，进一步为胡风全面平反，包括对他的文艺思想也作出了新的评价。

这次座谈会是以中央文件为契机，对文艺的一次新的反思，与会者为当年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批判，对一代乃至两代知识分子投射下巨大的心理阴影，不胜感慨。大家认为：胡风的彻底平反，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

历时三十三年之久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至此，才算真正终结。

历史却不会终结。历史以此为开端，又走向新的未来。

胡风的朋友们，中国的文艺家们，一切知识分子，应该、也可以和整个民族一道，吟唱胡风1949年笔底流出的诗句：

时间开始了——

写于1986年至1988年7月，北京

修订于2009年10月，北京

初版后记

这是一本与我过去的所有作品完全不同的书。当写完最后一页，放下笔，没有一点儿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倒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一种很难说是惧怕还是忐忑不安的情绪。我不敢称它是报告文学，也不敢称它是史书，也不敢像过去一样堂而皇之地向朋友们宣布：我写完了。

是的，不敢说。这本书远不能算作“写完了”，目前这个样子，只能是刚刚开始，“写完”的时刻还在后面，五年，十年，也许更多年以后。我想自己远不是有资格有能力写这样一本书的人，当然，更不会奢想，将来真正“写完”这本书的人会是我。

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



1984年岁末本书作者与三位前辈、也是复旦大学校友的曾卓（前左）、绿原（前右）、冀汸（后左）合影。

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的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我还作了些什么呢？没有精心设置的结构，基本上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平铺直叙；没有深刻而酣畅的议论，仅仅在事实的叙述中间或流露几句感叹；没有生动的场景描绘和心理剖析，一切都让位于也许是枯燥的、直接了当的叙述。一个作者应有的主观色彩，只是淡淡地残留在字里行间。

形成这样的定局，或许是自己认为，比起书中几十位人物二十多年坎坷的命运，一切精美的文字也会显得苍白。批判、被捕、狱中、受难的妻子、受株连的人……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被上述观点所左右，于是，最后出现的便是一个“记者”的书，而不是“作者”的书。

写作过程中，我时常设想有一天，我会和一个不同的李辉对话。这个李辉自称有上帝赋予的全知全能，掌握了所有有关的历史档案，于是，他对我说：“你的这本书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丝毫没有涉及到历史的真相。你所掌握的材料，充其量只是片言只语和无关紧要的，真正关键性的、最能说明历史进程原因的材料，除了我，任何人也无法得到，所以你也好，别人也好，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永远是不着边际的。”

我无法回答他，只感到一种困惑和失望。我沉默了半天，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

他没有回答，闭上了眼睛。我轻轻一推，才发现这个李辉睡着了，连能透露点什么内容的梦话也没有。

我没有睡着，没办法，只好就所掌握的材料写下去，居然总算写出来了。

我不怕睡着的李辉一旦睁开眼，再批评我几句，便这样将一本也许是“不着边际”的书稿，送进印刷厂。或许它会“着点边际”，也能让睁开了眼的李辉不再闭上眼，而是帮助我继续写下去，修改，补充，提高，让它真正记录下一段艰难的历史，记下一群人，乃至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

李辉

1988 年 7 月 9 日

附 录

APPENDIX

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

——关于左翼文坛宗派主义的随感

写在前面：从1988年写作《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之后，我陆续又写过一些关于文化人物的随笔，其中时常涉及到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问题。现在，我将散见不同文章中的有关内容集中起来，重新整理，再加充实，以图对这一话题有较为系统的描述。

一

199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演讲时，我曾讲过这样一个题目《文学团体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串半个世纪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主义问题。可是，转而又想，“宗派主义”，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从来没有走出我的视野。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说实话，只要一涉笔左翼文艺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宗派纠葛恩恩怨怨，我就如同坠入一张无形的大网之中。我的手脚，我的思绪，在网眼里伸来伸去，飞来飞去。一会儿仿佛轻松自如，摆脱了羁绊，可一转眼，却又被网绳挂住，缠住，让你吃力地扭动身躯，无奈地喘息。

我也像被黑布蒙着眼睛，引上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径。只感到在不停地走，不停地转弯，却总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路到底通往何方。我不能静下心来，看一看路

边各式各样的景致,甚至连停下来轻松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似乎有目的,又漫无目的;似乎有收获,又无从表达。我便如此这般走在这样的路上。

何其艰难!

太多的众说纷纭,太多的各执一词,太多的概念混战,太多的人生悲剧……翻阅堆积如山的回忆和史料,面对一个个亲历者饱经沧桑的身影,我常常有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真有这种时候,我推开满桌的书籍资料,站起来长叹一口气,或者恨不得索性对着墙壁喊上一句:历史真难说清!

有时我不敢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譬如,我设想,如果抽出半个世纪左翼文人间的争斗,抽出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不同人物的、循环反复的悲剧,那么历史的画面中还剩下什么呢?文学创造的殿堂里还剩下什么?许多人的智慧、才华,乃至精力,究竟抛向何处,这种抛掷意义何在?一个个悲剧的发生,有什么必然,有什么代价?

一天,我终于明白,我必须跳出无形的网,必须解开罩住眼睛的黑布走出山径。

不必拘泥于一人一事,不必让思路陷入盘根错节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细节辨析之中。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超脱,多一些理性的目光,在不同人的历史遭际中感受他们,理解他们,由认识性格而走进历史深处。

二

必须正视长期以来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

宗派主义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入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作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或许有不容调和的重大原则因素,但在不少人那里,庄重严肃的原则,仅仅作为冠冕堂皇的外在形式,各自难以言说的一己恩怨则掩隐于背后。这种时候,就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不同人身不由己地卷入。旋转中,人们毫不吝啬地消耗精力,毫不迟疑地对着一个既定对象发泄不满。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的人获得亢奋的快感。

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的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他而生命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而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不容回避的是，诸多宗派纠纷人事纠纷，常常影响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许多时间里，文坛中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无休止地围绕某一特定对象而展开的斗争。

总得有一个既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胡风时，所有对胡风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这个对象是丁玲时，所有对丁玲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这个对象是周扬时，同样，所有对周扬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

既定对象是催化剂，具有意想不到的功能，将汇聚一起的人们原有的种种矛盾和隔阂一一化解，或者说，暂且放置一旁。哪怕曾经对立，哪怕曾经采取各种方式试图将对方拖入困境。但既然情形发生变化，共同有了既定对象，曾有的一切便顿时显得不那么重要，大家不妨结为一个或紧密或松散的阵营，面对同一个目标。

然而，对象身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忽视，被曲解。参与者的创造性，被导向一个畸形的领域。

交锋的不是思想，更不是文学和艺术。如果是思想，是文学和艺术，那么，冲突和矛盾，便会成为巨大动力，促使各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促使各自艺术的提高和创新。此种状况下，双方都会无须借助思想和文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矛盾，而是乐意伸出手将权力的影子挥走。真正思想意义艺术意义上的派别之争，会带给人们挑战和竞争快感。

三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由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

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义，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

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

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的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不管承认与否，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个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风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缺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有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

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上世纪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入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四

不同的人的回忆中，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大。这可能就是一个真实的周扬。

不可否认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宗派情绪一直在周扬身上存在着，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在胡风集团冤案的酿成上，周扬与胡风之间早在鲁迅时期就存在的矛盾和宗派情绪，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他完全可能对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并入狱多年，造成众多文人家庭悲剧的后果没有料到，但当时，他也并不会因为胡风的入狱而感到十分内疚。

关于舒芜提供的胡风信件最后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批材料)发表，至今仍有不少谜难以解开。这批材料经舒芜在林默涵指示下整理之后，原决定在5月11日的《文艺报》上面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发表。但在清样出来后，周扬没有交给当时具体负责胡风批判的周恩来，而是越过他直接交给了毛泽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要去的，还是周扬主动送去的，这是一个谜。如果是周扬主动送审，那么动机是什么？又是一个谜。

更为关键的是，在毛泽东看到这份清样之后，为什么临时决定交由《人民日报》发表，把一个纯粹的思想批判一下子定性为"反党集团"？在作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刻，毛泽东和周扬有过什么交谈？到底在这件事情上，周扬个人应该负多少历史责任，宗派主义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和行为，恐怕永远也无从知

道了。

因此,即便仅仅只有“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一个著名的文字狱,中国20世纪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主义,也会是一个沉重得难以拿起、拿起却又放不下的话题。

五

有一次去采访夏衍,请他谈周扬。见到他,我一直想提到一个人,想再度从他那里了解他们永远没有化解的历史积怨。这个人便是冯雪峰。

还在大学期间,我便注意到当时文坛的一次争辩。那是因为夏衍在回忆录中,谈及20世纪30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时,对冯雪峰颇有微词。对于他来说,他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冯雪峰当年的历史作用。他对冯雪峰1936年由延安到上海后,没有先与他和周扬这些共产党人联系而是先找鲁迅一事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导致“两个口号”论争的发生、导致鲁迅与周扬等人矛盾激化的原因。他的这篇回忆录发表后,马上引起不同反响,一些鲁迅专家和当事人,相继发表文章为冯雪峰辩护,并认为在“文革”刚刚结束之际这样批评冯雪峰,对在“文革”中冤屈而死的冯雪峰来说,有失公允,也欠宽容。至今,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是是非非的话题,并没有被人淡忘。围绕这一历史纠葛而发生的不同人的命运,我想,仍将不断被人提及,被人描述。

个人间的矛盾,一旦与宗派主义的历史形成相联系,就再也无法摆脱。

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也是如此。他们在晚年仍然未能和解,其原因错综复杂,但历史阴影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文革”刚结束时,周扬接受赵浩生的采访,同他漫谈往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了这篇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对于很少用文字说明自己的周扬,这是难得的材料。在谈话中,周扬谈到了丁玲。他说在延安时期,他就和丁玲形成了两派:“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的说法,未见丁玲本人的反驳。但后来我采访陈明先生时,他明确表示丁玲和他都不同意周扬的这一说法,在他的印象中,在延安并不明显存在所谓的两派,文抗与鲁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是正常的。

这就说明,至少在周扬内心里,他一直是将丁玲视为与自己对立的一派。这样,即便在“文革”之后频繁表现出忏悔愿望时,仍然没有改善与丁玲的关系。

丁玲同样如此。她也无法淡忘与周扬的矛盾。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因多年磨难而郁积心中的敌意，愈加痛切。在1979年1月26日的一则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她的这一情绪："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3期)这时《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还没有发表。

在另一则日记中丁玲还写道：

> 近日为周"文"所苦。决先写《风雪十二年》。
>
> 下午回来，未谈正事，不谈要事，只劝我不要卷入帮派。我何时有帮派？现在谁有帮派？他自己是否有帮派？劝我不要卷入，究竟意在何处？有何所指？他代表谁在说话？对我想起何作用？这些小丑，只是会说假话，会说瞎话，会说坏话，真是防不胜防呵！
>
> (1979年3月24日，出处同上)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

1984年冬天，由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在北京创刊，特地在新侨饭店举办招待会。招待会的规模很大，在京的几代作家数百人都来参加。当然，因为身体有病等原因，周扬、夏衍等这样一些人物没有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这是丁玲晚年的一次壮举。她是这个聚会的中心。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八十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有几分执拗、自负。

在她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夫妇、"胡风集团"的其他受害者、右派分子……可以说，所有与周扬宿怨难解的文坛人士，都与她站在了一起。

这绝非一种巧合。丁玲心中，1955年、1957年周扬等人施加在她身上的打击，是永远不会散去的阴影。既然阴影过去曾带给她苦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

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

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毫不奇怪,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如今在20世纪80年代汇集到了她的周围。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在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六

不可否认,宗派情绪和宗派主义,在许多时候是一种致命的毒素,它会激发憎恨,把理性烧得发烫,导致精神悲剧的发生。在这一点上,胡风无疑又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1955年因受到宗派主义和政治家无情的双重打击,胡风处在最为艰难的境地。对于他来说,自那之后的漫长而痛苦的时间里,胡风的思想实际上处在一种停滞状态。在一生的最后30年,除了晚年平反后为数寥寥的几年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和医院里度过。换一句话说,他的躯体被禁锢,而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思想,也无形之中被突兀而至的巨大惯性带到一个静止的、狭小的空间。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仍将不懈地执着于往日的追求,他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减少艺术和思想的热情。同时,他当然也不会淡忘本来就纠缠于心的那些纷繁人事。过去,他反复辩解反复论证,试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在狱中,他仍然抱有同样的愿望,而且因这突然的变故显得更加强烈。

不变的是胡风。

从被捕入狱的那天起,一直到"文革"结束,胡风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思想的解释和对文坛纠纷的描述。他是可贵的,他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文艺观,更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1965年在度过十年铁窗生涯后,他和儿子有过一番对话。

"你是不是连文艺理论都不承认有错误?"晓谷问。

"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出错来。"胡风说。

胡风还对晓谷这样说:"要我承认是反革命,这还不容易。但我不能这么做。在

延安整风时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受到表扬，到处作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说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证明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不能这样做。”

当然不能。30年间，像蛇一样缠绕于心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正的胡风。这一点上，狱中的他，和1954年急切地寄出“三十万言”时候的他没有太大区别。他不能接受那些对手们施加于身的罪名，不能容忍将自己划归为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的异类。多少年的左翼工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都让他足以有资格认为，与批判他的周扬一些人相比，在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方面他同样毫不逊色。他的文艺思想中关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处处有生活”，是符合文艺规律的，

并非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挑战。

委屈、冤枉、痛切，诸如此类的情绪，始终在折磨胡风。于是，循环反复的申辩，没日没夜的苦思冥想，消耗着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的眼睛始终关注在一个既定点上。他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他无法轻松。他的性格使他注定做不到聂绀弩的那种坦然、豁达，乃至玩世不恭。他实在太严肃、太郑重、太无法调和，他也就只能让自己如此沉重地在时间里走过。

我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地这样想过，假如胡风不是那样过于沉溺于自我辩白和申辩，假如他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既定的内容局限自己的思维，寂寞岁月中的他，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走到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他可以如同一个思想家一样，在抽象世界里找到寄寓生命的所在。他可以摆脱文坛人事纠纷的困扰，平静地思索，深入地研究业已形成的文艺观，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可以真正进入到历史思考的领域，从鲁迅那里获取思想的力量，把鲁迅关注过的种种人生的、文化的、历史的问题，根据自己命运感触，根据自己独特的经历，进行新的透析。这样的胡风，将是一个发展中的胡风，一个走出昔日阴影的胡风。

可惜，这只能是一种假设。

这是一个遗憾。

胡风把遗憾留给了自己。

七

最近，一家报纸的书评版编辑就《李辉文集》的出版采访我，他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坛悲歌》中所描述的胡风集团冤案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主义。他问

我，现在应该怎样看待胡风的悲剧，以及如何比较胡风和顾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我只作了一个简要回答。

我说："关于这场涉及到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文人的文字狱，应该详尽描写和冷静思考。胡风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命运的悲剧性。当时，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有限的、却又是十分珍贵的独立见解，在这一点上他无疑仍然保持着'五四'时代、也就是鲁迅精神的传统。可是，他招致的却是灭顶之灾，并且还牵连到许多作家朋友。在这方面，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的悲剧性。他在1955年被捕入狱之后，由于性格等原因，他的思路始终陷入与周扬等人宗派矛盾之中不得自拔。胡风本质上是个诗人，所以情绪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的总结和理论的深化。结果，二十几年后，他的想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入狱之前。在这方面，他和顾准有着显著差别。我有时设想，如果胡风像顾准、或者俄罗斯、欧洲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能够在苦难中冷静下来，利用在狱中的特殊性，沿着鲁迅的一些思路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或者，将自己的文艺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那么，他的人生悲剧的价值也就会更大一些。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近乎于苛求的良好愿望。"

他又问："那么你觉得当代知识分子从胡风冤案和悲剧中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我回答说："应该吸取的地方当然很多。重要的是像胡风那样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这一点，我在作品中已经有过不少描写。同时，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更清醒和冷静一些，不要卷入过多的人际纠纷之中，不能让思想、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我想，这些回答尽管简要，却是我站在90年代的今天，回望远去的往事所产生的深切感受。

20世纪即将结束，但我们注定要带着这个世纪留下的一个个沉重话题走进21世纪。新的世纪就一定会轻松吗？谁也不知道。

1998年4月2日

1955 年的禁书

——关于查禁“胡风分子”著译作品的两份史料

一个偶然机会，我从旧书摊发现了 1955 年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一些档案资料，其中有两份是当年关于查禁所谓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译作品的通知。这两份史料相当详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胡风集团冤案发生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图书查禁活动的大致过程和基本范围。

第一次查禁通知

第一次查禁通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1955 年 7 月 28 日发出，题为《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中宣部办公室印发时间为 7 月 30 日，总号编序为(55)014 号，共印 315 份。新华书店总店则于 8 月 5 日向各发行所、各直属分店及省属分店以“急密”形式发出《关于停售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书籍的通知》，抄送机关为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北京发行所于 8 月 6 日收到此件。我所搜集到的这份史料，新华书店总店的通知为打印件，中宣部的通知和查禁书目，则是抄件，并注明：根据总店抄件抄存。

发出第一次查禁通知，距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被捕入狱约两个多月，此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进一步扩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中宣部 1955 年 7 月 28 日发出的通知说，关于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经请示中央暂作如下处理：

1. 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分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

2. 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的

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拟订。

3. 由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负责清查在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中所采用过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情况，并根据上述原则迅速提出处理办法。

《通知》最后还说：

"附来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这个目录是不完全的，在执行中由文化部加以补充。"

新华书店总店在《关于停售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书籍的通知》中写道："希望你们迅疾与当地党委联系，遵照中宣部的通知，对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进行处理；并迅速通知所属支店（门市部）贯彻执行。"

"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停售后，是否就地报废或退回原发货单位或原出版社，以及由谁报销损失等问题，总店正在与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容后通知。"

第一批明令停售和停版的书目为19人的93种著译作品，人员排序如下：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等17种；
刘雪苇：《论文一集》等4种；
阿垅（亦门）：《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创造》等4种；
绿原：《集合》等7种；
鲁藜：《李村讲的故事》等7种；
卢甸：《我们是幸福的》等3种；
路翎：《朱桂花的故事》等9种；
冀汸：《桥和墙》等4种；
梅志：《小红帽脱险记》等4种；
罗洛：《春天来了》等3种；
方典（王元化）：《向着真实》等1种；

张禹:《我们的台湾》等 2 种;
耿庸:《从糖业看台湾》等 4 种;
牛汉:《祖国》等 4 种;
化铁:《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等 1 种;
贾植芳:《住宅问题》等 6 种;
满涛:《樱桃园》等 7 种;
吕荧:《叶甫盖尼·奥涅金》等 4 种;
徐放:《赶路集》等 2 种。

第二份查禁通知

第二次查禁通知,由文化部 1955 年 11 月 5 日颁发《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补充目录》和《编有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新华书店总店于 11 月 15 日向各发行所、各直属分店、新疆、内蒙古新华书店转发。北京发行所收到此件时间为 11 月 17 日,新华书店总店的通知为打印件,文化部的通知则仍为抄件,但未加注明。此次发件虽仍注"急密",但从间隔时间看,文件转发过程明显缓于第一次。

由文化部 1955 年 11 月 5 日颁发的第二次查禁通知,主送机关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报送机关为:中宣部、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公安军司令部、公安部、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图书馆。

文化部在通知中说:

"兹发去《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书籍补充目录》和《编有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书籍目录》各一份,前一种目录所列书籍均应停售、停版和停止借阅处理;后一种目录所列书籍,均应作停售和停止借阅处理,但其中某些书籍(如《朝鲜通讯报告选》第三集)可视必要修正后再版发行。此外,尚有《东平选集》和《和平颂》(均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两书,前者有彭柏山短序一页,后者在后记中提到该书曾经陈亦门加工,可将两书的序言和后记撕去继续发售,但再版时均应重加校订后修正。至于其他人的著作中有称赞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的,如王瑶著《中国新文学

史编》已出版的可暂不处理，但再版时必须修正。又，江苏、福建等省文化局来信请示关于胡风分子何苦、王戎、梅林、彭燕郊、华田、斯民、刘大海、郑造、陈卓猷、彭拜、苏讯等人的著译的处理问题，经请示上级决定，上述十一人的著译已出版者可不停售，但以后不得再版。以上各节，即希通知所属单位检查执行。”

“又，我部八月十日所发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译目录的通报中，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朝友谊海样深》一书，据有关部门来信指出，该书著者之一‘阿陇’，并非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阿垅，因此，该书不应处理。”

可以看出，和中宣部第一次发出的通知相比，文化部的通知侧重于查禁过程中的技术操作细节。

新华书店总店在《关于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书籍的第二次通知》中指出：“在执行中如发现仍有未列入上述目录中的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书籍(包括编有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书籍)，应一面请示当地文化局，一面报总店，以便据以请示文化部。”

同时，新华书店总店的通知还指出：“关于停售书籍的报废损失及私营书店经售部分的损失负担等问题，至今尚未接到上级批示，特告。”由此分析，在查禁活动已经开展三个多月后，对如何补偿书店特别是私营书店的禁售损失并未确定，而一些书店显然一直在询问。后来是否就补偿问题做过相关规定，尚不得知，仍寄希望于新的史料发现。

由文化部颁发的《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发展著作和翻译书籍补充目录》，共涉及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14人的66种作品，排序如下：

胡风：《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等12种；
阿垅：《人和诗》等3种；
吕荧：《人的花朵》等10种；
路翎：《青春的祝福》等6种；
满涛：《苏联戏剧创作理论的若干问题》等6种；
罗洛：《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美学》等3种；
方然：《加里宁论文艺》等2种；

彭柏山:《任务》等 3 种;
梅志:《兔子头》等 2 种;
张禹:《文艺的任务及其他》等 3 种;
贾植芳:《人的证据》等 5 种;
鲁藜:《毛泽东颂》等 7 种;
冀汸:《一家亲》等 3 种;
绿原:《童话》等 1 种。

与第一次查禁通知相比,第二次查禁通知中涉及的人员新增加了彭柏山和方然两人,另外,增加了对收有胡风等人作品的一些选本的查禁。据《编有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的书籍目录》,需查禁的选本有 25 种,它们分别选录有胡风、路翎、牛汉、彭柏山、鲁藜、绿原、徐放、张禹、吕荧、满涛、卢甸等 11 人的作品。

如《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论工人文艺》、《英雄的中华儿女》的著译者为"胡风等",内收胡风文章;

《朝鲜通讯报告选(第三集)》,著译者为"路翎等",内收路翎的文章;

《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一共 6 辑,收有吕荧、满涛的译文和文章;

荒煤编的《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收有卢甸的文章;

《歌曲》(1954 年合订本)、《广播歌选》、《大家唱》等歌集,收有鲁藜的歌词;

……

结 语

1. 据两次查禁通知和附件,1955 年查禁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著译作品的活动共涉及 21 人,被查禁的作品,著译作品 159 种,选本 25 种,合计 184 种。这些被禁图书的总印数有多少,待查。

2. 1955 年查禁活动中,共查禁 21 位被涉及者的作品总数为 159 种(不含多人选本),个人被禁作品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

(1) 胡风:29 种;
(2) 路翎:15 种;

(3) 鲁藜:14 种;
(4) 吕荧:14 种;
(5) 满涛:13 种;
(6) 贾植芳:11 种;
(7) 绿原:8 种;
(8) 梅志:7 种;
(9) 阿垅:7 种;
(10) 冀汸:6 种;
(11) 罗洛:6 种;
(12) 张禹:5 种;
(13) 牛汉:4 种;
(14) 耿庸:4 种;
(15) 刘雪苇:4 种;
(16) 彭柏山:3 种;
(17) 卢甸:3 种;
(18) 方然:2 种;
(19) 徐放:2 种;
(20) 化铁:1 种;
(21) 方典(王元化):1 种。

3. 在被查禁的图书目录中,没有涉及到谢韬、曾卓、何满子、杜谷、胡征、朱谷怀、鲁煤等"胡风分子"的著作。他们在 1955 年曾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和迫害,有的被隔离,有的被捕,通常也被视为骨干分子。图书查禁为何未涉及他们,有待进一步考证。

风雨中的雕像

——关于胡风的随感

第一次见到胡风，是在14年前的5月。

1982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了北京，对于我来讲，这意味着人生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周围一切陌生将逐渐变为熟悉，过去无法理解的，也将逐渐被理解。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在20世纪曾经出演过数不清的政治、文化、人生戏剧的地方，会给我提供不少机会去追寻历史，去感受历史。

况且，这里还有许多我过去仅仅从教科书和作品中知道名字的文化老人。

与文化老人面对，与各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遭际的文人面对，实际上也就是面对着历史的一尊尊风雨中的雕像。

胡风便是我初到北京后最早见到的一位文化老人。

在即将毕业离开复旦时，恩师贾植芳先生担心我初到北京，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不方便，便在我离开上海时，特地为我写了一摞信，介绍我去和他的亲戚、朋友联系，以便他们能够给予帮助。

这些人中，就有胡风。

对于一个毕业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胡风当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上海四年，从贾先生夫妇和他们的一些朋友身上，我已经渐渐感受到，这些所谓的“胡风分子”，在当年铺天盖地、猛烈无情的批判中，被勾画得狰狞可怕，被视为洪水猛兽，可是，一旦走近他们，熟悉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丝毫类似的感觉。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单纯、天真、率直，乃至偏颇得可爱。

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奇怪，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对胡风集团冤案的平反还没有明朗，我怎么就会毫无顾虑地成了仍在中文系资料室做一般管理工作的贾先生家中的常客，并从他那里，开始了我学业上最初的起步？更为重

要的是，从他和他的朋友身上，我对历史的认识和感受，从此便从教科书本走进了生活，从抽象走进了具体。教科书中雷同、单调乃至武断的历史叙述和结论，渐渐地在我眼中失去了价值。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感受。

历史原本由人的活动构成。我相信，了解人，体味人的性格，对历史的把握才会准确，认识才会深切许多，丰富许多。这样，才不至于在空洞或者虚妄的概念迷宫里转向，失去应有的理性判断。

于是，在 14 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便是带着这样一种尚未完全清晰和明确的想法，走向胡风——个当时在不少人眼中仍然显得神秘的人物。

不过，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次去见胡风时，并没有带着历史的好奇和沉重感。我是以很平常的心情去看这位不平常的老人的。

一年前，胡风还处在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在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的安排下，他被送到上海治疗，病情大为好转。当时，因为他正处在恢复之中，我未能前去拜望。不过，一次在贾先生家见到了陪同胡风来上海治疗的他的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那天，她们和贾先生贾师母谈得很多。远远近近，悲悲喜喜，环绕着



1983 年，本书作者李辉在胡风家中采访胡风。

他们。我在一旁静听，我在一旁凝望。岁月流逝和生活磨难，似乎没有在年近古稀的梅志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她显得平静，清秀的脸庞充满微笑。她给人一种亲切、热情、优雅的印象。

那次，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胡风病中的一些听来令人心酸的情形。有了这样一次和梅志的接触，加上贾先生的关系，我的初次拜访，也就少了一些生疏和拘谨。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大病初愈的老人。这一年他正好80岁。他显得十分疲惫，身子直靠在沙发上，胳膊无力地平放在扶手上，大部分时间在闭目养神。“他呀，一工作起来就不休息，从早干到晚……你瞧，这两天他就太累了。”晓风一见到我就这样数落着父亲。

疲倦的胡风，没有过多讲话，只是简单问了几句有关贾先生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中有几丝疑惑，没有我在他过去的照片中所见到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孤傲锐气。朦胧中我感觉到，他对初次见面的人，肯定抱有戒心。挫折与磨难，让他不愿意轻易相信人，也无意表现出热情。

或者说，大病期间所发生的恐惧症，多多少少依然困扰着他。仅仅两年前，他还不得不住在精神病院里，受着臆想的折磨。家人的记忆里，他时常在发病的时刻，从病房跑到走廊上，像一个被捕猎的动物，来来回回急促地走，脸上充满着恐怖的表情，拼命想逃出医院。十多年后，儿子晓谷回忆到当年的情景。有一次他曾对晓谷说：“×××叛变了，正带着兵往这边打过来。他们要抓我。我是逃不掉了。你赶快走，还来得及逃出去。”晓谷安慰他，给他解释没有这回事，他怎么也听不进去，并对孩子不听他的话显得非常着急，一再要晓谷走。到后来，只好绝望地说：“完了，来不及了。你也走不掉了。”这样的情形，有时一个晚上要发作好几次，一直到他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现在想来，初见胡风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嘴。我觉得，他的嘴抿得紧紧的，显得很有力，也富有表情。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即便闭目养神，但紧抿的嘴，仍然透出一股傲然。

这个春天的胡风，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好转。在刚结束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上，他被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我和他谈到了这件事。他对我说，他长期与社会隔绝，这几年身体又不好，对文艺界的情况不了解，只希望文艺界真正能达到这次所要求的团结，使创作繁荣起来。

他最为关心的是正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胡风评论选》三册。这是与读者告别将近30年后，他第一次集中出版自己的全部理论著作。梅志告诉我，过去的八种单行本全部收入，没有作大的修改。当梅志谈到这里，胡风突然插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版？"

他是在停歇了好久之后才突然讲出这句话的。他的急切，他的忧虑，他的疑惑，都在这样一句简短的问话中流露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眼睛突然发亮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目光对我的刺激。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转瞬即逝的、令人难忘的目光，才使我更深地理解胡风。

对于胡风，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他所拥抱的文艺思想更重要？它们就是他的生命。它们日日夜夜萦绕于心。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受人拥戴还是被冷落，都无法让他抛弃自己视为生命的思想。他看重它们，我想大概不在于它们惟一正确，也不在于它们多么伟大，而在于它们融进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生命，它们是他生存的基础，甚至也是生存的目的。它们让他着迷，让他陶醉。从他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之日起，他就注定不会抛弃它们，冷落它们。即使它们搅得灵魂无法安宁，即使它们把他绊倒，让他在地狱门坎前打了一个滚，他爬起来后，还是将之紧紧抱在了怀里。

这便是独特的胡风。

文坛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如此执著如此顽固如此执迷不悟地充满着自信，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虽九死而无悔地不移初衷，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显得天真而单纯，对思想之外的世界懵懂不知，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面对整个世界。他的人格，他的悲剧，他在当代史上所具备的意义，都在他对自己的思想的拥抱中完成。

从第一次见到胡风后，我便开始了对他的观察、理解、认识。不能说我有能力准确地把握他，我只能说，随着自己学识和人生体验的逐日增加，我愿意一天天更为深入地走进他的内心，走进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

第一次见胡风后，我写了一篇特写，介绍与人们久违的胡风的近况。我没有想到，在北京，发表这样一篇文章，竟然有那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后来，文章还是在广州的《羊城晚报》上刊登出来，这也许是胡风平反后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他的特写。

那只是一篇千字文，写它时我并没有想得很多。但当我收到《羊城晚报》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时，我才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实际分量。

写信的是一位山东读者，当年因为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请教诗的写作而蒙受不白之冤。现在，他无意间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才第一次知道胡风获得了自由，而且可以公开见报了。看来，他并不是很注意新闻的人，对几年前胡风已经得到平反的事情居然茫然不知。根据我的文章，他在信中不无惊奇地说："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西，可见对他就不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以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我把这封长达数页的信转给了梅志。读这样一封信，想必他们感慨甚多。他们本来有许多困惑。想当年批判胡风其声势何等壮观，全民性参与，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胡风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可是，如今平反却一直遮遮掩掩，细水长流一般悄然滴着水珠。

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封读者来信，我都应该保留下来。它印证着一段变化着的现实，也印证着胡风与中国30年来的历史风雨时而密切时而若即若离的关系。

胡风是一个历史存在。因他而发生的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当代史叙述时谁也无法绕过去的巨大存在。

他已经成为一个参照。

在他之前，业已发生过的"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等等，仅仅限于思想文化界，虽然严厉却还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远不像他所面临的是全民性随心所欲的批判。从思想到肉体，从人格到外貌。这是一个开端，这是一个转折。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无须温良恭俭让，无须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的讨论、争辩。无须考虑批判对象的人格、精神的尊严，乃至历史行为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用一种全民参与的方式，用思想文化之外的手段予以解决。果断，干脆，痛快。

在他之后，即将陆续发生的"反右"和"文革"，则是将他已经经历过的故事，扩展到更大的天地里，他所面对过的种种困惑，会有更多领域里由更多的人来感受。许许多多让参与者兴奋不已的方式，譬如检举揭发，譬如全民声讨，譬如抄家，以信件日记定罪，等等，早已在批判胡风时预演过，如今，人们见多不怪，只不过更加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已。

胡风，当代历史之链上无法摘去的一环。

“文革”中的胡风,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

他早已被打入另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走资派”或者“黑帮分子”;他早已没有了家,也就无从遭受抄家的蹂躏;他早已是“死老虎”,也就没有必要被各种力量视为值得攻击的对象;他早已沦为阶下囚,也就没有可能被押上批斗会场尝一下“坐飞机”的味道……

“文革”中许多令人发指令人难以承受的东西,他其实早已在20年前一一经历过。20年前一场风暴的主角,如今,退到了时代后台,远离政治中心,在四川监狱里感受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可是,似乎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那样,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折射出只有“文革”才会具有的历史嘲弄意味。也似乎有他这样一个映衬,一些新的悲剧,才多了许多历史的无情。

他不是主角,他却无处不在。他幽禁后台,但前台上又分明一直闪动着他的影子。假如人们有心翻阅一下从1966年到1977年的报刊,便不难发现,从周扬到姚文元,彼此位置不断变换,惟一不变的只有陪绑者胡风。

1967年,姚文元在那篇著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将周扬与胡风相提并论。本来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却被姚文元划归到一起:“周扬的思想同胡风的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诸如此类的批判,将20年前命运截然不同的周扬胡风,一并推上了审判席。

不仅仅周扬一人,当时许多被批判的“走资派”,不管其是否与文艺有关,也不管他们是否了解胡风,也同样被划归胡风一类。

我收藏有一份“文革”时期批判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专号。对这样一个与文艺界并无关联的政治家的批判,胡风也成为一个陪衬。“叶飞鼓吹‘形象’地写贫农‘忘本’的‘内心斗争’,不过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所谓写农民几千年来‘精神奴役创伤’谬论的翻版而已,直接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邵荃麟之流的黑话遥相呼应……”,“叶飞还荒谬地提出:‘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都可以写,应该写。’‘无论哪个角落,都充满了最有生命的东西。’等等。这是明目张胆地贩卖陆定一、周扬之流所喋喋不休的极其反动的反‘题材决定’论和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论。”

仅仅十年之后,又一个历史场景的转换,姚文元和“四人帮”则成了胡风的同类。在当时的批判声讨声中,姚文元被回应了一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胡

风无一例外地与姚文元等紧紧绑在一起。他不仅被批判为“包庇胡风反革命分子”,也成了周扬的“同党”。胡风、周扬、姚文元,原本并非一体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则奇妙地被划归到一起。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文字的批判,远没有监狱这样一个地方更能强烈地呈现历史无情的变幻,更能反映出在政治漩涡中人的命运的不可捉摸,不可预测。

胡风是在1965年年底离开秦城监狱的,仅仅一年之后,那些当年与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也一个个遭遇到胡风当年同样的结局。

周扬关了进去。我不知道,他所关押八年的囚室,是否就是胡风度过十年时光的那一间;我也不知道,当他囚禁在里面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胡风。不过,我相信,他的思想没有停止流动。后来证明,正是这意想不到的遭际,促使他开始进行历史的反思。

罗瑞卿关了进去。当年是担任公安部长的他,亲自签署了“胡风分子”的逮捕令,现在他未能逃脱厄运。我没有读到过他本人的回忆录,不清楚他在里面如何度过艰难的日子,也不清楚他是否会想起当年有过胡风这样一个人。不过,从他女儿罗点点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我强烈感受到历史对他和儿女们的冲击。

“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十一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公安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死离别的痛苦。”罗点点的这段话,凝练而深沉,我读过不止一次,每次读到它,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她仿佛在铺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或者,她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电影导演,简洁的蒙太奇语言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

“文革”,真是一个巨大漩涡,将胡风、将一切人都揉为一体,成为高山一般沉重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当代历史上。

又是一个十年之后,姚文元也被关了进去。

这几天,刚刚拿到晓风为胡风编选的一部书稿《墙内集》,书中收录着胡风“文革”前后在狱中所写的信、交代等等。翻阅这些书稿,我感觉好像在与胡风面对。他那发亮有神的目光,傲然紧抿的嘴,又一一浮现在我眼前。

说是书稿,实在是一种过于轻飘的表述。这些信件,这些交代,实际上是胡风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人格的本色呈现。细细读来,我想象着,身处逆境的他,

如何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候，凭做人的原则，凭一如既往的倔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

除了陪绑，“文革”并非与胡风没有关联，监狱当然更不是他的世外桃源。他没有被批斗，但无休止的外调，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压力，一日也没有减轻过。

更为重要的，他面临着人格的考验。

就他的遭遇而言，将更多人卷入逆境的“文革”，应该说他不会有切肤之痛。相反，那些昔日导致自己遭受厄运的人，和自己当年一样受到批判受到磨难，对于他来说，完全有理由产生某种幸灾乐祸的满足。这样，当一拨又一拨外调人员前来从他这里搜寻周扬等人的“黑材料”时，他原本可以毫不迟疑地予以揭发、批判。即便他这样做，人们仍然会理解他，谅解他。

可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胡风。

胡风就是胡风。

也许他有太多受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偏激，譬如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意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样的人，即便遇到“文革”这样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也不会违背自己人格理想，去做落井下石或者随意栽赃的事情，这原本是那个时代非常容易做出的事。

他没有诬陷周扬，没有满足外调者试图获取意外材料的愿望。后来，在“文革”结束后答复关于乔冠华的外调时，他仍然一如既往，只是如实地回忆自己与乔冠华的交往，如实地谈对乔冠华的印象和看法。读这样一些文字，我非常感动，比读胡风的一些诗歌还要感动。这些交代，用一个文人真实的人格书写，这是他人生最好的诗。

因为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和黄树则有过接触，便很注意胡风关于黄树则的交代。

胡风抗战期间编辑《七月》杂志时，发表过一两篇黄树则的小说，并有过短暂的交往。但后来黄树则主要精力仍然放在本职工作上，成为著名的医务工作者。“文革”中，担任卫生部领导职务的黄树则，毫不例外地也受到冲击，而他和胡风的这段几十年前的往来，也就成了一桩罪行。

在 1967 年中国最为混乱的日子里，外调者找到了狱中的胡风，命令他交代所了解的黄树则的情况。从今天保留下来的十几个问题的回答看，胡风对这位当年的作者充满善意。他肯定清楚自己的每句话可能具有的分量，他也清楚，在

这样一种特殊情形下，真实地讲述一切，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曾经信赖过自己的那个年轻作者，当然，这也就是对得起历史。他自然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谁，但在有限的范围内，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实事求是肯定黄树则的价值，实事求是地将黄树则与已经成为罪人的他的关系叙述清楚，而不是违心地按照外调者的要求，往他人身上泼污水。在那样一个年代，这原本是不少人都无法避免的一种行为。

于是，读这样一篇交代，我仿佛在读友人之间充满感情的回忆，仿佛在读一位评论家对一位作家的论述。

“他态度沉着，言语朴实。”胡风如实写出第一次见面时，黄树则留给他的良好印象。胡风还写道：

> “他进延安后还寄来过稿子（应该还有信），那当是我到重庆以后了。其中有一篇记事散文写几个农民革命者的伤病员，一直到现在我还留有模糊的记忆。和他的小说内容相反，这写的是他所赞扬的革命的农民首领，而且是真人真事，但风格极朴素，几乎没有用什么表示‘赞美’的形容词，每个人只写了寥寥几笔，使我读起来，觉得这些人都是极可信赖的至亲好友。对这一种风格，我曾用炭画比方它：它没有色彩，也没有吸引目力的光，但却使读者默默地感受到人物们的最本质的精神内容。在生活实践中发展下去，这种风格是能够写出我们的和土地一样朴实的某一典型的农民革命英雄人物来的。”

读这样的文字，难以置信这是一份“文革”中一个“罪犯”奉命而作的交代。胡风坐在狭窄的空间，思绪却如以往一样，充满诗意地飞翔在文学天地里。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特殊方式，继续履行着一个评论家的职责。窗外发生的一切，似乎干扰不了他，他依然用独到眼光，按照自己的文艺观，来向人们描述作为作家的黄树则曾经拥有过的风采。

从交代中可以看出，外调者非常想了解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胡风上书时黄树则是否与之有关的敏感问题。对此，胡风完全清楚其中自己每一句叙述的利害程度。于是，他用非常明确、肯定的语气，证明黄树则与自己的“罪行”毫无关连：

"领导上问他看过我写给中央的《报告》没有。1949年以后再没有见过面，他当然绝没有可能看到过我的报告。而且，即使那时我们还见面，以我对他的处境的考虑说，不但不会把《报告》给他看，还决不会和他谈到这件事以及我对文艺领导的看法的。"

这种交代，虽然不会改变黄树则"文革"中受迫害的命运，但无疑会减轻一些他的压力。重要的是，它又一次提供机会，考验人性的善恶美丑，从而让胡风体现出处逆境而不移性情的精神价值。

上世纪80年代，黄树则住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一个小院里，我不时前去看望他，与他谈起一些往事。

我们当然谈到"文革"，谈到胡风。他说当时他很快就知道了胡风的交代，他非常感激胡风对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风雨的高级干部，对发生的历史悲剧，有着自己深刻的反思。

"做人就应该像胡风这样。"一次他说。

关于这个话题，他说了很多。他说，我们总是被要求不断地改变自己，我们也真诚地相信，革命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做好准备随时为之献身而在所不辞。作为一个革命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不正常的情形下，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却被视为正确，而实事求是反倒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特别是在人们被号召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判，将人之间最为宝贵的信任感和真诚打得粉碎。

他当年讲的这番话，至今仍让我感到沉甸甸的。

做人——多么简单却又多么重要，多么具体却又多么恢宏！它无处不在，它贯穿每个人的一生。利益可以暂且放弃，荣耀可以弃之一旁，压力可以承受，但正正派派做人，老老实实做人，则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如山川河流一般亘古不变。有时我在想，生活在现实社会，我们强调了很多很多，可是"做人"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似乎渐渐被人淡忘，被人忽略，被放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

然而，时间可以流逝，世事可以变迁，但做人的原则、标准，不应该改变。

人不是风标，一阵微风，便会改变方向。做人的原则不是超级市场里的商品，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

还有什么比真诚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人的信任更能体现人性的美丽?

我们常常感叹道德的丧失。可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又难以弥补的不就是对做人准则的破坏吗?当大声疾呼道德重建时,将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放在首位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更应是对现实人格的重构。不因一己利益的得失,不因仕途或者某种特别需要而扭曲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做人尚且残缺,遑论他哉?

在胡风逝世之后,我曾经又去看望过黄树则。那天谈得非常投机。他以书法著称,谈话间,特地为我写了一个条幅。他抄录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雪。纯净洁白的雪,总是带给他温馨与宁静。

胡风念念不忘的是鲁迅。

在1965年9月,他从秦城监狱里给梅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又一次酣畅地抒发出对鲁迅的深厚情感。他借一长串排比句,仿佛将心中所有的热情、苦闷、压抑、感伤一并宣泄出来。

> 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骗的心"、"欺骗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谦逊,是为了学习他的为了原则敢于采用表面上和原则正相反的反击法(例如说如某某斗争是为了"报私仇"),置身败名裂于不顾的那一腔战斗者的慷慨;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对敌人要做一个二六时中执著如怨鬼的怨鬼,纠缠如毒蛇的毒蛇,对人民、对友人、对爱人要做一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牛"和"别有烦冤天莫问,仅余慈爱佛相亲"的"佛子";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但却全心全意地、始终如一的、大小不改地,

用反语，用“伪装”以至敢于站在“假想敌”的地位，在个人“孤军作战”的形势下，也做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真正的集体主义者；——毛主席所说“骨头最硬”等等，等等。

鲁迅在胡风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存在。但是，这种神圣并非虚无缥缈，并非高度抽象化了的偶像。他在感觉着鲁迅的呼吸，感觉着鲁迅曾经注视过自己的亲切目光。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于他，是人生最高境界的化身，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昭示。

胡风当然非常清楚，无人能够达到鲁迅那种境界，但是，精神的感染，却时时存在，永远不会淡漠。我们不难发现，与鲁迅关系密切，受到鲁迅关心和爱护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总是无形之中在将鲁迅作为自己人生的向导，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鲁迅的不同侧面。萧军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冯雪峰忠厚朴实，正直善良；胡风独立、执著……重要的是，即便在极为复杂和艰难的情形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原则，没有让种种恶习蚕食灵魂。风雨中，挺立起来的，还是大写的人。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可以告慰鲁迅。

给梅志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胡风没有料到，仅仅不到一年时间，他心目中那个伟大而亲切、神圣而朴实的鲁迅，被一股强力，纳入到极为奇特的境地。

一个失去本来模样连鲁迅自己也未必能够辨认的鲁迅。一个如同道具一般在纷乱舞台上搬来挪去的鲁迅。一个被抽去灵魂被阉割生命仅仅是木偶一般的鲁迅。

伟大的鲁迅，尴尬地耸立于人们面前。

他被套上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他似乎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所有赞美。可是，他的精神实质，他的思想最为深刻最富生命力的内容，却变得支离破碎，甚至化为一阵云烟飘散。

他的生命本是一个巨大丰富恢宏的存在，却偏偏根据需要被任意简化乃至歪曲。

鲁迅不再是鲁迅，研究鲁迅也仅仅限于资料的收集，有时自然无法避免违背历史真实的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学习鲁迅，无疑已经成为一句空话。可以有成千上万人读鲁迅，研究鲁迅，可是，鲁迅精神哪里去了？它找不到可以寄寓的躯体。

他顿时成为被奉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所有思想所有言论，仿佛早就为这

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作好了准备。不同派别，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目的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是鲁迅的知音，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从他那里随手拈来能够作为护身法宝的东西。于是，《鲁迅全集》成为一个军火库，储藏着每一时刻急需的物资。批判周扬也好，批判"刘邓路线"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这座仓库，毫不费力气地搬起一批枪炮弹药，然后投入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自以为伟大神圣的战斗。

他似乎达到辉煌的顶峰。然而，与他同时代并且有关的所有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

他晚年的知己瞿秋白，一篇《多余的话》导致厄运，在遇难30年后重又被押上审判台，陵墓被毁，灵魂被蹂躏。他曾经关心过的方志敏，不再被视为英雄，清贫人生战斗人生，同样被泼上污水。毫不奇怪，那些与他相左的左翼阵营的同志，如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等人，无一例外地或者走进监狱，或者被批斗被流放，而他当年对他们的批评，理所当然成为他们的历史罪证之一。

作为一面旗帜，鲁迅仍然被高高地举起。可是，他所代表的上世纪30年代左翼队伍，却偏偏全军覆没。历史被阉割，伟人被架空，一面旗帜插在一片荒漠上。荒漠里没有点染生机的草木，没有流淌激情的河流，没有对手，也没有知音。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鲁迅焉能不成为一个真正寂寞的孤独者？

谁能想象鲁迅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

无法想象。

1955年的突然变故，对于胡风实际上意味着思想的停滞。在一生的最后30年，除了晚年平反后为数寥寥的几年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和医院里度过。换一句话说，他的躯体被禁锢，而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思想，也无形之中被突兀而至的巨大惯性带到一个静止的、狭小的空间。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仍将不懈地执着于往日的追求，他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减少艺术和思想的热情。同时，他当然也不会淡忘本来就纠缠于心的那些纷繁人事。过去，他反复辩解反复论证，试图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在狱中，他仍然抱有同样的愿望，而且因这突然的变故显得更加强烈。

不变的是胡风。

从被捕入狱的那天起，一直到“文革”结束，胡风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思想的解释和对文坛纠纷的描述。他是可贵的，他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文艺观，更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1965 年在度过十年铁窗生涯后，他和儿子有过一番对话。

“你是不是连文艺理论都不承认有错误？”晓谷问。

“至少到现在还看不出错来。”胡风说。

胡风还对晓谷这样说：“要我承认是反革命，这还不容易。但我不能这么做。在延安整风时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受到表扬，到处作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说得有声有色。到后来证明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不能这样做。”

当然不能。30 年间，像蛇一样缠绕于心的就是希望还原一个真正的胡风。这一点上，狱中的他，和 1954 年急切地寄出“三十万言”时候的他没有太大区别。他不能接受那些对手们施加于身的罪名，不能容忍将自己划归为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的异类。多少年的左翼工作，与鲁迅的亲密关系，都让他足以有资格认为，与批判他的周扬一些人相比，在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方面他同样毫不逊色。他的文艺思想中关于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处处有生活”，是符合文艺规律的，并非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挑战。

委屈、冤枉、痛切，诸如此类的情绪，始终在折磨胡风。于是，循环反复的申辩，没日没夜的苦思冥想，消耗着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的眼睛始终关注在一个既定点上。他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他无法轻松。他的性格使他注定做不到聂绀弩的那种坦然、豁达，乃至玩世不恭。他实在太严肃、太郑重、太无法调和，他也就只能让自己如此沉重地在时间里走过。

他也不像有些“胡风分子”。

绿原同样关进了秦城监狱，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这位精通英语的诗人，开始在狱中自学德语，甚至仅仅根据一本词典来自编一册德文文法。当他走出监狱，当他平反之后，一个功力深厚成就卓著的德文翻译家由此而出现在人们面前。

贾植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十年时间，“文革”中又遭受种种磨难，但他的达观一天也没有失去过。做人的原则没有改变，对胡风的敬重和信赖没有改变，并坚信历史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这并不影响他微笑着面对一切艰难。无论在何种场合和环境下，他都能保持平静。他的快乐笑声，永远感染着人们。这样，当平反之后，他便得以有可能精力充沛地继续对历史对文学的思考和研究，用学识和人格影响又一代新的学生。

和他相似的是路翎。这位被认为最有才华的“胡风分子”,陷于了与胡风一样的状态。他不能明白突然降临的一切,不能接受施加于身的罪名。他焦虑不安,他不得不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让流行的语言侵蚀他的艺术思维。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路翎,变得沉默,让内心的痛苦折磨自己。他和胡风一样,一度精神失常,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和《洼地上的“战役”》的那个路翎消失了。“文革”后,朋友们震惊地看到,路翎已经不会兴奋,不会微笑,眼睛呆滞无神,而过去,它曾被朋友们认为最有魅力的一双眼睛。

我没有去了解胡风与路翎重逢的情景。不难想象,那一定是令人揪心的瞬间。他们面对着,却不能流畅地交谈。他们握着对方的手,却很难感觉到各自思想的流动。

我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地这样想过,假如胡风不是那样过于沉溺于自我辩白和申辩,假如他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既定的内容局限自己的思维,寂寞岁月中的他,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走到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他可以如同一个思想家一样,在抽象世界里找到寄寓生命的所在。他可以摆脱文坛人事纠纷的困扰,平静地思索,深入地研究业已形成的文艺观,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可以真正进入到历史思考的领域,从鲁迅那里获取思想的力量,把鲁迅关注过的种种人生的、文化的、历史的问题,根据自己命运感触,根据自己独特的经历,进行新的透析。这样的胡风,将是一个发展中的胡风,一个走出昔日阴影的胡风。

可惜,这只能是一种假设。

这是一个遗憾。

胡风把遗憾留给了自己。

我很喜欢读绿原在80年代翻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诗。里尔克的诗精粹凝练,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诗中的理性,有时往往比浓烈的情感更具感染力,更能刺激人的思维。

谈到里尔克,人们一般常常以《豹》作为他的代表作。但下面这首《孤独者》,更让我感受到一种与宇宙一样广袤无际的悲哀。它容易让我想到胡风。

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将在它的边缘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
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
它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
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

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
甘于承受其内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
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

在我看来,诗里的那张“最远的石头脸”,就仿佛我所面对过的那个苍老的胡风。他以自己微弱的身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承受着精神的折磨,最终也没有改变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挺立在风雨之中。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理解他,甚至因他而株连的一些友人,是否就真正理解了他呢?他的文艺观和性格,曾使他对不少人作过严厉甚至苛刻的批评和指责,由此而招致的非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他的认同?他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人生交响中最具华彩的乐章,人们到底认识多少,理解多少?今天或者明天的年轻人,还会理解他吗?

每当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感到某种悲凉渗进心底。

不容回避的是,诸多宗派纠纷人事纠纷,常常影响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许多时间里,文坛中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无休止地围绕某一特定对象而展开的斗争。

总得有一个既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胡风时,所有对胡风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这个对象是丁玲时,所有对丁玲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这个对象是周扬时,同样,所有对周扬不满的人汇聚在一起……

既定对象是催化剂,具有意想不到的功能,将汇聚一起的人们原有的种种矛盾和隔阂一一化解,或者说,暂且放置一旁。哪怕曾经对立,哪怕曾经采取各种方式试图将对方拖入困境。但既然情形发生变化,共同有了既定对象,曾有的一

切便顿时显得不那么重要，大家不妨结为一个或紧密或松散的阵营，面对同一个目标。

或许有不容调和的重大原则因素，但在不少人那里，庄重严肃的原则，仅仅作为冠冕堂皇的外在形式，各自难以言说的一己恩怨则掩隐于背后。这种时候，就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将不同人身不由己地卷入。旋转中，人们毫不吝啬地消耗精力，毫不迟疑地对着一个既定对象发泄不满。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的人获得亢奋的快感，有的人在文坛存在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然而，对象身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忽视，被曲解。参与者的创造性，被导向一个畸形的领域。

交锋的不是思想，更不是文学和艺术。如果是思想，是文学和艺术，那么，冲突和矛盾，便会成为巨大动力，促使各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促使各自艺术的提高和创新。此种状况下，双方都会无须借助思想和文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矛盾，而是乐意伸出手将权力的影子挥走。真正思想意义艺术意义上的派别之争，会带给人们挑战和竞争快感。

可惜，并不久远的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景象。

尘埃落定，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

这是我“沧桑看云”时不断浮现于眼前的景象。不能不面对它们，不能不描述它们，同时，又不能不为之惋惜为之感叹。人们是否仍然走不出昔日阴影，同样的景象是否还会出现，人们是否还需要思想之外、文学之外的东西来获得刺激和亢奋，新的对象是否又会被选定，然后以此为焦点不同人重又汇聚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耗生命？

但愿往日景象不再。

最后一次见到胡风，是在 1985 年他去世前 10 天的时候。

去医院之前，我顺道先去看望路翎。他刚刚去医院看过胡风，告诉我他发现胡风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听说我马上要去，他特地拿出一个沙丁鱼罐头，一定要我带去，还特地叮嘱我，千万别对胡风说这是他让送的，要说是我在街上买的。我有些纳闷。原来，这正是他刚刚探望胡风时，胡风硬要他带回来的。他知道胡风最爱吃沙丁鱼，他愿意这个罐头重新回到他所崇敬和感激的胡风身边。

我很感动。从其他胡风的朋友身上，我也见到过他们对胡风同样的情谊。我为他们之间这种深厚情谊而感动。

在朋友心目中，胡风的重要位置永远是他人无法取代的。那些朋友，尽管因他而受难，尽管因他而消磨青春，可是，一旦获得自由，一旦可以重新沐浴阳光，他们对他敬重依旧，情谊依旧。他们不在乎别人如何议论，也不在乎仍将遇到什么。既然历史已经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既然胡风仍然健在，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分开。哪怕他们彼此之间，各自有着不同的性情、意趣和志向，但他们在对待胡风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仅此足矣。

这便是胡风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他的吸引力，不是能够带来飞黄腾达的权力，也不是可以赐予人的恩惠。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拥有激情和人格。

而正是这样一些最为珍贵的东西，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般，将许多敬重他爱戴他的文学青年吸引，并乐意在他的影响下培养下成为一位诗人一位作家。

当我最后一次坐在胡风面前时，我想到了这些。

83 岁的胡风，4 月份突然被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估计，很难活过这一年的 10 月。

和不久前相比，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身材魁梧的他一下子变得瘦削，脸色发青，精神显得十分萎顿，几乎说不出什么话来。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里，可以说是胡风晚年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评论集》写下数万字的长篇后记，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观，并对一些理论分歧再次进行梳理。他又在亲人的帮助下开始撰写回忆录。大家吃惊地发现，他的思维活跃如年轻时候，每天工作近 10 个小时，也不肯停下休息。几十万字的写作数量，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备受病魔折磨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难道他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难道命运早已安排好，要他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再次享受一下创作的快乐？

一年之前的 1984 年的 6 月，胡风在梅志的陪同下参加了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是他自 1954 年以来第一次行使公民权，对此他比任何人都要看重。那一次，他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但是，他没有料到，转眼间他便失去了应有的公民权利，宪法未能使自己免遭磨难。也许他预感到，这将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显得格外兴奋和郑重。

他走到选举站，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两位教师。回到家里，他写下《喜投神圣的一票》：

六月十八日，力疾赴中国艺术研究院投票选区人民代表。我选了候选人中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和一位音乐教授。我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名字，但我信任候选制和她们的职务。

在旧中国，我没有行使公民权选举过代表，我连是否有这种权都不知道。开国后，我才凭公民权选举过人民代表，也被选过。现在是和社会隔绝了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亲自投这神圣的一票。占一绝志感。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当时，梅志将胡风的这首诗寄给我，很快发表在《北京晚报》上。见报当天，梅志就给我来信，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今天见到胡先生的《喜投神圣的一票》刊出，很是高兴，这一票真是来得不易！"

此刻，坐在白色世界里，看着眼前精神萎顿的胡风，我感慨良多。沉默中我凝望着，仿佛看到一段漫长的历史在他身上流过。他经历的实在太多，他带给人们的话题也实在太多。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还有谁能比他更能引发出关于人生悲剧和文化命运的思考？

我想了想，似乎没有。

就是在那一时刻，我酝酿已久的想法最后确定下来：写一本书，记录胡风和他所遭遇的一切。3年后，我完成了《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可惜，此时他早已离开人间，没有可能读到它，我无法知道他是否赞同我对他和他所经历的历史的描述。

又是一些日子走过。虽然完成了《文坛悲歌》，但我从没有觉得对胡风的认识和思考可以结束。历史不会穷尽，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思考同样不会穷尽。

既然历史选定了他，一阵风暴将他吹起，他也就成了悠悠岁月里一座再也不会消失的雕像。那么，凝望之中，人们的历史沉思再也不会终结。

完稿于1996年9月3日

在冬天，怀念梅志

狂风一夜，落叶满地。说是北京今年的冬天来得慢，但还是在大风之后携着寒意来了。

在初冬，我怀念梅志先生。

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风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太熟悉这些诗句了。我儿时的成长伴随着不断地朗读它，背诵它。如今想起它，不只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1955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更是因为，词中傲雪挺立的梅花意象，总让我联想到梅志生命的美丽。

历史竟有如此巧合！悲哉？幸哉？



梅志的画像

几年前，我曾为丁聪先生画的梅志肖像画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让我想到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美丽、坚韧、勇敢。"

与毅然前往西伯利亚，在冰天雪地里陪伴丈夫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梅志陪同丈夫胡风奋斗、漂泊、受难，逆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就是她的生命的美丽。

第一次见到梅志，是在1981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念书。一段时间，贾植芳先生就一直在念叨："胡风到上海来治病了，他在监狱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他的关切和期盼，让我感动。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梅志会来他家里吃饭。他要我

到时也来。

走进客厅，见到了梅志和女儿晓风。我吃惊地看到，年近古稀的梅志在历尽牢狱磨难之后竟无一点衰老迹象。个子不高，身材苗条，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什么长吁短叹。她的语调柔和，但说话简捷明了，透出精干、果断与沉静。最美的是眼睛，有脱俗的清澈。这些，与整洁合身的浅色便装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有意无意之间用女性的美丽为她经历的纷乱动荡的时代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我注目她，听她和先生、师母闲谈。当时没有相机，未能为他们难得的重逢留下影像记录，想想真是遗憾。

几个月后，1982 年 2 月，我毕业来到了北京。稍事安顿，我便去看望胡风、梅志，还带去了贾先生写给他们的信，信中贾先生请他们对我这位新来乍到者多多关照。当时他们还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大约是个两居室。经过在上海一段时间的治疗，胡风病情已有所好转，可以进行简单对话。他的神态虽显得木然，但偶尔闪出的目光却有力而倔强。家里主事的当然是梅志。

不久，得到政治上平反的他们，新分到一套住房，开始张罗搬家。新家在木樨地，是当年北京刚刚盖好的两幢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楼。一些复出的老作家，如胡风、丁玲，还有一批副部长级官员都入住其中。这年夏天，胡风一家搬进了新居。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把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搬家。记忆中，除了几书架书之外，没有太多家具，一辆卡车还没有装满。搬进木樨地，他俩再也没有离开。可惜胡风在这里只生活了三年就在 1985 年逝世。梅志晚年的最后二十二年则一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她撰写《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在这里，她写下一篇篇感人的散文；在这里，她看着小孙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这里，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稳、最有家庭气氛的日子——只可惜胡风早早离她而去。

2004 年 10 月，梅志去世，永远离开了他和胡风最后的家。而他们那年搬进新居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拥有稳定而平静的家，是梅志期盼一生的梦想！

1984 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请梅志为“居京琐记”专栏撰文，她写来的第一篇散文《四树斋》，就是描写他们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家。三十年代和胡风结婚后，他们一直都在漂泊。先是抗战期间的逃亡，再是内战期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1953 年，胡风用稿费在北京买下一个小四合院，位于景山后面，与北海

公园相邻。为妻子和孩子安排一个舒适安稳的家，是已经受到批判的胡风此时最大的愿望。他自己张罗着将房子修葺一新。他扩大了厨房，给厕所安好抽水马桶。小院虽只有四间房，但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又买来四棵树种上，分别是：梨树、紫丁香、蟠桃、白杏。这年夏天，一家人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然而，他们此时已经陷入困境之中了。搬进新家后，胡风高兴地将书房命名为“四树斋”，但第一次标明“写于四树斋”，就听到文艺界一位领导惊呼：“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1955 年 5 月，风暴突如其来，梅志在胡风被捕几个小时后，也被从家里带走。他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只住了一年多的新家了。几年后，这一带被拆除，盖起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院。房子被拆时，她和胡风都正在狱中度日如年。他们又没有了家！他们被关押十年，1965 年底刚被释放又赶上“文革”爆发，胡风被遣送至四川，梅志陪伴前行。接着胡风又被判刑，梅志仍然陪同，一起在劳改农场劳动十几年，直到 1979 年释放出狱，获得平反。从结婚那年开始，漫长的四十几年，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家庭主妇的人生就是这样走过……

幸好，在晚年梅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终于享受到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走到生命终点。诗人牛汉也为丁聪画的梅志肖像写过一段话。其中写道：“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真是精妙的诗句。

如今，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花与果实早已化为一体。

2002 年 10 月，胡风诞辰 100 年的纪念活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等部门联合在上海举行，年近九旬的梅志应邀参加。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她和胡风相识、相爱的地方，她与胡风共患难的起点。难得的故地重游。

此时梅志身体还不错。步履自如，言谈流畅，记忆也特别清晰。她见到了贾先生；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朋友……

她又一次走进位于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当年她和胡风曾是这里的常客。如今她在熟悉的房子里伫立良久。她缓缓走上楼梯，轻轻地抚摩鲁迅的书桌和藤椅。她难忘鲁迅对胡风和她的关爱。她指着大儿子晓谷对我说：“当时刚怀上他时，反应很强烈，我很害怕，不想要。鲁迅就批评我，还关心地为我找药，送给我。不然，就没有他了！”说完，她笑了。

她在上海寻找着记忆的温馨。这是真正回家的感觉。

我们找到了1953年她和胡风搬到北京前在上海住过的最后一个家——永康路文安坊6号。

走进弄堂，老房子依旧，几位老邻居竟然认出了梅志。他们惊讶八十八岁的梅志，还是显得如此精神，记忆还是这样好。谈到往事，谈到变迁，感慨无限。

走出弄堂，前行几百米，就到了三角花园里的普希金纪念碑。当年梅志和胡风常常散步走到这里，仰望普希金铜像，感怀诗人情怀。又一次来到铜像跟前，梅志看着，说铜像是重塑的，但基座未变。说完，她拄着拐杖，一个人慢慢地围着铜像走，然后，在石阶上坐下。

我注目她，如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老了，但她以生命书写的美丽，连同她的回忆录，永远带给人对历史的无限感慨。

她在回想什么，我没有问。

她还记得普希金赞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那些诗句吗？“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早年她曾把它们吟诵，此刻，伫立于此，她还会在心底把它们吟诵吗？

写于2004年11月10—12日，北京

曾卓:“悬崖边的树”,寂寞而倔强

诗人曾卓创作的诗有不少精彩篇章,最为人熟悉的无疑是这首他六十年代身处逆境之时所写的《悬崖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诗只有短短十余行,但具有丰富的张力。遇磨难而不消沉,经风雨而不易其志,悬崖边的树欲倒却又傲然挺立。一棵人格化的树,浓缩着诗人的全部情感和意志,甚至可以被看作理想化人格的一个象征。

我所熟识的曾卓,从一开始便留给我这种印象。第一次在武汉见到他还是二

十几年前的1979年，那时我正在复日大学念书。假期回家路过武汉，经贾植芳先生介绍，我拜望了他。当年他刚过花甲，但有一头漂亮的白发。作为一位"胡风分子"，他经历了多年磨难，但依然充满激情，交谈中表现出思想的敏锐和深刻。我结识了他，从那之后直到他去世，他一直都关心着我，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前辈。我平生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谈他劫后新发表的诗。那还是在1980年，这也使我在感情上与他有一种特殊联系。

曾卓是最早鼓励我写出《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人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纠葛之中，他一再强调我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描述文人间的是是非非，在这方面，他和贾植芳先生所持的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常常令我感慨不已。然而，他并非是历史健忘者，也不是平庸的好好先生，而是力图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了周扬，他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道："周扬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表现在他还有艺术素养，能看出一些问题，但在那种政治情形下，不能坦率地说出来。他说过胡风懂文艺，这至少是一种钦佩。但是，政治斗争麻痹了他的真正审美能力。"这里不乏尖锐，但我分明又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宽厚之心和宽容的气度。

1992年春天，我和他一起参加在广东惠州举行的世界华人诗人诗会。诗会结束的头一天晚上，也是清明节的第二天，诗人们在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举办诗歌朗诵会。挂满树枝的彩灯如水一般闪烁流动，几百名闻讯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围着他们慕名已久的诗人们。

曾卓在不尽的绵绵细雨中，抚摸他的白发，朗诵起三十年前身处逆境时写下的情诗《有赠》。久别后重逢的一刹那，淡淡的灯光，轻轻的握手，把全身心的爱升华在对未未的憧憬之中。我是第一次听他朗诵，过去我没有想到，用湖北方言朗诵同样可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激情，当他以高亢的声调结束朗诵时，我看到一些诗人和观众，为他的诗而落泪。

我坐在树影下，从暗处看他。灯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很投入。

细雨中，忽然一只鸟掠过灯光，从湖面飞来，又匆匆飞去。

我的目光顺着飞鸟往远处看去。如有可能，我想我愿意看到远处一片悬崖边上，有一棵老树仍然生机勃勃，在天空中凸现着优美的姿态。

一转眼，曾卓先生去世竟已有两年多了。我总是时常想起他。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他在汉口的那间小阁楼；想起他的满头漂亮的白发；当然，更会想起这首《悬崖边的树》。

灵魂在飞翔

——《像是要飞翔起来——路翎晚年作品集》序

这难道就是路翎?他还不到六十,却只能无力地靠在桌边,借支撑物的力量站起来。脸上的肌肉松弛了,折成一道道深深皱纹。他一下子没有认出他的老友,记忆力随着那蹉跎岁月流去,淡淡地留下些痕迹。那双曾经明亮、漂亮得让朋友们赞叹的大眼睛,没有神采,只是呆滞地缓缓环顾周围,用简单而含糊的话,回答老友热情的问语。

第一次见到路翎,他留给我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那是在 1982 年,我刚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上海的王戎先生到北京来,为了让我尽快在北京打开工作局面,便带着我拜访他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路翎。

自从"胡风集团冤案"发生之后,将近 30 年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文革"平反后,从朋友的讲述中,王戎才略为知道一些路翎的近况。他听说,在活下来的朋友中,路翎的状况是最为凄惨和令人痛心的。在 20 年的监狱生活中,路翎的精神常常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有许多事情他想不明白,强加于身的许多罪名他无法接受。他不像别的朋友那样开朗而达观,可以很快适应突兀而至的打击,用读书、学习外语之类的办法让自己沉静下来,从而在磨难面前始终保持一种心理健全状态。

路翎却不。他和胡风一样,在狱中永远无法摆脱每时每刻精神的折磨。他默默无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忘掉心中的疑惑和不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安静地入睡,让心灵得到一夜的宁静。这样,他的精神始终拉得紧紧的,从没有松弛过,最终,他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然后,在病愈之后释放回家,靠做扫地工挣一点儿工钱养家糊口。

在来看望路翎之前,王戎就听说了路翎的这一切,他早已做好了精神准备。但当他看到路翎以这样一幅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仍然呆住了。他不愿意让自己这种伤感刺激路翎,强打笑脸与之交谈。等我们从路翎家中出来,走在破烂不堪狭窄的胡同里,他禁不住落泪了。

在我认识王戎的几年里，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伤感过，更没有见他落过泪。此刻，我开始明白路翎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开始明白，路翎在经历过磨难之后，身上真是发生了强烈的反差。不然，像王戎这种开朗达观性格的人，是不会如此感慨，如此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表现出情感脆弱的一面。

第一次见到路翎时，他还住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后来，他得到了照顾，搬到位于虎坊路的中国剧协宿舍，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有了一套算不上宽敞的三居室。时代的变化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晚年的路翎，无疑是一种慰藉。经过几年的治疗，加上心情舒畅，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有了好转。眼睛不再是那种浑浊呆滞，而是不时灵活地闪动着。虽然谈起往事还不流畅清晰，但记忆力明显恢复了许多。他开始可以独自一人上街走动，还偶尔外出到朋友家串串门。他又写起小说，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

与人们久违了的路翎重返文坛，步履虽然蹒跚，对于他，对于读者，其意义却极为重要。过去熟悉他的名字的读者，欣喜地发现他重又拿起笔，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重新肯定路翎上世纪40年代创作所具有的价值。不少学者渐渐接近于胡风当年对路翎所作的评价，公认路翎是现代小说界颇具才华最有创新意识的独特作家。他在二十几岁写出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被视为现代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路翎不再寂寞。那个备受磨难、为人歪曲的路翎，终于在晚年得到了历史的公正。

正是在身体和精神渐渐恢复正常的日子里，路翎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创作高潮。那些日子里，我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先是因为在《北京晚报》副刊做编辑，不时去约稿。后来，为了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也常去访问他，从他那里收集一些资料。每次到他那里，都发现他在伏案写作。他似乎在和自己的生命较量。少言寡语的他，只是在写作中才找到情感宣泄的途径。

他写得最多最快的是小说。短短时间里，一篇篇小说，包括中篇和长篇，相继创作出来。可是，我偶尔翻阅它们，产生不出兴奋和欣喜。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架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每当他兴致勃勃地拿出小说手稿给我看，我心里就不由得掠过一阵阵悲哀。对他，我不便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就只能用一些的空洞的话鼓励他，不至于让他失去创作的热情。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他

身上会奇迹般出现从前那个路翎的影子，这些一日日所做的努力，会是一个新高潮到来之前的铺垫。

那时，我常常收到他寄来的散文新作，也发表了一些。我喜欢这些短小篇章。它们清新，细腻，用一种难得的平静，描述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市井生活的观察。

他写得最多的是当扫地工三年的生活。我记得他寄给我的第一批文章，几乎都与扫地工生活有关。首先发表的是《天亮前的扫地》(《北京晚报》1984 年 12 月 24 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从路翎那里要来一些照片，请丁聪配上一幅插图。

画的上方是路翎的肖像。他眉头紧锁，嘴巴紧抿，满脸悲愤与疑惑。画的下方，是路翎的背影。他在冬日黎明之前，穿着厚厚棉衣，系着围巾，手持扫帚，在清扫着胡同里的垃圾。尽管路翎写得委婉、温馨，并非一种伤痕式的记忆，但丁聪显然读出了文章背后所隐含的悲哀。



丁聪画路翎肖像

在这样一些散文里，路翎的文字特点开始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副刊上其他作者的作品相比，他的句式一般较长，仍带有早年欧化语言的痕迹，但其间也有一些变化。他习惯于排比式地描述一个又一个场景，从描述中写出他的感受。在他的笔下，扫地工生活充满温馨。他留恋天亮之前在胡同里度过的时光，他写和老扫地工之间的坦率和真诚关系，写扫地时街坊间给予他的问候，他写胡同里孩子们的欢笑，他写挨家挨户收卫生费的体验……

现在想来，当扫地工的生活对于在狱中度过 20 年的路翎来说，当然是一种安慰一种解放。和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普通老百姓中间，那种政治上的压力相对减少。虽然每月仍要按时写出汇报，但毕竟不同于幽禁时期的孤独和压抑，备受精神分裂折磨的他，也才可能渐渐有一种稳定和放松的感觉。

这就难怪对扫地工的生活情有独钟，用清新温馨的笔调来描写它。

类似的心情，也反映在他这时创作的诗歌之中。

暮春，
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
吸一支烟，
坐在石头上，

或者，
靠在大树上，
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
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震响，
传得很远，
宁静中弥满整个胡同。

（《槐树落花》）



丁聪画路翎扫地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诗意。痛苦日子的生活，在晚年路翎那里，竟然酿出如此宁静与清新的诗句。这是真正的诗。

与晚年的散文相比，路翎的诗更能代表他的艺术创作力。它们表明，他内心中仍然以一种特殊方式潜藏着艺术激情和才华。在灵魂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在精神仍不时笼罩着分裂状态阴影的时候，他似乎更适合于把握诗的形式。在沉默的时刻，在给人一种近乎于呆滞印象的时刻，其实他的灵魂正在飞翔。

显然，他的内心，有一片供灵魂飞翔的天地。他时常产生一些常人没有的感觉，这些感觉便成为诗的内核。过去生活的影子，过去曾经熟悉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成为他的诗歌想象的基础。落雪，记忆与想象中的青蛙，奔跑的马，向太阳飞去的蜻蜓……在路翎那里，产生出奇特甚至有些怪异的感觉。我相信，假如不是那种精神状况，有些想象、有些词语构成是很难捕捉到的。心理学家或者医生，大概可以解释类似的生命现象。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才更适宜寻找诗的意象，而路翎晚年的诗歌，由此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飞翔是他潜在的渴望。于是，在他眼里，夜间周围的一切，便给他一个奇妙的感觉，它们都像是要飞翔起来。闪烁的星斗、街灯刺目的亮光、楼房顶端亮着的窗户，甚至夜的寂静和婴儿的笑，也“像是要飞翔起来”（《像是要飞翔起来》）。

读这样一首诗，那个目光呆滞行走不便沉默寡言的路翎，一下子在我心目中活跃起来。我想象着，他坐在窗户前，凝望着外面的世界，内心一定有一种飞翔的渴望。正是有这种渴望，黑夜里的一切，才在他的面前旋转起来，飞翔起来，带着他的生命飞翔。

类似的感觉常常出现在晚年路翎身上。从而，他对色彩、声音、词汇有了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连结。

他写战马：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它自己看见。

他感觉到蜻蜓心脏的燃烧：蜻蜓的心脏是有豪杰的火焰的蜻蜓的/蜻蜓。

他想象春雨中青蛙的欢欣——

池塘、岩石比以往更可亲，
撞击在岩石上而鸣叫。
它撞击是因为欢欣，
然后便轻轻跳跃上去了。

整首诗前面十几行为一个整体，充满春雨般的欢欣，可是，路翎最后只用一行单列一段就突然结束了全诗：冬天的时候在泥土与树的洞窟中。在我看来，整首诗，因为有了最后这一句，才于突兀中显出了诗的张力。生命在这里形成苦难与幸福、压抑与自由的映照与连结。读到这里，我仿佛触摸到了路翎飞翔的灵魂。

如果将也收入本书的路翎写于1948年的长诗《致中国》，和他晚年的这些诗作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异。长诗充满着理性的思考和呐喊，具备另外一种力量。但是，很明显，这种诗歌的震撼力产生于叙述方式，而非晚年这种对意象的发现。也许可以说，晚年路翎更像一个沉迷冥想的诗人，而非年轻时那个充满激情的诗人。

读路翎晚年的诗，总是可以感受到路翎内心强烈的渴望。他是否仍在留恋地回想以往创作力旺盛的日子？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一个新的时代？我这只是一种猜想和假设，因为，在路翎的精神世界里，有我们难以透彻理解的东西。其实，我们很难与他对话。

但是，诗是一座桥梁。

非常感谢张业松和徐朗精心编选出这本《像是要飞翔起来——路翎晚年作品集》，使我们得以集中地欣赏路翎晚年的风采。读这样一些作品，心情当然不会轻松，历史沉重感也会油然而生。不过，同时也会产生些许安慰。毕竟路翎走过了磨难，毕竟路翎以他不屈的精神和富有独特性的创作，又一次呈现出他的艺术才华。

路翎的灵魂会永远在作品中飞翔。

1996年9月9日于北京

解冻时节

——贾植芳和他的家书

一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在20年前，当时他刚刚获准从监督劳动多年的印刷厂，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重操旧业。

中文系在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楼房多年失修，记得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总是咯吱咯吱发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

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后来，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在课堂教学之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作品和掌故。

后来，我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喝得最多的是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再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但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两人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当时吟诵出一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后来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句，大概

写于安史之乱之后。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已有21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不免显得懵懂。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然而，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的眼光观望着一切，更多时候，不是靠经验或者知识来与新的环境接触，而是完全靠兴趣、直觉和性格。

当时真正称得上是历史转折时刻。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一个新时代，仿佛早在那里作好了准备，在我们刚刚进校不久就拉开了帷幕。印象中，当时的复旦便是一个偌大舞台，国家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里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令人兴奋、新奇的戏剧。观念变化之迅疾，新旧交替的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给，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上党史课，一个星期前彭德怀还被说成是“反党集团”，一个星期后就传来为他平反昭雪的消息；关系融洽的同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竞选对手而各自拉起竞选班子；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会因见解不同而针锋相对，难分高低；同学发表《伤痕》、《杜鹃啼归》，点燃了许多人的文学梦……就



2002年10月，贾植芳（左）与牛汉喜重逢。

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变得成熟起来。思想在自由流动，视野在渐渐拓宽，知识在不断丰富。20年来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在这所可爱校园里开始起步。

引发出我这样一些感触的历史场景，当然就包括着与贾先生最初的接触。不久前我到上海，先生说他正在整理1978年前后的日记。他说我的名字大概在1978年年底时候开始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不过，最初他写成“小李”，而不敢写出我的名字。他说他有所顾虑，害怕会牵连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直接写出我的名字。他告诉我这些往事时，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我很感动。为他的善良，为他对学生的厚爱而感动。

触动我的还有先生的余悸。新旧时代转换，人生大落大起，季节乍暖还寒，不少他那种经历的人自然而然产生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是历史的产物。这样的余悸，也许早已成为远远消失的陈迹，渐渐被人淡忘。但当我一封又一封整理先生1972—1978年间写给任敏师母的几十封家书时(这次选载的是一部分)，这样的感触，便又成了我了解、理解他们的人生历程的重要心理准备。同时，一个变得陌生而遥远的时代，也就再度浓墨重彩地在那些字里行间凸现出来。

二

先生保留下来的这些信，真实而完整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背影。从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到对个人处境每日变化的描述；从购物细节，到生活叮嘱；从在印刷厂监督劳动，到回到中文系资料室重操旧业……六七年间个人的琐碎生活，无不映衬着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动人魂魄的历史瞬间。一旦联系到他们的命运变化，联系到产生这些家书的时代环境，它们就显得并非普通平淡。

解冻时节的生动记录。

对于他这种身背“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名的人来说，对于许多曾经被冰冻封存起来的人来说，1972年可以说是一个解冻时节的开始。

大约一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先生在将近30年前写给师母的信。

那次，我到上海，他递给我一摞信，说：“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

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

上面这封信写于1972年5月21日，是这批信中的第一封。

“1972年？我还在念初中哩！”

当时读完这封信，我脱口便是这样一句。的确，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来说，1972年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那一年与前一年其实很难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对贾先生，以及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几代人，它的意味却极为深远。

一切均因不久前的林彪事件而发生潜在的历史变化。

无数“文革”的参与者，肯定最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变化。林彪事件的发生，不仅仅将领导层的矛盾冲突，以一种激烈、充分戏剧性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更无情动摇了人们业已形成的盲目崇拜、狂热投入的信念。于是，均衡被打破，偶像也不再成为偶像。大张旗鼓的运动方式开始变得如同虚张声势的演出，受到不少人的冷落或者消极应付。可以说，不管是否清醒意识到，对不少有识之士而言，他们内心开始出现忧虑、疑惑与沉思。历史的理性判断，或多或少成为人们的一种愿望和内在要求。

冰冻的情绪、思想，开始萌发新的生机。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心里萌生出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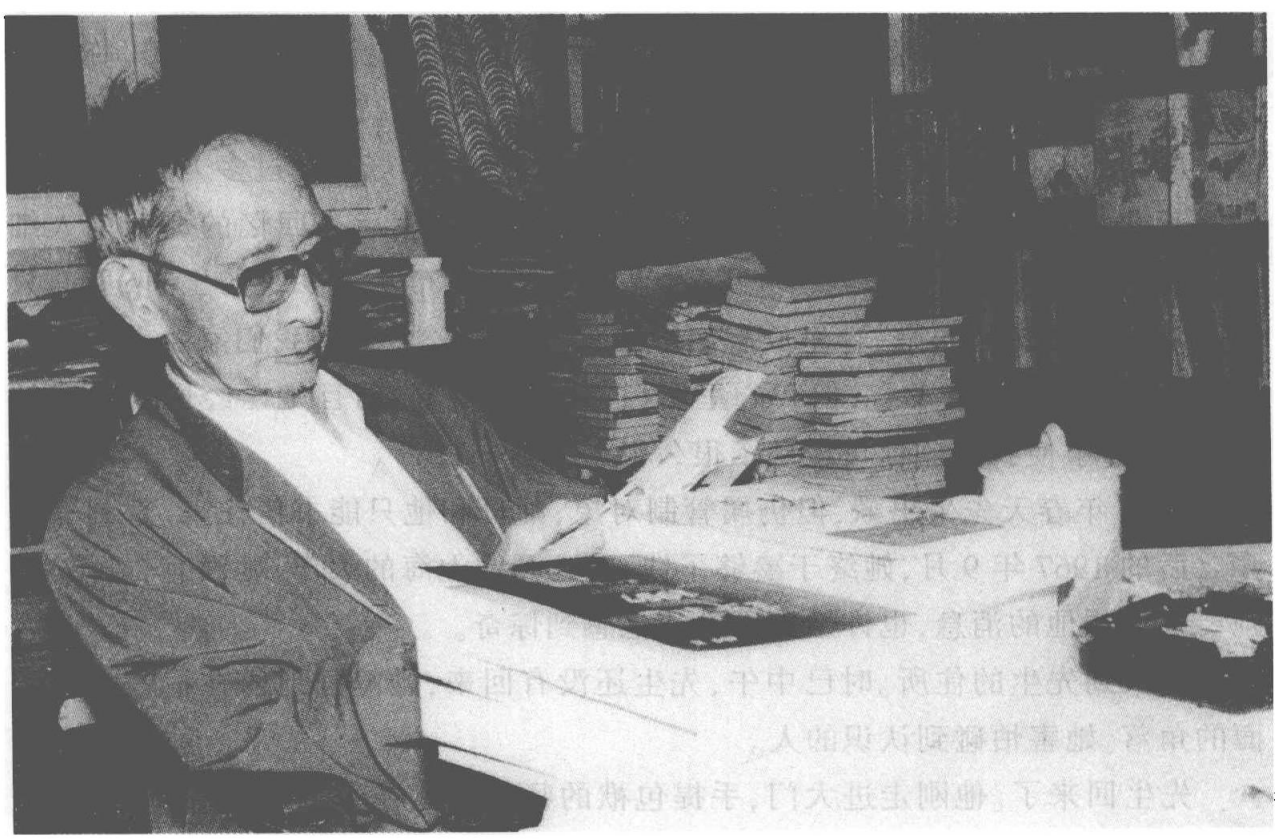
与之相伴随，被疯狂、高压、严酷捆绑得令人几乎喘不过气的生活，也渐渐趋于松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贾先生这样一些被管制的“异类”，所处的环境也就开始有所改善，周围的压力不再那么严重。这一年之后的一些家书能够保留下来，无疑与这一现实变化有关。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和同学们顽皮活泼地度过1972年的时候，在遥远的上海，会有一位长者用特殊心情，写出这样的家书。并且，几年之后，我成了他的学生，他们家里的常客。再过20年，又成了这些信的读者。

三

十多年前，当我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时，我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像胡风夫人梅志、路翎夫人余明英、贾植芳夫人任敏等这样一些受难者的妻子，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多么相似！她们背负着历史的磨难，承受着甚至超过丈夫承受的压力，在风风雨雨中走过。她们未尝一日淡忘过对亲人的思念，她们始终坚守着正义的信念。即便没有机会与亲人重逢，即便亲人也不知道她们的现状，但正是她们的存在，正是她们这种坚韧，成为亲人们精神的支柱，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当时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受难的妻子们”，正是想表达出我的这种敬意。

在认识先生和师母并且逐渐了解到他们的人生故事之后，这对个头一样矮小、一样精瘦的夫妻，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魁梧而高大的形象。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磨难。环境险恶，人心叵测，可是他们从未失去过做人的根本。正直、善良、坦荡、乐观，构成了他们的人格。我知道，不同时期的弟子们谈到对先生的敬



晚年贾植芳仍每天伏案，著述不已。

意和感激时，常常也就包括师母在内。

在某种程度上，师母经历的磨难更加令人痛彻心骨。

当年因为胡风案件爆发，先生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师母也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很快，在 1958 年底从上海被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师母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揭发师母在一位上海朋友家里的时候曾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又再度被关进了高原监狱。

师母初入狱时，凑巧看守所所长也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当女囚犯头目，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也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到了，这便是饥荒岁月。在青海，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一位牧民犯人饿得难以忍受，便央求师母帮助弄一碗牛奶喝。她想方设法偷来一碗，没想到，那牛奶是公安局长的，结果她被关禁闭，戴上了手铐。

从此，她被罚从囚室里往外抬每天饿死的犯人尸体。尽管她个头矮小，体弱无力，可是，她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常常是每次抬完回到房间，她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1962 年，她出狱了，回到山西襄汾贾植芳的家乡，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先生仍在监狱，她必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后来，果然是她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

她的出狱并不是正式释放，而是当时那里实在无粮，让她自寻活路。临行时还留给她一句话："先让你回去，什么时候要你来你就来。"

回到家乡，师母首先想到的是尽量打听到先生的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先生后来回忆的那个动人细节："1963 年 10 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 年春天先生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师母和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多之后的 1967 年 9 月，她终于凑够了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先生她要来探望他的消息，也许她更愿意让他感到惊奇。

她来到先生的住所。时已中午，先生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

先生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师母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感人的一幕。

我的叙述没有一点儿加工，甚至比师母的回忆还要简略、平淡。可是，当年在他们住的那个小阁楼房间里第一次听到她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沉默了好久。很多年后再写到这些，我仍然感到一股激动撞击心胸。

四

知道了先生和师母的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先生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师母，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他用各种方式各种语言为他们彼此鼓劲。“附信寄来的窗花—— 一对小鱼，我很感兴趣，联想到我国古代的大作家庄生的话：‘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们各自勉励，努力学习改造，争取早日团聚。”（1973 年 2 月）

健康，团聚，这便是一对受难夫妻当时最起码、也是最大的愿望。

> 这些日子没什么事，我身体精神都很健康。处理的事，也许需要上面批示，我这么想，所以还得等等，不能着急。来信说，你常想到这半年来忙于你的生活，想到我穿衣问题，等等。快不要这么想了，我常说，我们现在的惟一要务，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保持两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根本的根本，是最大的财富和幸福，穿的衣服只要能贴体和御寒就行了。你先不必为我的衣着操心，我倒是担心你腿不好，怕受寒，所以很想先把你的棉裤寄回，来信说，预请做一条，那也行，如无条件，即来信，好把旧的寄回。总之，首先要照顾吃饭，我住在大城市里，吃的总比你在乡间强些，每念及此，心里也很难受。但想到这些年艰辛的生活，对我们的改造和锻炼的意义，那收获就很大，也许这就是我们将来能再为人民和革命做些有益的事的最坚实的基础，如我所说，是千金难买的。这么一想，我觉得心胸很是开朗和广大。我想，你也应当有此体会。
>
> （1972 年 12 月 10 日）

6月12日的来信及汇来的8元钱收到了。知道你身体大健，使我精神上的负担得到解除，很甚高兴。虽然如此，但你年纪大了，加上生活的艰苦，应该从这次病中得出教训，重视生活上的保健工作，这样身体健壮，才能保持旺盛的精神力量，在生活和劳动中得到锻炼，为我们后半生的幸福，建立稳固的根基。要注意劳逸的适当安排；要加强学习，在思想上跟上时代前进。学习剪窗花很好，这也是一种精神修养，使精神上有所安排，集中，这样也能排除一些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保持一种内心的安乐和愉快。

（1973年6月24日）

你身体都好，我很高兴，反正我们这么拖了近二十年，两个人身体都好，并从艰苦生活中获得很大的思想收获，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还是那句老话，把我们的财力尽量用于支持生活，保持健康，你不能光吃窝窝，要吃细粮，年纪大了，乡下副食品又少，哪怕暂时不要买什么用品，一定要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生活上，精神健康，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973年7月2日）

你这些日子生活如何，是否吃白面？要吃白面。生活上绝不能过于艰苦，以致影响健康。油少，就多吃些蛋，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营养水平，把身体搞好！

（1976年11月5日）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这些文字，我明白了。

五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结束。

读1977、1978年先生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他内心的变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青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

（1977 年 10 月 4 日）

今年春节，我去上海看望先生和师母，翻阅他在 1978 年之后那几年的日记，这些日记，正好与这批家书在时间上相衔接。它们真实记录着解冻时节中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迎来新生，继续走向未来的行程。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成为他的日记中的一个人物。

翻阅它们时，师母在旁人的搀扶下走到先生和我面前。她已重病多年，几次被宣布病危。可是她却顽强地与命运较量，屡次转危为安，被医生视为奇迹。尽管有时她处在昏迷状态，但我相信她未尝一时忘怀先生。她非常明白她的存在对先生所具有的意义。她是先生精神的支柱。她仍然为他而努力活着。

他们一直在以自己的生命，以动人的情感，为这些家书做着最好的印证。

1999 年 3 月 7 日，北京

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

——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

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反戈一击”，永远是舒芜先生的历史尴尬。

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一群人的悲剧和他本人的悲剧，由此拉开了序幕。难以面对，却只能面对；难以言说，却不能不言说。尴尬或隐痛，注定伴随而行。

半年多前，友人寄来一份剪报，是舒芜2003年8月4日写给《书友》报编辑并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信中舒芜对化铁先生的《闲话贾植芳》一文予以补正。化铁的文章写到文代会期间舒芜邀请一些包括贾植芳在内的文人作家们吃饭，以“化干戈为玉帛”。饭后，舒芜又去客房拜访贾植芳。于是，在化铁笔下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 贾植芳露出一脸茫然的样子，对着伸出的手，用标准的山西话说：“您是谁？我不认识你。”
>
> 事后有人问贾植芳：饭都吃了，怎说不认识？
>
> 贾植芳说：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
>
> （转引自舒芜《书札一通》）

舒芜认为化铁的说法不能成立。他请贾植芳夫妇吃过一次饭，但不是在文代会上，而是在此之前的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期间；也不存在饭后去客房拜访之事。在补正中，舒芜提到了我：

> 1983年1月大约29日或30日，贾植芳、任敏夫妇由李辉引路，

> 到北京崇文门外豆谷胡同我家来，此为我与他们解放后第一次相见。我与李辉则素不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出版社工作，该社当时社址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后门就在我宿舍所在的豆谷胡同。贾植芳就是由他引来的。1月31日，即他们来访的次日或又次日，我与绿原、牛汉合宴贾植芳夫妇于前门餐厅，饭后同游中国书店，我购买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册。

舒芜的回忆大致不错。1983年1月，贾先生夫妇从上海来到北京，来参加现代文学流派研讨会。贾先生夫妇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全程几乎都由我陪同，一起去看望他们的不少朋友，如胡风梅志夫妇、路翎余明英夫妇等。他们夫妇也去看了舒芜。但舒芜的回忆两点有误。一，当时我的工作单位不是北京出版社，而是《北京晚报》，报社地点在东单，距他家不远。二，去他家的准确时间是1月28日上午。我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月28日，星期五：今天陪贾先生、师母跑一天。上午到舒芜家，下午到刘北汜家，晚到黎丁家。"

前不久，到上海，在贾先生家读到了他当年的日记。关于此次前去看望舒芜以及随后的舒芜宴请，他有很详尽的记录。北京之行的日记是回上海之后补记的，他把两个多星期的北京之行作了综述。其中写道：

> （1月）24日抵京……第二天早饭后，由此去梅志家，敏已于前一日由李辉陪同到了他们家，夜即宿此。以后这几天，去看了舒芜，由李辉陪同，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了，见了面得问贵姓，在此午饭。隔日舒芜来家回访，并约好牛汉、绿原由他们三个作东。隔了两天，约我们在前门饭店午饭，早上由牛汉接我们去，饭后又一块逛了琉璃厂、中国书店。舒芜居所也很蹩脚，他自号"天问楼"，敏说，可改为"天晓得"。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

贾先生的记录是准确的。那天去看望舒芜，我们中午确实在他家吃了便饭。后来舒芜的正式宴请，我没有参加，但听贾先生说过，是由牛汉、绿原、舒芜联合做东。不过，舒芜来客房拜访受到冷遇之事，却又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化铁的叙述将不同场合的事情混为一团了。

1984年年底，贾先生来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不是文代会)，我参加了大会采访，故大多时间和先生在一起。文学界中受到牵连的十几位重要的“胡风分子”，如路翎、牛汉、绿原、曾卓、鲁藜、冀汸等都出席了大会。胡风因病不能亲临会场，但他家与大会驻地京西宾馆相邻，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无形中也是一大愉快和便利。舒芜也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贾先生一天对我说，舒芜到他的房间来过，但他说不认识，就搪塞过去了。我想，就是这个故事，成了化铁行文的素材。

我相信贾先生能够这样做。贾先生常过他自己是一个“江湖人”，在历史动荡中闯荡，要把一个“人”字写得端正。我的印象中，这样一个“江湖人”，身上颇有玩世不恭的洒脱和豁达，甚至有几丝狡黠。如他当年的日记所叙，他去看望舒芜，绝非为了叙旧，更不是原谅了舒芜当年的举动。所以，对舒芜后来也没有逃脱“右派分子”的厄运，乃至当下居所的“蹩脚”，他都是在以另外一种目光冷对。记得在看过舒芜回来的路上，他就感慨地对我说：“舒芜最终也没捞到好处。”同时，他去看望舒芜还不排除另外一个因素，即他还寄希望舒芜有可能公开向他曾经深深伤害过的朋友，特别是对路翎，表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没有看到，因此，两年后当舒芜来访时他托词不认识也可说事出有因，顺理成章。

1986年我在准备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时，曾写信给舒芜，希望听听他的回忆甚至“难言之隐”。他给我回过两封信，表明不接受采访，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但他说自己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写，并对我如何描写他表示出豁达。在同年10月24日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接十一月十九日信。记得我们见过面的……您的研究工作，当然仍可自主地进行，对于我，不论怎样描写评论均可。”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一个个老去，故去。胡风走了，路翎走了……舒芜也终于出版了自述。在叙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一些史实的辩正(虽然这也非常重要)，而较少内心的解剖和道德反省。这当然不能让人感到满足。尤其是对那些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受到牵连的人。他们不能原谅他的避重就轻，遮遮掩掩，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当年环绕胡风的年轻人中，舒芜的才情和学识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在晚年撰写的关于周作人和妇女问题的随笔和专论，充分体现出他的这一特点。然而，才情与学识即便再出色，也难以弥补人格的缺陷。在谈及当年发表致路

翎的公开信以及提供胡风等人信件的过程时，舒芜包括有的论者，将侧重点放在接受新思想和追求历史进步上面，而对道德这一本质的因素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他们看来，舒芜之所以“反戈一击”，率先在文章中提名道姓地批评吕荧以及老朋友路翎，不过是思想选择的必然。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一个人要选择所谓“进步”或“革命”的思想，难道他就可以不顾友情，不管做人的准则吗？如果必须这样，其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经听说过为了某种需要而将父母兄弟杀掉的“大义灭亲”的故事，听起来总是让人毛骨悚然而难以接受。在我看来，再美妙的思想和理想的选择，都不能以牺牲血缘亲情为代价。

1952 年，舒芜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 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府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地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

该文的最后几句又是这样说的：

> 我希望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从书斋、讲坛和创作室中走出来，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第一步为自己创造理解这个文件的起码条件，进一步掌握这个武器。

这哪里像思想总结，分明更像揭发和举报！在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一做法无疑是树起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舒芜当年并没有身处“你死我活”的处境，他可以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接受新的思想，但完全可以不涉及他人，又有什么必要以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老朋友的方式来证明思想转变呢？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无非是他想以更积极、更主动的举动，来表明自己划清了与业已失势的“胡风派”的界限，从而也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立足之地。这就不难理解，在公开发表了这两篇文章之后，舒芜离开了南宁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北京，一时又成了风云人物。后来，虽然他依旧

不能受到器重，并难逃反右厄运，但这并不是他以及很多人最初所能预想到的。因此，舒芜的举动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所隐藏的私念和失去了道德准则所致。思想演变的分析，虽是认识历史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本相和人性的复杂。正是从这一思考出发，我把舒芜1952年的“反戈一击”，看作是比1955年提供胡风信件更为严重的事件。前者，主动权尚在他自己手上，他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后者，主动权则已在别人手上，他被历史惯性驱动而无法自拔，已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了。

历史的无情，就是如此降落在舒芜身上。

他必然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当回忆往事时，他依然难以面对心理的、道德的晦暗处。为他辩解的论者，也同样不愿意触动他最敏感的痛楚，转而以貌似深刻和艰深的“思想演变”来阐释历史场景中的他。

舒芜有一本文集，名曰《回归五四》。依我看，也许还应该再有另外一本书——《回到常识》。

写于2004-6-21，北京

绝响谁听？

——再读贾植芳先生的来信

贾植芳先生诞生于1916年9月29日，逝世于2008年4月24日。

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九十二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那篇最后的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先生晚年常爱这样为人题写："把人字写端正。"简单几个字，他用全部生命和人格写就。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他遭遇多年牢狱之灾，但他的精神锐气从未磨灭，他与胡风等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丝毫未减。他豪爽、乐观、坦荡，却非玩世不恭。他坚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完善，却并不迂腐。他看重友谊，却不袒护友人，相反，他总能超越于个人恩怨，站在更高层次、更开阔的广度反思历史，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和深度。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常爱对人说："写好一个人字。"他用人格印证这句话，也想以这句话熏陶学生，影响社会。

一杯酒，一只烟，一盘花生米、几片猪头肉，一碗炸酱面，一番海阔天空地漫谈……简朴的生活习惯中，先生享受着自由精神的快乐。

先生1937年以散文、小说创作走进文坛，《人生赋》、《热力》是他最初的精彩亮相，显示出他的艺术敏感性和现实观察力。然而，他没有把文学作为唯一选择和归宿。他翻译社会科学著作，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关注学术，拓展历史视野，遂成为他介入社会、敏于思考的另一选择。一旦走进大学校园成为老师，文学性情的挥洒、学术视野的开阔与自由精神的飞翔，这种至为重要的"五四"文化的传统，必然成为他能够履行好教师职责的基础。

尽管先生的教育生涯因磨难而断断续续，亲授学生不算众多，但不同时期的

许多学生,都把他当作恩师、亲人、朋友。学生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不限于学识,更多是“五四”文化特有的自由、开放精神的熏陶。特别是在1979年先生重新执教后,年轻的学生有幸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民国时代那些真正热爱教育、追求人格完善、善于教学的教授的影子。这是传统的余韵,这是历史脉络被割裂后的再续。一座大学,因有先生这样的老师,才真正具有魅力。

先生讲话,浓厚山西襄汾口音,难懂。他的笑谁都懂,爽朗,诙谐,机智,有时甚至还有几丝狡黠。年轻时给胡风写信,他用毛笔,短促有力而飘逸,好看。晚年字迹潦草难辨,一笔一划,他都用劲写,力透纸背。从1978年起,用这样的字,他写了将近三十年的日记,几乎从不间歇。日记,是先生人格的全部写照,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记录。

先生走了,这样的日记,恐怕也不大有了。

临近2008年岁末,写完上面这些文字之后,我开始整理先生写给我的信。

我与先生的通信始于1980年,止于2008年,时间跨度二十八年,计有数十封之多。2000年,先生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写给学生》一书,我从1980—1992年之间的先生来信中,挑选出35封公开发表。如今,我从1992—2008年之间的先生来信中,另找出8封加以整理收入《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之中。其中,先生的最后一封亲笔信写于2008年3月,距生命终点他只剩下一个月的行程了。

在这几封来信中,先生相继写到了陈思和、山口守、坂井洋史等,他们都是先生在复旦的中、日两国学生;李存光虽非学生,却因研究巴金而与贾先生有了密切交往。简短几封信中,与先生关系密切的几位学生和朋友却都出现了,实属难得。因此,我将之视为先生与学生交往史的珍贵记录。

整理先生来信,又一次在他的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山口守兄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叙述他的感受:“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来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们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

2008年即将结束的某天夜里，我梦见了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

同在2008年，家妹因病去世，山口守兄来信安慰我，有一段话他写得特别好："回想到那年我们访问你的故乡，见到你妹妹，已成了难忘的记忆。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对任何人的逝世不能说'安魂'或'离开人间'这种话，但将他们的形象可埋在自己心里深处，并永远记在记忆里面，这样故人就能活在自己脑子里。有时做梦能见到他们。这几年我也死了几位亲友。晚上睡不着时，时常想他们太难过，但后来我才想，回忆或梦里能见到故人也不坏，要不然他们会消失了。"

梦见先生和师母，说明他们没有消失。

他们怎么会消失呢？先生和师母的思想和情感，就活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活在我们的记忆和梦里。

时间真快，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先生的周年祭，谨在此献上我的心香一瓣。我想对他说：您和师母永远与学生们同行。

完稿于2009年3月2日，北京

贾植芳先生致李辉书简（八封）

1、1992年10月10日

李辉：

今天思和来寓说，应红进了北京医院，要开刀治疗。我们听了，十分惦念。她体质素弱，因此，在住院治疗期间，除了应遵医嘱服药外，更应该注意营养和休息，更要紧的心情要开朗，有"战时且当平时过"那样的情怀。同时，应该选择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主持开刀。因为据我的经验，开刀动手术，医生技术的高下大有讲究，我那次因车祸骨折住院开刀，因为是一位骨科的老军医，所以不仅开刀过程顺利，术后也没有任何后遗症，又为这次住院契机和这位老医生成了朋友。我国的医

学教育很不发展,“文革”前在校的医学院学生,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除了参加运动,批资产阶级,就是下乡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不务正业”,专业倒荒疏了。这十多年情况可能好些,比较注重专业教育,同时,也有不少国外回来的洋博士,医疗面貌可能有些改进,因此如果应红需要开刀,一定要尽可能地注意选择医生。据我的经验,老医生为好,除了医疗经验丰富外,他受的专业教育也比较严格(解放前,我国的医疗教育主要是老外经办的,像北京的协和,上海的圣约翰,就是美国教会办的,震旦医学院,是法国人办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是德国人办的,上海的同仁医学院,哈尔滨的医大,是日本人办的等),同时,这些老医生责任心比较强,认真负责,他懂得人命关天,责任重大,马虎不得。在我国没有颁发医疗法律的条件下,医生的医德是很重要的。

应红在病愈出院后,尤其需要休息一个时期,俟元气恢复了,再说工作。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才真正体会到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唯一的财产这条真理。尤其是今年上海气候反常,四、五月份我因搔痒症住院检查治疗了一个月,回来后,任敏又接着发高烧,折腾了近二十天才好,我们体会的就更深。

我们此间日子过的正常,今年没有外出,计划天气凉快后,十月将到浙江金华住几天,散散心。

现在就写到这里,祝愿应红早早恢复健康,出院回家静养。

此祝

双安!

贾植芳、任敏

1992 年 10 月 10 日,上海

2、1993 年 4 月 15 日

李辉:

桂英昨晚坐火车进京,想已看到了。

现介绍在我这里进修的日本访问学者星名宏修先生往访,并介绍你们相识和交谈。

星名先生原为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此次来

沪专题研究中国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我前两年去日本访问，在日本中国学会在东京大学举行的欢迎酒会上的讲演《我与胡风先生的交往与友谊》，就是他译成日文，分五期在大阪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上发表的。他为人笃实好学，此次进京访查资料，必要时，请能予以照顾、帮助是荷。

专此　顺祝

近好！并问应红好！

贾植芳、任敏

1993年4月15日，上海

3、1994年1月23日

李辉、应红：

你们过年好！

李辉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原稿一些失误处，我作了笔改。第二页开头："唐是说阿垅、方然到处骂人，我们又不惹他们"，这一段其中有漏失。事实是，唐指唐湜，他是九叶派诗人，因与我较熟稔，有往来，所以约在八十年代中期《文艺报》约他写一篇关于胡风的文章，他写好后寄到上海（他这些年长期住温州，这里是他的故里，但五十年代在《戏剧报》工作，住北京）给我看，其中说到55年反胡时，说，胡指使阿垅、方然到处骂人，也骂到他们，这就使他们不能忍受，因为他们对七月派并没开罪过，而且在旧社会，大家都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因此，55年反胡风时，无论左派、自由派都称快……云云。我看了之后，当场对他说，现在提这些不必要了，无论胡风，阿垅，还是方然，后来遭遇都很悲惨，阿垅死在天津狱中，方然跳西湖而死，请你原谅他们吧，他们对不起你们的地方，我作为他们的好朋友，向你们道歉，认错。经我这们一说，他倒不好意思了，所以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这些内容他事先都删去了。这是除范泉事件外，我第二次给人陪罪，道歉。你的记录稿，说到此事，可扼要地写一写。

又，记录稿中关于1945年毛到重庆时和胡风接触一节，是1946年舒芜在上海住在我们家里时说起的。

谢谢李存光老弟和你们的感情，四月间，如身体许可，我们一定去

北京逛逛，从79年8月以后，我就再没进过京了。

我们这些日子身体还好，没什么大病痛，桂英去年6月去了新西兰以后，家里雇了一个长工保姆照料我们，日子过得还正常，桂英他们也常有信或电话来，两人都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语言学校)。

去年年底学校突击买房，我们因为只有两个户口，所以房价要二万一千元，一次性付款，花了一万八千元。按照规定，住满五年后，此房可以自由出租或出卖。客厅的地板，去年年底也全部换过了(还是你1991年来沪时代我写的给党委书记的信，去年才落实了)。校修建科还说，房屋大修事，开春以后，民工们回来再进行。

这样，有了这几间私房，人的精神也自由一些，你们再来上海，就真的住在我们"家"里了。

上海从元旦以后，天气就不大正常，然冷忽热，忽晴忽雨，变幻莫测。也因此，我们只在家里围炉烤火，躲避春寒。

日本友人山口守先生，前信说他偕同他的老师松井博光先生以及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将在4月1日来上海，2日晚上在我家喝酒，3日去北京，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我们和思和再去，那就更热闹了。

先说到这里，祝你们

健好！

贾植芳、任敏

1994年1月23日，夜

4、1994年7月7日

李辉：

现趁周书兰女士进京之便，托她带上我们对你与应红的问候，并托你们对她多加照应，帮助。

你或许会想起来，书兰是桂英爱人书龙的姐姐，现在复旦图书馆工作。桂英外出后，她对我们日常生活，热心照应，帮忙。她此次进京系去新西兰大使馆办理在该国探亲签证。她北京情况比较陌生，为此，希望你们多加照应，另代购回沪火车票之事，还请亦为她帮忙。

我们一切正常，只是今年上海天气热得反常，报上说，有39度之高。恰巧这个热天我们家正在装修房子，我们临时撤到同宿舍两间房

子里暂住，因为是临时的，下月就可搬回去，所以原来的空调没有迁，也没有改装在这里，这样，人比较苦些，只有硬着头皮“抗热”了。好在近两天气温有所降低，最热的天气就算熬过来了。

原住房这次装修得比较像样些，你们如南来，也有了比较安适的落脚的地方了。

匆此，顺祝

健好！应红同此

贾植芳、任敏

1994年7月7日，上海

5、1995年11月2日

李辉：

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只是从你的来的电话中，得悉你与应红一切如常，我们才得到了慰藉。

前接山口守先生回东京后的来信，并附来他与坂井洋史先生所合写的那本论巴金的书出版社排印我的序文的小样，这个小样我事先未过目，校读之后，才发现一些误排之处，现将校改后的小样随函寄你，请便中转交出版此书的东方出版社责编黄金山先生，希望能得到校改，少些错处为好。

思和已于今晨动身去了东京，他前天在这里吃饭，昨夜来电话说得到东京的坂井电话，坂井准备今天去东京的成田机场车接他。闻讯之后，我们才放下心来。否则他人地两生，又不懂日语，即或有邀请单位早稻田大学的接应人员，但他们带你去乘机场的送客大车，并不直接送到你的住所，这就麻烦了，何况去接应的人不一定懂中国话呢。

我那本小书《狱里狱外》再版本，本月中旬可拿到书，届时，当签名寄给你们留念。

你上次电话说，下月可能来上海，我们听到好喜欢，因为我们两个都老了，能和你们见一次就是一次了。因此，更感到友情的珍贵。

上海这两天也渐渐冷了，所幸我们两个身体还好，没什么大毛病，家里仍有个小保姆照应我们，外面有事，有现在在学的研究生们跑腿，所以日子过得还太平。

那就先写到这里。

祝

健好!应红同此。

贾植芳

1995 年 11 月 2 日夜,上海

6、1998 年 4 月 3 日

李辉、应红:

你们离开上海后,这里的一位应届博士生马丽蓉同学来访,她是从新疆考来的回族女同学,她送来写当代作家刘震云的文章,文章不长,但写得有一定的自己见解,她希望能在北京的刊物上得到刊登出场的机会。为此,特将这篇文章寄给你们,希望应红能费心推荐到《文艺报》上发表,对这位同学应是一种鼓励与鞭策,这就叫"君子成人之美"。

这次有机会与你们在上海相聚欢庆,对我们这对风烛残年的夫妇,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也希望你们在繁忙的生活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希望加强自我保健意识,注意营养与休息。

希望年内我们能有在上海相见的机遇,希望能在报刊上能多读到你们的文章。

匆此,祝

健好!

贾植芳

1998 年 4 月 3 日,上海

7、1999 年 3 月(无日期)

李辉、应红:

你们好!现趁汪凌回京之际,带上我为"文革"中写给任敏的信的选辑写的几句话,文章信笔写来,你看后,如觉得行文有不妥之处,就请来个"修正主义",因为上海这个地方,文化气候还很"那个"。

我们近况,汪凌当可面叙一切。任敏病情已好转,但似仍需要住一个时期的医院。好在有思和就近照拂,因为桂英将小保姆带在医院照

应。每日有一位同学进驻家中为我烧饭和照应生活，这也是“非常时期”的措施。只要任敏病情得到控制回家静养了，我们的生活秩序也能比较正常运转了。请你们不必挂心。

春寒时期，望多珍摄！祝

健好！

贾植芳

1999 年 3 月

8、2008 年 3 月（无日期）

李辉，向您和应红拜个晚年，祝生活幸福，身体健好。

现介绍我的胞妹孙女毛巧晖来看望您，有所拜托。巧晖在复旦古籍所的博士后学位，后出站，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在此情况下，她在攻读博士生学位前的山西师大向她算账，真是狮子大张口。山西师大向她要的在她读博士学位后的这笔钱，数额巨大。按她现在的经济能力实在负担不起。您在京工作多年，如有熟悉山西相关单位负责人士和在教育部的头头脑脑请你从中关照一下，疏通疏通为好。

此信皆由她面陈。

握手！应红同此

贾植芳

2008 年 3 月于上海

（这是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所提毛巧辉应是在中文系的民间文学专业——李辉）

何满子：自龙门而来

一、龙门古镇

2009年清明刚过，人到杭州，4月9日，抽空前去新安江与兰江汇合处的梅城踏青。我是旧地重游。1981年，大学毕业前夕，与几位同学从杭州乘船溯富春江而上前往黄山，途中曾在梅城逗留一夜。将近三十年转眼过去，当年到此一游的余兴，随江水一直流到今天。

当年乘船两天的行程，如今两个小时即抵达梅城。返回杭州途中，兴致仍浓，行至富阳附近，高速公路上有一示意牌，赫然写着“孙权故里，龙门古镇”。我对朋友说：“走，我们去看看。”

古镇前的广场矗立一块巨石，上面镌刻一句碑文：“来这里读懂中国。”充满自豪，气势如虹。再看，原来是何满子先生所题。“啊，这是何先生的家乡！”惊喜中大声对朋友说。知道何先生是富阳人，却未想到龙门古镇就是他的故乡！熟知他的笔名“何满子”，反倒忽略了他的本名“孙承勋”，忽略了他与孙权的家族渊源。再读碑文后的题跋：“此地为吴大帝子孙千年繁衍之地，积淀了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仔细省察，可读懂中国。”显然，只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只有深厚的故乡情，才能使他写下如此豪迈的碑文。

“下次见到何先生，我得告诉他，龙门真的很棒！”我对朋友说。

不再有“下次”了。一个月后，5月8日，何满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我已来不及向他讲述龙门古镇印象，再也看不到他的总是锐气逼人的目光，也听不到他的直率、充满激情的侃侃而谈了。

二、上海解冻时节

认识何先生已有整整三十年。

1980年左右，我正在复旦念书，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贾植芳先生家中。除了他，当时，先后认识的还有贾先生的另外几位朋友王戎、耿庸（郑炳中）、顾征南等先生。

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时，满子先生与胡风并不熟悉，与《七月》、《希望》杂志也没有任何联系。而且，胡风听阿垅讲何满子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却又离开了那里，为此曾对何满子颇有微词。满子先生过往甚密的是贾先生，应该说，他的受牵连入狱，与贾先生直接有关。这也是他俩关系一直密切，来往频繁的原因。

正值历史转折时期，在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的日子里，这些曾被讨伐檄文描述为“青面獠牙”的文坛前辈，或温和，或爽朗，或激烈，以不假掩饰的真性情，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

第一次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正式平反是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七十六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不过，就在这一“复查报告”中，仍给贾先生留了一个“汉奸”的尾巴。于是，这段时间，贾先生再次遇到的不公正，成了他和朋友们谈论的中心话题。

贾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一期间他和朋友们的往来，详细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转折时节重要文化事件的珍贵史料。后来，我将贾先生1979至1981年的三年日记，起名为“平反日记”，连同家书等编选为《解冻时节》一书，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再读《解冻时节》，贾先生与何满子等朋友当年的痛苦、焦虑、气愤、申诉等情景，又在眼前——而在今天，有的人觉得他们的故事已说得太多，他们那代人的苦难不值得一提。甚至，更有人只挑剔他们的过失，从而将制造灾难者的责任化解，将历史的残酷变为娱乐化时尚中的滑稽一笑。

平反文件中,贾先生被留了一个“汉奸”尾巴,他和朋友们为之气愤。在朋友们的建议和鼓励下,贾先生就自己所谓“汉奸经历”的历史真相,向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写去申诉信。在贾先生这段时间的日记里,满子先生经常出现。

1980 年 10 月 25 日:昨日小雨。下午如约去炳中处,满兄已在谈。他们说,文件看到了,在《审查报告》中给我留了一个尾巴:1944 年当过敌伪淮海省参议,给郝鹏举写过《兴淮十策》,这是确实云云,并把我(共十一个人)排在最末。他们都很气愤,我听了也很惊异,怎么可以这么干,这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老手法。

1980 年 11 月 28 日:午饭后,和敏进市区。……游行至炳中处,他尚未归来,在巷口小店吃馄饨及面,小憩;六时到他家,南越已归,炳中随即偕满子同来,他们两个喝酒去了。……满子说,王元化给他打电话,专论及此事,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要坚持弄清,说他衷心怀念我,想碰一回头。总之,人们对之持分析态度,不像过去那么整齐划一地盲信了。

1981 年 4 月 27 日:前天,星期六,天色晴朗。上午全家在小顾家午饭,王戎、满子夫妇同座。满子夫人吴仲华,有二十多年未谋面,今天忽然出现,出乎意外。她并不显得苍老。饭后一齐步行至长春路,南越结婚在此请客;小顾小儿在此当头头(一家饭馆),客人共五桌,四桌都是女方亲友,只有我们一桌是“文人”,尚丁偕外孙也来相庆。菜甚丰盛。我举杯向满子夫人道歉——由于我和他们夫妇相识,使他们 1955 年、1957 年都吃苦;我又和尚丁对饮一杯,他也在 1955 年因我的关系,被关押年余,1957 年又被打成右派,去青海流芳四年。他倒坦然。他说:“这些年未被整过的人,倒要注意。”这真是一句名言。相聚至 9 时散席。

一年之后,贾先生的申诉得到回复,新的文件割掉了留给他的这一“尾巴”,对于他,政治范畴的平反终于结束。在 1981 年,这无疑是贾先生和上海朋友们的一件大事。

同一年,对他们来说,另有一件大事:胡风重返上海。

因多年牢狱生活,胡风身患精神分裂症,获平反后,被安排从北京到上海龙华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并由夫人梅志和女儿晓风陪伴。劫后余生,上海的这些朋友们,终于有机会与胡风梅志见面了。

"文革"一结束,胡风的朋友们就开始四处打听他的下落,直到1979年才有消息传到上海。满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中这样回忆当年情形:"这时盛传胡风已死,老贾还唏嘘不已。夏天,鲁藜来,知道阿垅、芦甸均已物故。秋天,曾卓来,这才知道胡风还在人世,后来又从聂绀弩的信中证实了胡风的健在。"(在寻找胡风的过程中,满子先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打听到已出狱的胡风梅志在成都的地址后,他立即写信给在成都的小姨子,请她代表他们前去探望胡风梅志。于是,何夫人吴仲华的妹妹,成了第一个前来探望胡风梅志并请他们吃饭的人。

共同的历史灾难,真正将相关者都紧紧连在了一起。谈及自己与"胡风集团"的关系,满子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中感慨不已:"这些朋友在以前确也没有特别的交情,经过天才的组织家把我们组织成一个共同的集团,经历了命运相同的苦难,仿佛真有了那么一种说不出的'组织之情'了。"

到上海治疗的胡风需要静养,上海的朋友们遂与梅志先行见面,时间是1981年5月29日。阔别二十五年,劫后重逢,对于他们,这都是一个难忘时刻。贾先生在次日记录如下:

> 1981年5月30日,夜　昨天早上偕敏与李辉出发,我和李辉去看美国图书展览会,敏去小顾家等我们午饭。
>
> 看了一上午图书,抄录了一些书名,可用者不多,想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查"之故。
>
> 11时许出馆至小顾家,老何已在此,他读了《人生赋》,评曰:这是"中众化"的作品,鲁迅为"小众化",他说像契可夫,说《更下》好些。
>
> 饭后,偕小顾去看老耿,曾卓、满子陆续来到,又同回到小顾家喝茶;小李见过曾卓后别去。六时许,梅志偕晓风来,二十八年不相见,她并不显得苍老,比我还大一岁;晓风满口北京话,我已

不大相识了，但她说“贾叔叔样子没有变”。张公已住院，医生禁止会客，他的病情到沪后有所进步，他已清楚他来到了上海……二十五年后，想不到又在上海相聚，历史总是冲破了它的阻力正常前进的。

如日记所述，我陪同贾先生一起参加了他与朋友们的聚会。不过，我想不起来，那天我为何要先行离去，没有留下来等梅志先生到来，因而错过了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

几个月后，他们与胡风在龙华精神医院的重逢，我更是无缘见证。

据贾先生日记，具有历史性的重逢是在 1981 年 10 月 13 日：

今日礼拜一，早上全家出动，坐车到龙华病院看谷非兄，他们一家将于月半飞返北京，近十时到医院，诸人已在候，请到一位大夫帮照了几张相，最后我们两家六口合照一幅。他不能多言，但看到我们很高兴，一直望到我们离去，他才去午休。与梅志母女及诸友坐车至曹家渡，在此午饭，算是为她们送行，席上有一条大鱼，由梅志带给光兄一尝。

日记未写出名字的“诸人”，是耿庸、何满子、王戎等人。贾先生在《悲痛的告别》一文中描述他们一起与胡风重逢的情景：

我们进屋时，他还在床上躺着，听见我们和梅志说话的声音，他吃力地挣扎着下床，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我们也很激动，但强自克制着，强颜欢笑地扶他下床坐在沙发上。他显出一幅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眼泪，梅志不断地替他拭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我们不能自持了，我们夫妇泪流满面地离开了这个变相的监狱——精神病院。是的，相隔二十六年之后，我们终于又相见了，我们的泪水里，有着欢欣的激动，而在他的这种激越的感情里，还包含着对因他的名字而遭株连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青年的歉愧之情。但是人们是不会怪罪他的，因为这是历史的恶作剧……

此情此景，今天再读，仍让人唏嘘不已。出现在这一历史场景中的老人，已先后远去，满子先生是最后一位。如今，他走进天堂，与患难朋友重逢，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痛饮，一起针砭现实臧否人物。远离人间，可以无所顾忌，尽兴挥洒性情了。

三、回望历史悲剧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印象中，多年来满子先生很少来北京，但在胡风去世前后，他有两次专程赶到北京，与胡风做最后告别。

胡先生忽然病重是在1985年4月上旬，他住进了友谊医院。他被确诊胡风患贲门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动手术，只能作化疗、吃中药缓解。医生确定，很难活到十月。对所有朋友来说，这是惊天霹雳，他们纷纷从外地赶来探望。

那天，我去医院看望胡先生，先到附近路翎家中取稿件。他和夫人听说我要去友谊医院看胡风，执意要我带一个鱼罐头去。告诉我，他们刚和何满子一起去医院看过胡风，特地送去新版《财主底儿女们》。胡风爱吃沙丁鱼，不少朋友都送鱼罐头，他就路翎带走一盒。晚年路翎一直言语不多，这一次却一再反复叮嘱我："你带去，一定让他收下。你别说是从我这儿拿的，就说是你在街上买的，他爱吃。"

带着胡风送给路翎的鱼罐头，我走进了病房，把罐头送给晓风。晓风指着父亲床头柜上的有一盒罐头说，路翎刚才也送来了。罐头旁边，躺着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他们不知道，我拿来的这盒，原本是胡风送给路翎的。

后来，满子先生这样回忆他与胡风的最后一面：

> 胡风住在单人病房，病人的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和一张小沙发。胡风闭目坐在沙发上，我进去后只是微微张一张眼，下颌微微点动，示意我坐在他身旁，表明他神志是清楚的。但自始到终不发一言，魁梧的身体已很瘦削，脸色暗青，病魔已把他侵蚀得异常萎顿了。
>
> 病房里除了女儿晓风在陪待以外，聂绀弩和周婆派了吴丹丹正在看望他，不久，路翎也带着刚刚印好的第一部的《财主底儿女们》来了，把书捧在他面前，翻开给他看他所写的序言。这时他大约有一

两分钟的时间张着眼，在路翎指点着书时，他脸上闪过一脉轻微的，如不注意难以察觉的欣悦，但立即闭上眼，不再有表情了。连晓风一匙一匙喂他冰淇淋时，也只是闭着眼啜入，口唇的翕动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这只能是最后一面。6月8日，踞确诊还不到两个月，胡风去世，享年83岁。因官方悼词内容等问题令家属不能接受，遗体停放在医院没有火化，将近两个月才由家属和朋友们自己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仪式。再过几个月，在胡风逝世七个月后，正式的追悼会才在北京举行，应家属要求，文化部同意请部分因胡风而受难的主要人员来京参加追悼会。

满子先生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与他同行的上海朋友有贾植芳、任敏、耿庸、王戎……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外地来人都住在西直门外一个并不起眼的上园饭店。追悼会之前的一个晚上，大家汇集在饭店的会议室，由满子先生挥毫抄写挽联。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与书法功力，在朋友中属佼佼者，由他来写挽联，堪当重任。

房间很静，空气显得凝重，除了偶尔就挽联内容议论几句外，大家很少说话。我们站在一旁，注视着满子先生挥洒哀伤与悲愤。

第二天，追悼会结束后，梅志请大家一同到家中吃饭——这是迄今为止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许多人都来了，而胡风先生永远不可能来了。

饭间，互相敬酒之后，满子先生忽然站起来，背对阳台，面朝所有人大声提议：“来，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们干杯。”高亢语调中，我听出了悲愤与凄凉。

一些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名字：方然、吕荧、郑思、彭柏山、满涛、阿垅、卢甸、黄若海、张中晓、王皓……

就在这次聚会之后，我开始确定研究方向，想趁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健在时，首先做好史料搜集和口述实录，以便为未来的写作做准备。

满子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1987年，我去信请他回忆被捕的细节，没想到，他写来一封非常详尽的长信。信如下：

李辉同志：

6月11日来信收到。因近日忙于研究生答辩，迟答为歉。

你所需要知道的情况，简述如下，事实非常平淡，几乎毫无戏剧性。

5月13日舒先生所提供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感到了一点紧张气氛，但我自感即使有事情，也牵连不到我。15日，星期天，王戎到我家，十分紧张，说他已作交代，劝我也交代和“集团”的关系。我说我与“集团”有什么关系？他说，他是奉了吴强（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之命来叫我交代的。我未予理睬。这是第一个朕兆。

但我仍觉得无论如何牵不到我，当时我住在利西路44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几家人共住，有电话。星期一（16日）我外出回来，邻居告诉我，市委宣传部姓吴的，打电话来，约我去一谈。我心里就料定是吴强，心想素无来往，要谈，他可来谈，他有的是车，何必要我去；当即打了电话去，吴不在，托接电话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请他来。也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这是第二个朕兆。但当时仍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突然。

次日晨七时，我刚起床，全家也都正在梳洗，门外有敲击声，我小女儿的奶妈开门，进来的是两个便衣，未等我问来意，就问我名字，宣布：“你被逮捕了。”我一怔，问：“犯什么罪？”来人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一人说：“去了就清楚。”于是取出逮捕证，是市公安局长许建国签署的。接着用手铐将我铐上。这是门外又进来两人，警服，将我带出。那两个便衣留下。（以后我才知道那两人是在我走后进行搜查罪证）。

门前停有一辆小汽车（花园内的门，不是栅门外），我被拥进车中。其中一个警衣者再上楼去交代（或请示）了片刻，下来后才开车。车出门外，总算去了手铐。车子东转西转（这是特意如此，不让我知道所去的地方），大约开了至少一个半钟头，才又在一条马路上停下。从一个小门中把我带进，我看手表，其时已近十点。

进入一间过道式的房子，命我坐下。引来一个人，问我早餐否？我说没有，也不想吃。其人说：“我们对犯人也‘革命人道主义’，饭你要吃。”进去张罗了一下，端来一碗面条。

这时，人们大概在办什么手续，决定关押在什么地方之类。大约十一时，才又由押我来的两个警衣人带出，乘原车到那房子附近的一幢楼房，由大门驶入。在一间办公室，命我将身上的钱、笔、手表、

皮带、鞋带，一律取出。开单，命我点数签字。我还点什么，签字就是。接着我被关入一间单身小房，有地板，但无光，整天开电灯。并给了毯子和被子。

我的牢狱生活从此开始。下午，我从要香烟的声音，听出了耿庸就关在我里边的一间中。我在此屋关了三天，才开始提审，而且换了一间有两三个案情不同的人的合居房间，以后并不断换房。后来知道关的地方是建国中路卢湾区的公检法办事处（公、检、法联在一组房间）。

情况就是如此，至于心境之类，我不絮叙。你要写起来，可能枯燥乏味之至。梅志来信，说某出版社要当事人每人自述一篇，结集出版。不知与你的是否是一回事？

因忙，匆匆写此，祝

著吉

弟：何满子

1987 年 6 月 22 日

正是在像满子先生这样一些当事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才能很顺利地完成一系列采访，并写出了《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想想自己，当时胆子也够大，还不到三十岁，缺乏一定的历史准备，居然敢动手做如此大的写作课题。我总说自己进入大学后是个幸运者，常常得到前辈们的厚爱与慷慨，这些前辈中，就包括在上海时期经贾先生介绍而结识的满子、王戎、耿庸等先生。

对年轻一代厚爱与慷慨，却不意味着满子先生是个“老好人”，相反，他性情耿直坦率，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从不掩饰，落笔犀利激烈，甚至火药味浓。，为此有人激赏之，也有人批评之。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没有了他，我们会感到冷清与失落。他的有些观点和行文风格，有的我并不赞同，譬如他评论张爱玲时的毫不留情，乃至在 2005 年以我不认可的方式导致陈子善兄策划的研讨会流产。但是，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君不见，正是他的特立独行，正是他的一篇又一篇犀利激烈的杂文，使三十年来的文坛，多了堪可珍惜的阳刚之气，多了野马奔腾的粗犷，多了拔剑四顾的苍凉。

对满子先生的坦率与耿直，我有切身感受。1988 年冬天《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发表后，满子先生一方面肯定我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尖锐批评。他先请贾

先生写信转告他的意见,大约一年后,又直接来信再谈己见:

李辉兄:

从王戎处知道你的书又将重版,并说起我对此书有意见。我前曾把我的看法告诉贾兄,请他转告。关于写到我的部分,有几点事实上的出入:1、我没有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过,当梅林、耿庸等到新文艺去时,我仍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与贾兄一道;2、在释放时,工作人员没有(你想他们怎么肯这样说)对我说:"你过去是革命的。"当时只是说:"你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我们花了不少钱,飞机火车,还算对你了解了。这对你也有利嘛。"言下之意当然是历史清楚,倾向尚好,没有反动的劣迹;3、释放后至去宁夏前,我并未与王戎等人经常来往。当时惟一接触颇多的是耿兄的夫人王皓,她在自杀前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办内刊而要求我帮忙。其他的人顶多只是见过一两面。

以上是具体事实出入。全文总的意见大致有两点,恐怕也不大容易改好。1、在你的叙述中,不是将这些人从他们各自的道路上出发,对当时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保持各自独立的见解,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而是好像真是一个集团,八方配合,有组织的对抗和进行。这不符事实。这正是案件制造者一贯宣传、企图在群众中造成的印象。你的文章正好支持了案件制造者的设想。这点影响可能不好。2、在亲近的家属中竟没有余明英的情况,和其他几个受害者的比较中更显出对她遗漏的不应该。

以上两点,可能许多朋友都有共同观感。第一是可能只能从字面稍作改动,要扭转来较费力;第二点作些补充大概是较方便的。

我以为贾兄已告你,故未再写信。现仍将所见率直奉告,请参酌。耑上,候

撰安

弟:何满子拜

1989 年 10 月 26 日

虽然我并一定同意满子先生对我的第一点批评,在如何还原历史的处理

上,彼此可能有不同理解和想法。但能够得到他如此坦率和具体的指正和修改建议,我更感到前辈的一种信任。多年来,正是在这样一些不可多得的情感滋润下,我感到生命的充实。

十几年后,2003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拙著,我寄赠一册满子先生,他当即回信。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信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细节:

李辉兄:

收到惠赐《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新版本,感谢无限。认真读了新增入的《风雨中的雕像》,写得很好,比正文更出色。

你大概不知道,你在 385 页上,写的香港《开卷》上那篇署名"徐盈"的文章,是我写的。原来署我的另一笔名"韩盈",因此文是一位我与耿都认识的徐大椿女士赴美经港带去的,故改成她的姓。据说,这篇小文起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作用。据李一氓谈,当时中联部(他们注意这类港台资料)曾印在内部参考材料上供参考过。梅志知道这事。附告。

再次感谢赠书。匆祝

撰安

弟:何满子

2003 年 4 月 11 日

满子先生所谈"徐盈"文章,我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1980 年,胡风在北京与朋友含泪重逢时,海内外舆论界已经在关注着"胡风集团"的平反进程。

1980 年 5 月出版的香港杂志《开卷》2 卷 10 期,发表了徐盈在美国的演讲纲要《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中的轴心》,集中谈到了关于"胡风集团"彻底平反的问题。作者认为:"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以后的'反右'和'四人帮'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规模虽然更大,但就严格意义上说来,已不属于文字狱的范围,而是政治性事件了。"

作者认为对胡风集团一案如何处理,将关系到文艺界是否真正

团结、是否有前途。他写到——

“但是，中国文艺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能否真正安定团结，就要看宗派统治是否能得到彻底铲除；那试金石，首先就是要看胡风案件是否能得到彻底平反。因为这是三十年中国文艺斗争的轴心。这并不是要不要‘向前看’的问题，也不是要‘翻老帐’，而是因为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文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看来，阻力仍相当大，这还得经过相当曲折艰苦的斗争，但前途应该是光明的，否则，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记得当年写作时，读来自香港的署名“徐盈”这一文章的剪报，我曾猜想作者是否为《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还为他能在美国发表这一演讲而钦佩。满子先生的来信，为我解开了一个谜。

却原来，机智的满子先生他，以杂文家的想象力，虚构出这样一篇演讲，在中国历史转折之际，为乍暖还寒的文坛再洒融雪剂，从而使胡风，使满子先生本人及朋友们的解冻加快了速度。

事过境迁，一个细节的还原，为沉重的悲剧抹上了一份喜剧色彩。走笔至此，我分明看到满子先生面对历史老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他笑到了最后。

四、旧作上的题跋

在1955年陷入逆境之前，何满子先生一共出版过三本书：《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论儒林外史》、《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自2003年开始成为旧书网的常客后，我先后觅得《论儒林外史》的两个不同版本和《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一种。每次买到后，我均寄满子先生请他题跋。

之一：

《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上海出版公司，“中国文艺研究丛书”，1954年3月第一版，1955年1月第二次印刷。字数57000字，印数7000册。

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此书为我早年涂鸦之作。当时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机械的意识形

态氛围下，缺乏不投时好的觉悟，率尔议论，思之常感愧恧。深盼其能绝迹于人世为幸。不意李辉兄竟觅得一本，重读之不胜汗颜，非仅通常"愧少作"而已。但此为既成事实，只能深自任咎也。

2004 年 6 月

何满子识

重读旧作，满子先生极为认真。他在不少地方用红铅笔画上了红道。以下为他画上红线的部分文字：

1. 其实这种借题讽世之词，不过是他未获委用的酸葡萄情绪的发泄罢了。由于怀才不遇之感，这颗自叹不幸的"蚌外之珠"便发而愤世嫉俗，成为狂生；发而孤芳自赏，成为傲士。(43 页)

2. 他的人生态度，是灰色的，冷眼旁观的，清客式的，游戏人间的。他把人生看作梦，看作舞台，而他则是游手好闲的一个票友——带着凄惶味的插科打诨的演员。(45 页)

3. 对他所敬慕的朋友如王斲山者，尚且如此油腔滑调，陶情笑谑，则对他人他事，亦必卖弄机智，到处插科打诨以娱己娱人。……以谈说悦人，佐人饮酒，这分明是帮闲清客的行径。……其名其文是离不开其人生态度的，而人生态度又决定其思想意识和社会地位。虽至刀架在脖子上，依然要发"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这类玩世的自嘲，实是插科打诨的本性难移之故。(48~49 页)

写作该书，作者称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书末写道："鲁迅先生对金圣叹是否定的，他评金本《水浒传》，只说了'惟字句亦小有佳处'一语，别无一字之赞。其高见卓识，实在令人钦服。写完本篇时，不禁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兴起由衷的崇敬和感念。"作者这样评价金圣叹："在封建士大夫阶级中的正统派眼里，金圣叹自是一个狂狷之士，一个不安分，不走正路的左道旁门。"

在我看来，该书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杂文，而非严谨的学术论述。上面所引画红道文字，集中表明作者更像一位锋芒毕露、不留情面的斗士。

诚如他在题跋坦言，此乃"机械"氛围下的作品，难免"愧少作"。

之二：

《论儒林外史——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上海出版公司,“中国文艺研究丛书”,1954 年 11 月,字数 39000,印数 16000 册。

该书内容提要写道:“本书内容分九章,分别探讨了我国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高贵的品质、伟大的良心,他的不愿和封建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超拔精神,他的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卓越的艺术才能,以及他的不朽的巨著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这部巨著的内容在今天对于我们还具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实验主义论者对吴敬梓所作的不恰当的评价,澄清主观观念论者的谬说。”

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 此为五十年前旧作,出版方半年,即被胡风案株连入狱,从此告别文字生涯廿余年。五十年前之书,存世已罕,李辉兄竟觅得一册,重睹此书,不禁感慨系之。
>
> 2005 年 11 月
>
> 何满子

我还另买到《论儒林外史》1957 年的新版,改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满子先生题跋如下:

> 此为本书第二版,初版 1954 年出版于上海出版公司。两版均已难得,今李辉兄觅得,亦奇遇也。但本人则徒惭少作之幼稚焉。
>
> 何满子
>
> 2003 年 2 月

新版《论儒林外史》的重要,在于为了解满子先生的经历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曾被作为“胡风分子”而被捕的他,一年后被释放,适逢 1957 年春天的鸣放时节,他又获准出版旧作。在 3 月新写《后记》中,开篇写道:“这是 1954 年的旧稿,最近新增了三题,通篇并作了一番修芟,但读书有限,识见不广,仍然只得以疏漏的面目献给了读者。”对于他,这是突遭厄运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虽然书的面目“疏漏”,而在当时情形下就一个文人的政治生命而言,此书的新版无疑是一种完满。不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完满”转

瞬即逝。

三本书中我未买到《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不算完整。如今,即便有幸觅得,斯人已逝,又如何求先生再题跋于书呢?

惟有叹息。

五、又回故乡

回到龙门古镇。

难以理解,在这个有着辉煌历史传统的村落里诞生的孙承勋,舍弃诸多足以"光宗耀祖"的名字不用,却为何选择了被伤感悲哀浸泡得格外沉重的"何满子"三个字作为笔名,陪伴自己走完漫长人生?

"一声何满子,落泪到君前。"从古到今,"何满子"在诗歌中,无不与苦难与痛苦相关,最有名者莫过于白居易的诗句:"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他还这样注释说:"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满子先生自幼熟读经典,白居易的诗句和"何满子"的典故,他不会不清楚。可是,他却选择了它。

于是,孙承郎从龙门古镇走出,何满子向世人走来—— 一个桀骜不逊、坦荡无畏、不惧是非的执拗文人,充满自信地走来。

磨难却不期而至,将他笼罩。历史悠久的"何满子"典故,因这个人的遭际而在20世纪多了新的浸泡,多了名字与命运的巧合。

满子先生离开龙门多年,重返故里生活则是在命运多舛的1966年秋天。不是衣锦还乡,更谈不上光宗耀祖,而是以戴罪之身从上海被遣送龙门。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头等大事中一个小人物的遭遇》回忆说:

> 这时,我收到吴仲华从家乡的来信,诉说她在乡间也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抄家和凌辱。信是拆开了的,显然被检查过。9月底,红卫兵便向我发出了驱逐令,张贴在单位院内的广场上。内容大致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何满子,在家乡有极大民愤,当地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押解回乡批斗,特下驱逐令,于二十四小时内押解回乡,云云。……下驱逐令的次晨,我就被押送回原籍乡间,一直放逐到1978年冬天,共十二年整。

二十多年前，满子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还讲述过自己在家乡被批斗的故事。说是批斗，但因为都是姓孙的本家，碍于情面，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对他的批斗，总是戏剧般收场。

有人大声宣布："何满子是胡风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自己交代。"

他上台交代几句。

"不彻底！"本家们齐声高呼。

"那让他认罪。"

他朝着观众三鞠躬。然后，随即有人宣布："好，散会。"

日子艰难，却少了在城市单位里的严酷无情。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满子夫妇在家乡龙门住了将近十二年，直到1978年解冻时节的来临才返回上海。

谈到故乡的十二年生活，满子先生写道："乡村的劳动人民确实很厚道诚朴，即使对我这个'朝廷钦犯'也照顾帮助，比起上海的牛鬼们来，我受的折磨要轻得多……"

故乡以这种特殊方式，为受难的何满子提供了温暖。

故乡难忘。可以相信，当晚年的他题写"来这里读懂中国"时，他没有忘记龙门古镇的一切。

如今，他已魂归故里。

"一声何满子，落泪在君前。"千年龙门古镇，你看到了归来的游子吗？

完稿于2009年8月27日，北京